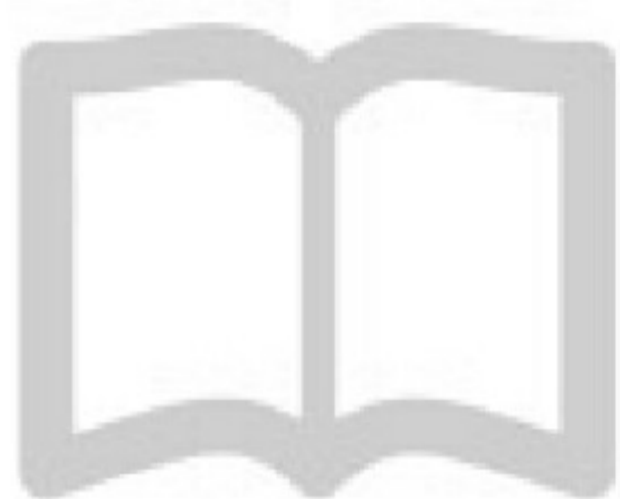


#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三卷

1985-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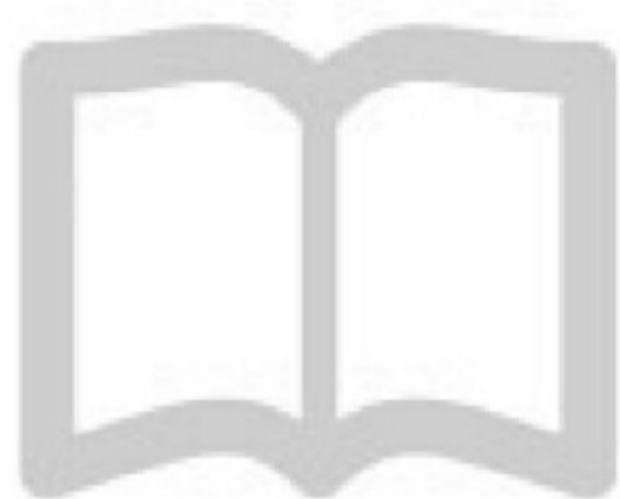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赵紫阳文集

## 第三卷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三卷

1985 - 1986



中文大學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三卷（1985-1986）》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 香港中文大学 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8-3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ume 3 (1985-1986) (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808-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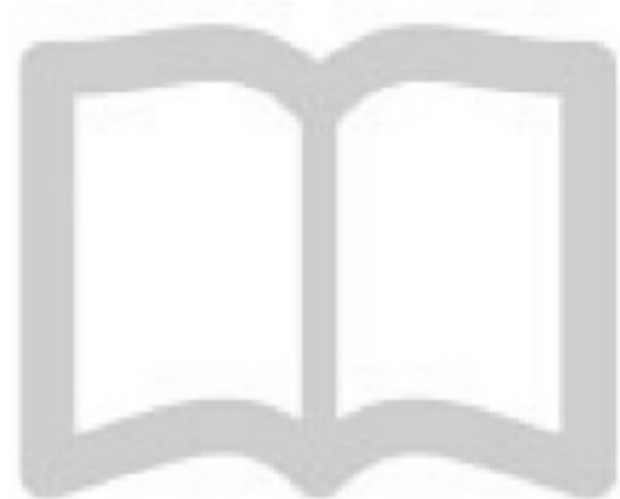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

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 目 录

## 一九八五年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13
控制货币发行 稳定经济形势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五日.....	16
对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和有关方针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至三月八日.....	19
接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第二期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37
放开农产品价格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40
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46
接见全国省长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	55
慎重初战 务求必胜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57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插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63
林业要进行改革和发展多种经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69

大企业要下放权力以增强内部活力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72
东北搞好粮食加工转化 可以成为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76
对陆定一同志来信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79
给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82
放手让大企业发展综合利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83
科技体制改革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多出成果和人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86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94
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保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	96
认真解决现存问题 继续推进企业改革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97
划清不正之风与改革探索的界限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101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105
必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122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131

搞好城市改革 发挥城市功能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	132
在首都各界人士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142
编制“七五”计划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二日 .....	145
切实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	154
加强省区之间在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协作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 .....	155
对报纸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评论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	157
会见新加坡吴庆瑞博士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	158
对国家科委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	163
积极开拓技术市场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	164
要保证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	165
接见“中国面对未来”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	166
听取四川省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	168
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要有新思路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 .....	171
对《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174

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175
实施分税制改革给田纪云同志的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177
对《关于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178
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精简机构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179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180
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187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195
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197
给《李约瑟文集》的贺词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198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199
给马海德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203
给中医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204
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5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207

下大功夫把旅游基础设施和管理培训搞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208
在第六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211
“星火计划”是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好形式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223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24
在河南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35
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43

## 一九八六年

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经济工作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	247
端正党风要从中央领导机关带头做起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252
希望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254
接见体改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255
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256
关于统计信息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265

发挥军工系统优势 向军民结合型转变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267
发展旅游业需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274
就三峡工程和核电站建设安排问题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277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部分专家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278
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283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287
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297
国有森林不能下放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298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要慎重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299
赞成搞“火炬计划”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300
就“国际和平年”对世界各国听众的广播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302
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304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生产问题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306
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和批示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318



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	320
关于制定“八六三计划”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323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	327
视察秦山核电站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358
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的方针与措施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 .....	360
给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	369
给《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	370
在省（区）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 .....	371
给北师大北国剧社的复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	373
关于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给万里等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	374
祝叶剑英同志九十寿辰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	375
正确对待农村党员雇工和发展私人经济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	376
为促进中澳友好合作做出新贡献	
——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的贺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	379

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380
关于核安全问题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	382
在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384
关于发展乡镇煤矿和建设大型煤矿等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386
给《中国日报》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393
加快发展煤炭工业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394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395
积极参加援外项目管理 使当地人民受益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399
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价格改革方案的看法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401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407
会见世界银行首任驻华代表林重庚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415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421
天津要走发展外向型轻加工经济的路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425
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436

关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 .....	441
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办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集团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	449
对武钢引进国家两个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 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一日 .....	451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	453
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	455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	457
致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	459
处理好价格改革与搞活企业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一日 .....	460
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	46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	468
接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478
在“走向二〇〇〇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483
听取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486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	490

在广西视察期间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	494
不要在我家乡搞纪念性的东西和要求照顾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	502
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	504
纠正行业 and 部门不正之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	510
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512
后 记 .....	515



1986年2月，在海南岛考察，与田纪云、胡启立、谷牧讨论洋浦港平面规划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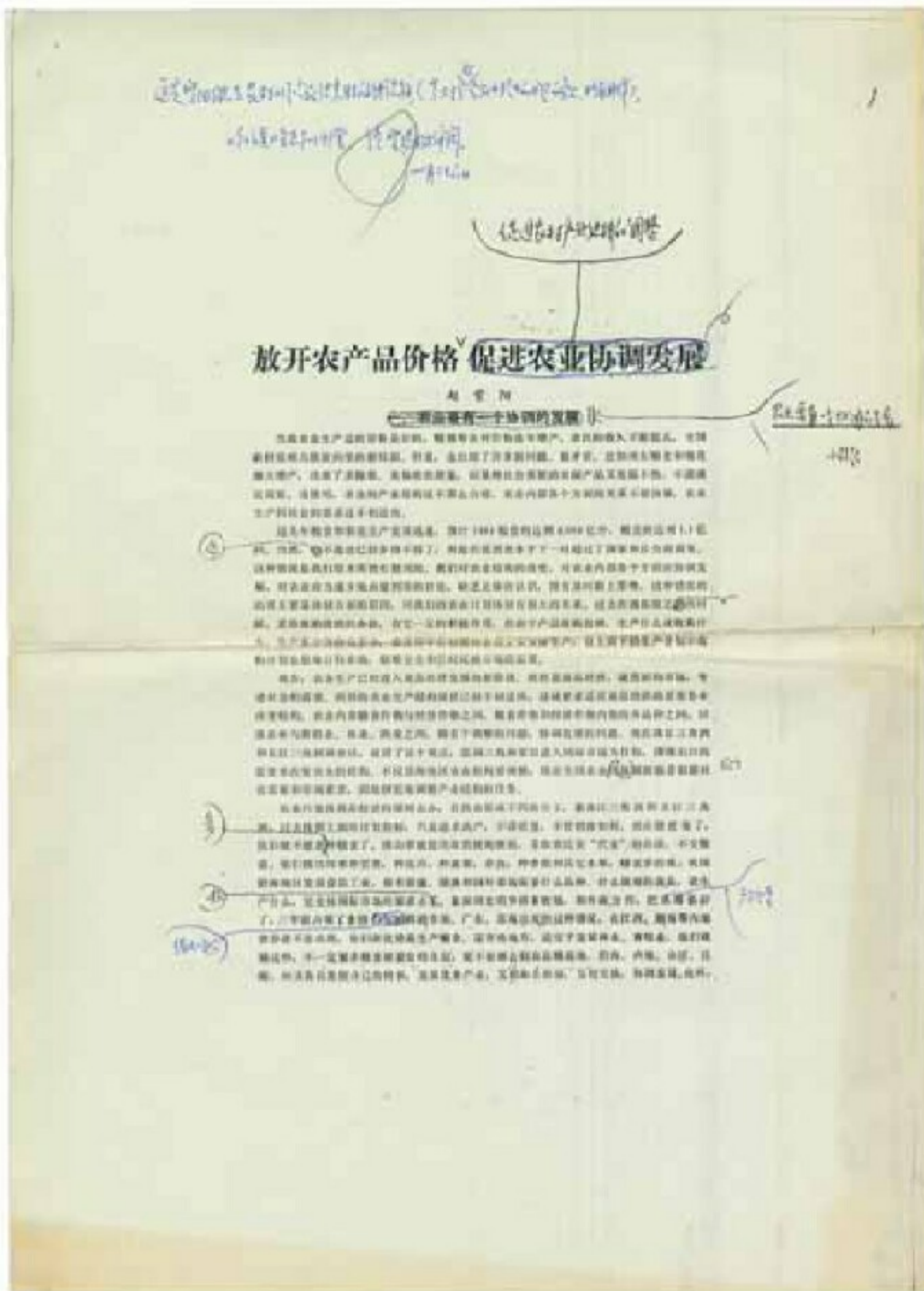




左上： 1985年10月23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在联合国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席上就座，与钱其琛外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等聆听各国代表的发言

左下： 1986年11月，在贵州省农村地区考察，询问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右： 1985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稿(首页)，经修改后于1985年1月3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告国共, 弄化中, 意本同, 此4件值, 第一, 产, 发展第, 三, 产, 业, 统计资料, 国家统计局编, 1985年3月27日

产, 业, 转, 型,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对, 提, 高, 社, 会, 生, 产, 效, 率, 作, 用, 很, 大. (47) 世, 界, 各, 国, 经, 济, 加, 速, 发, 展, 第, 三, 产, 业,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选, 择.

口, 径, 经, 济, 总, 值, (GDP) 收, 入, 发, 展, 速, 度, 可, 以, 说,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指, 标.

国外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兼同我国对比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探讨国外的消费规律，尤其是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消费规律，对我国合理引导消费，克服压抑消费或消费基金失控等偏向，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消费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提高消费水平。

全世界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万亿美元，每人平均

—— (72)

文, 既, 经, 过, 调, 整, 又, 是, 一, 既, 去, 的, 序, 序

2,600美元, 用于个人消费约1,800美元。但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中, 消费水平差别很大。

改革, 3

	1982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其中, 用于个人消费
低收入国家	280	200
中等收入国家	1,520	1,030
高收入国家	11,370	6,850

世界上十个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1982年人均消费为150美元, 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生活的最低限度需要, 但已耗用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我国1982年人均消费约为220美元, 只能基本解决温饱。美国达到8,680美元, 日本为3,950美元, 估计苏联为3,500美元 (均不包括政府消费部分), 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折算为美元时所采用的汇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国货币购买力的比价, 因此这几项人均消费美元数不完全可比)。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消费率(%)高低各异。一般说来,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消费水平高, 消费率也高; 消费率是指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苏联和我国为国民收入)的比率。

—— (72)

1985年4月15日, 在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上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批示

田纪云同志：  
分税制问题，可暂从  
明年起开始实行（即  
11省试行）中央、地方  
均拿出相应的财力，由  
此即建立新的分税制  
且还可考虑作一些调整

田纪云同志，改善研究  
分税制问题，好！  
11省试行，可先由  
11省拿出相应的财力  
中央、地方均拿出  
相应的财力，由  
此即建立新的分税制  
且还可考虑作一些调整

1985年9月13日，就实施分税制改革问题给田纪云的信



STATEMENT BY PREMIER ZHAO ZHANG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4 OCTOBER 1985

1985年10月24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英文版，封面及前两页）

(Continued)

Mr. President,

Fo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world history it is rare for a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o have such enduring vitality like th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se universality and importance grew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Despite twists and turns and its present weaknesses, the United Nations is irreplaceable i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it shoulders and the impact it exerts on the world. Today, we can say that the world needs the pres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m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needs the support of the world. We are holding this special session to celebrate its birthday for the very aim of reaffirming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its functions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tter play its due role.

It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mankind to build a world of peace and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 the very reflection of this aspiration. All peace-loving countries and peoples have made countless effor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one a great deal of work under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condi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se lofty objective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rem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but they fall far short of our expected goals. Though a new world war has broken out, regional hot wars and the East-West cold war have been on and off. The colonial system has disintegrated, but there have been repeated encroachments upon other's sovereignty and armed conflicts; all countries, big or small, should be treated on equal, not great power politics remains operativ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gh the system of apartheid has been universally

- 2 -

condemned, the pressure acts by the South African authorities are being intensified. While the wealth created by mankind has multiplied, there is a widening gap of wealth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arms race has swallowed up an enormous amount of wealth and resources, whereas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from starvation and disease and struggling for their very existence. In a word, our present world is still fraught with contradictions, contradictions, turbulence and conflict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of insecurity and causes for anxiety.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take "United Nations for a Better World" as the theme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accords with the aspiration and desire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opinions.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s to what kind of world can be regarded as a better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of the U.N. Charter, a better world cannot be built withou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it calls for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These are its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s made it clear in its very first sentence: "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which twice in our lifetime has brought untold sorrow to mankind ...." Regrettably, however, the four past-decade years are years of East-West confrontation and agonizing escalation of the arms rac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mains turbulent and the danger of war hangs on. In order to safegua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prevent war, the East and the West should remove confrontation, ease the atmosphere and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All countries, whether different or similar in social system should coexist peacefully.

中国希望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sup>\*</sup>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VV 中国希望恢复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这是为了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感谢邓克尔<sup>11</sup>总干事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秘书处为促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过程中所作的努力。

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个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它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不仅要扩大出口，同时还要增加进口。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同关贸总协定大多数成员国在某些方面，如外贸体制、价格和汇率方面的差异将缩小。

<sup>\*</sup> 这是赵紫阳同志在会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时的谈话摘要。

1986年1月10日，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时的谈话摘要手抄件

耀邦、小平、光本、德四同志：

十一月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研研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办公室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讲话和重点的汇报，曾重议了以下问题：

一、涵义和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建设的需要，不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从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转变。

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充满活力，要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确实是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之计。

-1-

## 1986年11月18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前三页）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考虑，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走向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增强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制，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二、党政分开。大家一致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根据党政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提出的，是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提出的，比“党政分工”的说法好。有没有更好的说法，还可以再议。

党政分开，不是讨论共产党要不要执政的问题，而是解决如何执政，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实行党政分开，需要理顺党同政府和党同人大、政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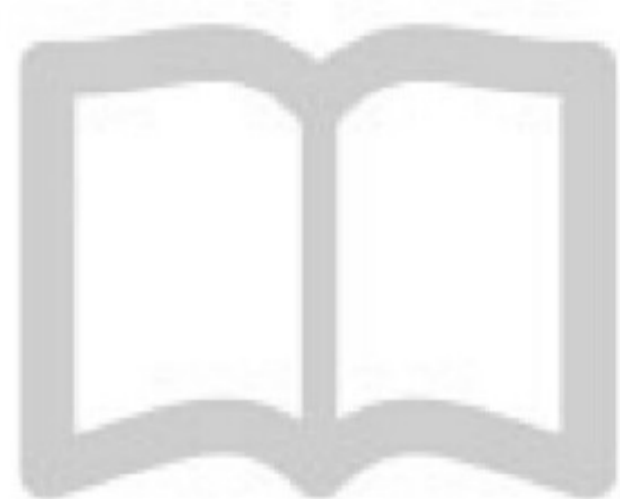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2-

系，同时也要理顺党同全国人大的关系。三十年来，重点是党同政府的关系，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化、制度化。

党政分开，首先要从中央做起。这几年，中央一级的党政关系已有很大改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至于地方各级党组织、政府、人大，它们的具体职权和职能同中央一级不一样，要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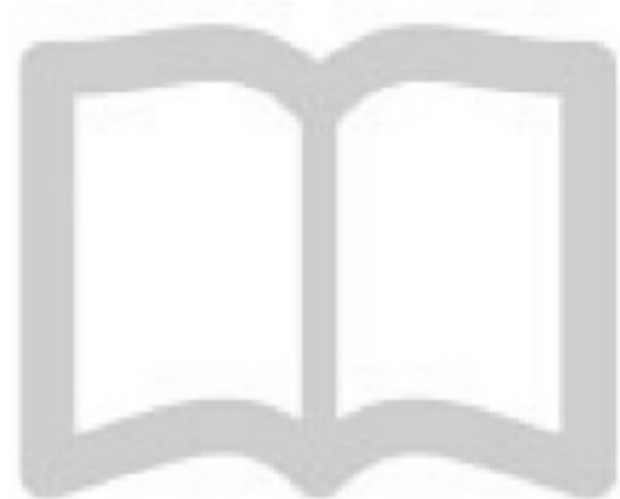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三、党内民主。以前我们讲党内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现实、可靠、有效的途径。这几年，我们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足之处是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缺少程序性的规定。现在，党中央向政协征求意见很好的。基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考虑到今后二十年、五十年的情况，对党的中央组织内部相互关系、议事规则、表决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制度、基本制度的规范性。要有相应的领导体制加以保证。这样，在大政方针上就有可能避免因领导人的更迭或领导人能力的变化而产生波动。这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处理好了，全

-3-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一九八五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同志们：

刚才仲勋同志已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了话，我又听了各个民主党派和政协的领导同志的讲话，都讲得很好，我听了以后深受启发和教益。我这次来，是向大家拜年的，当然，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勉。我希望今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各条战线的工作比去年做得更好，希望一九八五年我们整个国家的光景比一九八四年更加美好。我想，这既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的愿望和责任，也是全中国人民和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的愿望和责任。

去年，中央公布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个文件公布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总的反应（包括国外）是好的，都认为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构思是合理的，认为如果改革能够这样下去，我们中国确实大有希望，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当然，也有另外一面。除了反对改革的人以外（这总是有的，是少量的人），也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好心人，有一点担忧，担忧我们的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大概都看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中国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价格是不行的。价格是关键，是改革整个体制的关键，也可以讲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但是价格的改革会出风险，会带来物价上涨，担心物价上涨，因此希望中国这场改革搞得稳当一点。现在要求中国改革搞得稳当一点的人多起来了。首先我认为这种

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既然大家有这些想法，这更加提醒我们，在进行这场非常深刻的、关系到我们国家四化前途的重大改革，一方面我们对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决心要坚定不移，要有必胜的信心，不要为了出现那么一点小的波折，或者一些小的乱子而动摇；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改革的步骤、改革的方法一定要谨慎从事，这就是邓小平主任最近不断讲的，要走一步看一步。总之，一定要搞好，不能也不允许发生大的曲折。这一点，我们头脑清醒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今年是我们体制改革决议公布以后的第一年，作为城市改革来讲，作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也可以说是一次初战。古今中外不少有经验的战略家都遵循一条原则，叫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第一仗要慎重一些，一定要打好。慎重初战当然不是不迈步、停滞不前，而是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准备地、有把握地迈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一步。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年体制改革的方针。

一九八五年，我们究竟要改些什么东西？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首先你们大概都知道了，不久前开了一个农村工作会议，已经公布了，农村的价格体制改革的步子我们可能要迈得大一些。就是说，要把三十年来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对农产品的统购包销这个制度，要逐步地取消。对农副产品要逐步地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国营公司、国营的力量积极地参与市场调节。这将是农村五年以前联产责任制改革之后第二个大的改革。解决吃大锅饭问题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到了城市；价格改革，看来这一次又是农村带头，因为今天农村具备了这种条件。农村价格全部放开，总的趋势价格不会上涨，而是下浮。当然主要是由于这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农副产品丰富，具备了这个条件。这恐怕是多年来我们想搞而不能搞的、也不敢搞的一件事，现在时机成熟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个改革将进一步促使农业合理化，将会进一步搞活农业经济，对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将发生莫大的意义。在其他领域，譬如在工业品方面，在价格问题上的改革，当然我们今年要迈出一些步子，要选择那些影响面比较窄，而对我们、对工业、对促进工业内部合理化又能起推动作用的小量的产品进行些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与此同时，我们今年开始将要给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对国家机关，包括科技、文教、整个的国家

机关，将进行工资改革。在企业里面，将比较大面积地、大幅度地推广企业的工人工资增长同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个办法。今年准备大量推广这种办法，使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生产、节约，从经济效益提高当中来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不受国家所谓几级工资制的束缚。过去的所谓八级工资制在企业里将很快就要打破。

有一些同志对调整和改革物价有些担心，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调整和改革工资，一方面要使生产者从生产中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要使消费者不降低收入，不降低自己的实际购买力。就是说，既要保护生产者利益，又要保护消费者利益。当然，我们在调整、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将要仔细考虑这些问题。现在北京也好，各地也好，都有些街谈巷议，什么粮食要涨价了，电视机要涨价了，抢购的不少，这都是不了解情况，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主要是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我相信，明年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就听不到这种议论了。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将会看到，一九八五年我们确实是进行了一场十分重要的而又非常成功的改革。

祝同志们健康长寿，新年愉快！谢谢！

# 控制货币发行 稳定经济形势\*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五日

昨晚我一夜没有睡好。今天主要说经济形势，不是一般地说，集中讲去年票子发得这么多(初步统计全年新发行二百六十亿元，超过原计划八十亿元的两倍多)。十二月份像飞机撒票子一样，三十一日就增发了十亿元，完全失去控制。发这么多票子，怎么看？给一九八五年带来什么问题。一九八五年票子发多少，要预计一下。

改革，一九八五年不出台不行。国内外议论很多，改革势在必行。但风险在于通货膨胀。一九八五年改革是在多发了二百六十亿元票子的基础上，这是有风险的。一九八五年必须有几条硬措施，应付风险的措施。我们国家不要只看形势很好，有一天一拥而上地抢购，你看会发生什么问题。一个城市挤兑抢购，就会带起一大片。要有应急办法。否则突然发生问题，大家就会措手不及。货币投放要从紧，不是一般地提抽紧银根。也可能票子不多，但不能立足于此。立足点要谨慎一些，风险冒不得。改革不能停，风险又不能冒。

票子发多了，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农副产品收购量增加，多投放了一百亿元；二是农村信贷过猛；三是城市消费基金迅速增加。问题不出在基本建设，主要出在消费基金。消费基金，下半年直线上升，基本上是失控。钱从哪里来？问题在于企业生产基金全部用于奖金。利改税，国家这一头定死了。工人这一头，有钱就发奖金，互相攀比。中间那一块，

---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生产基金基本上没有了，所需资金只好从银行贷款，实际上是用贷款发了奖金。这就是秘密所在。第四季度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消费基金失控。对此要有几条措施：

一、出售黄金。充分准备好，下决心拿一百吨黄金。也有可能卖不出去压在那里，准备对付风潮。现在人心相当浮动。这么多粮食还发生抢购风潮。北京二万台彩电预售，几天就光了。

二、进口高档商品。进口汽车、彩电、长丝，花二十亿美元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一百亿元人民币。

三、发股票，出卖小企业固定资产。

四、卖房子，包括旧房子，新房子拿出一部分。优待价，分期付款。

五、规定票子发多少，不得超过。银行会议说要发三百亿元，这不得了。一方面多回笼，一方面少发票子，从严控制。今年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亿元。太紧张了，也不好，急了不行。专业银行搞起来了，中央银行没真正抓起来，对专业银行控制不住。资金吃大锅饭，所以专业银行就竞相贷款，中央银行处于无力状态。票子发多了，对改革是很大的威胁。又要改革，其他方面又很松，漏洞很多，问题就大了。

六、今年消费基金要有个说法。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不搞不行，但必须加强监督。怎样监督，要研究办法。你到我这里贷款，我就得监督。银行有顾虑，怕企业向银行保密。

七、国库券，再发一种一年的。

现在仅靠行政办法不行了。靠计委控制不住，关键是银行。财政是一小块，银行是一大块。我讲过，不能这边用外汇进汽车，那边贷款给专业户买汽车，货币回不了笼，白忙活了一阵。票子一年增发百分之五十，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如果不控制，一九八五年真可能增发三百亿元到四百亿元。可不能不加小心。

（赵紫阳在听取吕培俭<sup>1</sup>同志发言后说）

一、去年票子情况继续研究，多少正常，多少不正常。真正看清楚，要过半年。继续观察，估计一下子说不清。

二、鉴于去年一下子发这么多，今年又有两项改革出台，在票子、信贷问题上必须谨慎。谨慎了没有坏处。两三年内要为改革创造条件。决议已经发了，改革两三年纹丝不动不行。

三、措施还要认真研究。回笼的措施，控制投放的措施，控制消费基金的措施。有的同志向我说，一九八五年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一定干不得。我想了，不搞不行。但一定要有控制措施。增发一百五十亿元票子，也可以再研究一下如何控制使用。既要控制，又要搞活，银行一定要作为问题研究，有严有宽。

关于货币发行情况、基本看法和拟采取的措施，请依林、纪云同志负责，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报告。

## 注 释

1. 吕培俭(1928- )，江苏洪泽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曾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副部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 对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 和有关方针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至三月八日

## 一、关于研究“六五”后三年出现的新情况

“六五”后三年的路子与前两年不一样，模式变了，规律变了，很多事情原来预测不到。现在生产资料市场趋向缓和，事先没预计到。要从这五年的变化，“温故而知新”，预测今后五年。这几年能源增长少，工业增长快，这是由于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要认真研究这三年中出现的新东西，哪些将在“七五”期间继续起作用，哪些只是暂时起作用。

“六五”经济的发展已经突破旧的规律，现在对“七五”计划的考虑还没有突破旧的模式，正处于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之中。“六五”期间出现的新情况，总的说对“六五”计划的执行起了好作用，有的在“七五”期间还将继续起好作用，有的在今后如果不受制约可能起另外的作用。目前正处在变化过程中，很多因素捉摸不定。现在看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把“七五”计划搞好，另一方面可能要准备不断进行调整。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制定“七五”计划总体设想以及“七五”能源、运输、邮电、原材料、人民生活、轻工市场、基本建设、财政和信贷计划的初步设想时的几次讲话要点。他在这些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 25 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制定“七五”计划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方针，如首次提出实行住宅商品化等，对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发挥了引领作用。

## 二、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出发点

消费结构影响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又影响消费结构。你们汇报提纲中已经提到：认真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变化，研究市场的动向，预测消费品增长的可能及其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数量及结构，应当作为“七五”计划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而现在编计划的做法是先测算生产增长率多少，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多少，基建规模安排多大，材料、外汇平衡怎样。这基本上是传统的方法。现在是否从另外的角度再测算一下，即从消费开始。预测一下“七五”人民消费会是什么样的需求，几个主要方面大体达到什么水平。首先是农业、轻纺、食品工业，然后是原材料、能源、交通，然后是进出口。看看问题在哪里，看看城乡消费对生产建设结构提出什么要求。当然，一开始不能算得很细、很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消费出发，社会主义国家搞生产建设却不从消费出发。现在我们的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人民需要的东西供应不上。如果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吃的比重就不会占那么大（现在占百分之六十）。今后，生产建设应该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和国外需求来安排（包括数量和结构）。总的原则是生产适应消费。如果生产方面不可能做到，则要引导消费。

这次搞“七五”计划，重点是搞“七五”的，也想想后十年。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体要有个设想。比如住，如果每人八平方米，建筑面积实际要十六平方米，算下来一年要三百多亿元投资。这么多投资，如果没有个政策，不可能做到。再有，建材工业如果不改革，还用水泥、砖瓦，那也不行。又如穿，达到什么水平（包括数量、质量），用什么纤维，从哪里来，怎么解决？石油化工怎么搞，技术改造的方向怎么定，都要有个考虑。又如吃，食物构成、食品加工怎么搞等，也要有考虑。另外，还有个购买力的问题。这些，都要有个说法。

## 三、关于实行住宅商品化

要改革现行的房租办法。现在居民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不对头，促使居民的消费过早地转向家用电器，出现消费早熟。



如果住房政策正确，在城市可以吸收大量购买力。要下决心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房租，这个问题可以想法解决，不外乎提高房租，把暗贴变明贴，实行按定量补贴包干。设想按每人使用面积十平米计算，房租由现在的每平方米每月两角提高到每月一元，增加的八角国家予以补贴。实际住房少于定量面积的，国家照样拿出补贴，但不按月交给住户，而由国家统一存入银行，等住户买房时划拨。使用面积超过定量的，超过部分的房租由个人负担，国家不补贴。这样才能鼓励人们少要房子，自己攒钱买房子。

要实行住宅商品化。什么都商品化了，技术也都作为商品，住房非商品化不可。设想住宅每平米二百元的造价对折(一百元)出售十平方米房子(房租每月十元钱)、用十年的房租(一千二百元)即可买下来。现在由房管局掌握的住宅共九亿平方米，房租提高后，一年可回收资金一百亿元。加上国家现在每年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二百亿元，可有三百亿元用于住宅建设。在国外，建筑业是几大经济支柱之一。我们实行住宅商品化，就会促进建筑业的发展。

这样，情况将比现在好得多，既可以减少国家对住房的投资，而且通过回收资金，房子建设还可加快；耗能少的新型材料也发展起来了，整个建筑业、建材工业也活了；人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消费结构也会趋向合理。否则，房子建得再多，也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同时，人民过早地把购买力转向高级消费品，彩电、冰箱年年大量进口，引进生产线越来越多，到一定时候，生产力饱和过剩，就造成损失。

看来，今后要把消费基金压得很低，恐怕难以做到，只能设法吸收它。如果房子变成商品，即使消费基金扩大也不可怕。

#### 四、关于电力建设

我们国家影响经济发展的，我看主要不是煤，关键的，第一位的是电，第二是交通。如果现在项目要调整，就要加强电，加强交通。要不受任何牵制，下决心加强电和交通。

“七五”计划总的还是要讲综合平衡，但要把电、交通加强。交通也要围绕电来安排。整个计划以电为中心配套安排。电是我国发展中的主要薄弱环节。如果电的情况好一些，工业生产情况就会更好一些。“七五”计划电力装机三千五百万千瓦的方案，用什么方法把它实现？搞电，有个燃料问题，即煤的问题。煤是有的，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开采也不十分困难，主要是运不出来。解决了交通，煤还是有的。

现在看，政策的作用很大。石油上去靠包干，煤炭上去靠小煤窑。电，不能大家用一家办。大家办电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落实。工厂办了电，卖给电网一度电四分，而电网卖给工厂要八分，这样谁还办。电力部门要鼓励地方办电，要支持大家办电，不能大家办起来你拿走。

## 五、关于煤炭建设

能源工业问题，关键是个政策。过去总认为搞煤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实际上，政策对了头，煤炭产量上得较快。从煤矿的发展，得到这样的启发，就是有些矿山，或者比较分散的矿山，可以让老百姓去开。全部靠国家去干，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有些也不合算。发挥农民办矿的积极性，速度可加快，投资可节省，国家可以腾出一部分投资转到别的方面。

煤的开发要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这个方针，还可以管几年。小煤矿可以搞改造，规模也可扩大。这样，可以做到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可以把筹集到搞煤的资金和外资更多地用到电上。要搞几条政策。当然也有个布局问题。大煤矿还是要搞的，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有后劲的问题，这就要考虑“八五”怎么办？

煤矿可以搞“小煤中电”。例如锦州电厂周围有很多小煤矿，可以用附近的小煤矿的煤，根本不用从营口运煤来解决，关键是个价格问题。搞“小煤中电”，电厂规模不要搞得太大，单机二十万千瓦，逐步滚动。陕北煤也很多，可以沿黄河摆电站，附近搞小煤矿。真正能搞小煤矿的是黑龙江东部，山西、陕北以及内蒙古西部。

雁北的煤矿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大秦线通车后会不会没有煤？要认真在那里搞地方煤，靠老百姓去搞，好好支持一下地方煤矿。那里老百姓很穷，稍加支持，局面就可铺开。那里煤炭储量很大，搞好了，可搞几千万吨煤。计委要专门组织一个小组去规划一下。

平朔露天矿哈默不干，我们自己搞。跟加拿大合作也好，自己搞也好，反正要搞下去。如果平朔自己搞，准格尔矿就要推迟。两个大露天同时搞，国家没有那么大力量。原来要搞准格尔，是因为哈默要搞平朔。准格尔现在还没有开工，完全可以推迟。这样大的项目，搞不清楚，就撤下来，要下决心推迟，不背这个包袱。一定要从效益出发。日本能源贷款，可以用于其它项目。平朔自己干以后，要把造价降低，把煤炭成本降下来。

今后凡是开发基本上国内用的资源，一般不要搞中外合营企业。一搞合营企业，土地贵了，工资高了，建设标准也高了，成本也就大了。宁可借外资，从中国国情出发，按中国的标准搞。陆上石油一般不要与国外搞合营。

## 六、关于节能

发电烧油机组要搞替代机组。原来烧油的机组，凡是能改的都要改过来。剩下的机组，如果不能改，或者勉强去改不合算的，可以作为备用，烧些高价油，用于电站调峰。

压烧油是个小的综合平衡，没有条条块块约束。它有主动权，自己可以预测到一九九〇年有多少钱，今年安排什么项目，明年安排什么项目。围绕电，把所有条块结合起来了。

## 七、关于建立能源交通基金

搞基本建设基金制，一下子搞不起来。搞能源交通基金，我赞成。从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划出一块，或者每年财政拨款定个比例，财政收入多，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就多；财政收入少，基金就少，让它自己去滚动。钱统统放入银行，可以成立能源交通银行。这样能源交通建设的资金就会建立

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搞了能源交通基金，能源交通部门主动了，财政部、计委也超脱了。

## 八、关于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重点

我国整个经济卡在电上，但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交通问题。有了交通，煤就运出来了；有了煤，电也就解决了。因此，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现象是电，根本的是运输问题。“七五”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交通上。一是加快建设；二是放宽政策，国家搞重点，其它靠地方和老百姓搞。要好好研究这方面的方针、政策，研究得透一些。

现在交通困难，大家用交通，一家办交通，这是个问题。要促使大家办交通。

发展交通要考虑利用外资。过去打算在煤炭方面利用点外资，国外有人愿意贷款给我们搞能源，我们就把自己搞能源的投资调出来，把钱转到办交通上。因此，煤炭部也可以修铁路。

## 九、关于铁路建设

运输建设不要到处布点、开花。不然花很多钱，见不到效果。铁路，集中力量把大秦线搞上去，把大秦线的下半截修通。上段和下段配了套，能力至少可以达到一亿吨，搞得好可以达到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五千万吨。可以考虑，把东胜到包头接通，一百多公里，主要地方集资，国家支持一下。东西大通道搞通了，宁夏、内蒙古东胜、准格尔和神木的煤都可以从这条线运出来。铁路建设修三条线：一条是大秦线；一条是晋东南到石臼所；一条是焦枝线，这条线可通长江、汉水，潜力大得很。大秦线修起来以后，煤源一定要落实。如果菏泽铁路也能用大马力机车，晋东南的煤就可以大搞一下。

运输这么紧，铁路又不是一下子能修起来，比较快的办法是进口大马力机车和国内增产车辆。为什么大家搞汽车的劲头那么大，搞机车不积极？是不是价格问题？下决心把车辆价格提高，让生产厂有利可图。现在

有些军工厂、机械厂没事干，机车车辆提价以后，它们有利可图，是可以干的。这比进口机车车辆合算，而且投入使用后，投资很快可以收回来。提高价格后买车辆多花的钱，由财政部补，从铁道部上交利润中扣。请财政部搞个政策。

## 十、关于公路建设

当前，公路拥挤现象非常严重，大马车、小马车、小四轮、拖拉机、大汽车、小汽车，六七种车拥在一条道上。要有个管制办法。比如搞单行线、分快慢车道。紧张路段，要辟个便道，让慢车下公路。也可以规定白天一个方向，晚上一个方向。特别繁忙的路段，要设公路警察。当然，根本的是要修公路。明年下决心，铁路短途货运，每吨公里加价四分，短途客票价也相应提高，使用户感到不合算，不如用汽车。这样，汽车增多，公路运输就会发展起来，铁路运输也就缓和了。

## 十一、关于港口建设和沿海运输

我国海岸线长，不论从国内来说，还是对外开放来说，港口都是个大问题。沿海港口建设，没有一个长远规划，五年、五年地搞，不行。要有一个长远的到两千年或更长一些的部署。“七五”计划和长远规划要研究这个问题。

过去沿海搞煤码头，是为了出口煤炭。现在看来，煤炭出口量不可能很大。秦皇岛、石臼所的码头都有一个从对外转为对内的问题。也不要再搞二十万吨级大码头了，可以采取过驳的办法。

港口建设，没有点办法，光靠国家投资不行。沿海港口，可以一吨货物收两元过港费，用于码头建设，使码头建设有一个固定财源，长年累月，“驴打滚”。

长江口的港口问题要论证一下，北仑港、张家港、南通港、黄浦港都要论证。罗泾港是洼地，建港投资很大，不少人认为不合算，建张家港比

罗泾港投资少。建不建罗泾港，交通部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黄浦港搞一亿吨差不多了。长江口搞一些专业码头，我赞成。

有同志建议开辟从南到北的海上运粮通道。这是一个大问题，“七五”计划要考虑。从长远看，北方是玉米带，南方需要玉米作饲料。要研究搞一条海上运粮通道，从北往南运玉米，从南往北运大米。现在吉林积压玉米二百亿斤，压一年一斤粮亏三分，压三年就报废，请赵维臣同志重点帮助吉林缓解缓解。

## 十二、关于航空

民航机场建设，应尽量利用现有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民航买飞机，原定利用结存外汇，现在外汇平衡较紧，除已签协定的以外，不足部分向中国银行贷款，国家拨给贴息的外汇定额。

## 十三、关于大家办原材料工业

发展原材料的方针，除国家支持一部分外，要让大家去搞。要调动一切积极性，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国内的国外的，国内各个方面的，打破资源垄断和行业部门界限，让大家办原材料。

过去对原材料工业统得太死，都是指令性指标，办起来也没有利。要放开，让大家办，农民办、企业办、省市办、部门办。此路一开，一些行业就打开了。近几年发展原材料有两条经验：一条是让大家搞，一条是要给利。有了这两条，大家才去办，看上去很难解决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了。煤炭为什么活了，就是因为放开了。现在煤炭打开了，建筑材料打开了，铁矿也打开了。

要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和农民的优势。中国很多地方有“鸡窝”矿，矿很小，但品位不低，国家搞不合算，可以让农民搞。辽宁、四川、西昌都有小铁矿，可以让群众搞。农民去开矿不一定是破坏资源，部和公司还可以指导。过去对这个问题不那么自觉，现在回过来看，应该让大家来搞，要有计划地搞，要很好研究由老百姓开铁矿、磷矿、有色金属矿的问

题。化工部也要着眼全国，让大家搞化工，不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你化工部的。煤炭、冶金部门都可以搞化工。计委牵头研究一下原材料的政策。

开矿、筑路，这是使农村多余劳力不向城市挤的一个很大出路。大同、太行山地区的农民开煤矿，河北迁安一带的农民开铁矿，由小到大，逐步扩大，投资比国家搞少得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沿海交通方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农民，可以像现在这样发展社队工业。内地相当一部分农民要搞矿山，搞建筑，建小电站，修公路等。这样，国家节省了投资，农民富起来了，第三产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过去农民“以粮为纲”，只能国家搞矿，搞死了。今后要分工分业，适合发展轻工的发展轻工，宜于搞矿山的搞矿山，有的可以搞养殖业、搞畜牧业。

要大家办原材料，除主管部门不要过多干预外，还要给利，就是要在价格上放开。现在原材料价格太便宜，既不利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加工工业的技术改造。要把原材料价格搞活，老产品不动，新产品提价，促使企业改进产品工艺，搞技术改造。要实行两种价格，现有的基数按平价，新增加的提高价格。价格提高后，农民、企业、地方办原材料的，可以分材料或分钱，这样，他们就会搞原材料。国家就可以把钱集中用在发展原材料的加工和提高质量上。

要算个账，究竟是用人民币向农民高价买原材料合算，还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合算。山西、贵州很多小铁矿附近有煤矿，可以对这些小厂进行技术改造，只要比进口合算就可以让他生产，这比运煤运矿出来合算。黄金也是这样，发动老百姓去搞。

#### 十四、关于综合利用

要发展综合利用。现在国内自己搞原材料就不能加价，进口却可以补贴。这不利于综合利用和原材料工业发展。所以，对搞综合利用的，要优惠。只要对本行业外的多种资源进行利用，其产品价格可以提高。这样煤矿就不会采煤弃硫，冶金焦炉也就会回收焦化产品了。

现在建材局支持各部门搞建材，而不是都统到它那里，不让别人搞。化工部门也应当这样。很多部门搞综合利用，都有化工问题，要支持有条件的部门、地区、企业都来搞化工。化工部可以同冶金部签个协议，要冶金部搞化工。同样，非冶金部门也可以搞钢铁。

要专门研究从国内废旧设备中扩大废钢来源。国内就有很多旧船不应再用，还有旧拖拉机、积压的钢材，都可以利用。特别是旧设备，要规定哪些不能再用，作为废钢重新冶炼。利用得好，可以少进口废钢。这几年节约能源有成效，但原材料节约成绩不大，要很好研究如何节约原材料。大企业吃干榨尽，综合利用，很有潜力。过去一直说要搞综合利用，由于条块限制，加上价格低，就是搞不起来。现在一是打破条条，二是打破块块，三是企业有自主权，有利于搞综合利用了。搞计划外的非本行业产品的综合利用，其产品企业可以自销卖高价，利益归己。企业搞余热发电，水电部搞代理，收手续费，这样，企业都去搞了。

## 十五、关于协作问题

什么都由国家包下来不行，要采取合股的办法。国家倡议，吸收地方资金去搞。解决“东西”关系问题，全靠国家也不行。东部需要资源，西部需要资金，可由国家加以组织，互相协作。还有一个内外关系问题，企业生产有潜力，别的地方来投资，要允许分享成果。

## 十六、关于外汇、外贸

对外开放，扩大引进，可以加快经济发展，但要有外汇，否则快不了。利用外资，要还外汇。借外债也要还。扩大消费，如果外汇多，也不可怕。所以关键是外汇，要培养创汇能力。这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六五”计划注重调整，前几年外汇有节余，所以大家脑子里没有外汇的问题。现在搞“七五”计划，如果没有扎实有力可靠的外汇基础，其他方面很难立论。



“七五”计划，焦点恐怕是出口创汇问题。今后五年，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从国际市场出发，使外贸真正能立于不败之地。多搞点外汇，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要从政策上下功夫。要发挥我国的优势，采取措施，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如果设想一九九〇年我国外债余额三百亿美元，只要一年能出口收汇五百亿美元，按百分之十五计算，能还本付息七十五亿美元，就可支持下来，关键在于那时能否一年出口五百亿美元。

开放，有两重意义，不仅引进，还要有出去。光有进来，没有出去不行。要多出口，多换汇，出口要从国际市场需要出发，要考虑什么最赚钱就出口什么。要解决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和花色品种问题，还要发展旅游。

要研究进口，研究进口商品的结构，哪些东西可以多进口，哪些可以少进口，哪些现在进口将来不再进口。有些东西如钢材、木材势必扩大进口，但有些东西要减少进口。还要很好研究大量进口的东西如何替代。比如，与其大量进口钢材，不如多进口矿石、钢坯，因为搞后头的工序，利用外资比较容易。又如，进口单体自己搞抽丝，可以省很多钱，因为石化的裂解部分投资很大，但产值较低，国内搞后头的，技术引进也比较容易，现在国外很多闲置能力，我国的原油掉头后到国外加工，这比全部进口长丝纤维合算得多。有人说这是搞“无米之炊”，但比全部进口“大米饭”省钱。

要通过利用结余外汇，培植增加外汇的能力。手中还是要有外汇，如果外汇很少甚至没有，人家就不借钱给你了。

## 十七、关于消费基金和工资

“七五”期间消费基金的估计可能小了。

对消费基金问题，要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否则很多问题不好解决。这几年，消费基金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以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是因为多年没有动工资，这带有还账性质，今后几年消费基金的增长估计还会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也可能是正常的，当然不能长期下去。现在企业劳动生产率不反映经济效益，因为劳动生产率是以产值计算而不是上交利税来计算的。例如有的工厂，产值增长不多，劳动生产率就不高，但利税增长却较多。现在农村搞活了，小企业搞活了，收入都上去了。如果大

企业内部搞活了，经济效益就可以提高，工资也可以增加。我们三十多年铺了个大摊子，但工资水平很低。现在还了账，进入了挖浮财阶段。动员挖浮财阶段就可以提点工资，过几年再控制工资。这条路子可能会出风险、出漏洞，但能解决很多问题。工资高了，物价改革也好办。我们如果不把劲用在降低原材料、燃料消耗方面，光把劲用在控制消费基金，这不是高明之策。还是要通过搞活企业，提高效益，增加职工工资。

对工资问题，现在既要承认机关、教师等人员比较苦，又要看到目前财政有困难。等国家富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提高收入，必须先从农民、工人搞起，从小企业、大企业搞起。它们搞好了，机关才能提高，这叫后天下之乐而乐。

给小学教师增加工资，学校做团的工作的人也要增加，人事干部、事务人员也要加，每人轮一圈。小学要加，中学要加，大学、机关都要加。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工资差距就拉不开，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 十八、关于人才流动

现在大企业知识分子工资低，人才外流，这样冲一冲有好处，可以使大企业知道知识分子可贵，工人也就认识到知识分子重要了。不冲一下，知识分子工资提高不了。要造成一种形势，才能解决问题。现在先让他跑一些，然后国家再来解决。现在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有些问题是很不合理的，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这就是方向、是合理。制止企业人才外流，可以采取收所得税的办法。国家培养的技术人员，到别的单位去，超过原工资水平的收入要征收工资所得税，同时，要半年前提出离职报告，办离职手续。不能要走就走，不能停薪留职。

## 十九、关于吃、穿、用问题

吃穿用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长期决策。对这个问题，无论是“七五”时期还是到二〇〇〇年，都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

世界银行认为我国从食物摄取的热量，已经达到世界中上等水平，问题是动物性蛋白质少。我们的食物构成必须改变，但要研究一下食物构成改变到什么程度才适量。不要把食物的胃口吊上去，吊上去就不容易下来。苏联人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斤，还要进口粮食。我们人均粮食八百斤，还可以出口粮食，主要原因是食物构成不同。中国以素食为主，是长期形成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我国耕地少，人口还要增加。世界银行说，中国动物性蛋白质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五就要进口粮食了。现在粮食多了，应该转化，但转化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转了。一九九〇年动物性蛋白质比重要达到百分之十，算过账没有？要研究一下食物的合理配方，不要单纯吃大米。要搞个专门机构，研究合理的食物构成，搞点材料，让中央领导知道。这既是一个宏观问题，也是一个微观问题，决策不当就是一个大包袱，因此决策要适当。

啤酒和饮料生产。一九九〇年啤酒消费量平均每人十斤，比现在增加五斤，肯定不够。要作点典型调查和研究，对农村人口的啤酒消费量要估计够。

要多搞饮料，这是我们的优势。山里野东西多，山上不宜种粮食，可以种水果，搞饮料加工。轻工业部对发展饮料要有政策。对各地的饮料，全国开个会鉴定一下，选择几个有发展前途的好品种，大批量生产，占领市场，指导消费，不要各搞各的，普遍发展。这是一个方针问题，不仅是五年的问题，也是二〇〇〇年的问题。

穿的问题，呢绒不应该提倡纯毛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羊毛。要限制纯毛织物生产，要提高价格。应该向混纺呢绒发展。

空调器现在要作为奢侈品，不能多搞，要征收奢侈品税，提高销售价格。进口也要少进，要加税。凡是耗电大的奢侈品要限制，若干年内不能普遍进入家庭。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一般消费品，价格已经很高了，不要再加价了。

## 二十、关于第三产业

搞活第三产业意义很大。我们不仅要为第三产业鸣锣开道，还要开绿

灯。明年对发展第三产业要采取措施，放开价格。要靠大家办第三产业，企业可以搞，农民可以集资搞，国家也要搞。这样，就业好办了，社会化程度也就提高了。

## 二十一、关于价格

消费品要实行质量差价，生产资料价格也要逐步放开。计委要逐步减少计划分配的部分，包括基本建设用的材料。要实行两种渠道，两种价格。一是计划调拨，一是市场调节。这样做以后，全国的价格情况是：农产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放活，消费品搞质量差价。价格这样放开后，利润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可以增加，工资也增多。一部分生产资料涨价以后，对基本建设、重点建设，无非一是多拨一点钱，二是少搞一点。

两种价格要坚定不移搞下去。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两种价格并存，逐步向一种价格过渡。这样搞，有副作用，毛病、漏洞不少，但好处很大。人为地来确定价格的做法不行，一是不能正确定价，二是连锁反应较大。所以，价格还是走农村的路子，世界银行也说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两种价格并存，容易出现投机倒把，要加强管理，搞个管理制度。

实行两种价格，对各个企业的负担要平均。老企业用平价油，新企业用高价油，这样老企业即使不进步也有利润，新企业负担却很重。对此石化公司要在内部加以调剂。计委对生产原材料和负担国家指令性调拨任务的直供厂，按定的基数供应平价油，要开出单子，并逐年按照一定比例加以调整。

## 二十二、关于财政

“七五”计划不能打财政赤字。解决的办法就是借外债和借内债，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有些财政支出甩出去，由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至少在一九八七年应该实现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借债主要是靠发国库券。可以考虑一律按工资百分之十购买国库券，发工资时扣，像长期储蓄一样，到期偿还。这样硬性摊派的办法名声可能

不太好，但国家能得到实惠。开始可能要挨点骂，但没什么危险。对农村如何购买国库券也要研究一个办法。将来立一个法，这就是中国的办法。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城市工资总额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到一九九〇年，国库券发行能不能达到五百亿元，最少三百亿元如何？

关于征收职工个人所得税问题。不能全面开征，可以把起征点提高一些，按三百元、四百元和五百元三个等级实行累进征收。这样，面会小一些。先把税种建立起来。起征点高一些，可以减少广大职工的火气。

今后财政支出中，要定出各项开支的比例，如基建占多少，国防费占多少，行政费占多少，教育经费占多少，援外占多少，等等，不能要一点给一点。在国外，预算一经通过，不再追加，要钱下年再说。

国防费要搞固定比例，不能年年批。军委的意见要求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我原则上赞成，你们研究一下。

## 二十三、关于信贷

消费基金失控的提法可以再研究。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一九八四年，由于工资要改革，各地区、部门和企业纷纷增加消费基金数额（包括突击提职提级）。由于信贷体制要实行“实存实贷”，各专业银行和地方银行都纷纷争贷款基数。这两条是非正常发行和非正常增加贷款的原因。工资总额和贷款，以什么时候作为基数，将来研究时，可以考虑用一九八三年的。

对于去年票子多，要作分析，不是普遍的多，主要多在一部分地区，主要多在广东和江苏等省。

可以买点黄金、减少外汇储备。如果看准了美元要贬、黄金要涨，可以买进，每盎司三百美元以下就可以买。

陈云同志对外汇库存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有点外汇库存就烧腰包，我们有一、二百亿美元的库存也不算多；二是外汇库存不要少于连信用证都开不出去。要正确理解陈云同志的意见。外汇库存不要增加了，只要进口平衡就可以，就没有风险。

非贸易外汇，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方面有潜力。对出国用汇要实行定额控制，没有钱就不出去，或者拖到下一年再出去。农民旅游不能搞了，没有外汇给他。要由财政部搞个办法。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报告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二〇〇〇年工农业翻两番可以做到，但能源不够；第二，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资金市场，中国的重复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资金市场。有商品市场就必须有资金市场；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光抓工农业实物生产，不抓第三产业，结果工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低的。要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必须发展第三产业。

借鉴世界银行的意见，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资金市场。我们的预算外资金增加很快，“七五”期间将要超过国家预算内的资金，再加上银行的信贷资金、农村资金和城市居民资金，社会的资金量很大。通过资金市场，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办法，把资金的横向联系搞起来。

“七五”信贷计划的根本问题，要考虑体制改革。改革就是要研究资金市场，研究增加储蓄，研究怎样把呆滞的资金集中上来。居民手上有八百亿元现金，吸收一半就是四百亿元，通过银行媒介使之用于生产建设。

我们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银行不发达，结算方式很落后，存取款不方便。要用发达的银行促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卡能不能在中国搞？“七五”期间银行工作要跟上。

要研究怎样能利用香港资金。可以把我们在香港的银行同其他银行联合起来，搞一个财团，到国内来投资。要坚决把那些投资少、见效快、有偿还能力的项目，转到用香港商业信贷上去，把沿海城市的利用外资项目转到商业贷款，在税收上给予照顾。把这一批转出去，就可以把那些优惠贷款转用到周期长、赢利少而又急需的项目上去。请计委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路子一打开，我们的路子就宽了。

## 二十四、关于国营企业管理体制

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提出国营工厂实行社会主义股份制。中国国营企业应该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国家机构组成董事会，这样可以打破条条块块。我觉得，社会主义机构股份所有制加董事会也是个办法。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可以收买股份，插进去。

## 二十五、关于计划方法

我们的计划方法要改。我们现在的理论是僵死的，经验是旧的。搞“七五”计划纲要要按照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围绕开放、改革、搞活，用开拓的精神去研究。这一轮汇报总的感觉开拓精神不够，提出的问题太少，新的构思太少，思路太窄。世界银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宏观的、内在联系的，写的东西一看就清楚了。要研究他们的方法。他们先是收集材料，回去写，写完后再来考察，还有很多计算公式。我们的计划方法都是一些经验方法，我们的知识也不够。要组织几个人就世界银行报告写出研究意见。一是分析是否符合中国情况，二对其中几种建议，我们怎么选择。此事，由马洪、房维中，再加几个青年人组织起草小组，写出报告。

对南朝鲜要好好研究，他们的计划比例较大，控制更多，比起日本，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对台湾也要搜集材料，注意研究。还有新加坡的做法，也要研究。

还可以研究一下里根的经济政策。里根的办法是这边减税，那边用高利率，要找人研究一下美国的高利率经济。

对国内，我们要研究江苏的经验。江苏的经验是国家对地方实行包干以后，地方活了，省的财政收入从一九七六年的四十四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计划的八十四亿五千万，八年翻了一番。江苏的办法，主要是发展集体经济。集体企业除上交国家税收以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留给企业，用于发展经济。我们要给地方活力，竭泽而渔非英明之策和治国之道。

搞一个社会保障方案很重要，但是不能由一个部门来搞。根据经验，重大问题都不能由一个部门来搞，要实行主管部门、跨部门单位和理论界结合起来的办法搞。

二〇〇〇年的目标，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比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好。现在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外，别的国家都用国民生产总值。外国人说，只讲工农业总产值不讲国民生产总值，不搞第三产业，是效率低的表现。有人建议，上海、天津、北京和其它大城市，不要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指标，否则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我们的一些

大城市，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例可以低于全国，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例一定要高于全国。

多年来，我们是产值高，国民收入少。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如果使国民收入翻两番，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六就够了。“七五”计划如果积累率达百分之三十，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超过两番。我们可以按照世界银行报告的路子，组织一下，以计委为中心，好好地讨论讨论，先搞几个问题，同他们研究。

搞“七五”计划，计委是个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一个方面。四月下旬、五月上旬再听一次计委总的思路汇报（包括企业放活后计划工作怎么个搞法），把矛盾摆一摆，议它两三天，把思路定了，各部门搞各部门的。再用两个月的时间汇总研究，到七月拿出“七五”计划纲要。要吸收青年人参加进来。



# 接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 第二期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在谈到工厂的工资基金如何与经济效益挂钩的问题时）还是按利改税的办法，先核定工资总额基数和上缴税利挂钩的比例，一个厂一个办法，先分到各部门各地区，再分到各厂。要照顾原来的基础，有的基数高，有的基数低，有的潜力大，有的潜力小，当然就会不合理，以后可以再调整。到底按什么比例挂钩，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现在设想：上交税利增加百分之一，工资总额增加百分之零点七。各厂的比例不一样，有的可能零点三、零点四、零点五，有的零点七还不行，因为先进的企业原来水平就比较高，增长很困难。但一下子要求完全合理也不可能。第一步先通过这一改革把工资制度推到一个新的轨道上，然后在这个轨道上逐步调整，逐步完善。利改税就是这样。利改税第二步也是有问题的，对部分企业实行调节税，越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调节税越多，不这样，国家财政吃不消。后进企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时，国家暂时先让一块。现在看，先进企业目前留利水平不低，但今后潜力小，后进企业留利水平可能比先进企业增长快。将来的趋势是逐步降低先进企业的调节税，逐步调高后进企业的调节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第一步走上一个新的轨道，但照顾原来的基数，先进的多负担，后进的留的余地比较大，随着差距的缩小，逐步进行调整。

（有的同志提出企业工资改革是否控制得住时）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搞来搞去，还是“大锅饭”。效益好的企业靠自己的经济效益解决工资问题，这是正当的。听说有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一

方面挪用发展基金、生产基金发奖金；另一方面又向银行贷款搞生产，等于用贷款发工资。这种倾向必须制止。

（在谈到今年的改革如何搞时）今年怎么搞法，我在元旦政协座谈会上讲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国内外绝大部分评论都是肯定的。看来这个《决定》作为一种构思，作为一种蓝图，作为一种大的方向、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变成具体的政策、步骤，还需要时间，需要不断地探索，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有了大的框框，有了方向，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就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要采取这样一个原则：从大的方面讲，这是我们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要有信心，坚定不移。但具体步骤还要谨慎，一步一步地走，一边走一边看，这样走上几步之后，就会更顺利一些。

中央《决定》的出发点、落脚点、主要目标，就是把企业搞活。企业活了，生产活了，整个社会也就活了。解决企业活力，第一个就碰上计划体制问题。计划体制问题不改革，企业不可能活，这和农村有很大不同。严格地讲，农村历来是指导性计划，只有收购计划是指令性计划。但在城市里，特别是骨干企业，就涉及到计划体制问题。今后不能搞那么多指令性计划，即使是指令性计划，也必须给企业留下余地。计划体制一变，就发生一个问题，过去靠指令性计划管企业，今后靠什么引导企业？这就要发挥价格的作用。目前价格不合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多年积累的问题，动小了不解决问题，动大了社会承受不了。因此，城市改革只能一步一步走，想一个早上搞一个方案，宣布全国怎么搞，这在中国行不通。怎么走法呢？首先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要先易后难。我们这几年的改革实际上是这样走过来的。改革从农村先开始，农村的改革牵制比较少。农村除农产品价格外，主要是农民自己内部的问题。承包是农民内部的承包，国家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农产品价格问题。社队、乡镇企业也比较简单，城市集体所有制比较好办，小企业也比较好办，现在这些都活起来了。商品也是这样，农副产品、小商品也活了。对大企业、骨干企业、大商品的这部分改革放在了后边，如果对大企业也采取像小企业一样的办法，国家吃不消，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错综复杂的旧体制只能逐步解决。再者，改革不能只搞某一个方面，改一个方面，不搞另一个方

面，必须互相适应，因为它是互相牵制的，不能孤立地搞。每一年搞些什么，什么事能搞到什么程度，既要分步骤走，有个轻重缓急，又要考虑到连锁反应，尽可能地逐步配套、小配套。整个改革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某一个地方开始，其他方面同步配上套，然后再前进一步，再进一步配套，相互配套，把纵深和横向结合起来。改革只能逐步进行，不仅要看需要，还要看可能。提出需要和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经验，还不具备那样的经验，一下子规定得很细，设想今年怎么搞，明年怎么搞，大后年怎么搞，我看不具备条件；二是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问题。三中全会《决议》大的轮廓有了，现在是逐步实行的问题。逐步实行，就要分轻重缓急，逐步配套。

一九八五年价格问题、工资问题都要迈出一步，但总的看来不可能迈大步，只能迈小步。要迈步，就要迈步前充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尽可能事先设点防线。物价要迈出一步，物价迈多大，要很好研究，物价迈出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有预防措施。工资也一样。今年希望迈出不大的一步，但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务求必胜，一定要办成功。今明两年体制改革是重要的两年，一定要迈出重要的步子。只考虑到困难，就会犹豫不决，丧失时机。这两年搞成功了，我们就有了经验，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会增强，以后就可能加快改革的步伐。用五年左右时间使《决定》的原则逐步实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今明两年。为使这两年的改革既迈出重要的步子，又能取得成功，其它方面要为其创造条件，包括货币发行、建设规模，甚至包括工农业增长速度问题。在改革中间，为了使改革不发生问题，不一定在这两年把速度搞得很快。为了把经济理顺，必要时要让点路。

希望体改研究班第二期学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后，积极探索，多提供一些经验，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可以通过通信方式与体改委建立联系。

# 放开农产品价格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农副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这说明，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生产同社会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一九八四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点一亿担。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在低消费水平下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乏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完全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

\* 这是赵紫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红旗》杂志曾予转载。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已经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題。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原则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像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多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养鱼、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像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和外商合作，把产品质量搞好了，三年就占领了香港很大一部分鲜奶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更不要都去搞商品粮基地。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白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像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养，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去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

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 农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扩大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按统购价收购，有多少收购多少。这就是保护价。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资，平抑物价，避免由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劣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产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下降，缺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些。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所以，不能说这是“限购”，应当说这是放开。这样，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国家按优待价收购总数不变，各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时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作物品种，改进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今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左右；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可以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这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等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关内，关内猪肉调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

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肉类能基本自给。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 进一步搞活农业的重要措施

把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变，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是个很好的时机，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农民种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又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变，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来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会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



民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 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 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下午座谈会结束，耀邦同志、启立同志和国务院的一些同志都来了，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我看这个会开得是好的。谷牧同志开始时的报告、同志们的发言、会议简报我看了，大家讲了许多好的意见。刚才谷牧同志就会议讨论的问题，需要重申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又扼要地作了总结。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是在特区、沿海港口城市，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带，大家都拥护中央这个方针。对开放的范围、政策、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除个别地方还有一些要求没有解决外，其他看法比较一致。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是好的。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 一、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

关于开放、改革的意义，这里不多讲了。外国人评论说，邓小平同志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叫开放、改革的道路。去年春天，胡耀邦同志提出，中国的四化，一靠改革，二靠开放。同年五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用了这个基调。改革和开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长期实行的重要方针。加快我国四化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改革总是一天天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们的开放也是地区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这是确定下来的国策。

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开放就是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我们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开放来进行的，特别是从包括对外和对内这两个方面开放的含义来讲更是如此。现在大家都喜欢用“封闭式”经济、“开放式”经济这些说法。我们的改革就是由过去的“封闭式”经济改为“开放式”经济，由对外封闭改为对外开放，由对内相互封锁改为对内相互开放。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能闭关自守，就必然要开放，就必须改革过去的“封闭式”经济模式。所以，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

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大的方向定了，这条路子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可是究竟怎么走，具体怎么搞，老实讲我们还没有经验，还得通过实践，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在实践中来发现和总结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做法。中国的改革大体上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展开的。我们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指导思想，有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了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基本构思、总的方向和总的政策。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就在于我们总的设想有了，总的构思有了，总的蓝图有了，我们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也要看到，实现我们的构思、设想和蓝图，必须一步一步地实践和积累经验，一步一步地探索，这又规定了我们的改革必须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第二，我们的改革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由专家们先行设计一整套方案，然后大家在一个早晨步调一致地按此行动。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成功。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对《决定》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是一个很有胆量和勇气的《决定》。但是，小平同志同时说，要走一步看一步。既要有勇气做出关于中国的改革方向、改革蓝图的大胆的决定，又要在步骤上走一步看一步，避免大的失误、大的曲折。因此，在今年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我用了三句话来表达以上的思想：一句叫做“坚定不移”，这是说从战略上、从改革的总方向上，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要犹豫徘徊。第二句叫“谨慎从事”，就是说在具体的行动、步骤上，要谨慎从事，不要鲁莽轻率。第三句叫“务求必胜”，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允许出点小乱子，不能允许出大乱子。

只能允许出那些可以及时调整的某些偏差，出了偏差有灵活反应，能及时地加以调整、纠正；而不能路已经走得相当偏了，问题已经相当多了，然后再来一次大的调整，出现一个大的曲折。我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央关于改革问题的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开放上，如果出现一点问题就裹足不前，动动摇摇，是不对的。但是，在改革中不承认我们的经验不够，不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不对的。中央和国务院往往在一个时期，在改革和开放上，提出一些重大的设想、重大的政策或重大的部署，但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往往强调步骤、强调领导、强调有秩序地进行。这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提得很高，步子不是很快。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去年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当时也有一些同志反映“不过瘾”。一说开放，大家都兴高采烈，都拥护，但是一谈到具体政策、具体步骤，同志们又觉得不那么过瘾。后来经过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认识也一致了。这次也是这样的，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说，要使沿海大约两亿人口的地区形成一个从南到北的开放地带，设想讲得很大，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要先搞“小三角”，还是要由点到面，有步骤地进行。这样把脚站稳了，实际上以后的速度会加快。我们的国家总是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

讲到改革和开放，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习惯作法，就是很喜欢一拥而上，一哄而起。要么不搞，要搞就一拥而上，一哄而起。这是我们多年来搞运动的做法，好像成为习惯了。至今在经济工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仍然受到这种习惯做法的影响。比如，在国际贸易上已经给外国人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很容易“刮风”，搞不清楚一个时期刮一个什么风。当然，这里也可能有经验不够、信息不灵的问题。确定要搞什么就大家都来搞，一说不搞大家都不搞，缺乏准确的信息和正常的做法，往往采取突击、“刮旋风”的办法。一九八二年日本报纸就报道中国生铁旋风，对中国各地竞相降价出口生铁很惊讶，一下日本的生铁都顶不住了，时隔不久又竞相进口。现在进口彩电也不得了，听说有人托驻日本大使馆买彩电，大使馆说很困难，因为我们进口太多了。还有进口汽车之风，进口电脑之风，进口化纤之风，外国人也摸不着底，不知中国今后又刮什么

风。无论是国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大宗商品突然增加很多、突然又下降很多的做法都是不适当的，要尽量地把它缓解一下。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要增加进口些什么东西，也只能逐渐地增加。要出口些什么东西，也只能逐步增加，不然一下子拥到国际市场，价钱降得很低，对我们不利。现在很多事情我们都摸不清楚，今年怎样，明年怎样，国内市场怎样，国外市场怎样，若明若暗，不甚了了。这需要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调查和预测。经济工作是很复杂、很细致的，有它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搞，绝不是一哄而起所能奏效的。搞经济工作，“刮风”的办法是不行的。什么事一拥而上，一拥而下，肯定不会有好的效果。中国太大，如果每个地方少用一点，加到一起就节约很多；如果每个地方多用一些，加到一起就差额很多。如不注意，就往往使国际市场某些产品暴涨暴跌，对我们极为不利。从根本来讲，是我们没有经验。经过这两年，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这个问题。

以上讲了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问题。谷牧同志的讲话也好，工作部署也好，《纪要》也好，都是本着这么一个精神写的。这次开放的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应当根据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办，才能办得好。

## 二、开放要由沿海到内地、由点到面逐步推进

作为开放地带、开放地区来讲，全国是从沿海到内地发展。当然内地也不是不开放，内地也可以出口、进口、引进技术，也可以搞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这都是开放。但从全国来看，作为开放地带，总的还是由沿海到内地，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从沿海开放地带本身来看，我们现在的部署大体上是由南到北，一步步地走。从经济发展的水平看，从宏观上考虑，还是先南后北好一些。如果南北统统一起开，这又和刚才讲的指导思想不一致了。反正得有个步骤，分个先后，轻重缓急要排队。就全国而论，一个长江三角洲，一个珠江三角洲，还有一个闽南小三角，条件更为优越一些，可先走一步。这不是忽视胶东半岛的优势、辽东半岛的优势。但总得一步一步走，先开放这些地区，下一步再考虑胶东和辽东半岛。

内地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内地的同志认为，沿海本来条件就好，还要给他们优惠的条件，而我们内地的条件本来就差，还不给优惠条件，所以内地也提出要开放。反正事情只能一步一步走。中国的事情要是大家都挤在一起搞，就搞不成了。对于尚未开放的地区来说，别人先开放一步，也正是为自己开放准备条件，积累经验。要是你开我也开，结果谁也开放不了，谁也迈不开步。所以还是由沿海到内地，由南到北，逐步推进。

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也应该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我们确定要开放什么地方，步骤上也应该分细一点，多走几步。这对于改革和开放的健康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分几个步骤，就可能顺利发展，而结果是加速了整个开放的进程、改革的进程。要是几步并一步，急于求成，结果反而快不了。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你们回去以后，可能会遇到县里、乡里的同志思想不通。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让别的地方开放，而不让我们开放呢？”要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我们既能在大的方针、政策上一致，又能在具体的步骤上取得一致，就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 三、开放要有“进”有“出”

我们对两个三角洲、沿海地带，要给一些条件，给一些政策，使他们进一步开放。但进一步开放，绝不能理解为只是“进”，只是把国外的东西引进来。开放是有进有出，既要“进”，同时要“出”，要扩大出口。而且，从全国对沿海开放地区的要求来说，今后必须努力做到出大于进。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开放？一方面为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利用一部分外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利用开放地区的有利条件，通过改革和开放，能够多创汇，使我国的产品更多地打入国际市场。从目前的需要来看，从长远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都有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资金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而运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需要用外汇去偿还。这就有一个外汇支付能力、支付手段问题。因

此，我们应利用开放之机，努力提高自己外汇支付的能力。当然，一开始就要求开放城市和开放港口一下创多少外汇，节余多少外汇上交给国家，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引进一些设备和技术，进口一些材料，还需要花一定的外汇。但是，总的来讲，对这些地区的要求不仅是个外汇平衡的问题。我在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讲过，这些地区从长期来看外汇平衡是个大问题。你们的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设备也可以引进来，外资也可以借得到，材料也可以买进来，关键是外汇怎么办？当前在珠江三角洲，这个问题很突出。长江三角洲和所有开放的城市、港口、地区都有类似问题。要进一步加快引进，解决外汇问题就更加迫切。沿海开放地带的任务，将来绝不能仅仅是使本地区的外汇平衡，还必须为国家多创外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要内地一下子多创汇，是有困难的；相比之下，沿海开放地带创汇能力更强一些，应当多担负任务。不然，我们国家的外汇靠哪里？要看到，外汇困难是长期的，现在国家积存了一些外汇是暂时的现象。不能因为存了这点外汇，就误认为我们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外汇问题。我们国家外汇紧缺，努力创汇，争取外汇平衡是个长时期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国际金融市场有一个特点，你越是有外汇，他越是争着借给你；而当他发现你外汇紧缺，急迫需要借债时，他反而不借了，或借贷条件很苛刻。直到今天，外国还是想借钱给我们，因为中国的黄金储备和外汇积存还有相当数量。但是，一旦我们的外汇结存下降到正常储备的警戒线以下的时候，借款的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巴西就是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借钱给他，但是到前年就谁都不借给他钱了，都上门逼债，因为知道他不行了。墨西哥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特别应该懂得我们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情况不同。美国等国际金融资产同拉丁美洲有个经济共存的关系，所以墨西哥、巴西发生债务危机，美国会救它；中国要是发生那种情况，他是不会救你的，我们也不能指望靠他救。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利用开放和改革之机，增强创汇能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创汇率；不能光考虑进，必须同时考虑出，有进有出，开放才能继续下去。从长远讲，沿海地带必须为国家提供外汇。如果沿海地区开放后只有用汇的本领，而没有创汇的本领，那就会走不通，就不可能出现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你们的任务是要多创外

汇。至于怎么搞，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研究一下，这是硬功夫、苦功夫、真功夫。要按小平同志讲的，一项一项地下功夫搞好，要认真落实。不要光挂在嘴上，不见行动。

上次我在佛山市讲过，你们现在的情况虽然很好，去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老百姓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如果你不解决出口问题，再搞三年就玩不转。不能光靠用人民币抢购美元，抢来抢去，人民币就会贬值，外汇也增多不了。现在外汇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大家高价抢购外汇，造成人民币贬值。本来一九八四年我们外汇创汇额是不错的，在美元坚挺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约是三点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但是在国内一些地方，是用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甚至更高。这反映外汇紧缺，花外汇的人多，创外汇的人少。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不仅开放不能持久，而且发展下去会冲击人民币，把国内金融搞乱。所以，一定要给开放地区的同志们讲清楚，中央之所以把一些地区提前列为开放地区，就是为了让你们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多出口、多创汇，为国家作出贡献。不能一说开放就要国家多拨外汇，多花国家的外汇，而不把多创汇放在议事日程上。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条件开放，我们就开放不起。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经济特区，在开放城市以及开放地带，都必须十分明确。当然，实现这个要求要有个过程，但是必须有这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 四、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

现在到了把这个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我国过去的体制是高度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这种管理体制，必须坚决破除。不破，就无所谓改革；不破，就谈不上开放；不破，也绝不能搞活。但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搞活以后必须有相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不能认为一开放就不要管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开放，越是改革，就越要有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非常薄弱。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讲加强管理，也绝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采取旧的办法，而是要学会和加强开放中的管理，改革中的管理。资本主义国家是开放的，香港是最开放的，但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



而我们现在与改革、开放相配套的管理却非常薄弱。旧的管理办法不适用了，现在还要继续破。要改革，要搞活，就要继续破除同改革、开放相矛盾的旧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建立一套适应改革和开放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小平同志经常讲我们要有两手。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不要怕开放以后，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要因噎废食。当然，好的东西进来，坏的东西也可能进来。因此，只有开放这一面还不够，还要有另一手对付这些坏东西进来。他说一个整党，一个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了能保证开放顺利进行，即使出点问题，我们也能及时处理，不使蔓延开来。这两个方面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我也很赞同广东同志在会上讲的“加强管理、强化管理”这句话。这是指导开放、促进开放、保证开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越加强管理，就越敢开放。比如深圳的二线不搞起来，你敢开那么大吗？现在之所以在有些地方不敢放那么宽，就是因为二线跟不上去，就是因为管理问题没有解决好。加强管理，才能保证开放健康发展，使开放不会夭折。

究竟怎样加强管理，要下功夫研究、探索。将来在这方面，我们要立法，要有些规章制度。特别重要的是执法要严，有了制度不执行等于是空的。一旦有了规矩，有了法律，执行就要严格。当然我们要把界限划清。过去也搞了一些错案子，不该打击的也打击了。但也不能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不敢讲加强管理了，这一点我们思想上要明确。至于说管理制度怎么定，立法怎么搞，什么时候才能健全起来，还要有个过程，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另外，炒卖外汇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现在仅仅开放了几个经济特区，加上几个沿海城市，但是炒卖外汇的问题，已经对我们国内金融产生很大的干扰。对此，我们也应当有两手：一是坚决搞好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一是同炒卖外汇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要有一套有力的办法和措施。现在这股风已经刮到北京、上海来了。北京有些商店、出租汽车和饭店，给外汇券是一种脸色，不给外汇券马上又是另外一种脸色。这种情况广东早已有了。将来开放的地区越来越多，同国际上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估计开放以后突出的问题，就是外汇问题。在外汇平衡上不能出大的问题，不能没有支付能力。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会出现倒买倒卖外汇，

在国内相当一个范围内会形成两种货币，其结果就会冲击人民币，造成人民币不断贬值。这样下去，对国内经济建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要有一套很严格的对付办法。炒卖外汇的现象是会长期存在的。但要严厉地取缔，这样才能控制得住。绝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是难免的，任其蔓延。要是任其发展下去，到最后就会不可收拾。所以必须从严管理，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不管是什么人，坚决不允许搞这类活动。特别是将来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都陆续开放，如果外汇再倒卖起来，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形成两种货币，内地怎么顶得住？那样，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建设就有可能乱套。我认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大，很值得我们重视。请搞金融的同志，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逐步建立一套办法、措施。下一步外国银行也可能逐步进来，国内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也会增加，比如上海酝酿要恢复交通银行，天津酝酿要恢复金城银行。将来还可能设外汇商店，开展外汇自由存取的业务。这些措施一实施就会搞得更活。但是，另一方面就要坚决制止外汇的倒买倒卖和外汇在国内流通，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严格执行。

这次会议最后要形成一个《纪要》，将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和常委同志审阅通过后，就批发下去按《纪要》办。另外还有个立法的问题，上次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也是由人大授权的。人大已授权国务院，对改革中间的问题可以相机处理。这次开放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在宣传口径、说法上，也要搞得周到一些。请谷牧同志找有关同志研究一下，作一些布置。

# 接见全国省长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

这次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省长会议。我们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召开的，主要的、中心的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我们当前的非常好的经济形势，就是如何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今年真正在改革问题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又不至于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既要使改革走出一步，又不要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这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怕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不迈出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小平同志最近讲的要丧失时机。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年在迈出一步时掉以轻心，而最后使物价出现较大的波动，人民是不会满意的。世界上一些好心的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对我们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都希望我们取得成功。但是他们不少人也有一些忧虑，怕中国的改革带来大的通货膨胀，使改革发生困难。东欧的改革情况当然同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发生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物价出现大的波动。目前我国人民反映，也是集中在两点上：第一要求改革，第二怕物价上涨。广大人民希望改革，但不要物价上涨。所谓物价上涨，就是乱涨价。有计划地价格调整，人民是理解的，会接受的。总之，不改不行，但如果改的结果带来物价的较大波动，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改革就不能算是务求必胜，不能算是取得胜利，而且会给以后的改革造成新的困难。当然，要做到这两点很不简单，需要大家共同仔细研究。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主要精神，会议要集中讨论这些问题。

本来这个会议要十号开，为什么提到九号呢？因为耀邦同志要出去。我们省长会议开得不多，四年开了两次，这个会议又很重要，大家又希望见到耀邦同志，请他讲讲话。因此我向他提出，希望他改变一下日程，和大家见见面，耀邦同志答应了。所以这个会议提前半天，耀邦同志见见大家，刚才已经照了相，讲了话。耀邦同志的话虽然讲得不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大的界限划清楚了，我们就按这个精神，按耀邦同志的意见开好这个会。

刚才耀邦同志讲到整党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现在我们整党要保证改革，既要促进改革，使我们决心改革，也就是解放思想；又要使改革健康发展。我们党风如果不正，纪律松弛，改革就会遇到困难。所以整党要促进改革，保证改革，这个很重要。

# 慎重初战 务求必胜<sup>\*</sup>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

这次省长会议，互相通气，交谈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以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大家认为开得很好。正如耀邦同志所说，是用轻松的办法，解决重大的紧迫的问题。这种形式，我们以后还要采用。会议期间，耀邦作了重要讲话，依林、启立、纪云分别就经济形势、工资改革、物价改革作了报告，万里同志也讲了话，都讲得好，我都同意。

一、当前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都好。主要表现在：两大部类比较协调，生产、流通、消费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势头，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这是在调整经济的基础上，改革、开放、搞活的结果，是进一步改革的有利条件。问题是货币投放过多，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加过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结存外汇急剧下降。这是今年改革的不利条件，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一九八五年是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在改革上，必须不失时机地迈出重要的一步。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既不要丧失时机，又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探索，防止出现大的失误。在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上必须坚定不移，在具体步骤、具体行动上必须谨慎从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曾经发生过消费基金、信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

贷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失控的现象，最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使改革被迫停顿下来。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当前特别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我们的改革，只能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不顾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第二，我们的改革，要考虑到宏观上引起的反映，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第三，我们的改革，是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下功夫提高经济效益，不能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靠歪门邪道捞取外快。这样，才能使改革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今年的改革，是在去年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既要在物价和工资改革上，迈出重要的步伐，又必须在宏观上加强控制，防止物价发生大的波动。这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关键，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旨。现在人们的心理是，要求改革，害怕涨价。不改革，坐失良机，不能理顺经济关系，就会失去群众；但是，如果搞不好，物价失控，轮番涨价，也会失去群众；这种危险性也不是不存在的。避免物价发生大的波动，需要四个条件：一是改革的方案、步骤本身要妥善，要切实可行；二是群众的心理因素不可忽视，要早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三是要严格制止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趁机乱涨价；四是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数量，这是最根本的。治本治标，双管齐下，就有可能既搞好改革，又不使物价失去控制。

四、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是宏观上最重要的措施。为此，今年的信贷规模要适当控制。中央银行对各专业银行、各省区分行都要有存贷差的控制数，不得突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受一点影响，少增长百分之一、二，也要下决心这样做。该抽紧的，一定要抽紧；当然，该支持的，也要支持。申请贷款的企业，不论国营、集体或个体，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信贷资金要管紧一些，用好一些，用在刀刃上，不搞一刀切，以取得良好的效益。

五、今年的物价改革，重点是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和运输价格问题，以利于农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同时，拉开质量差价和地区差价，以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的交流。这是承受得了的，对整个经济的发

展有益的。今年在价格上所采取的措施，步子已经不小了。因此，主攻方向要明确，不要打乱仗干扰中央的部署。物价体系的改革牵动全局。放开生猪和蔬菜的价格，今年何时执行，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除此以外，什么调，什么不调，什么放，什么不放，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执行，不得各行其是。

六、今年的工资改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是要推行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工龄工资在内的结构工资制；工业企业单位，是要逐步推行工资总额与上交税金挂钩的办法。连续几年消费基金都有相当大的增长，带有还欠账的性质。现在，消费基金的增长应适当控制。特别是滥发奖金、补贴、实物，乱提工资级别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今年的工资改革，主要是要转上新的工资制度的轨道，国家力量有限，标准不能过高。这一点要向全体干部和全体职工讲清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务工资，绝大多数应按最低一格执行，以后再逐步拉开距离。工矿企业的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是好的，问题是如何挂得好，如何控制得住，要制定一套控制和监督的办法。实行挂钩的企业，一是工资基数要认真核实，定得合理。对去年工资总额中的那些不正当因素，应予剔除。二是要开征工资调节税，以防止由于企业外部条件不同而造成的工资水平悬殊过大。目前推行工资基金与上交税金挂钩，主要卡在还贷款如何计算上。把归还贷款完全视同上交税金是行不通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予考虑。要研究出适当的比例，具体办法另定。今年不具备条件实行挂钩的企业，仍按原来的办法执行。同时征收奖金税，可比去年适当放宽一些。但去年的奖金税必须照章缴纳。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收益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也应做适当规定，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不能分光花尽。某些地区的工资区类别过低，可分步骤逐年解决，今年拟先把四类地区调为五类地区。

七、严格禁止乱涨价。国营企业应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的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要牢牢掌握在国营商业、物资部门、生产单位手中，不准集体和个体商业经营这些商品的批发业务。应该看到，我们国家有力量控制得住市场物价，怕就怕国营和集体企业自乱阵脚，趁机乱涨价，扰乱市场。这是危险的，是破坏改革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

八、这几年行政经费增加很多。今年的行政经费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先削减百分之十，节省下来的钱归各级财政。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达到三百二十亿元，比前年增加四分之一。今年一要压缩总额，要求比上年核减百分之二十；二要控制商品购买范围，对市场紧缺的汽车、彩电、空调器、录像机、家具、呢绒等十七种商品，未经授权单位批准，任何单位都不得到市场购买，与民争货。要重申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扬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作风。

九、对党政军机关开办的各种公司和企业，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决定，认真进行清理和整顿。对经营商业的各种公司，要重点加以整顿。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不得兼营商业，不得担任各种公司、中心等经济实体的顾问、名誉董事长等职务。对利用权力，钻多种价格的空子，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招摇撞骗的，要坚决取缔；暴利必须没收，偷漏税款必须补税，并科以罚金。从事工业、交通、技术咨询、服务行业的，可以允许继续办下去。但经营方向必须端正，必须符合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所有这些公司和企业，都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人、财、物上与机关单位脱钩。此事各级政府要切实抓一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检查督促，各机关单位要具体负责，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对各种民办企业，也应当进行整顿，加强管理。

十、这几年结存一部分外汇是暂时现象，去年四季度以来外汇结存急剧下降。外汇紧缺将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实现外汇平衡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开放，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不能只进不出。要利用开放的条件，使我国的商品更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努力提高创汇能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在这方面，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各地各单位都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外贸出口计划，提高换汇率，减少亏损。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削价竞销，“肥水不流外人田”。要加强外汇的统一管理，取缔黑市，严禁炒买炒卖，不准在国内市场流通。对去年机关团体企业单位炒买炒卖外汇的要坚决清理，情节严重的要加以惩处。全国各地各单位利用外资、借用外债、使用外汇的情况要加以登记和审查，不能心中无数。现在结存的外汇已是“一女多嫁”，如竞相使用，就有可能出现巨额亏空。属于各地各单位的外汇，所有权不



予变动，但如何使用，国家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管理、指导。国家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外汇的分配使用计划，经国务院批准后下达执行。一个票子，一个外汇，只要在宏观上控制得住，就出不了大问题。

十一、控制货币发行量，必须同时加速货币回笼，包括非商品回笼。否则就会成为单纯的紧缩，对生产建设不利。不要指望上边增加多少信贷资金指标，那是不现实的；要把眼光转到大量回笼货币和吸收存款、收回贷款上来，这方面潜力很大，大有可为。今年对回笼货币要有一些特殊措施，力争多回笼一百亿元。利用结存外汇，进口一些差价大、赚钱多的高档消费品，对于活跃市场，回笼货币，为改革准备资金都是必要的，这几年要抓紧落实。工业、商业、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把紧俏商品拿出来供应市场。国库券的发行量要增加，条件要更优惠一些，期限要缩短，利息要提高。居民储蓄存款不仅要稳住，而且要增加，存款利率要适当提高，以利于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基金。计划拿出一百吨黄金，制作首饰出售，回笼货币，稳定金融。

十二、今年市场情况不可过于乐观。回笼货币，繁荣市场，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说，必须立足于国内，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要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把我国消费品工业提到一个新水平，大力增产价廉物美、款式新颖、适销对路的商品，满足社会需要。

十三、住房改革势在必行，应提上议事日程。兴建住房，是人们的迫切需要，是吸收社会购买力的一大产业，回笼货币的一大财源。国家把城镇职工住宅包下来，低房租、吃大锅饭的办法，不仅使建筑行业失去活力，而且使消费结构畸形发展，大量的社会购买力转而集中冲击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必须进行改革。要把住宅出售和房租改革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路子来。这件事要专题研究，积极试点，拟订方案。

十四、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小企业、集体企业放活了，要注意解决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活力问题。国务院确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项规定，要真正落实到企业，不要层层克扣。企业内部也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经营管理水平高、对国家贡献大、留利水平过低的少数大中型企业，应逐步降低调节税，或适当调

低指令性计划指标，使它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允许大企业搞跨行业的多种经营。

十五、我们进行这样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没有一个安定团结、遵守纪律的良好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改革过程中，在开放、搞活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管理，强调纪律性。一方面要改革、开放、搞活，一方面要讲管理、制度、纪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强调管理，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沿用老办法，而是要建立一套同改革、开放适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要搞好立法和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立法要从实际出发，执法要严肃认真。财政、银行、审计、税务、海关、物价、统计、工商行政等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同违犯财经纪律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

十六、搞好整党，纠正不正之风，促进改革，保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决策和部署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当前出现的几股新的不正之风和纪律松弛的现象，对改革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不加以纠正，改革很难顺利进行。除了必须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段以外，还必须强调党性、党风、党的纪律。

十七、今年的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巩固和发展大好的经济形势。今年工作的要点是：抓好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加强宏观控制（控制信贷资金、消费基金、固定资产投资和外汇），防止物价发生大的波动。我们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改革确实大有希望。对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要重视，不能听其蔓延。只要及时提出，及时解决，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当前是改革的重要时刻，掌握动态，研究政策，至关重要。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都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从全局出发，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多研究一些宏观方面的问题，和我们多通气，共同做好工作。全国从上到下，在重大的决策、部署、措施上，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

#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插话摘要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是我们当前经济形势好的重要特点。持续发展很重要，一年好一年坏，走一步又退一步，这不叫好。一九八一年我们实行调整以后，连续几年，生产一浪高过一浪。做到持续协调发展也很不容易，多少年来文件上都这么说，但真正做到，还是没有几年。现在确实是很好的形势。对当前的形势怎么估计？我同一些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开会座谈，认为这次和一九八一年调整的时候不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很乐观，认为我国经济起飞的时期已经到来。多数人认为还不能这样看。后来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讲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现在看，还是应当谨慎一些。形势好的方面是要有足够的认识，对存在的问题也应有正确的估计。去年四季度票子发得那么多，不正之风来得这么猛，这两个东西究竟对今年有多大影响，一定要有冷静的分析。所以，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起飞”呀，“良性循环”呀，“财政经济基本好转”呀，都没有说，留点余地好。对存在的问题，对今年改革的不利条件，要重视，不可掉以轻心。把这些问题看得过重，甚至认为大事不好，惊慌失措，那是错误的。但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听之任之，也会造成损失。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把矛盾暴露了，我们加以重视，加以解决，工作就会前进一步，不利条件就会转化为有利条件。

二、去年第四季度，特别是十二月份，不仅是多投放了票子，增加了消费基金，减少了外汇结存，而且是带来一个信号，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全党的思想不那么统一，不正之风对改革的干扰相当严重。如果大家认识一

致，不正之风就可以顶住；如果认识不一致，不正之风就会蔓延。不正之风有些是划不清界限，把改革、解放思想和不正之风混淆了；有些明知不对，也不敢管，甚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去干。这包括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内，有些就是从北京刮起的。有些领导干部，慷国家之慨，化公为私，假公济私，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为自己争选票，或想在退休以后给自己留“根据地”。这些不正之风，对改革是极大的危险。在改革中，必须统一认识，坚决纠正这些不正之风。

三、在改革中加强管理，首先要把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管住。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可以说决定于“官僚资本”是否捣乱，只要把“官僚资本”管住，我们的改革就会顺利进行；否则，改革就要失败。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占绝对优势的，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官僚资本”不捣乱，个体企业、小商小贩就掀不起大浪。今年要把物价改革、工资改革搞好，而价格又不至发生大的波动，使调整物价引起的冲击波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乱涨价，那就必须加强管理，主要是要管住“国”字号的，还有与国营经济有直接联系的集体企业，对这些单位一定要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要“不教而诛”。事先要明令公布，哪些准搞，哪些不准搞，令行禁止。对乱涨价的，对搞不正之风的，坚决惩处。有些要撤职，开除党籍。违犯国家法纪的，还要法办。经济上也绝不能让他们占到便宜。

四、对“变通”办法也要作具体分析，需要划一个界线。比如前些时候讲“松绑”，也不能什么都“松绑”，党风能“松绑”吗？纪律能“松绑”吗？这些都不能松。看来，对“变通”也应有个正确的说法。有些是全国的统一规定，地方、部门、单位无权变通，也不允许变通；有些不影响全局的具体规定，可以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耀邦不是讲要“立”吗？现在我们“立”的东西太少，没有一套比较稳定的、比较长久的规定性的东西。多年来我们是习惯靠“精神”办事，办一件事，要看上边什么精神。往往一件事没办完，新“精神”又来了，下面不知所措。我们要记取这方面的教训，搞些稳定性、规定性的东西，有些要“立法”，使大家都有所遵循。

五、改革要有先有后，互为条件。我们的改革，如果大家都不动，那就是死水一潭；如果要改大家一起改，那就会乱套，改革就无法进行。改革有个分步骤、分层次，有先有后、互为条件、互相支持的问题。我认为，我国的改革能成功的妙诀也在这里。从全局来看，农村的改革先行一步是好事。如果城乡一起改，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钱从哪里来。当时城市稳住不动，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后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有了原料，有了市场，反过来也就支持了城市，使城市的改革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们的大中企业担负了财政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相当大一部分，支持了小企业、乡镇企业的放开；现在，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活了，国家的税收增多了，就有可能逐步减轻大中企业的负担，使他们也具有活力。我在上海也说过，这几年上海每年上交财政一百多亿元，支持了全国的改革。现在有可能来解决上海适当减负放活，发挥优势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可以使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六、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要看到把沿海地区开放，大大有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再过两三年还会更明显。不要认为把开放的优惠条件给了沿海，沿海开放后发展起来与内地无关。事实上，沿海是全国的沿海。沿海经济的繁荣，势必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现在横向联系增加？就是因为沿海开放了，有了与内地加强经济联系的可能性。沿海开放后，背靠内地的工业基础，面向国外市场，就能使沿海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内地的骨干企业，主要科研部门，也可到沿海开个窗口，沟通信息，更新知识，承接订货，使内地工业基地的作用也发挥出来。这两年沿海与内地的横向联系正在发展，看来大有可为。不能认为是优待沿海，不管内地。什么事都有个主要环节，抓住主要环节就把整个链条带动起来了。沿海不是孤立的沿海，开放沿海不是对内地毫无关系。时间越长，越能看清它的意义。

七、我们的国家这几年形势很好，但我们家底薄，还是一个穷国，而且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发展生产，是要搞建设，不能认为现在就富的不得了了，可以享受一番。前些时候，我们在宣传上也讲得不够清楚，好像到处都是万元户，给人民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共产党这几年把农民大

都变成了万元户，现在该轮到工人、知识分子成为万元户，把胃口吊起来了，因而在增加工资和消费基金上，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应当把我们的家底向群众和干部讲清楚，很多事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起。我赞成一些同志提的意见，今后有些事情要多做少说，没有普遍意义的，就是做了也不说。顺便说一下，我们不赞成组织农民、组织万元户到国外去旅游。实际上出去看一趟，并不能学到多少适合中国的东西，弄不好还可能把那个万元户搞破产。我们国家刚刚好起来，不要去搞形式、搞虚假、搞浮夸等不正之风，那些东西是不祥之兆。现在我们国家应该励精图治，要扎扎实实工作。

八、工资、奖金问题不能互相攀比。一攀比，你搞我也搞，要搞大家搞，效益好的发一百元，效益差、经营差的也发一百元，结果还是平均主义。这样搞下去，改革就无法进行。我们贯彻按劳分配，使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就一定会出现差别。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工资收入都有差别，搞得好的与搞得差的，要拉开档次，体现差别，承认差别。当然靠工薪收入的同担风险的个体经营者、农民还不一样，工薪收入者之间悬殊不宜过大。但是绝不能攀比，搞攀比就搞成新的吃大锅饭，并不能真正调动起积极性，相反，却会成为当前改革的一大障碍。这点，在思想教育中必须明确。

九、关于提高猪肉收购价格问题，产猪多的省像四川、湖南等，要从长远考虑。如果四川的猪肉价格提得太高，将来可能四川的猪肉会出不去。因为各地会算账，如果加上运费，你的猪肉价格高于本地，他就会转而支持本地养猪，不吃你四川的猪肉。同时，猪肉价格提高了，猪皮也要相应提价，补贴和成本要增加，地方财政也受不了。你们要下决心少提一点，肉便宜一点，销路就可以打开。如果把猪肉价格提得很高，你们的优越性就没有了。弄不好，又会出现卖猪难。

十、关于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要搞双轨制。一个是国家的计划价格，即调拨价；另一个是交易中心的价格，即议价。进口的钢材出售不要再搞一种价格了。进口的钢材，抽一部分到交易中心去卖，就可以解决亏损问题。一律搞牌价，就搞死了；都搞议价也吃不消。生产资料的两种价格，经过一段时间，逐步调整，逐步接近，就像粮食的价格一样，最

后搞一个统一的比例价。农村走的这条路子，生产资料也可以走。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既解决了问题，社会又不至发生大的波动。

十一、关于南方木材价格放开问题，上次书记处讨论时，提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通过合同，国家收购二百五十一万立方米。现在，放是放开了，但收购二百五十万立方米的合同却没有落实。这样，整个南方的造纸厂都面临停产或纸张全面涨价的危险，还有木制品、家具等也要大幅度涨价。应该落实合同，或者按比例也可以。比如三七开，你出产一百立方米木材，三成交国家按计划价格，七成可以放开。当然现在已放了，不改了，但全国收购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否则，各地都不好办。

十二、在农业结构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影响了各地优势的发挥。比如江西要多产粮食，多养猪；福建要少种粮食，着重发展多种经营。但是江西的粮食运不过去，或者运去了价格比当地加价收购的还要贵，这就会限制两省经济的交流和农业结构调整。又如从全国来说，南方大米多，很需要玉米作饲料。东北玉米多，特别是吉林，是我国很好的玉米种植带，现在积压了约二百亿斤，需要调出大量玉米，调进少量大米。南方没有玉米，把大米拿来喂猪，很不合算。如能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和价格问题，全局就活了。除了陆路运输以外，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海运和河运。要在“七五”和长远规划中，考虑建立海上运粮通道，把东北的玉米运往南方沿海，再转运到陆上。

十三、现在农村涌现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有些地方还叫专业大户。但整个农村经济发展，还得有个过程。专业户的出现，同整个农村经济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扶植专业户，切忌盲目性。专业户如果没有那样一个经营水平，没有那样高的技术，没有那样合适的厂房设备，没有一个社会化的服务机构，就经营不好。揠苗助长，急于培养成专业大户，结果反而害了他。广东高要县养鱼专业户陈志雄，开始包四百亩鱼塘，养得很好，赚了钱。以后县委动员他，包了二千二百多亩，发展有名的“文庆鲤”，结果亏损十多万元，欠国家和集体十万八千元。他本人和国家在经济上都蒙受损失。我国农村的专业化分工，这几年在开始发展，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发展，毕竟有个相当长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农村将来大量的还是兼业户，而不是专业户。有一些地区技术水平和

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像长江、珠江三角洲也可能出现一些专业大户。但专业大户也是他自己发展的结果，专业户的资金，应该是自己一部分，再加上国家一部分贷款，不能主要靠贷款。盲目地去扶持，不但对专业户本身不利，而且国家也会背上包袱。所以，我在书记处讨论中央一号文件时讲过，不要专业大户的提法，以免产生副作用。



# 林业要进行改革和发展多种经营\*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一、木材价格问题。木材价格太低，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不是不同意木材提价，但是木材影响面广，牵涉太多。如果木材调价，那就是所有用木材的产品都得涨价，老百姓也用很多木材。因此，这个账很难算。木材如果提价，提少了不解决问题，提多了影响太大。是否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即逐步加大木材加价的比重，也就是在国家统配材内先提百分之十，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可以加点，逐步使木材的价格趋于合理。这样既可以把国营林场搞活，又不至于使整个木材价格上涨。

二、新林场的开发问题。现在是一部分林区因为基本建设条件比较好，采伐比较容易，出现了过量采伐的问题。而还有一些林区，因为路没有修进去，林子出现了过熟的现象，应该想办法把这些林区的木材拿出来，否则木头就烂了。新林场的开发，不要照搬国营林场的一套了，是不是可以采取新章法呢？如补偿贸易的方法。江苏省需要木材，让它投资，入股也可以，用这个钱修路，搞基本建设，然后给它木材。另外，家庭承包、小组承包都可以，事先规定几条。第一，划好了地方，搞承包，个人可以承包，也可以集体所有制，税收照缴，经济利益定个分配办法。第二，规定一年只能采伐多少，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不能过量采伐，还得基地更新。这些，都签订合同，包给他，他就有积极性了，他可以自己筹点资金。新林场采伐后，老林场的采伐量就可以往下调减一些，以减轻老林场的压力。

---

\* 这是赵紫阳视察黑龙江省伊春林区时的讲话要点。

三、林区搞多种经营的问题。林区搞多种经营是有有利条件的。一是有资源，二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技术设备基础。交通、电力等条件都具备。我看，只要政策对头，方向对头，搞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能搞什么就搞什么，生活出路不成问题。像桃山林业局搞旅游，这也是个资源嘛！还可以开发许多新的生产项目，如畜牧业，很有价值，我看是个很大的出路。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种草的地方，搞优良牧草。另外，种药材，挖金子。中国人多，可以到处去搞，砂里淘金，一天搞几块钱还是可以的。过去国家一年只产十吨金子，提价呀，放开呀，去年就搞了三十吨。我国搞到五十吨是可能的，最近又提出也可以搞到一百吨。还有，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也可以发展，搞一些第二、第三产业。总之，林区有这么大个摊子，这么多干部，一是搞多种经营，二是搞各种各样的承包责任制，个体的也可以搞，家庭的也可以搞。这两条结合起来，就会有办法了，积极性就起来了。另外，再和外边合作不仅对国外开放，对国内也开放，这样就活了。当然，问题要逐步解决，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们国家也有个承受能力，一下子变不过来，把不良循环转成良性循环需要有个过程。不能不动，不能不转，不转不行，一下子转也不行，需要各种条件。

四、林业上缴利润的问题。农场搞大包干了，林场是不是搞？林场搞森工，情况不同。它的利润高低同伐木头多少有关系，伐多了利润就高。鉴于林业资源情况，有些老林区不能伐的越多，企业越多得。某些企业，亏损企业或微利企业，可以搞亏损包干或微利包干。一个一个林业局算，有的林业局没有利了，可以搞微利包干。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有的企业亏损，国家有政策可以搞亏损包干。工业企业也有这种情况。林业是个大问题，最难解决的是林业。

五、关于林区政企分开问题。政企分开没有涉及到企业办不办社会的问题。企业不办社会，要看你是什么地方。我说过多次，中国资本家修铁路也办社会，辅仁中学、辅仁小学，就是这么来的。再比如，美国淘金，每一个淘金点都是一个社会，因为它那个地方荒无人烟，不像城市，需要有一套机构，有一套设施，你自己不办社会，谁给你办社会。我到澳大利亚，有个煤矿，附近的镇子就是它投资的，全部工人宿舍都是企业办的，房租特别低。房租不低点，工人不到那里去，没个镇子工人不来。这个镇

子占它整个企业投资的百分之二十。现在企业办社会，只是“社会”的那部分要单独核算。什么俱乐部、食堂、澡堂，对社会开放。投资，固定资产还是企业的，管理上可以搞承包。这算不算政企分开了？企业办社会和政企分开，不是一个概念。政企分开，就是企业的事政府少干预。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减少政府对企业内部经营的干预。你们政府又是管理机关，管理机关又是政府，将来经营权力要下放，上层不直接搞管理。企业办社会则是另外一个概念。

# 大企业要下放权力以增强内部活力\*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黄兆銮<sup>1</sup>厂长汇报到“七五”期间汽车改型、工厂扩建共需资金 24 亿元，其中 6 亿元由建设银行贷款时）记得在北戴河时讲，不要国家投资嘛！银行贷款也是国家投资呀，今后的投资都是贷款了，你们要争取不要国家投资。你们报建设银行贷款 6 亿元，计委同意吗？（答：建行同意给我们贷款。）

（当汇报到一九九〇年生产汽车十五万辆，生产能力达到二十万辆时）你们规划到一九九〇年汽车产量达到十五万辆，生产能力达到二十万辆。我看生产能力也不一定搞那么急，搞急了对生产矛盾很大，主要先把产量搞上去。计委的意见是一边改造，一边扩建，一边抓紧生产。要把生产抓得紧一点，计划生产能力可延长两年再达到，把产量多搞一点，这样可以多积累资金，投资、引进都好解决。你们把这些考虑一下，计委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们感到你们的协作任务还不够落实。

（当汇报到外汇不足时）你们还有没有节省外汇的办法呢？就是说，计划生产能力的形成往后推一推，一些不急需的设备缓一缓；一些关键的部件用进口设备生产。一般的、非关键性部件用国产设备生产；一些部件对水平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国产的差一点就差一点，不要进口设备；一些关键部件对水平影响大的采用进口设备生产。这样就可以节约外汇。看

---

\* 这是赵紫阳在吉林省长春市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时的讲话。

你们的报告要增加八千多台设备，其中有多少是国产的？多少是进口的？（答：进口 300 多台。）引进 300 多台设备就要用三亿美元外汇？再算一算账吧。你们再研究一下，外汇要给你们一些，但原来全国算的外汇宽，答应得多一些，现在情况有些变化，可能给不了那么多，再算一算细账，尽量多节约一些外汇。

（当汇报到一汽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头以后，有些事情还要找一机部和中汽公司，原想单立户头办事效率可快一些，现在反而慢了时）这就是说单独立户还没有具体落实，要由计委协调一下，把各方面关系疏通好。

你们这个厂子就是一个大公司，大的联合体。过去我们的工厂都是下设车间，权力比较集中。下边没有一点经营权，企业内部没有活力。大企业如何从内部增强活力，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这种办法（指专业厂、下属厂独立经营）是企业增强活力很重要的措施。大企业首先要解决车间、分厂、厂这一级的权利问题，扩大它们的自主权。这恐怕是大企业搞活的重要步骤之一。你们已经走了一步，要继续探索。像你们这样的大厂，如果下边只搞生产不搞经营是不行的，下边也要搞经营。总厂对分厂，车间对班组，都要独立经营。厂与厂之间的活动和联系，不一定都经过总厂。厂与厂、下属厂与总厂之间，应变成经济关系。按照这样一个方向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队办企业比乡镇企业活力大，乡镇企业比城市集体企业活力大，城市集体企业比国营小企业活力大，国营小企业比大企业活力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原因，即大企业担负着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由国家规定了生产什么产品和价格，影响它的活力。这是外部原因，外部原因也要逐步解决，但这只能根据国家的承受能力逐步解决，不可能一下子都下放。如果都下放了，谁愿意搞什么就搞什么那也不行。因为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一方面是指令性计划，一方面是指导性计划。大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总要占一定的比重。今年你们生产汽车将近九万辆，只有四万辆是指令性计划，多数是指导性计划，你们就成了市场调节为主了。大企业终究要担负一些指令性计划，这是我讲的外部原因。但不要因为外部原因掩盖了内部原因，不要把管得死、没有活力的原因都归到国家来，还要研究你们内部影响活力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们这里分厂也都大得很，它们那里怎么样？它们之中也有个活力问题。现在世界上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都趋向分散，包括跨国公司。公司太大，经营不太灵活，调动不灵。我在接见比利时企业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化工集团的董事长时，他说，他成功的经验有三条，他管三件事：第一，决策；第二，用人；第三，机会（市场信息）。我说，你这三条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一个国家也不外这三条。最近这次他再来中国时，又对我说：我现在权力都下放了，只管了一条，就是掌握一部分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我掌握。我看哪里需要增加投资，哪里不需要投资，只管这件事，其它我都不掌握，都下放了。他说，经营要分散，权力要下放，过去的办法不适应技术发展、市场变化快的新情况。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有的经营管理都分散了。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包括156项中的大企业和以后搞的一些大企业），要从内部把活力搞起来，不能因为外部没有完全放开而掩盖内部影响活力的一些问题。有些企业对上要求下放权力，但在内部不下放权力。国营大企业怎么搞活也是个主要问题。要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解决。

还有一条，现在你们是黄金时代，容易掩盖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忽视产品质量。现在产品质量再坏也有人买，“皇帝女儿不愁嫁”。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东西紧张了就不讲质量。水平搞不上去，质量搞不上去，没有竞争力，好景不会长。汽车工业的情况不会总是这样的。到一九九〇年时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是这样。到那时，如果质量上不去，水平不高，竞争力不行，好景一过，东西就卖不出去。所以要趁黄金时代把技术改造搞上去，把水平搞上去。外国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进行技术储备和新的技术革命，没有经济危机，技术就上不去。如果经济非常繁荣，销售很好，技术就不会进步。都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在销售困难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的时候，就找诀窍，搞技术储备，等到经济繁荣开始的时期，那些技术就会发挥作用。我们前两年调整的时候，丢掉了这个机会。一九八〇年生产任务不足，但没有抓紧机会搞改造、上水平。现在汽车非常好销，又要上产量，又要上水平，就发生了矛盾，这一点要注意。当然，你们已经注意了，从国外引进，搞技术合作上水平，这是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销售好的时候，往往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服务态度也不好，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要注意。

## 注 释

1. 黄兆釜(1924-2015),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曾任一汽副厂长。

# 东北搞好粮食加工转化 可以成为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结合起来抓。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好的经验，要注意发现、总结。按理讲，物质文明好的，精神文明也应当好；精神文明好的，物质文明也应当好。过去搞空头政治，没有基础，一时搞好了，也不能持久。这几年讲经济、讲致富，形势确实是很好的。当然也发生了某些思想作风上的不正之风，农村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但总的讲形势是好的。解决好这些问题也是长期的，要不断解决。一般地说，物质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有了保证，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社会秩序也好，人民精神状态也好，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吉林这几年工作成绩是很明显的，工业、农业成绩都很明显，经济方面有很大变化，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我们整个国家形势好转，是从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开始的。农村形势好，促进了整个经济形势好，没有农村的经济形势好转，也不可能有全国经济的好形势。但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农村的好形势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同时又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有人说，刚刚好一点，就说粮食多了，要调整产业结构。我说，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村形势是不可能继续好下去的。对现在的新矛盾不采取正确的办法解决，必然严重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农村只有专业户而没有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的讲话。



价格的改革也不会是商品经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我们相信一九八六年会比一九八五年好一些。农村的问题不会太大，二、三年内就会走出一条更广阔的道路，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按照原来的老路走，就会越拖越被动。这个问题一定要看清楚，要讲清楚。

你们现在搞粮食转化，也要多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多方面找门路，即使一九八五年粮食受一点影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对农民也要造成一种形势，不造成形势，他也不可能积极搞结构改革。这是进一步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方针。吉林要围绕粮食问题做文章。这方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要使你们的粮食优势继续发挥作用，不要受到抑制。要围绕这个问题把这篇文章做好。这样，我看吉林的形势就会更好。

从中央来讲，要考虑到北粮南调问题。但从你们来讲，对粮食转化、粮食加工、粮食增值要解决好。粮食可以搞很多东西，究竟搞什么，你们应当很好研究一下，也要借鉴外国的经验，看以粮食做原料可以搞哪些东西。也不一定搞很多种，尽可能搞一些小型的，这样来得快，社队企业可以搞，农民也可以搞，不需要国家投资，就是让农民把农业生产延伸。不仅种好粮食，还要搞好粮食加工，由粗加工到精加工。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畜牧业。一九八〇年我来东北讲过，东北应当成为中国畜产品、乳产品、肉食品基地，动物蛋白基地。中国的动物蛋白基地，近期放在大西北是不现实的。不是有草就有畜牧，必须要有工业条件、交通条件、技术条件，还要有贮存、运输条件等等。西北交通不大方便，气候不好，人又少，加工技术不高，办工业很困难，特别是运输困难，有些东西运不出来。东北地方大，粮食多，还可以种草、搞饲料，发展畜牧业。有了畜牧业，有了粮食加工，就可以促进各种食品工业发展。

动物蛋白、食品工业是东北很大的优势，也是吉林很大的优势。但不是一下子可以搞起来的，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打开一条路子。你们这里比关内哪个地方都优越，比西北更优越。西北虽然有不少优越条件，面积也大，但工业、交通不如东北。你们这里是可以搞好的，只是过去不习惯。现在是北粮南运，将来就要就地加工，搞饲料，发展畜牧业，把粮食转化成动物蛋白，多吃动物蛋白更好一些。广东受外国人影响，吃奶制品比较多。这样就把农村工业搞起来了。

社队工业各地都要搞，也能搞好。原来我想山西雁北地区社队工业得怎么搞呢？到了那里一看，他们搞起来了。先是搞小煤窑，小煤窑发展起来以后，就围绕小煤窑搞“配套”：首先是搞运输，把汽车运输业先搞起来了，县运输公司、乡运输队、煤矿运输队、运输专业户等等，都搞起来了，都是很赚钱的；第二是烧石灰专业，用小煤窑烧石灰，也是赚钱的；第三是汽车修理业；第四是石料场，搞采石加工，为基本建设服务；第五是搞煤矿设备厂，生产挖煤用的钢钎和铁钉；再就是办服务业，洗澡、理发等等。雁北就是这样搞起来的。一个小镇子，什么都有，就是搞小煤窑带动起来的，如果没有小煤窑，什么也搞不起来。

发展城乡经济，一是要发展乡镇企业。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将来中国一部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不是进大城市，而是搞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体制灵活，不是吃大锅饭，便于发展。二是要因地制宜，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还要结合市场需求。所以你们要围绕粮食加工、粮食增值、饲料工业、畜牧业来搞，这就会在农村、乡镇形成很大优势。当然，短期内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应当组织一批技术人员攻这个关，组织一些专家专门研究粮食转化、粮食增值、粮食加工问题，发展畜牧业究竟应当走一些什么路子，向哪个方向发展，你们应当研究这门经济学。

# 对陆定一同志来信<sup>1</sup>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启立、兆国<sup>2</sup>同志：

建议将定一同志的信作为中央参考文件印发（并发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我是赞成定一同志的见解的。

关于速度问题，十二大定的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从近几年的实际及其趋势看，是可以达到的。原来，我的想法是头一个十年要少于一番，第二个十年要超过一番；现在看来，头一个十年也有可能做到翻一番，即平均每年可递增百分之七左右（有的条件好或潜力大的地方会高于此数，有的条件差或潜力小的地方会小于此数）。这样的速度，既可以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要求，又可以稳定而持续增长。

目前确实已经出现了追求高指标、竞比增长速度的现象。勉强追求、比赛过高的速度，既助长讲假话、搞形式、浮夸风一类的毛病，又超过电力、交通所能承担的能力，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去进口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强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一地勉强上去，也是无法保持下去的。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危害。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高速，这样才可能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

现在需要在速度问题上提醒各地注意实事求是。为此，建议各级领导和宣传部门，凡是容易引起下面一味追求高指标、比赛高速度的话都不要去说。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 注释

1.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25年入党，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给赵紫阳的信原文如下：

紫阳同志：

一月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十以上。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翻两番”不成问题。惧的是，原料、市场、动力、交通、金融、财政，特别是动力、交通，肯定跟不上，缺口要扩大。这样，势头是否保得住？下降了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形势好，但类似“大跃进”的风，似乎吹起来了。不来自中央，而来自地方。谁也不甘落后，自定高指标，而且都有理由。我的儿子在河南安阳，那里要搞三个大工程，把地方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又因为是“试点市”，自定年增长不能低于百分之十。两全其美办不到。硬搞，势必走歪门邪道，不实事求是，讲假话等等。但是形势所逼，非硬搞不可。这是儿子对父亲说的，不会假。公开场合一定不会说。这就是新的“大跃进”要来了。

中央怎么办？要有“宏观控制”，要强调在形势好的时候严格实行实事求是，要在宣传上不再多鼓增产之劲，而鼓质量之劲，鼓实事求是之劲，鼓头脑清醒之劲，鼓避免比例失调之劲。不要鼓“翻三番”之类的劲。多讲政策、经验，少夸数字。还有别的。

敬供参考。顺祝

新春之禧

陆定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三时

2. 王兆国(1941- ), 河北丰润人。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曾任二汽副厂长、党委书记, 团中央第一书记, 中央书记处书记,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中央台办主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 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 给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毛文书<sup>1</sup>教授并转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全体同志：

我热烈祝贺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成立二十周年和陈耀真<sup>2</sup>教授回国执教五十一周年，热烈祝贺广州国际眼科学术会议的召开！

我殷切希望您们继续努力，深入钻研，在防治眼科疾病，发展眼科学，造就眼科学人才上取得新的成就，为发展我国卫生事业，造福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致以  
崇高的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 注释

1. 毛文书(1910-1988)，四川乐山人。时任中山医学院眼科中心主任，国际著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1965年与其丈夫陈耀真创办了中国高等医学院校最大的眼科医院，是亚太地区人工晶体植入协会创办人之一。

2. 陈耀真(1899-1986)，福建福州人。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博士，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曾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眼科主任，华西大学、岭南大学医学院眼科教授，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院长。

# 放手让大企业发展综合利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谈大企业如何发展综合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在“七五”原材料工业规划时谈到过，但没有进一步落实。这个问题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很重要。过去由于部门、行业分割，很多企业的综合利用没有很好开展。例如开矿，只采自己管的，不采其它用的；开煤矿只采煤，对煤矿中的硫铁矿、粘土矿就不管。又如，对焦炉气的回收、建筑材料中的综合利用、火电厂的炉灰利用等，都不很积极。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生产力没有解放出来。

过去没有搞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门、行业的分割，企业有这方面的潜力，但主管部门不关心这件事。主管部门有两种：一种是只管本部门产品，不关心搞别的行业的产品；另一种部门是限制别人搞自己的产品。二是企业按指令性计划生产，上边要求什么搞什么，不是根据可能来搞，企业是被动的。三是有些综合利用费力不少，但由于价格、销售权的限制，企业得不到好处，无法搞或搞了也生存不下去。

我这次在沈阳视察，煤气厂反映，如果回收的产品允许自销，就可以回收综合利用。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凡是由于综合利用生产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产品，可以允许自销。这样放开后，可以综合利用的东西可多了。环

---

\* 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财政、水电、冶金、煤炭、化工、轻工业部，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总公司，建材、物资和物价局的负责人讨论研究大企业如何发展综合利用时的讲话。

保工作中也可回收很多东西。企业中有些事，如果统过来就没有积极性，只要不统过来，给企业自销权，就可以发挥积极性，把这一部分生产力解放出来。这样，完全可以多生产一些化工原材料、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等等，还可替代一部分原料、燃料。请大家研究研究，这样搞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危险？企业自己搞，只要有利它就可以干，是否这样一来，该上交的不上交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次会后，搞个具体规定的文件出来。不光是强调对综合利用的认识，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与规定。

（当有人谈到有些综合利用的产品已纳入指令性计划时）计划外的综合利用部分可以让企业自销，原有的计划任务要保留。

（当有人谈到对利废企业需要免税或低税时）凡是不用国家投资的可以免税。各部门要发动大家的积极性来搞本部门、本行业的综合利用，发动大家搞建材，大家搞化工，大家搞电。企业发展生产，凡是计划外的、超计划的均可自销；企业自有资金用在哪儿有利，就允许它在那里发展。

电力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对头，不支持人家办电，这个问题提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老改不了，该是到改的时候了。小水电比较复杂，可以另议，火电就比较稳定，电力部门不能低价进，高价出；电力这样紧张，为什么不支持人家的积极性。我看对企业的自备电站，电力部门只收手续费，只是代理。电力部门要首先考虑如何发动大家多搞电，不能限制人家办电。要定一个政策，即电力部门对自备火电站实行代销代供，只收手续费。搞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德政。在这方面要开明一点，电的紧张就可以解决。

大企业潜力很大。现在有些人老是说小企业很活，是船小好掉头，大企业不好活。大企业不能这样攻国家，攻垮了国家，大企业也活不了。大企业潜力大，大手大脚浪费惯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在东北参观沈阳电缆厂，该厂去年产值增加24%，利润增加90%，主要原因有两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是这两条。沈阳电缆厂的具体经验：一是划小核算单位，大厂变小厂，这也是落实责任制；二是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同工人的利益挂起钩来，该厂每降低成本1万元，可得奖600元，只占6%；三是用能人。这样一搞，企业起了很大变化。所以，厂内的责任制要和提高产品质量（优质优价）、降低成本挂起钩来。大企业在这方面潜力是很大的。越是部管大企业，浪费越是惊人，它的潜力越大。今天



请几个大部门来，就是要求你们把这个问题抓一下。要搞活大企业就要抓这些大企业的内部问题，不是再开什么口子、让什么利的问题了。大企业要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从大企业内部搞活，不要靠国家给你活，而要大企业自己活起来。各部要选一批厂子搞起来。

（当有人谈到搞综合利用要投入时）有些投资可以由厂内工人集股来解决。我看搞综合利用，一要价格放开，二要工人集股，可以滚动发展，只要有利可图。简单地说就是两条：产品自销，工人集股。

现在国家有两种价格。对两种价格，你找它的毛病会很多的，但东西会增多的；一种价格，东西就少。农村也是从两个价格上突破的，农副产品多年来走了两个价格的路子。实行两种价格有好处，但要防止倒来倒去。完全防止恐怕不行，只要不泛滥就是了。两种价格，要逐步缩小差距。现在的粮食两种价格，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才高价收购一部分，否则两者的差距会变得很小的，很可能变成一种价格。工业有没有可能也走这一条路子？这几年有了些外汇，进口了好多原材料，所以发展速度高了，同时搞的两种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原材料的增加。农村的两种价格，矛盾不少，但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如何适应这两种价格的发展形势？当然不能一劳永逸，要防止泛滥。防止是可以的，但也防不完全，不要使其泛滥，不能把计划冲掉。工业消费商品也是这样。

我看有两条可以放开干：一是企业的综合利用，二是依靠农民搞建筑材料、煤矿、铁矿等，均可搞，要把浅矿、鸡窝矿划给群众去开。群众开矿很解决问题。山西雁北地区可以大开，根本是运输问题，那一带不是煤源问题而是运输问题。在那里根本不是讲买多少煤的问题，而只讲买上火车的权，只要能运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很多地方由小到大，越开越大。山西北部，内蒙古的南部大有希望。还有铁矿也要选些地方给群众开，这样可以节约国家的大量投资。现在这一带最富的要算山西雁北地区了，一个县的财政收入有3000万元，人均收入800元以上。总之，我看大家搞得话，原材料紧张情况是可以解决的。不要一家办，要大家办，包括各个企业也可以办，只要有利。简单讲就是两条：大家办，要有利。最后由经委、计委、财政部牵头，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向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发下去。

# 科技体制改革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多出成果和人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科技体制改革，讨论得很认真，很热烈。

面临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讨论科技体制问题，研究对策。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研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研究。他们存在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强调的重点颇有类似之处，都是要推动科技和生产进一步结合，使科技和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

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曾经显示过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某些重大科技课题的优点，但现在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我们四化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要求。这种体制的一个极大的弊端是科技和生产脱节。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十分关切。近几年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每年都要专门讨论几次科技工作，在讨论经济工作时也经常结合讨论科技工作。无论是专题讨论还是结合经济工作讨论，着眼点都是想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大家都在贯彻。讨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也都力求体现这个方针。我们既要通过技术改造，使原有企业转上新的技

---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术基础，也要建设一批用现代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企业。技术进步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制定了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政策，也制定了鼓励科研单位为企业服务的政策，尽管还不够完善，但都在逐步落实。情况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好转。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方针、规划、政策、体制四个方面必须配套。现在应当着重解决体制问题。

科研和生产之间，本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应当有横向的、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渠道。我们过去的体制，把它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堵塞了。科研单位只有一条垂直的对上负责的系統，没有通向社會、为生产单位服务的渠道。长期以来，科研工作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有需要的成果又往往成本太高，或技术上无法配套，很难在生产中应用推广，原因就在于此。这是老问题了。多年来，大家都着急，都不大满意，想改变现状，又似乎无能为力。在老体制的框框里打主意，确实很难改变。当然，出路是有的。出路在于改革。

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两方面都得改。经济体制正在改，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现在对科学技术最热心的，第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如饥似渴。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也有了紧迫感，很积极。大中企业的情况就不同了，相形之下，它们中间的不少单位，变化还不够明显，对技术进步的要求还不够迫切。这种现象，乍看有点反常，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企业的活力越大，竞争越激烈，对科技的要求就越迫切。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推开的。农村经济，乡镇企业，改得最早，搞得最活，它们在竞争中体会到技术落后的苦头，也尝到了依靠科学技术的甜头。竞相采用新技术，已成为它们的内在要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也放得比较活，有了采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大中型企业目前还不够活，但这是暂时现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它们也会跟上来的。因此，现在是把科技体制改革提到议程上来的时候了。再晚，就会误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为了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科技体制非改不可。

二、现在，经过调查，试点，多次座谈，十易其稿，形成了一个文件。对这个改革方案应该怎样估价？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没有副作用？正反两个方面，都得仔细考虑。最后当然只能靠实践来检验，而且也只有与实践

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完善。但是，事先总是尽量考虑得周到一点为好。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讨论得很好，今天我也简单地谈一些看法。

现在设想的新的科技体制，和原来的科技体制相比，有许多不同。主要的一点是考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的科技体制必须与此相适应。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存在着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无视商品货币关系，无视价值规律，无视经济杠杆，同经济有关的事情就办不通。硬要去办，常常是事与愿违，劳而无功，最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你要农民向城市提供粮食、棉花、肉类，下死命令不行，最重要的是得按照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你刮共产风，平调，农民就不干。你要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也得讲价值规律。如果谁支援谁赔钱，越积极越吃亏，一天两天可以，长期就办不到。科研也是这样。要科研面向生产，就必须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应当允许绝大多数技术成果成为商品。要使科研单位为全社会服务，就必须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开拓技术市场。要科研单位经常地主动地到企业里去找课题，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由国家拨款的制度。要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休戚相关，就应当通过技术合同等多种经济办法，使他们在利益上联系起来。试点的经验证明，运用这些经济手段，非常见效，多年来三令五申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得到解决。技术成果很快发挥了作用，社会增加了财富，企业得到了好处，研究所也壮大了力量，添置了设备，科技人员增加了收入。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都很高兴，劲头都很大。当然，试点的单位只有五百多个，不算很多，时间也不长，但可以看出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肯定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支持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就能够逐步形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互有需要和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将会出现多种形式的科研和生产的联合。研究所内部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批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的新型管理人才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造就出来。

有两个不大好解决的问题，这次文件上有意识没有提。一个是有些研究所，水平很低。一个是有些研究所，人员过多。这两个问题，都应该解决，也有办法解决。但目前不必把过多的精力牵扯在这些事情上，操之过急没有好处，单纯用行政手段也难以奏效。转上了新的体制，科研单位之间出现了竞争，大锅饭吃不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形势也就成熟了。当然，

从领导上来说，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提高，安排那些不适合在科研单位工作的人改行。

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同志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怕步骤过急，震动过大，打乱研究工作的秩序，特别是怕影响重大攻关计划的进程。有的怕忽视必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影响科技研究的纵深部署。有的怕事业费削减过猛，一时难以做到经费自给等等。这些顾虑都值得重视。现在提出的改革方案吸收了大家的意见。

第一，对重大的科研课题，包括重大的攻关项目在内，可以继续实行计划管理，也可以由国家同研究单位签订合同。计划管理这种形式要保留，对实行计划管理的项目，也要提倡采取招标承包等新的手段。技术成果商品化有多种形式，既包括企业在技术市场上向研究单位购买技术成果，也包括研究单位同政府部门签订科研承包合同。

第二，在改变拨款制度的同时，对事业费如何管理，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机构，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不削减，有的少削减，有的要取消，但对后两种情况，都不是骤然削减，而是分步骤实施。这样，可以使研究机构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削减下来的事业费仍将全部用于科技，而且通过新渠道投入科技事业的经费今后将不断增加。

第三，在推进开发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应用研究，并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使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都能各得其所，协调发展。推行基金制，以同行评议、择优支持的办法代替“领导批条子”，这可以使研究经费分配得更加慎重，更加合理。

当然，现在的方案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看来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构思是合理的。科技体制改革应当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稳步前进，力求避免大的震动和损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随时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我们不仅不要求一刀切，而且反对一刀切。过去政治运动多，形成了一种习惯，喜欢“刮风”。搞经济建设，搞开放，搞改革，不能靠“刮风”，要防止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要多采取积累的方式，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

三、改革科技体制，目的何在？书记处讨论这个文件时，耀邦同志说，改革科技体制，就是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千军万马，是指整个科

技界，知识界。上山，是指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摘桃子，是指把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耀邦同志这段话很明确，是我们改革科技体制的目的。请同志们务必掌握这一点。改革科技体制，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要堕入烟海，把根本的宗旨忘掉了。第一，不要忘记千军万马。改革科技体制就是要解放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发挥出来，使他们有用武之地。第二，不要忘记上山摘桃子。解放出来干什么？出成果，把又多又大又好的桃子一筐一筐摘下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贡献。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至于经费自给等等，那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把我们现有科学技术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之对经济建设作出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将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其他问题都好办了。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评价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的、根本的、最后的标准只能看是否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也就是是否促进了我们振兴经济、实现四化的事业，而不是其他。

四、去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科技体制改革来说，更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尊重知识，不爱惜人才，肯定没有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不是资源，不是资金，也不是体制。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缺资源。资金问题，从长远看，也是可以解决的。体制问题，现在就在改革，大有希望。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缺乏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今世界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经济能否起飞，有没有后劲，就要看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能否大大发展，人才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我们在人才方面有两大问题：一是人才不足，二是现有人才的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比较起来，后一个问题更为迫切。新的人才当然要大力培养，但首先应该把现有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的工作靠他们，为未来培养人才也要靠他们。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调动老知识分子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里说的中年知识分子，不仅包括

四十多岁而且包括五十多岁的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骨干在内。在年龄问题上，对他们的要求应该同对行政干部的要求有所不同。科研单位、学校、企业、国家机关，都要切切实实为知识分子解决具体问题，特别要注意知识分子的合理报酬问题，一定要逐步而又切实地解决好。

听说，有些同志对人才流动表示担心。总的来讲，提倡人才流动，方向是正确的。现在的流动，大部分是流向搞活了的小企业，因为它们生产搞活了，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小企业需要科技人员，它们过去长期分配不到大学生。不少大企业和研究所又积压了相当数量的科技骨干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技术人员转向小企业，这是无可非议的。当然也要防止副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应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去堵，而应通过疏导的办法，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最近有个材料，上海有个工厂有四个技术骨干被小厂拉走了，原定的攻关计划无法继续进行。要注意防止出现“老基地垮掉了，新企业又上不去”的现象。为了缩小副作用，可以规定一些办法，例如必须保护原单位的技术权益；科技人员必须在半年或一段时间以前向原单位提出申请，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后才能离开；以及规定最高工资额和开征某种所得税等等。现在确有一些技术人员，流入新单位后，工资待遇过高。这种现象，反映了人才奇缺。随着今后小企业技术人员的增多，随着技术市场的开拓，特别是随着骨干企业对技术人员工资待遇的改善，大多数技术人员是可以稳定的。

五、把千军万马动员起来，摘桃子的问题就好办了。摘什么桃子？大桃子小桃子都要。请同志们注意一个趋势：现在经济建设对科学技术人员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要求。

农村越出了单一粮食生产的小天地以后，多种种植业，多种养殖业，各种类型的乡镇工矿业，在产前产后包括咨询、服务、储存、运输和深度加工等各个环节上，都在不断地向科技界提出新的要求。

小企业不可小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对中小企业的作用重新进行估价。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机制非常灵活。这种很有活力的组织形式一旦同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四化建设中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面向经济建设，既要面向大中企业，也要面向小企业。

能源、材料、交通、通信、机械、建筑、消费品等各行各业，都面临

着技术改造的任务，存在着大量的生产技术问题急待解决。我们既需要很先进的技术，也需要“不显眼的”适用技术。世界银行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也说，在中国，大量地不断地采用“不显眼的”技术，比采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缩短同一行业中先进工厂和落后工厂在技术上的差距，比兴建少数最先进的工厂更重要。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量大面广的企业的情况的。

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对于所有工厂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国工业品的成本构成中，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降低消耗，潜力很大，可以提供显著的经济效益。国内市场需求已经起了变化，产品结构必须相应变化。国际市场的竞争更是日益加剧，首先是质量方面的竞争。质量比不上人家，只好放在地摊上贱卖。高技术的产品，一时比不上人家，还情有可原。有些事情实在说不过去。在西欧的文字中，瓷器和中国是一个词，瓷器来自中国，是中国的象征。但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的瓷器远远不如人家。同样是衬衣，人家一件可以卖到几十美金，我们只能卖几块美金，而国际市场上的纺织品配额，只讲件数，不讲金额，我们就吃了亏。这样的事情多得很。我看要出榜招贤，科技界责无旁贷，同企业界一起，首先把我们各类出口产品的质量一步一步地提高，变劣势为优势。

综合利用很有前途。在旧体制下，一涉及两个部门，综合利用就发展不起来。现在情况正在起变化。国务院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准备确定一些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特别是大厂，通过综合利用，过去的大浪费就可以成为大潜力。这方面，有许多能产生重大效益的课题。

六、改革，开放，搞活，既向科技界提供了新的条件，也向科技界提出了新的任务。几年来，国家花了很大的投资从国外引进技术，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使用单位和研究单位、制造单位之间，应该彻底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同心协力，加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发展过程，共同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和研究工作的起点，加强我们自主开发的能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通过改革，出现新气象，取得重大进展。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势必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人估计，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遥感遥测技术等方面，有可



能首先出现具有重大效益的突破。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新技术革命的动向，及时掌握信息，定期作出分析。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今后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这对我们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建立，对我们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确定，关系重大。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各种门类各个学科的科学技术，需要各个层次的科学技术成果。各方面的科技人员，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千军万马，勤学苦练，无非是要有用武之地。过去，是我们体制上的一些弊病束缚了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出人才，出成果，为人民造福，这是科技界自己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科技体制改革，国家科委和各级科委当然要负起责任来，但这不单是科技界的事情。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还有国家的各有关部门，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坚定而又有步骤地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实现我们预期的目的。

#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尊敬的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和大家一起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向我国妇女和世界妇女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向正在北京访问的女外宾表示祝贺，祝愿中国妇女和世界妇女的友谊与日俱增，为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国际正义携手共进！

请允许我向在华工作的各国女专家、女学者和专家们的夫人表示祝贺，感谢你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支援和帮助，祝愿你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今年是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展开；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将开始。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关系着国家的前途，也关系着妇女的命运。

我向在城市和乡村投身于改革和建设的各族各界妇女表示祝贺，祝愿你们发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在生产、工作和各项改革中取得新的胜利！

这里我要特别向辛勤劳动，从事妇女工作、幼儿工作、教育工作、保健工作等方面的全体女同志表示祝贺，祝愿你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蒸蒸日上！

我还要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表示祝贺，表达我们的骨肉手足之情，祝愿我们炎黄子孙共同渴望的祖国统一的大业早日实现！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  
为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五周年，  
干杯！

# 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保证\*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

这次审计工作会议开得不错。审计工作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说明审计工作很重要。经济越是搞活，越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审计工作是加强管理和监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使开放、搞活、扩权健康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希望全体从事审计工作的同志做出新的努力，使审计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注 释

1. 于明涛(1917- )，河北深州人。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中南局秘书长、常委，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河南省代省长，中央委员。

---

\* 这是赵紫阳打电话给于明涛<sup>1</sup>审计长对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所作的指示。

# 认真解决现存问题 继续推进企业改革\*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去年发生的一些问题，要认真清理，你们财政、税收部门要认真地抓下去。国家规定的税收一定要征收，税收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没有修改以前，还必须征收，要确立这一条。奖金税一定要收。最近我去了石家庄，据河北高扬<sup>1</sup>同志反映，去年滥发奖金的主要是一些小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商业部门及银行系统，真正的国营大企业还比较好，主要是它们没有太多的钱。今天广播了，有一个地方的农业银行每人发 1000 元以上的奖金。

二、总的来讲，建筑行业去年有明显的进步。由于过去浪费大，招标承包后，效果比较显著，但是肯定也有问题，有些甚至是很不像话的。一搞活肯定有空子，有空子就有人去钻，所以要防止这些钻空子的事。我们的改革是长期的，看来有两条要确立起来，作为长期的政策：一是坚持改革，二是加强管理，或者说继续改革，勤于检查。

三、关于人才流动问题。我总的看法是，不主张人才流动自由化。目前有些人才流动，我看可以利用这个形势，冲击它一下，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但不能立足于此。有好多人在原单位被压着，不被重视，不使用，别的单位要，本单位就是不放，说自己要用、要提。过了一段依然故我。有些单位对知识分子要发些补助、津贴或解决一些问题，其他人员也就叫要同样对待，冲击波一个接一个，大锅饭、平均主义老打不掉。文艺界著

---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名的演员，体育界优秀运动员要加一点工资就加不上去。平均主义不打破，人才很难脱颖而出，只能按部就班。现在人才很多，就是没有发现，如果允许人才流动，可能出些问题。也不要怕，可以想些办法，逐步建立章法，加以限制。

我考虑有这么几条：一是你要流动，必须在半年以前提出，不能说走就走，这一条我在科技会上讲了；第二条，在本单位的成果不能算你的，这是企业的成果，你不能拿去，作为与原单位竞争的对手；第三条，国家培养的人员要法定在国家企业中固定服务若干年，不到限期不能离开；第四条，你到新单位后超出原单位的工资部分要收税。总之，要因势利导，要定出几条来。韩信不走，也就拜不了将。所以我们的企业，冲它一下，它就会对如何发挥有能力的人的作用问题真正加以解决。不冲一下，好多能人无用武之地，冲它一下，可解决一些能人的问题。有些能人如名医，他们也不会去小单位，因为有些小单位缺乏科研、试验设备，无法施展本领。人才流动这种事不能全面推开，一推开就会出乱子，所以要因势利导。改革中可能有乱，乱中要有治，但心中要有数。

四、我这次去石家庄，有些感受。那里有两件新事：一件是生产资料高价结算。计划内调拨的也高价，统统进入市场。凡是需要的，统统去市场买，如果是计划内的补你差价。听说这件事连物资局李开信<sup>2</sup>那里也同意，已经办了几个品种。一、二月份实行以来，去市场买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先利用库存了。买的人也不去抢购了，反正有货。也认真节约材料消耗了，品种调剂等也可以搞起来了，周转加快了。第二件事是大企业在利改税基础上搞承包制试点。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订出各种计划，经营者组织起来搞承包，承包合同完成了，奖励给经营者。有的是本单位的人搞承包，有的是别人来承包。石家庄国棉四厂一个副厂长组织班子，把各个环节的能人15个人组织起来承包，承包后拿出两名工程师专搞节约棉花，降低成本，仅节省这一项就增加收入500万元，而这个厂去年利润为800万元。这说明过去厂内浪费实在太大，管理无人负责，承包后，就发现了能人，大抓经营，抓节约，效果显著。像这种类型的经营者中，有些人不是为了钱，是想争口气，不相信这个企业在自己承包过程中搞不好。他们取得经营资格很不简单，有的是招标的。招标时承包方案要通过答辩，

然后拿到职工代表大会上去通过才允许承包。这样搞才真正地解决了经营问题。这类经营承包制往往是划小核算单位，像石家庄的一个拖拉机配件厂，去年拿出两个车间搞承包，大承包下去配小承包，对能进行核算的商品组织承包。石家庄的经验证明，企业的潜力很大，现在大企业的中心问题是潜力未挖掘出来，经营者的积极性未挖掘出来，小企业活就活在潜力挖掘出来了，大企业就是躺在国家身上。承包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经营者就抓节约，抓挖潜；层层承包的结果，经营者层层挖掘出来了，积极性也层层挖掘出来了。这样抓住关键，打破平均主义，效果大不一样。越是大的国营企业在利改税后越要解决挖掘经营者的积极性和挖掘全企业的潜力问题。石家庄国棉四厂过去派性干扰，一直疙疙瘩瘩，调整了几次，未见成效，这一次先是五个人组织起来承包，后来扩大到15个人，都是关键环节上的人，这些人有一股子劲，要把国棉四厂翻个身，真正改变面貌，这种精神就很可贵。另有一家新建的印染厂，过去搞得一塌糊涂，领导班子不行，确定对外招聘承包，由一个曾在该厂工作现在化工厂工作的人承包。他承包后，干劲很大，从一月份到现在一直待在厂内工作，没有回过家。所以在利改税的基础上搞经营承包，明确责任制，企业中的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

五、我看石家庄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在利改税基础上搞经营承包，经营者自愿结合。另一条是搞联合，松散的联合。在联合体内部实行期票贴现，这样搞大大压缩周转资金与贷款。有家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在这个联合体中有生产厂与销售单位，生产厂为了生产借贷款，生产出来的东西给销售单位，销售单位以销售的钱来还生产厂的贷款。它们相互之间用期票不用现钞，这样贷款少了，周转也快了，普遍讲究效益了。还有一个新事物，有一家光明实业公司，是一个有300多亩地的农村大队搞起来的企业集团，集团内搞了好多企业，还有旱冰场、电影院等。他们50%的税收照交，余下的利润60%留给公司，40%发给农民，每人的月工资达300元。我问了一下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公司的总经理即原来的大队长说：我们不是按你们大厂的办法办，而是我们农民的办法，劳动态度好，效率高。去参观时看到，车间中的农工都是埋头操作，根本不抬头看你，我们的一个农工可以顶上大厂的几个工人，现在他们每天工作七小时，另一个小时搞

学习。看来看去，国营工厂的中心问题是效益问题，也要解决浪费问题，许多承包后的厂子都是从这个问题上突破的。石家庄如此，全国也是如此。像北京的印染厂、沈阳电缆厂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国营大企业要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大厂子搞好了，我们的经济可以上一个新的水平。

六、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看来得要几年时间。采用市场调节，肯定价格会有波动，几年内不可能就平衡了，将来在不断的震动中间趋于平衡，不能一下子平衡。例如：现在猪肉贵了，可是鸡蛋便宜了；过一段鸡蛋可能贵了，其它东西便宜了，或者到那时猪肉可能也便宜了。那就吃便宜的东西吧！总之市场是无情的。

## 注 释

1. 高扬(1909-2009)，辽宁辽阳人。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

2. 李开信(1919-2015)，山西原平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局长。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顾问，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 划清不正之风与改革探索的界限\*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最近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城市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会议，五十多个城市参加，会上大家有两个建议。一是希望这一次纠正新的不正之风，要注意划好界限。我们党的教训很多，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有过教训，反对精神污染又有过教训。他们建议中央注意一下界限的问题。二是他们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的提法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话过于强调了，说绝对了。因为整个来讲，我们处在一个探索改革的过程，正处在由旧的东西向新的东西转化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还要探索，有许多事情要逐渐从过去的许多不适应的规定中解脱出来。比如前几年各地方讲的“变通”。我在省长会议上讲，不能什么都变通，要划个界限，有些能变通，有些不能变通。特别是在纠正不正之风时，必须令行禁止，绝不能再发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但反过来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探索就没有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最大的不正之风”，这句话本来是中纪委提出来的，我觉得很好，接过来了，用在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上面，这句话写不写上去，现在还没有想好。但是，真正严格执行起来，不能每个新的试验都经过中央批准。有些试验错了，可以改；有些试验是违法乱纪，可以处罚；有些试验还是属于改革，没有改好，可以再退回来，大概几年之内就是中央的决策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小平同志讲改革的问题要走一步看一步。我根据小平同志的话跟外国人

---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改革中间“如履薄冰”。就是说，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一只脚踏实以后，再迈出另一只脚，迈的时候要注意，迈不好就收回来，立足点、重心不要一下子转到另一只脚上，一脚踏空就会栽到河里。改革中间要有回旋余地，就是说，不能保证每一项试验都成功，有些试验不合适，可以退回来，不至于造成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分寸要恰当。

因为这是给人民代表讲，政府工作报告不能讲那么多道理，在党内讲这个问题，就要两面都讲，当我们刚发现并正在纠正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讲得很严厉，所以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牍。但也必须看到，这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最重要的在于是不是能够及时发现。如果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就不可怕。我的看法，去年总的评价，我同意定一同志的话，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第四季度特别是十二月出现的问题，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但是应当说，问题一旦出现，我们发现比较早。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的危险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个话我是认账的。去年第四季度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耀邦同志提出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比较早，在书记处议论形势时我也谈过两次，我说形势问题要议票子，现在心中无数，票子的情况不议清楚，形势就说不清楚。后来国务院连续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找了一些青年经济学者议，一开始大家讲得比较好，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呀，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呀。后来我说不能这样说，要围绕票子议形势，先把票子的情况分析清楚。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在今后几年之内，要想不出问题是困难的，要想事先想得很周到，然后再去改革，那就改不了，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水平，就是吃这么几碗干饭，事先要把下一步棋都看得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本事。但是迈出一步留有余地，不要一下迈出去收不回来，这个我可以做到。所以我讲，出了问题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对于我们今后改革能否最后完成，是个关键问题。当然，去年十二月份出的问题，要把它挑出来，确实是突出的，但时间就那么长。问题一出来能及时发现就不可怕。

有一些问题，现在还无力解决，比如奖金问题，我也摸过，奖金发得最滥的一般是小企业。现在工资非常不合理，许多乡镇企业的工资大大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放活的小企业工资都高于大企业。这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能长期这样下去的，但现在急于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题也不一定有利。拿汽车运输来讲，过去所有国营企业搞运输的汽车，基本上是赔钱的，运费吨公里二角钱；现在汽车包干到人，大体上一辆汽车一年的利润是八千元，个人得的也比较多，大概一人一个月得一百多二百元。大学教授会说，开汽车的拿那么多，我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才二百元钱，这叫什么重视人才、重视知识？是乱搞嘛。但是，现在要把汽车司机的工资拉下来，只有改掉包干，还照样亏损。何去何从？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研究。汽车运输有没有乱涨价？我不敢讲没有，但是总的讲汽车运费比过去降低了，大部分运费吨公里是一角八，有些地方降到一角五，汽车运输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为什么这样？因为效率提高了。就像农民一包干收入马上增加一样，小企业一放开，收入马上增加。对汽车司机工资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多年来就是国家办运输公司，赔钱，或者盈利很少，现在基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现在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有些富的地方一个支部书记月工资五百元。我前几天刚从石家庄回来，石家庄郊区有个西里大队，土地大部分被占用了，就办了一个光明实业总公司，下属十九个企业，农民一个人一个月工资三百元。我问公司干部你这样得了啊？他说我怕什么？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积累。究竟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效益高。这个公司是七小时工作制，我说你们为什么搞七个小时？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农民要学技术，给一个小时学技术。他说你最好到我们厂子看一看，你在那里走一圈，有没有人抬头，有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人抬头。可惜我没有去。后来石家庄市委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公司的劳动效率比同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高一倍以上。乡镇企业工资大大高于国营企业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但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有的企业过去浪费很大，现在一包，不浪费了，效益出来了，要是不包，那就他们也很苦，国家也拿不到。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机关。我估计人代会如果敞开讲的话，大体上意见多的就是这个方面。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教卫生人员，工资没有什么提高，物价又有所上涨，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小厂子工资增加。为什么现在要着重解决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因为大企业工人工资并不高，奖金乱发的也比较少。（胡耀邦同志：大企业里面，石油、煤炭工人的工资是高的。）大同

矿务局的井下工人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附近小煤窑的井下工人月工资三百元，但是小煤窑的煤价比国营的还要低，就是因为效率高。这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一个很大的潜力，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需要解决，但有些问题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比如一个技术人员到小企业，马上给房子，给高工资，大企业就留不住，这很不合理，需要解决，但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才能解决。因为这是向人大的报告，不好讲那么多道理。听说丕显<sup>1</sup>同志要在党员会上讲话，有些道理恐怕要说一说。估计这次人代会上，农民代表会讲好，工人代表大部分也会讲好，大企业可能有点意见，机关的同志大概意见相当多，知识分子说你们光打雷不下雨，雷声大雨点小，讲来讲去，落到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什么也没有，都是空话，都是为工农谋福利。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农村也有这个过程。农村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凤阳的农民说好得很，苏南的农民不一定说好，因为他们的征购基数高，越是困难、落后的地方，放开以后一下子富起来了，国家高价收购农产品，他们高兴得很。又如鲁西的棉花，大部分是高价卖的，南通的棉花大部分是牌价。当然，现在用比例价，大家基本上接近了。工厂里面看来也得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有了这一段才有条件逐步趋于合理，这个问题要向大家说清楚。不是说不知道，不想解决，问题是要创造条件。

## 注 释

1. 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东南局青委书记，苏中区党委书记，华中野战军七纵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顾委常委。

#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各位代表：

刚刚过去的一九八四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实现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一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新的提高。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思，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经过同英国政府的平等协商，终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使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为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一国两制”的构思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也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继续取得了人民高兴的重大成就，在对实现本世纪三大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进展。当前，怎样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顺利地、健康地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我国大好的经济形势，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我就以此为题，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 一、关于经济形势

一九八四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代化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九八四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九的基础上，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各方面的经济效益也有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国家财政状况继续好转。

一九八四年，我国农业又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四亿零七百余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棉花达到六百零八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一。农村多种经营有较大发展，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期求自力更生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但是由于过去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和其它原因，粮食、棉花的产量长期增长缓慢。随着农村改革和农业新政策的实施，近几年农业生产连续大幅度增长，去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近八百斤，棉花十多斤，按照我国人民当前的食物结构和衣着水平，一般已可以达到温饱有余。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有少数地方的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许多措施来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看到，十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在农业上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一九八四年，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全面增长。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能源的生产超过计划的要求，原煤产量达到七亿七千多万吨，原油达到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吨，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保证了整个工业的持续增长。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电子、轻工、纺织、食品、医药等行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军事工业部门在发展民品生产和向民用工业转移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交通运输业通过挖掘潜力，运输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六十五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到一九八四年已有四十三种提前达到一九八五年的指标。

一九八四年，我国重点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一百二十三个大中型项目，工程的进展比较顺利。一批重点煤矿、电站、油井、建材企业和铁路新线建成投产，有利于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有利于为生产的持续增长准备后劲。全国人民关心的宝山钢铁总厂建设，第一期工程已有部分项目投产，其余也进入全面调试阶段，炼焦、炼铁、炼钢、初轧可望在今年内陆续投产。科学研究、文教卫生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投资，比上年都有所增加。全年施工的更新改造项目七万四千个，全部建成的三万九千个，对增加生产、提高质量、改进品种和节约能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近几年来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安排。随着生产建设的持续增长，通过各种渠道，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安排了四千二百多万城镇劳动力就业，职工和农民的收入继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去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达到六百零八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农民的纯收入，全国平均每人达到三百五十五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吃穿用各类商品都继续向多品种、中高档和多样化发展。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去年农村建成住宅约六亿平方米，城镇建成住宅约一亿平方米，又有大批农户和部分职工住上了新房。

各位代表！经过几年的调整 and 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走上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路子。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一个是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国民经济的基本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一个是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二者互相促进地共同增长。这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希望做到而没有做到的，现在开始做到了。这对于我国今后经济的长时期发展将产生重要作用。

这几年来，我们从加强农业入手，以发展农业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远远超过了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二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发展，为工业提供了原料、市

场、资金和劳力，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对加快发展轻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且要求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更好地为发展农业、轻工业服务，促进了轻工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许多轻工产品特别是呢绒、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档产品的产量急剧增长，花色品种不断增多，质量逐步提高，丰富了市场供应。在农业和轻工业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因经济调整而速度一度下降的重工业迅速回升。一九八二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一九八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四，一九八四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重工业的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进。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在实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与上述特点密切联系，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在居民收入首先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下实现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在城镇扩大劳动就业，增加了职工工资和奖金，使城乡人民的收入和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一百七十五元提高到二百八十八元，一九八四年达到三百二十元左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七点三，远远超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二的速度。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资金积累也逐步增多。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调整初期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降低到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从一九八二年起略有回升。这几年我们在调整中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而忽视消费的做法，正确认识和发挥人民消费对于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生产、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显著改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各位代表！前几年特别是一九八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和成就，是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结果，是正确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突破长期形成



的僵化和封闭的模式，城乡经济越来越活跃，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技术联系日益增多，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迅速扩大，改革和开放健康发展，这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农村展开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旧体制。党和国家的各项农村政策顺应强国富民的历史要求，符合亿万农民勤劳致富的共同愿望，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促使了农业生产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同时，我们在城市改革中也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一九八四年，从正确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在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建筑业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在进一步发展城镇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特别是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个纲领性文件的通过和公布执行，标志着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积极搞活国内经济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工作的发展。去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一千二百零一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扣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六，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全年共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七百四十一个，超过前五年的总和。全国以各种形式实际使用的国外资金达二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七。计划内签约成交的技术引进项目有一千多项，成交额比上年大幅度增加。

一九八四年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继续好转。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积极为四化献计出力，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我国国防更加巩固。全国人民从一年比一年好的发展形

势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因而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对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

各位代表！我们说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很好，并不是说一切都好，我国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除了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还不够合理，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以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对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货币发行量多了一些，再加上乱涨价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致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初步分析，一九八四年增发的货币，就其主要部分来看是合理的。这是因为，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需要增加货币投放，在搞活城乡经济的过程中，生产经营单位增多了，个人收入增加了，单位和个人的手持现金也要相应增加；农业发展了，许多农副产品国家要收购。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超出了正常需要的范围，主要表现在信贷增长过猛和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一九八四年银行的各项贷款总额比一九八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其中十二月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长额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一九八四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第四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出现这样的问题，同以下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去年下半年在酝酿一九八五年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工资改革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各专业银行可以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以一九八四年的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核定；在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时，工资总额以一九八四年的实际数为基数核定。结果一些金融单位不顾大局，为了增大信贷基数，竞相放贷；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为了增加工资基数，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致使银行信贷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采取任何比较重要的改革措施时，都要周密考虑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拟定出保证改革健康进行的相应的规定和办法。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支流，但必须予以重视。其中，有些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有些是因为我们事先考虑不周或事后检查不

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我们在去年第四季度发现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了研究，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措施，并于今年二月召开全国省长、自治区主席和直辖市市长会议作了进一步的统一部署。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认真贯彻落实省长会议的精神，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今年春节以后全国的货币回笼情况和财政收入情况是比较好的。实践再次证明，只要全国上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一定能够把今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继续健康地推向前进。

##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五年，是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一年。在前几年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是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大好形势的需要，是保证整个改革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分关心和支持改革。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和发展，城乡生产全面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国民经济充满前所未有的活力，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充分运用各种有利因素，积极进取，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当前，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正确的构思和决策。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必须坚定不移，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不懈努力，以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根本目的。在改革的方法与步骤上，必须谨慎从事。从今年的改革来说，一定要慎重初战。这是因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关系复杂，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的国家底子薄，经济和财政力量有限，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强；经济生活中去年出现的货币发行偏多等问题，又给当前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必须足够估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认真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不积极进行改革，坐失良机，不能理顺经济关系，就会失去群众；操之过急，草率从事，造成失误，也会失去群众。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了的坚

决改，看不准的先试点，使工作有充分的回旋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上述精神，国务院决定：今年的改革一定要继续把经济搞活，促进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迈出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同时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为今后的改革打下较好的基础，为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创造更好的条件。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密切联系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件大事，今年也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

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在农村，要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努力开辟粮食的多种用途。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发展林木、水果和药材种植业，发展饲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小型采矿业、小水电工业、建筑建材工业以及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逐步建立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合理的产业结构，使我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农村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利用。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鼓励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加工、销售、运输等领域中，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逐步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积极组织城乡商品交换，广泛设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认真加强储运系统，使农副产品更多更快地变为在城市适销的商品，以适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

在城市，小企业要继续搞活，并要着重解决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前几年首先是搞活农村经济，接着在城市中先赋予小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而让大中型企业担负较多的财政上交任务和指令性计划的生产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前几年是城市支持了农村的改革，大企业支持了小企业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样逐渐推进的改革步骤是正确的。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应该把进一步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问题逐步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必须全面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对于经营管理水平高、贡献大、而留利过少的少数大型企业，要逐步降低调节税，适当减少指令性计划任务。从大企业自身来说，必须强调挖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强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要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适

当划小核算单位。在经营方针上，要实行多种经营，积极开展综合利用，发展跨行业、跨地区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协作。国营大中型企业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有着许多有利条件，而它们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浪费很大，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把它们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在工资制度和价格改革上迈出重要的步子，是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任务。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职工队伍本身建设的需要，严重阻碍着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许多商品的价格，仍然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的正确评价，影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进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已经成了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由于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的改革既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全局，又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全国人民，必须上下一心，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加强纪律，保证改革取得应有的效果和成功。

一九八五年的工资改革，重点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逐步消除工资分配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积弊，初步建立起能够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新的工资制度。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使职工工资同本人所肩负的职务、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充分准备，逐步推行职工工资总额随同本企业经济效益浮动的办法，把职工和经营者的工资、奖金同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低、本人贡献大小很好地挂起钩来，既保证工资增长同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必要的比例，又有利于国家对消费基金的合理控制。在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中，仍可沿用现行的办法，并加以改进。经过改革，工资制度和工资工作将转上新的轨道。今后我国职工的工资，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得到经常的稳定增长，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工资分配中要么长期不动、要么大家“齐步走”的局面，这将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重大进步。

目前工资改革的各项具体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实行新的工资办法，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今年七月开始算起，中小学教员从今年一月开始算

起。通过这次工资改革，我国职工的工资水平虽然将有一定的提高，但也不能要求很高，不可能把过去二十多年工资制度中积存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这是因为，一定时期职工的工资可能提高多少，客观上受着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高低的严格制约。近几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的幅度，已经超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今年的情况还将是这样。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现在要求有更多的提高，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根本做不到的，也是不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引导广大职工充分认识这次工资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前景，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工资改革中，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从全局出发，自觉遵守有关工资改革的各种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要坚决停止扩大编制、增设机构和机构升级，认真核定各级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和人数限额，不许超过国家下达的增加工资的控制指标，不许动用地方财力额外增加工资，也不许自立工资标准和进行自费工资改革。企业单位，必须核定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指标（一般为上交税利）的基数，以及两者之间挂钩浮动的比例，认真剔除去年工资总额中的种种不正当因素。同时，要合理规定企业留利中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和其它基金的比例，严格限制工资基金开支的范围，不许挪用银行贷款、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和其它基金来发放奖金、补贴和实物。对于当年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超过国家规定幅度的企业，要征收累进的工资调节税。对沿用过去的工资、奖金办法的，要征收超额奖金税。对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应当有合理的差别，但不能过于悬殊。

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经过多方面的权衡比较和认真测算，考虑到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企业消化能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一九八五年决定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在改革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贯彻价格“有升有降”的原则，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今年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合理调整农村粮食购销价格和棉花收购价格并实行合同订购，把其余农副产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二、适当提高铁路短途运价，以

利于调整运输结构，充分发挥公路和水运的作用；三、适当拉开质量差价和地区差价，减少和淘汰质次价高、不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促进优质名牌产品的迅速增长，促进商品的合理流通；四、对原材料、燃料等重要生产资料，计划分配部分的价格基本不动，按规定企业自销的部分，实行市场调节，推动生产资料进入市场。这个改革方案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有利于在保持经济全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这样做风险较小，成功的把握较大。各地方、各部门必须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搞好。

今年的价格改革，是在去年货币发行偏多、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既要在改革价格体系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又要坚决防止物价出现大的波动。为此，必须坚决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国务院已经决定：第一，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财务上乱开口子，乱提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从一九八五年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资基金，都要在银行开立专户，先存后用，由银行按规定监督支付。现在不少单位一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互相攀比，盲目扩大消费基金；一方面又要求物价不上涨，这是自相矛盾的，是办不到的。第二，统一制定信贷计划和金融政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职能，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现金投放。适当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增加信贷资金来源。中央银行对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和各专业银行，要统一规定货币发行控制数字，各专业银行和各地分行必须按计划执行，不得突破。第三，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规模。对超过限度的投资，要征重税。第四，坚决压缩行政费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今年的行政经费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削减百分之十，集团购买力要按上年实际数额核减百分之二十。严格执行机关团体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审批制度。第五，在坚决控制货币投放的同时，进一步抓好消费品工业的生产，积极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和名牌优质产品，增加市场供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货币回笼。日前各地正在认真贯彻以上各项措施，希望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加强监督，使这些措施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

从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来看，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绝大多数商品的

货源有较多的增加，只要人们按照需要购买，不发生抢购现象，是可以满足供应和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对于极少数供不应求的高中档商品，如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名牌洗衣机等，国家已决定采取预售办法，直接供应给消费者，禁止中间倒卖，价格坚持不动。少数农副产品，主要是一些鲜活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价格放开后将促进生产的迅速增长，随着生产的上升，价格也必然逐步趋于平稳和合理。在这个过程中，对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产品，如城镇居民吃的粮食和食油，继续实行定量供应，销售价格不动；肉价放开以后，国家将对城镇消费者采取定额补贴的办法，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各地方、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必须切实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监督管理，严格禁止违反国家规定随意增加提价的种类和扩大提价的幅度，特别要坚决制止国营工商企业乱提价和变相涨价。对于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和财经纪律，任意涨价、哄抬物价、就地倒卖、牟取暴利的，要给予严厉的惩处。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顾虑，避免思想波动，防止抢购风。我国有十亿人口，两亿多户，市场容量很大，如果都去集中购买某种东西，国家储备再多也经不起冲击，这样就会人为地造成供应紧张，而且会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行基本稳定物价的政策，避免物价大幅度波动，这对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把物价基本稳定理解为物价冻结，认为任何价格的变动都必然带来人民实际生活下降。这是因为，产品价格随着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变动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从我国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合理调整和适当放活价格，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切实处理好价格变动和人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不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近几年为了解决长期违背价值规律所造成的价格严重混乱问题，我们对价格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显然是直接对农民有利的。就城市职工来说，生活费指数的上升确实比过去高了一些，但由于就业面扩大和



平均工资提高，除去物价上升的因素，绝大多数家庭实际收入仍然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广大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都能感受到的。一九八五年，我们要迈出价格改革的重要一步，职工生活费指数还会有所上升，但由于同时进行工资改革和对某些副食品给予价格补贴，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仍将有一定的提高。总之，在改革价格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下降，还将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做到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国家机关和科研、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中工作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近年来虽然收入增加较少，其中有些同志家庭负担较重，生活还比较困难，但他们仍然忠于职守，积极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现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思想和风格，这是广大群众都看得到的，是值得大力表彰的。当然，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关心他们的困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逐步改善这部分职工的生活。我们这几年进行的经济改革，先解决社会生产发展和企业职工、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后解决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增加收入的问题，这是从我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社会生产发展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进一步增加收入的问题也就更有条件解决了。对于这种情况，相信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在今天的改革中，我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干部，特别是城市广大职工，肩负着光荣而又繁重的任务。无论是进一步搞活城乡经济，还是改革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比真本事。我们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都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社会提供多种多样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和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作出贡献。而那种把增加收入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涨价上的想法和做法，是同改革的目的相违背的，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各位代表！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保证各项改革健康地、顺利地向前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有必要在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把人们的认识进一步统一起来。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的现象。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已经相当高了，只要大体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以实现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我们当前应该着重强调的，还是大力提高社会效益，而不是追求不适当的高速度。现在，有的地方不顾社会的需要和市场供求情况，不顾财力、物力的可能，不考虑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收支的平衡，片面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互相攀比增长速度。对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加以纠正，不仅会助长讲假话、搞形式和浮夸风，助长乱集资和平调风，而且会造成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紧张，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一地勉强搞上去了，也会因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原料、材料的供应无法承受而难以为继，那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大城市是全国或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担负着从各方面支持全国或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它们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业产值的翻番上，而应当更加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外贸、交通、邮电、旅游、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和其它社会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这样，大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低一些，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不会低，很可能还会高一些，对全国所起的作用也会更大。因此，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第二，既要搞活经济，又要加强管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深刻的改革，一方面要继续解放思想，强调开放、搞活；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健全制度。这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原则仍然是：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当然，强调管理，指的是要针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建立一套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各个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经济综合部门和监督检查部门，要加强对宏观经济情况和经济调节手段的研究，做好必要的协调平衡和调节工作，严防重

大经济活动失控，做到经济改革不出大的偏差，即使出点偏差也能及时得到纠正。财政、银行、审计、税务、海关、物价、统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从实际出发，继续制定好各项必要的经济法规和规章制度，并且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

第三，加强全局观念，克服本位主义。经济改革是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有关改革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必须由中央通盘考虑，统一部署。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当在遵守中央统一部署和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决不能逾越权限，各行其是，更不能只从本单位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干扰中央的统一决策和部署，损害全国的大局。各地区、各部门对于新出现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可资遵循，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绝不能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在改革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加强全局观念，在改革中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都应当考虑到在宏观方面所引起的反应，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现在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把改革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谋取本单位的利益，可以不顾生产发展的长远利益去追求眼前利益，损大公肥小公，甚至损公肥私，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的。

第四，必须继续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继续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忽视人民生活消费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不积极满足人民生活消费正常增长的需要，是错误的；不顾生产发展的可能，脱离我国国情，盲目追求高消费，也是错误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正确处理收益分配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要坚决反对把生产基金变为消费基金分光花尽的错误做法。我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要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加以正确的引导。这几年我国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国家的底子还很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很低，只有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逐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才能为人民生活持久的改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五，必须继续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排除对改革的干扰。前个时期，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物价牟取高利，利用权力倒买倒卖紧缺物资，以及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这些新的不正之风，对改革具有极大的危害。如果不坚决加以纠正，不仅败坏改革的信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新的不正之风的各项规定，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刹住这些歪风，绝不允许再发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必须切实加强组织纪律，严肃政纪法纪。在纠正不正之风的过程中，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对由于在改革中缺乏经验、界限不清而办了错事的，应着重教育，吸取教训。对为本单位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没收其不正当收入，并给予情节严重者以必要的处分。对借改革之机，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决不能姑息纵容，必须彻查严办。对一切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必须继续给予严厉打击。在这同时，对严守纪律、勤奋工作、有能力、有贡献的优秀职工要提拔重用；对勇于检举揭发不正之风的一切工作人员，都要保护和表扬。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我们的全体干部和人民都应该胸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坚决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纪律严明的良好社会环境，我们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总起来说，全国从上到下，在有关改革的重大的决策、部署和措施上，必须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我们的改革，只能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正确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决不能不顾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哄而起，一拥而上；我们的改革，要认真考虑到在宏观经济上引起的反应，决不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我们的改革，是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下功夫提高经济效益，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靠歪门邪道捞取外快。坚决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就能够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各位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这几年执行了一系列符合历史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正确政策，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继续前进，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谦虚谨慎，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扎实工作，我们的经济就一定能够振兴，我们的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们的形势就一定会蒸蒸日上，我们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 必须保持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趁各省市负责同志来京开人大的机会，今天请大家来开个短会，主要是想向大家通报一下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形势任务、大政方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讲了。今天是要补充讲讲涉及经济全局的几个问题和我们的一些设想，同大家通通气，对对话。同志们在下面，从本地区、本单位，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看得比较多，很需要了解宏观方面的情况，以便能够看到在全局上，在稍远一点的未来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很好。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用了这样一个提法：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要做到“持续”、“稳定”、“协调”，这三点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就有可能使这样的好势头保持和发展下去。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实现的。如果搞得不好，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丢掉这种好势头，在经济上出现曲折，甚至大起大落。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需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巩固和发展大好经济形势，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各地正在积极贯彻执行，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从各地反映的一些情

---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况来看，要真正消除可能发生的风险，继续保持好的势头，还需要各级党委、各级政府继续努力，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抓紧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的各项措施。姚依林同志已经讲了宏观方面的一些情况，万里同志也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讲到当前应注意的问题。这里，我就外汇、票子、速度等三个问题讲些意见。这三个问题，核心是速度问题。

## 一、关于外汇问题

这几年我们结存了一部分外汇，中国银行也还有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头寸。加上国家的几百吨黄金储备，就我们国家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是可以办成一些事情的。只要我们使用得当，真正用在关键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去年就考虑要怎样把结存外汇用好。去年底外汇储备由一九八三年底的89亿美元，下降到82.6亿美元。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国库空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基本情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一些关键设备，还要进口一些必需的原材料。因此，从长远来看，外汇的基本状况不是宽裕而是偏紧，外汇短缺的现象将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存在。即使目前我们还结存了一些外汇和黄金，如果大家以为情况很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任意乱花，那么这些家底很快就会搞光。今年三月底，结存外汇已下降到68亿美元。问题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按照现在大家的想法去搞，不加控制，外汇结存还会急剧下降，今年或明年就可能出现外汇困难。国外资金当然可以利用一些，但要看到外国资本一般都是这样，当你外汇多、底子厚的时候，他想方设法要借钱给你；而当你外汇紧缺的时候，他就会卡你，不借钱给你，或者借钱给你要附加许多苛刻的条件。世界上一些负债累累的国家都有这个痛苦的教训。最近，日本报纸已有消息说，中国外汇急剧下降，好像中国经济又出现了什么问题似的。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出口增长缓慢，进口大量增加。这种局面不改变，是非常危险的。

今年到三月底止，出口 51.5 亿美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9.1%，比去年同期增长 2.7%；进口 60.4 亿美元，完成年计划的 19.9%，比去年同期增长 54.9%。进出相抵，贸易逆差 8.9 亿美元。除石油出口增加、纺织品持平外，其他产品出口都在减少。特别是一季度对港澳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 20%，影响很大。

出口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由于消费基金增加过猛，计划外固定资产扩大太多，造成国内的需求过度膨胀。而国内需求膨胀的结果，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价格上涨。现在出口产品的成本大量增加，价格上涨很多，特别是一些紧俏商品大家抬价收购。据经贸部统计，去年全国出口商品实际成本 2.79 元换一美元，今年二月份上升到 2.96 元。冻猪肉外贸收购价 5500 元一吨，现上升为 6200-6500 元；对虾收购价原为每斤 3.7 元，现在议价已达 10 元；兔毛收购价特级每斤 27 元，上升到 100 多元；鳊鱼苗去年收购每公斤 300-350 元，现涨到 1000 元以上，最高达到 3500-5000 元。看来今年出口亏损会大量增加。二是货源紧张。由于国内需求增加，这几年本来已趋缓和的内外贸争货源的矛盾又加剧。很多商品在国内畅销，价钱也好，于是许多地方和单位愿内销而不愿外销，以致出口商品收购困难。为什么进口增长过快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持生产的超高速度和维持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资。我们的工业产值去年的增长率是 13.5%，但第四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达 17.9%，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 23%。这不仅是高速度，应该叫做“超高速度”。要支撑这个超高速度，只好大量进口原料、材料和组装件。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过分膨胀，各地竞相上项目，引进生产线，你引我也引，要引大家引，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的生产线多引进了几十条，都靠进口部件装配过日子，原材料不够也大量进。据粗略计算，去年进口的钢材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 36%，进口的汽车和底盘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 32%，进口的化纤和长丝相当于国内化纤生产量的 60%，彩电的组装件 70% 以上是进口的。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这是难以为继的。

由于出口上不去，进口大量增加，现在已出现一个危险的信号：到二



月末开出的进口信用证与可收的外汇已出现较大的逆差。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信号。这样大的进口规模，这样的办法乱花外汇，是我们国力无力承担的，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要不了多久就会把我们的外汇储备花光，到时候只有大幅度削减进口，挤商品出口，造成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严重现象，势必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紊乱。这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对于目前外汇平衡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及早解决，以免陷入被动。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一件大事，必须认真抓好。但是在步骤和方法上，不搞急刹车、一刀切，要有区别地、逐步地进行。既不要在国际上引起大的震动，似乎中国又出了什么大问题，又不要在国内经济上引起大的波动，使生产能够正常进行。

解决外汇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努力开辟创汇来源，增加外贸出口，提高换汇率，并注意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要节约外汇，压缩支出，把得来不易的外汇真正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好的效益。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大力增加出口。这次会后请各地无论如何要集中抓一下出口问题，务必保证今年出口任务的完成。目前货源很紧张，国内需求一下子还压不下来，在内外销货源发生矛盾时，我看要实行“出口优先”。各地区各单位都要顾全大局，安排货源要先外后内。要认真检查一季度出口计划完成的情况，坚决扭转进度迟缓甚至下降的现象。

要加强对出口的管理，坚决纠正抬价收购、低价倾销、互相挤占市场的现象。要严格实行出口商品许可证制度，按照商品类别，分别由经贸部和各省、市发放出口商品许可证，一些大宗的、关键的商品必须由国家管住。具体办法由经贸部拟定实施。

第二，必须控制进口，用好外汇。今年的进口用汇计划必须调减一部分，使进出口基本平衡。原来批准给各地区各部门使用的外汇额度，用汇时间要延长，额度要压缩。有些原来规定三年用的，现在拉长为五年用，每年的用汇额度就减少了。凡是与外商签订了合同或协议的，不能失约，但今后再签订新的合同，就应当从严掌握。下达给各地各部门的年度外汇使用额度，不得突破。如何用好外汇，今后要划几条杠子，应当把有限的

外汇用好，出成果出效益。首先应当用在能够增加出口、提高创汇的项目上；其次，要用在四化建设所急需的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外汇的使用方向，不能是用来维持生产的超高速度，不能是用来维持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和重复引进，这点我们必须很明确、很坚决。

第三，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在创汇中、在出口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我们实行开放，并不是为了多花外汇，而是要发挥沿海的优势，打入国际市场，多创汇。我不久前讲过，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既要“进”，更要“出”，今后要努力做到出大于进，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不然，全国的外汇平衡怎么实现？当然“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开始的时候，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带也需要一些外汇作周转。但用汇一定要和创汇结合起来，不能靠吃国家外汇来发展。应当发挥对外辐射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上显身手。

## 二、关于货币投放问题

要使货币的投放避免失控，必须解决好消费基金增长太猛和信贷资金增长过快的问題。

消费基金必须继续控制，不能松懈。去年全国职工工资性支出比上年增加 258 亿元，增长 22.3%，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幅度。其中支付奖金、补贴等增加 105 亿元，增长 46%。今年一季度工资性支出仍比去年同期增长 34.9%。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省长会议精神，决不能使今年的消费基金再冒上去。去年规定的奖金税，必须如数上交，不得不了了之。河北省比较严格，奖金税已收 2200 万元，其他各省市都要认真去抓，务必不能让那些不老实的人占到便宜。

信贷资金投放过多的问题，过去讲得不够，应当抓紧解决。为了维持超高速度，就要多建厂子，多搞基本建设，多引进生产线，于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都大大增加。去年年底，工业贷款余额为 131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大大超过了工业的增长幅度。流动资金贷款全年增加 762 亿元，其中十二月份就增加 425 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全年增加额的 1.4 倍。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去年发放乡镇工业贷款 290 亿元，比

一九八三年翻了一番多。今年第一季度的贷款也是上升的趋势。农业贷款一季度增加 56.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4.5%，其中集体和承包户贷款增加 13.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4%；乡镇企业贷款增加 24.3 亿元，增长 318.9%。另外信用社还发放给乡镇企业贷款 22.4 亿元。由此可见，一季度银根并未抽紧。春耕需要用些钱，是季节性的问题，而乡镇企业信贷太多，发展太快，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稍高于国营企业是应该的，但今年一季度乡镇企业却增长 45%，显然过高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趋势。它对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民致富有重要作用。各地因地制宜搞一些养殖、开矿、小水电、农副产品加工、建材、运输服务等行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过急过快，盲目发展，拔苗助长。特别是加工工业一下搞多了，社会需求减少后就会发生问题。各种工业包括乡镇工业追求高速度，必然造成各方面的紧张，外汇紧张，资金紧张，能源交通紧张，原材料紧张，支持不了。电没有那么多，工厂只得停三开四，拉闸限电，或者买高价油，搞小柴油机发电，得不偿失；公路没有那么多，汽车一下增加许多，只能造成交通堵塞，运输效率降低，两台车顶一台车用；资金没有那么多，就多发票子，那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货币发行，一定要在宏观上控制和管理好。货币发行如何才适度，超过什么限度才是多发了，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新课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从自给半自给的封闭式的旧经济模式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一些旧的计算公式已不适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出新的计算方法。现在城乡经济搞活了，流通领域扩大了，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发展了，经营核算单位增多，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相应需要增发一些票子。我们要研究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计算公式。对于去年货币投放多了多少，现在一下还说不清楚。我们从十二月份猛增的情况分析，估计全年大约多发 80 亿元。因此，今年的票子发行应从紧掌握，上半年要力争多回笼一部分票子，才能应付下半年投放的需要。今年三月份，除了把一、二月份投放的 51 亿元票子收回外，净回笼 4.5 亿元；回笼比去年同期少，第二季度的回笼任务相当重。上半年如果不多回笼一些票子，全年货币投放的数量就难以控制得住。下半年

大量的农副产品要上市，不能说不收购；工资改革要出台，也不能说没有票子不搞；维持正常生产用的投资和流动资金，也不能让银行关门不贷了。所以，上半年的银行工作必须为下半年的货币投放准备条件。上半年多回笼几十亿元，下半年就主动了。以前我曾经讲过，我们要适当地把银根抽紧一点，以便为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今年工资改革、物价改革都要迈出重要的一步。目前物价上涨的指数已不算小。二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 5.3%。如果票子再发行过多，几件事凑在一起，那就要给改革增加很大的困难。

总之，今年的货币投放要先紧一些，一是要控制消费基金，二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除了正常生产和建设所需的资金、收购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必要的资金以外，其它的要压缩。城市工业贷款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都要压。要区别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情况，把银根抽紧一点，走一段再看看。为此，需要把信息搞灵通一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调整，避免出现大的问题。

### 三、关于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外汇问题，货币问题，归根到底是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分不开的。为了维持过高的速度，就大量使用外汇进口，大量投放货币支撑，各方面都绷得很紧。因此，要控制外汇的下降和货币的投放，从根本上说，就必须抑制社会需求的过度膨胀，放缓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一个比较松动、留有后备的经济环境。这样，既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又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经济发展速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达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只要保证每年递增 7-8% 的速度就绰绰有余了。“六五”计划期间，看来可以超过这个速度。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国力来看，有个 7-8% 的增长速度就比较正常，这在世界上来看，也算是高速度了。这样可以集中力量把经济关系理顺，把基础设施搞好，把后备力量准备充分一些，为进入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在连续几年好的形势下，我们又有些头脑发热，现在已经出现了片面追求脱

离实际的高指标，竞相攀比增长速度的不好的苗头。增长 10% 都不过瘾，要向更高的指标看齐。你提 10%，他就提 15%、20%，似乎指标越高就表示思想越解放。春节期间，我去东北。辽、吉、黑三省的能源那么紧张，工业产值年初的头两个月增长 11% - 13%，应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速度了。他们还说，思想不如某些省市解放，没有增长那么多。我对他们说，怎么才算思想解放啊？难道 10% 以上的速度还低吗？能保持下去就不错了。还有乡镇企业，各地都想向江苏、浙江和广东看齐。农牧渔业部安排今年全国平均增长 29.8% 的速度，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了，不少省市都安排增长 40-50%，大大超过全国平均速度，地县又层层加码，压任务。这样做怎么吃得消呢？

竞相攀比，追求超高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对改革的进行是不利的。我们的着眼点，是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而不在于一个时期要搞得多么高。一个时期搞得过高，很多矛盾解决不了，会留下来不少隐患。陆定一同志前些时候写信给我，认为现在形势好，但类似大跃进之风，似乎吹起来了。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追求超高速度的结果，使社会的总需求超过社会的总供给，因此表现为物资的短缺，物价的上涨，表现为要大量进口物资来填补。但这是不能持久的，当外汇短缺、紧缩进口时，就会形成生产的大起大落，将被迫来一次大的调整。为了短时期的超高速度，务虚名，就会带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低速度，造成经济的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吃过这种亏。还要看到，追求超高速度，势必把经济方面的各种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的改革也很难成功。现在工资改革还没有开始，票子已经投放过多，如果发展下去，物价轮番上涨，人心就会浮动，改革就难以进行，难以奏效。又如，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提高经济效益，使我们的产品上品种、上质量、上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物资很紧张，什么东西都好像缺乏，“萝卜快了不洗泥”，那么，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企业素质等都会成为空谈。现在有些企业和单位，又在大量“复制古董”，重新生产那些已被淘汰和更新的老式机床和老式锅炉。而且成本上升，亏损面扩大，质量下降，这是不好的征兆。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什么经济效益，什么现代化，都会被抛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搞的

结果会在政治上给国内国际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一套不行了。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里还要说一下大城市的增长速度问题。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讲了大城市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业产值的翻番上，而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城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功能，更好地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应当把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的主要指标。这个报告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通过，人大批准的。应该说是把大城市从产值指标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了。但是某些大城市仍然提出来工农业产值要提前翻番，把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不是把绳索往自己身上套吗？万里同志也经常说，像北方的某些大城市，不仅能源、交通很困难，连用水都很困难，工业增长速度能比小城市、比乡镇企业高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条件不同，要求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都不能攀比。

当前正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这是非常必要的。不正之风和超高速度是有密切联系的。搞超高速，也会助长不正之风，使它很难纠正。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整党，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大力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经济上的问题，还得通过经济的办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为此，就必须在宏观上加强经济管理，一是要搞好经济立法，制定经济法规，堵塞漏洞，使正常的经济活动有章可循；二是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生产，调节供需，繁荣经济。适应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同步建设。

去年的经济形势是很好的，今年的经济形势也是好的。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大好的势头。我们绝不能在经济上再出现一次大的波动，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接受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反反复复的教训。当前必须适度地抑制社会的需求，控制消费和投资的过度膨胀，逐步放缓增长速度。当然陡然一下降低很多，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步子要稳当一些。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冷静的估计。只要全国上下有统一的认识，一致的行动，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一定会实现。

#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告马洪、房维中、袁木<sup>1</sup>同志：

此件值得一看。发展第三产业，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对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也作用很大。同时，也是我今后加速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发展速度可靠的潜力。望能组织几个人就此专题作进一步研究和规划，并提出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它既是关系调整，又是一项大的经济改革。这个问题，在“七五”纲要中应是一个重要部分。

赵紫阳

四月十五日

## 注 释

1. 袁木(1928- )，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曾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中组部调研室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全国政协常委。

---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1985年47期《国外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文的批语。

# 搞好城市改革 发挥城市功能\*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这次到湖北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城市改革的情况，重点又是武汉市的改革情况。这几天听了省里和市里的汇报，找了一部分同志座谈，总的来说，我感到湖北的形势、武汉的形势是很好的。湖北省委在关广富<sup>1</sup>同志主持工作以来，工作是做得好的，中央是满意的。

就全国来讲，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很好。在省长会议和这次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有个概括的说法，就是：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形势。我们过去历史上有过教训，形势好了，就不谨慎，结果反而会出问题。所以现在要提出如何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问题。

如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概括来说有四点：

第一，要坚持改革。我们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一些积弊，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因此，坚定不移地、有步骤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关键。

第二，要加强宏观的控制和管理。特别是在三个方面要控制好。一是控制信贷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和流动资金的贷款；二是控制消费基金；三是控制外汇支出。现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的管理办法正在改变，而新的管理办法还没有系统地制定出来，这就往往会

---

\* 这是赵紫阳在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政军党员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出现一些漏洞。因此，在微观放活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和加强宏观的控制和管理，包括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立法，都需要加强和完善。

第三，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第四，要逐步地把目前的超高速度减慢下来，使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可以稳定的、持续发展的、正常的增长速度。全国去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全年平均 14%，其中第四季度达到 18%，今年第一季度是 23%。这个情况，一方面要看到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发展速度过高，势必大量贷出流动资金，大量搞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大量动用外汇进口原材料。就我们的国力来说，靠这样的办法，长期维持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保持清醒，很可能有一天会大起大落。大量投放货币和大量支出外汇，同搞超高速有直接的关系。速度太高，国民经济的弦绷得太紧，也会助长不正之风。在速度上不应盲目地互相攀比。当然也不宜急刹车，那样也会使经济受到影响。因此，要妥善安排，逐步减缓。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下城市改革，特别是大中城市改革的几个问题。

## 一、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城乡经济网络的枢纽。城市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改革。因此，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城市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这是由城市的地位、任务和功能所决定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才能把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链条带动起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城市的改革。抓好城市的改革，也会进一步带动农村改革。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城市工作应当搞些什么？我们在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地，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的中心。

城市的工作和各项经济活动，不应该局限于为本城市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城市的规模不同，辐射的范围不同，服务的范围也就不同。比如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应该为全国服务。武汉地处中原，首先是为华中地区服务，进而影响到西南、西北。城市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工作的考核办法要改进。城市作用的大小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主要是看它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因此，考核大城市（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的工作，不能单纯看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看国民生产总值。只讲工农业总产值而忽视其他方面，就会限制城市功能的发挥。

我们要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意义。城市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把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的、现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心。要紧紧地把握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打开思路，进一步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 二、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当前城市改革中要抓些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这么三个要点：简政放权，敞开大门，搞活企业。

搞活企业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都要从搞活企业出发来考虑，改革的结果要使企业能真正活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首先应该是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企业的活力问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好这个问题。

简政放权，敞开大门，这是搞活企业的前提条件。简政放权，才有可能使企业不再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敞开大门、打破封锁，才有可能使企业从条块分割中解放出来。没有这两条，企业就活不了。

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敞开大门，对外省、外市、外地实行开放。开放才有竞争，才能进步，才能发展。武汉市在改革中提出“敞开三镇大门”，“让企业见市场的世面，经竞争的风雨”，敢于把大门打开，不怕外地商品冲

进来，不怕个别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有胆略的决定。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其他行业的进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怕在竞争中失败，采取封闭的政策，只能是保护落后，助长守旧依赖思想，越封闭越落后，最后只能被淘汰。

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更要实行对内开放。前一阶段，我们对实行对外开放讲得比较多，对内开放讲得不够，抓得不狠。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开放。对外开放是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对内开放是发展国内的商品交换，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今天的城市与过去的“城堡”不同，城堡是封闭式的，城市则是商品交换的中心。城市的这一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开放。先进的城市要开放，落后的城市同样也要开放。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搞封闭，搞条块分割，只能人为地切断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既不能扬长，也不能避短，更不能带来落后变先进的转化。多年来条块分割的体制，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没有真正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这个问题必须在改革中认真地解决。

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要有步骤地进行。中央各部和省除少数部门和行业外，所属企业原则上应下放到所在城市管理，首先打破中央部门这些条条和省这些块块。企业下放到城市以后，要避免城市变成新的块块。城市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改变多年来政企不分，干涉企业内部事务过多的现象。市政府的职能同城市的功能是有区别的。随着企业下放，市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可以先改变职能，后改变机构。形象地说，就是先撤“香火”，后拆“庙”，可能比较有效。改变职能，就是要多用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多用经济法规去管理企业，少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改变机构，就是要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裁减专业行政管理部门。

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局以下行政性公司的问题。这种公司上面有局，下面有企业，把权放给企业，它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总是要截留一些权在自己手里，使规定下放的权力无法落实到企业。因此，这类公司有的可以撤销，有的应改为服务性的公司，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一定要全部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 三、开辟多种市场

城市与市场是不可分的，大城市是大市场，中小城市是中小市场。要逐步开辟多种市场，不仅有消费品市场，而且应当开辟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各种市场配起套来，经济杠杆的威力才能显示出来，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才能落到实处。

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实践表明，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有害的。现在，我们把生产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指令性计划，按计划价格进行内部调拨；另一部分是计划内允许自销和指令性计划以外的，可以进行市场调节。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会逐步缩小，后一部分会逐步扩大。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不是通过统一调价来解决，而是通过逐步扩大进入市场调节这一部分的比重来解决。我国农副产品价格的改革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成功的。这是中国独特的做法。我国粮、棉等农副产品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统购派购占绝大部分，后来逐步加大超购、议购部分，最后形成了比例价。既调整了价格，又没有引起大的震动。许多生产资料也要走这条路。石家庄市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计划调拨给企业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不直接拨给企业，改由城市组织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销售，市场价同调拨价的价差按计划指标返回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开辟金融市场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商品生产要求发展横向联系，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则是纵向联系，各方面的资金难以互相融通。这是一个矛盾。开辟金融市场，首先要解决横向融通问题。要鼓励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投资，通过融通，把资金引导到社会需要和宏观效益较好的方面来，以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要积极发展技术市场。技术市场是科研和生产的媒介，它能够沟通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既推动了生产，也促进了科研。有了这种场所，就可以把科研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潜力释放出来。许多城市都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有条件建立技术市场，把它搞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去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是，劳务市场实际

上已经存在，劳务方面的招标、承包正在发展，很多第三产业也是搞劳务的。我们应当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劳务市场搞好。

搞好市场，搞好流通，必须相应地解决交通问题。武汉市提出搞活“两通”（流通和交通），这是对的。没有交通，当然就很难流通。我们现在交通紧张，运输结构不合理，运输效率很低。城市是交通枢纽，水、陆、空运大都在城市里交叉。要更好地在中心城市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组织联运，提高运输效率，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改革运输的管理体制。

#### 四、调整产业结构

农村改革中有个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城市改革中也同样要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每个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把优势发挥出来。要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包括周围中小城市群和集镇在内的经济网络。不要每个城市都搞“小而全”、“大而全”，城市的产业结构要各具特点，城市之间要相互补充。每个城市、每个经济区都要研究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城市要注意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资金。过去，城市有了钱就去上项目，办工厂。今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首先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智力投资，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为本经济区服务的能力。

我国的第三产业很不发达。每个城市都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第三产业不仅包括为生活服务的行业，也包括为生产服务的行业。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效率如何，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程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慢，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把第三产业搞好，把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行业搞好，在现有的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第三产业要为整个经济区服务，不只是为本城市服务。发展第三产业，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逐步解决好价格问题，使第三产业企业具有活力，使办第三产业的单位和个人有积极性。

住宅建筑业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要积极进行城市房租

改革和住宅商品化的试点。温饱问题解决后，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把城市住房改革搞好，可以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可以大量地吸收人们的消费资金，回笼货币，使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可以大大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可以克服在分配住房中的不正之风。住宅商品化涉及到房租问题，要研究出具体办法，既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国家又能承受得了。

## 五、增强企业活力

现在许多小型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搞得比较活，而担负指令性计划任务较重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却搞得不够活。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它们拥有的固定资产多、技术力量强、计划供应的原材料比重大，具有自己的优势。只要认真加以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一定能够改变效益低、浪费大的状况，使巨大的潜力较快地挖掘出来。

大企业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改革。现在有些大企业主要不是想方设法在企业内部挖潜力，而是要求上级减税让利。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对的。简政放权，打开大门，适当调减某些负担过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调节税和指令性计划指标，这是搞活企业的外部条件。但要把大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关键是要眼睛向内，搞好企业内部的改革。除了适当划小内部核算单位，搞好内部的经济责任制，积极抓好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以及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等以外，要把企业变成开拓型、经营型的企业，关键在于改革企业的人事制度，把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企业可以采取考察任命、民主选举、自荐推荐、招聘聘任等形式选拔干部。人才选准以后委以重任，常常在短时期内就可以使工厂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要重视调动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同时还必须重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加强他们的责任感。这个问题很多企业没有解决好。因此，在实行利改税，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基础上，还可以实行企业的厂长、经营者的经营责任制。就是说，主管部门与他们签订明确的经营责任合同，包括厂长、经理的责任、任务、职权和奖惩办法等内容，严格执行。加强厂长、经营者的责任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能把企业办得更好。

企业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和协作。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城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以骨干企业和名牌优质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富有生命力，应当推广。有的大城市提出，企业的技术改造原则上不搞土建，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产品向小城市和乡镇企业扩散，减少大城市过于拥挤的现象。城市要在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方面，多作协调和组织工作，把社会生产力更好地组织起来。

## 六、搞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对搞好价格体系改革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价格是有力的经济杠杆，开放、搞活，理顺经济关系，发挥城市的功能，都离不开价格的改革，离不开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当然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牵“牛鼻子”，就要抓好价格体系的改革。

我们当前的价格体系改革，是在物资比较丰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价格调整，这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根本不同。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就是物价有升有降，使各种商品的比价趋于合理。在价格调整和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的总水平会上涨一些，但由于生产发展，工资提高，特别是家庭就业人口增多，加上国家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必要的补贴，因此，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下降，生活质量能够提高，人们会感到更加方便，在经济上能得到实惠。武汉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武汉市蔬菜、肉、鱼等副食品价格放开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食堂管理员对我说，放开以前买进的菜，能吃的只有六七成，三四成要扔掉；现在，从集市上买的可吃到九成，从国营菜场买的，也能吃到八九成，可食用的部分增加了。过去吃菜是老、粗、蔫，现在吃菜是嫩、细、鲜；过去吃冻猪肉，现在能吃到鲜肉；过去吃死鱼，现在能吃到活鱼。而且品种增加，节令提前，营业时间延长，服务态度改善，随要随买，任意选购，群众称便，商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大为

减少。我们的物价改革，完全可以做到既能促进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能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旧社会通货恶性膨胀，“金元券”成为一张废纸，人们现在余悸犹存，形成一种对物价变动的紧张心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冻结物价，不懂得合理调价的积极作用。事实上长期冻结物价，造成商品匮乏，甚至有价无市，价格看起来便宜，买不到东西，或者只能买到质量差的商品，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实惠。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根本原因是生产不发达。价格不合理，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必然影响生产的发展，阻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如不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搞活经济，都会成为空谈。当然，也要看到，价格放开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增加消费者的支出，但东西多了以后，价格也就会趋于平稳。价格体系的合理化，带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丰富，社会服务质量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改革已给我们以启示。长期以来，我国粮、棉价格过低，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价以后，加上其他措施，出现了生产大发展的新局面，棉花自给有余并能出口，粮食从六千亿斤很快上升到八千多亿斤，农民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改革物价体系，是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价格体系的改革牵动全局。既要把价格关系理顺，使之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又要避免大的震动。这是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宏观综合平衡的需要，当前在价格改革上要采取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把改革的步子走稳一些，工作做细一些，比较稳妥。要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价格改革。一定要制止乱涨价。应该改的，要坚决改；该管的，要严格地管；不允许涨价的，坚决不准涨价。要做好群众性的监督检查工作。国营商业要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这几条抓好了。我们的改革就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改革价格，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围绕价格体系的改革，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改变那些旧的观念和习惯。各个城市、各个单位，都要通过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来进行宣传解释，消除群众的担心和顾虑。



这是当前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思想问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应该结合改革的实际去进行。

我国的物价改革，这几年小商品已经放开了，市场供应趋于缓和的消费品正在逐步放开，市场活跃，花色品种增多，过去很多买不到的东西能买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不大。一九八五年我们放开了农副产品和鲜活产品的价格，步子也迈得不小。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和市场调节两种价格，市场调节部分将逐步扩大。今后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还要逐步放开和调整第三产业的价格，解决房租和住房商品化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可以说，我国的价格问题已初步摆脱了旧的体系，而纳入了新的轨道。沿着这个轨道，再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断采取渐进的方式，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样就有可能在没有大的震动的情况下，基本上完成价格体系改革这个最关键、最困难的任务。那时，我们的城市和整个经济生活的面貌都将大为改观。

一九八四年十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为城市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现在武汉以及其他城市改革经验使我们看到，城市改革的路子已经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我们应该对改革具有充分的信心。

## 注 释

1. 关广富(1931-2016)，黑龙江穆棱人，满族。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 在首都各界人士纪念亚非会议 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朋友们：

三十年前，二十九个亚非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根据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的建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会议通过了最后公报，发表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鲜明地表达了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保卫世界和平，开展友好合作的共同意志。在万隆举行的这一会议，作为二次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和它进一步迅猛发展的象征，载入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史册。

三十年来，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亚非地区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又有几十个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登上了世界舞台。这对于促进世界力量对于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当然，亚非地区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仍未停止。大片阿拉伯土地还被霸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恢复。纳米比亚的独立尚未实现。种族歧视在南非依然猖獗。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捍卫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还没有结束。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军备竞赛，使广大亚非国家和人民深感不安。

三十年来，在经济领域，亚非地区各国在不同条件下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已开始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产生不容

忽视的影响。但是，总的来看，亚非国家的经济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它们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受害者。

亚非地区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和今天还面临的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激励着和敦促着亚非国家更高地举起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旗帜，为更好地实现亚非会议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做出更大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决心同亚非国家一起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中国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独立。我们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同情和支持其他国家和人民采取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去争取和维护他们的独立。我们认为，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南部非洲问题，都应该按照联合国大会多次做出的公平合理的决议尽快获得解决。我们主张在亚非地区和全世界根除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制止大国欺侮小国、强国侵略弱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中国同印度和缅甸曾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也参与制定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我们一向根据这些原则同亚非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同周围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在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在不断发展，并期待着同其他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

亚非地区有近一百个国家，在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乃至社会制度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再加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些国家彼此间发生矛盾和分歧难以完全避免。外来势力也从中挑拨，以售其奸。

亚非国家为了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必须排除外来干涉，像当年亚非会议那样，善于“求同存异”。所谓“同”，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并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共同奋斗。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曾倡议亚非国家进行区域性经济合作。近几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提出并积极进行“南南合作”，这比亚非会议当时的设想前进了一步。我们认为，加强“南南合作”既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又能有力地开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我两年前访问非洲期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这就是：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些原则同样

适用于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我们决心按照这四项原则，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同广大亚非国家一起，为“南南合作”做出贡献。

亚非地区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在这里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后来这两大洲都长期沦为殖民主义者侵略和奴役的对象。三十年前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新觉醒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的时刻，让我们亚非人民更密切地携起手来，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无愧于前人和无负于后代的光辉贡献。

# 编制“七五”计划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二日

## 一、第三产业问题

第三产业在我们国家是个大题目。为什么没有搞起来，怎样才能搞起来，对这个问题现在心中无数，不甚了了。笼统地讲，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具体提高多少，没有量的概念。过去忽视第三产业，影响了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第三产业占的比例达到什么水平经济效益最大？过头了也不行。总之，一、二、三产业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发展第三产业要研究许多政策问题。中国第三产业落后，很多人搞采购，外国人打个电话就行了。如果第三产业发展了，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就不用回家洗衣做饭了。这些都可以提高效率。当然，第三产业发展与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工资不多，没有钱，就是第三产业发达了，他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要很好认识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的第三产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如何划分，哪些是福利，哪些是产业？这些问题，都要组织人好好研究。

## 二、新兴产业问题

迎接新的世界技术革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在“七五”计划的蓝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苏联、美国、日本、西欧都在讲新技术革命。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七五”计划纲要起草小组汇报时的几次谈话要点。

西欧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经济会不会衰落下去，关键在于能不能联合起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发展新兴技术，有一个正确决策的问题。不从我国国情出发，不量力而行，光搞新兴技术，把传统产业丢掉，这样不行；但还是按老一套搞，只发展传统产业，到了二〇〇〇年还是老水平，差距还会拉得更大。中国发展新兴技术必须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这一点要明确，这是个大决策。

发展新兴产业，重点是发展电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这是对的，特别要突出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不是一个专门的产业，一向是同其他产业融合在一起的。要把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地位放得很高。发展新技术，必须集中力量。西欧每年用于科研经费约五百亿美元，超过美国、日本，但是效益不如美国和日本，原因是他们国家多、分散搞，现在提出要联合起来，要搞“技术共同体”。他们的经验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对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元器件这些关键东西，我们必须集中攻关，资金集中使用，这样搞十年、八年就会见成效。至于这些元器件的装配使用，可以分散。大规模集成电路、基础元器件要像搞“两弹”那样，集中攻关。彩电、显像管、微型机的生产不能集中，可以分散。新兴技术不能完全靠引进，要结合引进集中攻关。经过十年，至少要缩小差距，而不是拉大。过去说同世界先进水平差二、三十年，现在还是拉大差距的趋势，弄不好，到二〇〇〇年会相差四、五十年。

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要抓两头：一头抓“不显眼”的技术，一头抓决定前途的关键技术。抓两头，管中间。

### 三、外贸、外汇问题

外贸、外汇是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集中起来，一个是外贸体制，一个是汇率，一个是进口替代。我到北京以后，外贸体制改了两次，退了两次，其它方面改革都有前进，外贸改革还没有找到门路。外贸权力下放，要同完善汇率、关税、补贴等经济杠杆结合起来，首先要完善经济杠杆，然后才是下放。不然就会放了收，收了放。权力下放以后，才能解决技贸结合、工贸结合问题。首先要管住，然后再搞经营权力的分散。我们的问题是，先把经营权分散了，杠杆的完善没有跟上。当然，经济杠杆不是一

下子能够完善的，要配套，又要逐步，还是动态的。对汇率，到底采取什么方针？这个问题是不是“牛鼻子”？外汇兑换，是管严还是放松？汇率可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有利，可以刺激出口。贬值以后对国内物价有何影响？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不应该是冻结的，而应该是浮动的；不能与美元背离太大，也不能天天自动浮动，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控制的浮动，有升有降。汇率浮动，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外汇存款。对外开放，媒介是汇率，汇率不合理，是外贸的“卡脖子”问题。

发展中国家外汇是个大问题，出口不发展，进口就受限制，借债也就有困难。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要采取一些大政策。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很大，利用这个基础，加上廉价劳动力，并改进技术，我们就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成套设备，向发达国家出口零配件。机械出口要提到战略地位上来，关键是要采取扶植政策，提高竞争能力。

中国这么大，完全靠出口平衡外汇不行，还要搞旅游，扩大劳务出口。中国劳力多，而且手巧，劳务出口潜力很大。

#### 四、消费基金问题

现在，我国工人工资水平同工业生产达到的规模不相适应，工资水平低了。这是由于多年来体制不合理，早该提高的效益没有提高，早该提高的工资也就没有提高。今后几年，有无可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配套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资也相应地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时期的工资增长和效益提高的幅度不成正常比例；当然，这段时间不会太长。农民这几年收入增加这么多，就是因为效益显著提高了。目前一些工厂提高效益的潜力非常之大。企业真正把潜力挖出来，纯收入的增长会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的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公式不适用。当进入正常阶段，这个公式是适用的。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提高效益上来，同时提高工资。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效益没有跟上来，多发了消费基金。如果效益能上去，多发消费基金有什么不好？“七五”时期，可能效益提高不多，工资也提高不多；也可能把效益搞上去，较大幅度提高工资，经济生活不会出大问题。

## 五、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问题要有个规划。中国这么大，到处发展小城市，但交通不发达，联不起来，搞协作也有问题。要以大城市为中心搞城市群。不是搞卫星城，城市带，而是要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的城市网络。通过大城市、工业基地、交通枢纽把中小城市衔接起来，发挥中小企业作用，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现在看来，搞经济区范围太大。

## 六、农村劳动力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应当发挥这个优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会腾出一部分劳动力。要组织他们开矿、修路、造林、发展建筑业和运输业。开发矿业，一是乡镇自己开矿，一是到大矿当合同工。国家建筑队伍、林场都用固定工，不是个办法。技术工人可以用固定工，普通工人要用农民合同工。这样做好处很多，利国利农。利用农村劳动力问题，要作为一个大的战略方针提出来。

## 七、经济体制问题

你们写的这个初稿，第三部分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好不用这个题目。作为计划，就讲微观放活，宏观控制。控制主要是间接控制，利用和完善经济杠杆。要设计出一个方案，有步骤地进行。主要是价格、金融和财政，都要围绕微观搞活、宏观控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文章就在这里。没有经济杠杆，就没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党内管经济的同志最不适应的就在这里。

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这是“七五”计划的特点。这个问题重点要讲间接控制。有的靠指令性计划，有的靠经济杠杆作用，包括价格、金融、财政，实际上是讲计划体制改革。



## 八、价格问题

价格改革是带头的。价格是经济杠杆中最重要最有效的形式。价格改了，才能暴露矛盾，才能为金融、财政改革创造条件。价格不改革，企业放活就没有条件。搞活企业是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价格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价格不改，税收会很复杂，只好用调节税、产品税。价格不改革，金融改革也难以进行。

原来设想，价格先改生产资料，后改生活资料。东欧国家敢放开生产资料价格，不敢放开生活资料价格。现在看，先改生活资料价格是可以的。今年把影响人民生活最大的副食品放开了，剩下的价格调整都没有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问题解决了，再把住房、第三产业价格放开，难关就过去了。

价格放开的趋势，总的来看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高于消费资料，原材料、基础设施价格上涨高于加工产品。消费资料价格放开受市场制约。原材料价格放开，迫使加工企业技术进步。至于生产资料价格如何改，相当时期内是又放又调，这样比较稳妥，不至于出乱子。计划内小调，计划外放开，这条路子可以走得通。看来，每年都动一点不行，一次调完也不行，搞不好要“翻船”。两种价格并存，可能比较好，从宏观方面考虑，关键是要有合理的比例。总的看，计划内价格的部分绝对量不增加，比重下降。还有一个合理负担的问题，对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价格要同步调整，相互配套，使它们能够公平负担。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计划调拨价格部分绝对量不变，比重下降。例如，钢材统配部分，现在大约二千万吨，占百分之六十；以后钢材总产量达到六千万吨，计划调拨部分还是二千万吨，但比重下降了，只占三分之一。另一种是，也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价格，计划内和计划外形成综合价格，在一定界限内浮动。

石家庄将全部钢材都按市场价格投入市场，然后对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企业给予差价补贴，效果很好。田纪云同志提出，也可以考虑在生产领域加价，不一定都在流通领域解决。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营商业具有吞吐、调节作用，也可以说是领导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主要的不是表现为保留多少固定价格，而是表现为国营商业参与市场调节，起领导市场的作用。

总之，两种价格问题是一篇大文章，是能否达到价格改革彼岸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好好研究，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 九、财政问题

财政改革，作为方向应当减轻企业税负，首先减轻调节税，修订产品税，同时国家财政也要减轻负担，二者要相适应。要下决心，从明年开始财政不打赤字，不向银行透支。一是增加外债，一是增加内债，一是甩包袱。

可以考虑，逐步增加企业的留利水平。到一九九〇年，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这个问题要算算账，到底提高多少合适，可以是百分之十以上，也可以百分之十以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如果拿出百分之十，可以“一箭双雕”，一是用来调整价格和税收，使企业盈利水平大体接近，处于同等条件下；二是企业留利水平提高了，可以为融通资金，为实行股份制创造条件。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这一块怎么办？物质不灭嘛，还在社会上。可以通过金融体系集聚起来。这与原来设想不一样，过去强调靠财政集中资金，现在要减少财政集中程度。靠银行吸引和调节资金。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完全靠财政不行，应当逐步地把盈利企业基本转到银行。建设周期长的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贴息；不盈利、非盈利企业以及服务行业，由财政拨款。实际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财政集资来搞建设，另一种是通过银行来集资。

## 十、金融问题

外国管理经济，主要靠银行，利用利率、证券交易、放款、收缩银根等手段。我们国家要发展商品经济，又不利用银行，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价格、银行、财政三方面的改革要统一考虑。

要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以吸收资金，提高贷款利率以控制投资。当然，也要考虑到提高存款利率以后，会不会把一部分利润转为消费基金，这与控制消费基金是否有矛盾。最近有个同志给我写信，反映现在抽紧银根，下面哇哇叫。他建议拿出一部分钱来实行高利率，谁能用得起谁就用。这样可以使一部分效益好的项目继续搞下去。这个意见是好的。过去用行政办法，一说上都上，一说下都下，搞一刀切。这样不行。实行高利率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筹集资金，二是能限制效益差的建设，三是通过贴息保证重点建设。这样，计划内和计划外资金就统一起来了。这种办法，比用行政办法进行控制投资的效果好，损失少。

货币发行量应该多少合适？现在事先不知道。货币流通次数没有办法计算。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少渠道向多渠道、从一种计划向多种计划转化，到底需要多少货币，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国家交通落后，信息不灵，又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货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拿国外任何一个公式来套用都不行。

财政、税收、资金市场和股票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发股票，可以有领导有限制地试验、探索，既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消极作用的社会主义股票市场。这是一种严格限制了的股票市场。中国人一说股票市场，就想到过去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我们现在所说的股票市场，不是那种投机者的市场。实际上，南朝鲜和台湾对股票限制很严，有一套管理办法。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很好研究。

关于发挥银行的作用，要特别提一下人才培养问题。现在我们整个银行的工作人员，知识、经营、业务管理水平同银行改革的要求都不适应。体制改革，必须考虑金融人才这种状况，只能在游泳中学游泳。我们要请一些外国金融专家作顾问，引进人才，培养干部，进行基本训练。现在的问题，不是知识更新，而是启蒙教育。这种状况，不能不制约我们的改革。

## 十一、市场问题

世界银行林重庚<sup>1</sup>对我说过，只有一个市场不行，要有几种市场相配套。这个道理是对的。发展商品经济不可能只有一个商品市场，还要有资

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焦点是资金市场，影响是多方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应是统一的、开放的市场。我主张首先打破条条、块块，把企业放到城市，然后再解决城市的问题。要简政放权，敞开大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措施，都要有利于统一的商品经济市场的形成。对于打破条条、块块的界限，要打总体战、综合治理。“七五”计划要专门讲一下发展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

## 十二、股份经济问题

我对搞股份企业是有兴趣的。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谁代表固定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过去是靠计划、财政来控制，放开以后谁来代表？弄不好，就是职工利益代表一切，经营者是顶不住的。可以实行股份所有制形式，这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把财产所有者代表具体化了。现在的财产代表太抽象，分解为几股有好处，所有者、经营者、工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制约。问题是，这种股份所有制发展的趋势如何？

## 十三、“七五”计划的编制方法和组织工作问题

在“七五”计划中，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问题，“七五”可以完成；有些问题，“七五”完不成，但要规定做到什么程度；有些问题，如改变出口结构，发展新兴产业，“七五”期间不会有大的进展，但是发展方向应当明确提出来，不然，过十年还是变不了。对这些问题，都要联系二〇〇〇年来考虑。

“七五”计划纲要，要虚实结合，总要有一些看得到、抓得到的东西。现在着重从政策上写是好的，但不要写得太虚。不像计划，完全是一篇政策建议，也不好。

从消费出发安排计划，是我提出来的，但是预测很难准确，“七五”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意思要讲到，但要说话一点，不要说得太死。从消费出发，作为战略是可以的，但作为计划安排的原则，只能逐步体现。

“七五”计划纲要，一方面搞文件，一方面要组织一些人讨论专题，比如第三产业、外贸、价格、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平行作业。经过讨论，成熟的意见，就写到纲要里；行不通的，就不写了。计委的力量也要动员起来，集中精力搞好这项工作。

## 注 释

1. 林重庆 (Edwin R. Lim, 1941- )，菲律宾籍华人，祖籍福建。时任世界银行首任驻华首席代表，经济学博士。曾任世行越南项目业务官员，世行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非洲局局长、印度局局长。

# 切实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这是件好事，很需要办，但一出此题目，定会出现各地都要挤着上，结果力量分散，一事无成。报告中已注意到防止这类情况发生，但一定要看到真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有不怕得罪人的精神，不要当和事佬、“高级泥瓦匠”（抹平）。另外，要悄悄做，不要宣扬。文中就此谈了点意见，供参考。

（在“项目规模不要大，力求‘小、专、现’[小型、专业化、现代化]，不搞重复”处批注）

这一条很重要，切忌一下铺大摊子。

（在“从项目搞起，逐步形成新产业开发区，对批准的项目可采取若干特殊优惠政策”处批注）

很对。从搞项目搞起，各个小区可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求全。一开始也可不打出新产业开发区的牌子，以免各地争着挂号。

（在“更不能一哄而起”处批注）

这是多年老毛病，这次一定要避免。

---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请示》的批示。

# 加强省区之间在自愿、平等、互利 基础上的经济协作\*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

提出的方针(四句话)和建立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不要成为计划会议的翻版,而是一种跨省区、开放式、松散型的组织形式,都是正确的,可予同意。提出的五项建议,请计委牵头研究,如有必要可酌情予以批复。

(在“大家一致同意以‘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处批注)四句话是对的。

(在“如果把经协会开成计划会议的翻版,变成五方争项目、争投资的场所,既使国家经济主管部门感到为难,五方也难以自求平衡”处批注)很对!

(在“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起来……有利于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市之间、企业之间的分割、封闭状态”处批注)应该如此。

(对报告提出的五项建议批注)

(一、建议将川、滇、黔、桂地区国土资源的综合考察和发展战略研究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计划,并尽快组织力量实施,为开发大西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可以考虑。

(二、为改善西南公路交通,四省区五方一致达成协议。在两年内修通省际间的断头公路,并对公路干道进行改造;除各方大力组织群众和自力更生筹集部分资金外,请中央主管部门拨出专款支持)应该适当支持。

---

\* 这是赵紫阳对廖伯康<sup>1</sup>关于四省区五方(云、贵、川、桂、渝)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三、为了形成对沿海开放地带的有力支撑,把沿海与四省区五方紧密联系起来,建议在四省区五方建立“内陆资源开发区”和“内陆经济开放试验区”,准予实行特殊政策,对开发资源应采取更加优惠的措施,予以鼓励,使沿海地带的开放有一个纵深配置,使我国整个对外开放有一个更加扎实的基础。建议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牵头,有关部门和四省区五方参加,进行专题研究后,报国务院审批)可放后考虑。

(四、建议把四省区五方在这次会议上协商一致的一批急需的交通、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及早列入国家计划。这些开发项目四省区五方都早有规划,并且作了长期间的前期准备工作,有些项目已经具备了上马的条件)可酌情予以支持。

(五、川、滇、黔、桂的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多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对改变这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专题方案,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重点扶持)可请统战部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

## 注 释

1. 廖伯康(1924- ),重庆市人,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曾任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建委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



# 对报纸连续发表批评 “超高速”评论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我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即：不要把目前的超高速，比作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也不要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评论。但需注意，目前各地攀比速度的问题远未解决，认识也很不一致。纠正这种倾向，不能踩急刹车，要逐步使之降速，但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和统一思想，否则对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引起不良后果。因此在向报纸打招呼时，亦请注意此点。

以上请报告耀邦、启立同志考虑！

最近国务院将开会研究由于信贷、外汇控制后各地所提出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一下经济形势，容后再告！

赵紫阳

五月十三日

---

\* 这是赵紫阳对胡耀邦、胡启立批转王震反映不同意报纸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评论材料的批语。

# 会见新加坡吴庆瑞<sup>1</sup>博士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赵紫阳总理(以下简称赵):我们有一年没见面了吧。吴博士是第三次来中国了。博士担任了我们的沿海开发经济顾问,使我们在老朋友之外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今年一月,我国吴学谦外长到新加坡访问时,向李光耀<sup>2</sup>总理提出请您担任我国政府经济工作方面的顾问,得到李光耀总理的应允。新加坡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闻名,我相信新加坡的经验和您的才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很大帮助。博士这次来,到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看了些工厂、学校,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博士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对您的工作表示感谢。

吴庆瑞博士(以下简称吴):首先我向赵总理祝贺中英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这是贵国的成功,也是您个人的成就。香港现在非常繁荣,与前一段时间人心不稳的状况大不一样。中英达成协议后,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这里显示了赵总理的外交才能,也使外界看到中国政府的诚意和能力。

赵总理工作很忙,有关经济特区的情况我已与谷牧先生交换过意见,受到很大启发。为了更好地利用会见时间,我只能想就贵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我认为,影响贵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有两个,这两个因素可能会长期起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贵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来向国外购买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进行能源、矿业和交通等基本建设。这方面所需要的资金是无限的。现在中国主要是靠国内的积累。另一个因素是,需要获得足够的外

汇，中国现在获得外汇的能力很差，需要通过扩大出口和发展旅游来解决。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我曾和中国官员讨论过从国外商业银行贷款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发现，中国对从国外贷款持谨慎态度，认真考虑将来如何还本付息，这是正确的。如能通过扩大出口和发展旅游业获得外汇，进而扩大从国外取得贷款，可以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在三十年前，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就是通过有计划地扩大出口来解决的。我相信中国扩大出口是能成功的，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为现在中国的产品主要是内销，因此，必须改变现有的工业结构。如果采取有力措施，用四五年的时间，就可以使贸易出口有较大增长。

在增收外汇方面还有一些可能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旅游事业。我曾与贵国旅游局长韩克华<sup>3</sup>先生谈过，他是个有能力的人，韩认为中国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很大潜力，中国地域辽阔，风景优美，还有大量文物古迹。韩局长强调了两个困难因素，即缺少旅游宾馆和民航飞机。我想，只要解决了旅馆和民航交通，客源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常规发展的话，这两个因素的改善自然是缓慢的。因此，我认为韩先生所讲的规划是保守的。我向韩先生建议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尽管意见不成熟，韩先生认为还是值得考虑。例如采取预制房屋进行组装的办法来修旅馆。可以在北京、上海等地制造这种房屋，在这些地方制成后，运到旅游点进行组装。北京有一座丽都饭店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新加坡制作后运来北京组装的。航空客运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计划来发展，速度也会很慢。因为购买飞机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培训人员（特别是地勤人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建议，请美国的航空公司到中国来，与他们签订十年的合同，让他们承包几个城市间的国内航线。这样你们不用付钱就可以扩大吸收国外旅游的能力。目前美国国内空运能力过剩。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办的话，可以在两、三年内做出相应的安排。

不管怎么说，上述两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和解决的。我的这些想法很笼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具体的措施。

赵：首先我就吴博士提到的香港问题讲几句。香港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首先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其次是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明智的合作态度。中英达成香港问题的协议书是双方合作的产

物。我在这里要请吴博士转达李光耀总理：在香港的过渡期间和过渡期之后，我们希望在维持香港繁荣方面得到新加坡政府的合作，并愿意就这个问题听取新加坡朋友的意见。

刚才吴博士讲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把外贸、外汇、外资作为重要因素提出来。这的确是关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正是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我对您刚才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并且要同有关部门进行研讨。

我有个建议，就是想从今天上午邓小平同志同您谈到的您在中国的工作题目中，特别提出外贸和外汇问题，请您帮助研究。这并不是新增加的题目，而是希望博士在那些题目中重点帮助研究的题目。

您刚才讲得很对，就是中国要加快发展步伐，必须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在利用国外商业贷款方面要更大胆一些。但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在贸易、旅游以及劳务出口方面的外汇收入。最近世界银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情况的第二次调查报告正在征求意见，准备定稿，其中就谈到了中国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国外商业贷款方面过于谨慎。如果博士没有读过这篇报告的话，我可以随后给您送去。

吴：我很高兴能读一读这份报告。

赵：我国的外贸工作有两个问题，都希望吴博士能够加以研究。第一个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的国情应采取什么方针发展出口。第二个是外贸体制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对各个领域都有一些设想。我们的方针是一步一步地走。近几年我们外贸体制的两次改革却都不够成功。主要问题是，如果沿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势必造成工贸、技贸、国内生产与国际市场的严重脱节；但实行地方和企业分散经营，则又两次出现了国内一些地方和企业互相竞争，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的现象。究竟哪些要集中，哪些要分散，什么条件下集中，什么条件下分散，我们缺乏经验。现在我们初步认识到，必须在完善经济手段和行政管理措施（即税收、价格、汇率、许可证等），搞好宏观控制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分散经营。这两者必须同步进行。同时，还要加强经济立法和执法。

关于出口战略，我不想多讲了，吴博士比较清楚。我只说一点，就是

赞同您所提出的大力发展旅游业（我国近几年的劳务出口也有较大增长）。世界银行的第二份调查报告中，对中国机械产品出口前景的估计比我们自己看得要乐观些，认为中国要多发展这类产品出口。

为了帮助吴博士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想把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向您简要介绍一下。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出现了高速度增长的情况。去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总产值比前年同期增长 18%，而今年 1-4 月份的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 24%，这种意外的情况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值得思考。我们经过初步分析，认为这种高速度的增长有正常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多；开放和改革使企业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材料、能源生产形势很好。我们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是在电力年增长 8% 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在节能上也做了许多工作。还有农业连年大丰收。这些因素都是正常的，是要长期发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前几年国家积存了一些外汇，去年下半年各地用来大量进口原料、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我这里也想请吴博士帮助研究一下，如果博士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要讲的话，我很想听一听。

吴：这是一个很大而且是很复杂的问题，我有些意见曾经与谷牧先生和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sup>+</sup>先生谈过。我想，仅仅在中国进行了两周的考察，就向您谈论这些复杂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冒险”，我不想“冒”这个“险”。（众笑）

赵：吴博士到中国来帮助我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我们中央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非常欢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中新两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不能照抄新加坡的经验，吴博士还要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在这方面可以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帮助，您需要哪些方面的材料尽管告诉我们，我们将尽力提供。目前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我们可以提出“七五”计划纲要，当然还不一定是最后定稿。届时我会送给您，征求您的意见。

最后，请吴博士转达我对李光耀总理的良好祝愿，欢迎他在今年九月第三次访华。我期待着同他在北京会面。

吴：感谢赵总理对中国形势所做的精辟分析性的介绍，并明确了我们应当做哪些工作，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中国的机构也很复杂。（众笑）所以我需要花一段时间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新加坡人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能够成功，并希望能为此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 注 释

1. 吴庆瑞(Goh Keng Swee, 1918-2010)，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祖籍福建，伦敦经济学院博士。新加坡前副总理，开国元老之一。1985年被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

2. 李光耀(Lee Kuan Yew, 1923-2015)，新加坡华人，开国元老，祖籍广东大埔县。时任新加坡总理，后任国务资政，内阁资政。

3. 韩克华(1919-2003)，河南南乐人。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曾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副主任。

4. 魏玉明(1924-)，山西榆社人。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任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局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兼外资管委会副主任。

# 对国家科委抓一批 “短平快”科技项目<sup>1</sup>的批语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利益的事业。农业结构改造不发展乡镇企业不行，发展乡镇企业不依靠科技不会有前途，两者结合将可能闯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因此应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已过半年，可增拨一千万元先开张，明年从科技费用中自行解决。外汇可请计委适当照顾，但不能多。今后应主要先用在国内的科研成果推广上。

## 注 释

1. “短平快”项目，指科技商品化周期短，与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应用科学技术，取得经济效益快的技术开发项目。后来，国家科委对这类技术开发项目命名为“星火计划”项目。

# 积极开拓技术市场\*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看很好！我们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技术市场，因此生产需要技术的信息，科研单位不知道；科研单位新出来的成果，生产单位不知道。通过技术市场这个媒介，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沟通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同时，科研单位通过技术市场了解生产单位的需要，科研就有了方向。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推动了科研。有了技术市场这个形式，这种场所，可以使生产和科研单位的潜力都释放出来。

---

\* 这是赵紫阳参加《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时的谈话。



# 要保证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目前在全国减缓速度的时候，同时应注意解决一些名牌产品的材料供应。有一种可能必须防止：效益好的、名牌产品、骨干厂子，因材料不足，或材料价高消化不了而减少生产；乡镇企业、落后企业、质次产品则速度有增无减。

今日，上海陈国栋同志谈到：一方面上海货供不应求，一方面材料十分困难。因此应研究点办法。办法之一，就是由中央掌握的材料（包括进口的材料）要支持上海及其他类似地区。为此，年度计划中原来定的材料（指令部分）分配，可以予以调整。请酌！

---

\* 这是赵紫阳写给张劲夫、吕东的一封信。

# 接见“中国面对未来”国际研讨会 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这次会议将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探讨，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空前规模的国际研讨会。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对发展中外经济、金融合作有重要作用。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要认识和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了解对中国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基本政策，也就是两个基本国策。第一，中国已经确定，不仅在本世纪末，而且一直到下一个世纪，中国将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现代化”，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做不但能使我国的经济得到发展，也可使我国的政局长治久安。第二个基本国策，就是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持改革。这一政策可以保证四个现代化顺利进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开放搞活、改革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只能是越来越开放，不会收缩或中途改变。

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问题，刚才查尔方特<sup>1</sup>勋爵提到了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我可以告诉朋友们，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比预料的要好。“六五”计划的实际增长超过计划。过去的口号是保四争五，现在看来可以达到8-9%。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七五”计划可以继续以7-8%的高速度发展。也就是说，第一个十年（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〇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可以翻一番，比原来设想的要快。原来想第一个十年不可能翻一番，如果第一个十年翻一番，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更有把握了。不久前，我国召开了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我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宜过高，应当是适当的高速度。报告后，我注

意到这个提法在国际上引起一些议论，有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问题，又要进行调整。我可以告诉朋友们，这是不会的。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增长快了些，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为 23%。我们认为这样的速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搞一个“适当的高速度”，但这还是高速度。我们现在不是要调整，而是要把中国的经济建设纳入正常的轨道。这样做不会影响我们的对外关系，这一点请朋友们放心。

我刚才之所以向朋友们讲了我国搞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以及现在和今后的经济形势，是为了说明国外金融界、经济界、工商界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前景是非常好的。他们可以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大有作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还缺乏经验，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太理想，经济立法也不太健全，朋友们对此有些担心和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朋友们从长远看问题，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立法正在逐步改变和完善。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金融界的朋友，我们非常重视同外国的金融界发展合作关系。我们需要为四化建设筹措资金。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但缺乏资金、缺乏技术。我们愿意发展银行之间的合作，因为金融界的合作是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桥梁。银行除了搞信贷业务外，还可以提供咨询，探讨各种合作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信息，介绍客户，培训人员等。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银行的改革也很重要，希望朋友们给予帮助，发展这方面的合作。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是得到中国政府全力支持的。中国银行是我国同外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渠道之一，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我们希望看到中国银行与外国金融界合作得到发展。

## 注 释

1. 查尔方特 (Lord Chalfont, Alun Gwynne Jones, 1919- )，时任英国上议院议员，勋爵。曾任英国工党政府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

# 听取四川省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当前关键是农贷资金不要花在其他方面去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80%以上是用贷款嘛！（田纪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是两个控制，一个满足。即：一个是银行货币投放要控制在指标以内，一个是贷款要控制在指标以内，这样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就可以满足。）

去年货币回笼很不理想。今年的货币回笼，不能说与去年持平或同期相比就好。去年光中国银行就花了外汇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20亿元，去买商品。商品那么多，但回笼的货币比去年多不了多少。去年多发了100多亿元票子，引起物价上涨，人民担心。为什么说物价上涨，就是票子发多了，基本建设规模大了，人为地造成了紧张。为什么资金紧张，原材料紧张，归根结底，就是计划大，需求高，速度快了。对这个问题，全国认识不一致，没有一个省说它票子不紧张，没有一个省说它速度不正常，没有一个省说它回笼货币不好。这样全国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如果我们的经济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是要吃大亏的。我们没有条件把速度搞到20%以上。

现在的所谓高速度，一是把这几年节余的外汇用去大量进口原材料和消费品，二是银行大量发票子。没有这两条，就没有这样的高速度。一句话，就是需求过高。这样搞下去是维持不住的，到一定程度是要爆发的。一旦爆发，就要产生连锁反应。我们省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明确的认识。现在说法很多。有人说，我这个地方刚刚才开放你就紧缩银根，怎么开放。实际上讲开放就要外汇，就要进口东西。西南、

西北的同志说，他们那里起步晚，建设速度慢，刚刚要上，你就要收缩。当然，民族地区要照顾。但这样的搞法是不行的，结果总有一天大家要倒霉。我这样讲，你们思想不一定通，但通不通都要顾全大局。

我这次访问西欧时，一些懂得经济的领导人都为我们这样搞法担心。主要是我们自己把需求搞得太高。现在到处喊票子少了，实际上今年发的票子比去年多得多。（田纪云：日本小林实过去鼓吹中国经济发展正常，最近变了。他的观点有三条：一是银行没有货币发行权，二是贷款必须讲效益，三是必须有还款的保证，但中国没有保证。这三个观点都值得我们考虑。）

为什么在全国人代会后，我们立即召开省长会议，集中到一点，就是速度过高。要求要把速度降下来，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材料，没有那么多能源，没有那么多票子。但是，在省长会上对控制基本建设讲得不够。今年全国 1300 亿元下不来，实际上要 1400 亿元，也可能还下不来，所以要下控制指标。

建设银行出了乱子，多投了 80 亿元。我们国家管得太多，但对许多又管不住。西德战后，其他放得较宽，但控制货币非常严格。这次汉堡市长施密特在我离开时对我说：货币供应要注意哟！里根的政策也是控制票子。英国的失业人员多，闹得那么厉害，撒切尔夫人坚持不改变政策，仍然要控制票子。我们不能完全像他们那样搞，但是像这两年那样发票子，是自食恶果。我在省里工作时，也是经常找银行，要他们支持生产，压银行。美国政府是不干预银行的，但我们各级政府都可以随便干预银行。

为什么去年发生问题，过去财政和银行是一个体系，财政管银行。去年体制改革，银行成了单独体系，有中央银行，有各专业银行，中央银行管发票子，专业银行管贷款。专业分行放活了，只考虑自己业务，拼命放贷款，而中央银行就管不住，出了一点漏子。改革对不对，还是应该改的，但不配套。（田纪云：现在不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没有积压，都很畅销，这说明票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一句话，需求太高了。大家都感到票子紧，是在 20% 以上的高速度的基础上要求票子的，当然货币不够。今年第一季度，商品消费量增长 32%，生产适销对路的只占 23%。就是说，水不够加面，面不够加水。说穿了，就是把前几年积蓄的外汇，用去进口钢材和木材，不然全国的日子过得去吗？

票子发多了，物价就要上涨。总之，靠发票子把经济搞上去，是不行的，靠不住的，这没有多少理论。我们不懂，说明无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导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 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要有新思路\*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

## 一、关于蔬菜生产

大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牵动每家每户。蔬菜的种植面积要落实。从长期看，近郊菜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衔接好，不能脱节，要有个安排，有个步骤。一些细菜可以搞塑料大棚，近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学习荷兰，小面积搞些园艺生产，产量很高，也节约土地。

蔬菜放开后，供应近郊菜农的口粮，没有执行倒三七价格<sup>1</sup>的，可以继续供应一段时间平价粮看看。已实行倒三七价格的，也不要变回来。这部分差价款，中央不收回，怎么用，由市里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自己决定。

## 二、关于鼓励外地蔬菜进城

我到武汉和保定，两家都有反映。一是湖北的莲藕进不了北京，他们那里一毛多一斤，北京三毛多一斤，但是不准进北京。二是保定的菜进不了北京。保定历来是种菜供应北京的。北京要把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蔬菜基地。可以和外地签订合同，如张家口的土豆，廊坊、保定的大白菜等。北方和南方不同，南方一年四季生产菜，但他们吃得细，要求高，成了习

---

\* 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研究城市蔬菜供应问题时的讲话。

惯。北方淡季长，吃菜习惯比较简单，有几种大路菜，就可以解决好几个月的吃菜问题。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只靠近郊不行，还要和远处挂钩。将来能不能由地方上到这里办些货栈、商社，比如保定或廊坊地区来京办。大城市搞活完全靠小商小贩不行，要组织地方公司进大城市，有些地方以地区为单位，近的也可以县为单位进城。这比单由大城市到地方上收购方便，矛盾也少些，也比小商贩好管理。这样一搞，城乡就疏通了。城市里的国营商业主要掌握批发环节，进货的层次可以减少。但也要掌握一部分货源，调节市场。

### 三、关于蔬菜价格

前些日子，北京菜价上涨，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应。大城市的蔬菜比什么问题都影响大，一定要谨慎。现在已经放开了，要坚决放到底。万一出点问题，国家出点钱稳住，不要再走回头路。经营环节亏点钱，不要再补给消费者，逐步理顺关系后就好了。

### 四、关于国营蔬菜公司的经营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国营蔬菜公司经营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国营公司应该怎样工作，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国营公司第一要学会按照市场价格参加竞争；第二要服从整个宏观经济的利益，包括平抑物价等。现在国营公司一种情况是采取消极态度，也缺少货源，造成经营萎缩，市场缺乏领导。另一种情况是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国营系统占市场绝大部分，不考虑供求关系，价格还是死的，没有搞活。国营公司通过吞吐，平抑物价，应是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基本上不赞成主渠道的提法，应当讲对市场起领导作用、主导作用。讲主渠道，就必然造成垄断。如果长期是国营公司占主渠道，国营公司占市场比例很大，市场就活不了。国营公司占到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放开就是空话。当然，弯子不要转得太陡了，否则容易出问题。总之，一个大文章是在两三年内真正使国营公司的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既按宏观经济的要求对市场起



领导作用，又不排斥别人。总的讲，将来国营商业要起批发作用，不要在市场上占到绝对的优势，平时经营额可少些，以利于把市场搞活。但必须保持合理的库存，要抛即抛。这是个大问题，对国营公司既是个新的考验、新的促进，也是个新的课题。国营公司由国家核定合理库存，贴给利息。

将来国营公司能不能划小核算单位，独立经营，服务设施出租(刘毅：商业、服务业负担太重，平均两个人养一个退休职工，有的一个半人养一个退休职工，承包比较难。有的地方免征蔬菜企业营业税，解决了退休人员的经济包袱)。免收营业税是否解决退休人员的开支问题。可以考虑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企业免缴营业税后自己养退休人员，这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可能影响以后的改革。另一个办法是用营业税去解决退休人员问题，这样有利于改革，将来要走这个路。当然，已经免了的，也不必再恢复。

## 注 释

1. 倒三七价格，是指当时国家定购农民粮食实行的合同定购价格，其作价方式是30%按粮食统购价格计算，70%按粮食超购加价计算。因这种综合比例价格以粮食统购价为基础且只占30%，故称倒三七价格。粮食超购加价系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提高了20%，为鼓励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多出售余粮，其超售粮食的价格在已提高统购价的基础上再加价50%。

# 对《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 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各同志一阅。三位同志的报告<sup>1</sup>切中时弊，这也是我们经常强调而始终落实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在机械制造业存在，其他行业都存在。但为了有所突破，还是首先抓住在机械行业中贯彻。过去所以落实不了，主要是抓得不狠，缺乏一套检查、监督、协调制度，对各部门出于本身利益而常常相互矛盾，缺乏及时权威性的仲裁，致使许多问题我行我素，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目前中央特别强调质量问题，对外技术引进的用汇额也将有所削减，如何加强工厂管理，技术引进中如何技贸结合、节约外汇，更显得重要。此事请周建南同志牵头，同有关部委认真研究提出贯彻措施。

## 注 释

1. “三位同志”是指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王传善、国家计委机电局王洪太和国家经委机电局倪益瑾。他们随机械部超高压输变电设备考察团访日后，共同提出了《关于提高我国机械工业水平几个关键问题的报告》。

# 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同志们：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邀请我出席这个大会，和大家一起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你们，全国的教师们和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礼！

全国人大常委决定九月十日为中国教师节，表明了我们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敬。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可以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的过程中，他们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广大教师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振兴，就不可能培养出大批的、高质量的四化建设人才，就不可能真正提高我们全民族科学文化的素质。那样，我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四化的成败，祖国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和教师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全党、全国、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在整个社会形成强烈的尊师重教的社会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

我们的教师既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又是社会主义精神风尚的传播者。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四化建设培养出又多又好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

\* 这是赵紫阳在北京师范大学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等师范学校。它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全国的高等院校，对整个教育战线有着重大的影响。希望同志们发扬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它越来越好，蒸蒸日上。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 实施分税制改革给田纪云同志的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纪云同志：

税制问题，可否从明年起开始实行（或部分省试行）中央、地方划分税种的新体制，为此，相联系的税制方面是否还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改善？之所以说明年起，就是从“七五”计划开始，不知准备工作是否跟得上去？

致礼

请酌！

赵紫阳

九月十三日

# 对《关于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情况报告》<sup>1</sup>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报告很好，会议也开得好。加强沿海与三线横向经济技术联系，对加快我国建设，提高内地工业技术水平，支持沿海实行开放政策都有重大意义。请计委、经委联合开会讨论一次这个报告，大力予以支持，把沿海、三线横向联系搞活起来。

## 注释

1. 指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持召开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后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

# 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精简机构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可印发仲勋同志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志、中组部尉健行同志参阅。贺光辉<sup>1</sup>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机构改革设想和大体步骤，我基本同意。总之，机构改革必须建立在机关职能的改变上，不然仍然是老路重复。因此，机构的裁并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

## 注 释

1. 贺光辉（1929—），陕西清涧人。曾任一机部研究院副主任，国家机械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全国供销社监事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副主任。

#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所作的开幕词。现在，我受党中央委托，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几点说明。

## 一、文件的性质和特征

这个文件是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持下，经过一年多来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它还不是“七五”计划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它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一、“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and 奋斗目标；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这些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改革设想，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在起草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

---

\* 这是赵紫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它将有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经济工作的大的矛盾上面，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编制“七五”计划和我国以后的中长期计划，都要这样做。这个《建议》经这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以后，将由国务院据以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然后提请明年春天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

## 二、当前的经济形势

正确估计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依据。对形势的估量，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估计，估高了不好，估低了也不好，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如实估计。《建议》既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建议》指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作出这个论断，主要的事实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农业生产从缓慢发展走向全面高涨，轻工业生产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走向日益繁荣，能源生产从停滞不前转为持续增长，各项建设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看经济形势，主要看重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看经济能否以适当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几年总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在整个“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十。在编制“七五”计划时，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多方面测算，看来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百分之七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超过百分之七。在这样长的时期连续保持百分之七、八乃至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有的，只有某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才出现过类似情况。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活力越来越旺盛。现在的情况，与一九八〇年底我们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解决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主要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当前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作为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的重要

阶段，今后将开始由温饱型逐步转向小康型，使我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种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改变了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收入连续下降、存在巨额赤字的情况，近几年在收入大幅度增长、支出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保持了收支基本平衡。前两年虽然还有些赤字，但数额较小，今年有可能做到消除赤字。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有少量财政赤字，影响不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要依据。今年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达到一千七百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总数将达到三千亿元以上，比一九八〇年增长将近一倍。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增强了。

我们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基本实现，并不是说已不存在问题和困难了。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物价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和还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解决新任务和新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而努力奋斗。

### 三、“七五”时期的任务

概括地说，“七五”期间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二、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这三条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不改革，就没有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

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为了给改革创造好的经济环境，我们一定不能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脱离国力的可能盲目扩大建设规模。但是，也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加强工农业基础设施，使经济发展有后劲，使人民的实际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增加。

“七五”期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在保持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作一些小的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这样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由于刹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但分散在两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也可能控制不住。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特别加以注意。“七五”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这是多年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改革也大体上参照这两个阶段来安排，这样做比较积极稳妥。

#### 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要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and 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坚决地、有步骤地展开。过去几年，在

放开放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也就是说，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完善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必须认识，从宏观上加强间接控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比之微观搞活，比之直接控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我们也更缺少经验。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与现在已采取的改革措施配起套来，并为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积极反应。在“七五”的前两年，改革的重点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控制体系。除了必须采取的某些价格改革措施以外，应更多地利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要抓紧制定一批经济法规，建立和加强经济监督、经济信息系统，加强银行、税收、审计、统计、质量检验、工商管理和社会公证等部门的职能。与此同时，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要下大力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搞活。除了引导企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继续落实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外，当前还必须注意分别不同情况适当调减它们所负担的调节税，减少局以下公司等中间层次，制止向它们乱摊派、乱集资，减轻它们的负担，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能使这些骨干企业越搞越困难，而应当使它们越搞越有活力。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七五”后三年，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间接控制，认真搞好生产资料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的改革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要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鼓励探索，鼓励创新。这里必须指出，减少直接控制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程度和步骤，应当同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互相适应，互相配套。

## 五、“七五”期间生产建设的两个关键

“七五”期间要为改革创造好的环境，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准备后续力量，又要改善人民生活，矛盾很多。解决这些矛盾，关键有两条：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

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开辟国家财源，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职工生活，出路就在于把这种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我国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七五”期间应当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改进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更加现实的意义。“七五”期间，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和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搞好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和企业各方面的素质，真正把企业的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使全体职工和干部明白，为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而奋斗，就是实现“七五”计划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七五”期间我们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形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将不是短期的。我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程度如何，决定于自己的创汇能力如何。开放不能只进不出，必须有进有出，进多少取决于出多少，出得多才能进得多。“七五”计划能否实现的又一个关键，是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要认真研究和制定外贸出口发展战略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充分发挥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的的作用，带动内地，发展更多的重点出口商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在增加出口的同时，要努力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偿还能力的增强，要适当地多利用一些外资，包括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我们既要学会创汇的本领，又要学会用汇的本领，使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提高效益和增加创汇是互相联系的，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企业的素质上，使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上水平、求发展，使产品经受国内外市场的检验，不断更新换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第七个五年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坚决做到：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它腐朽思

想的侵蚀，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一切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对于一切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必须予以制止和取缔；三、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疏导即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能重犯过去“左”的错误。在经济领域中，要大力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企业信誉，实行文明经商，文明办厂，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抵制各种歪门邪道和腐朽的经营作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坚决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

同志们！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做好这五年的工作，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对于更好地保证九十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满怀胜利的信心，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 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姚依林、宋平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过的，我都同意。这里，我集中讲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全局、关系“七五”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 巩固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关键所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了估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问题是，这种好的形势，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应该说有两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搞得不好，这种形势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搞得不好，已经出现的好形势，也可能重新遭到破坏。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坚决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逐步做到基本平衡。

一九八〇年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年年都讲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八一年到八三年比较好，三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56 亿元。但去年以来急剧上升，一年增加了 464 亿元，社会总规模达到 1833 亿元。今年增长的幅度预计不会少于去年，社会总规模将达到 2300 亿元以上。这就是说，八四、八五两年每年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都相当于前

---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年增加的总和。从总规模来说，五年翻了一番半。到八四年底，在建工程计划总投资数已达 6178 亿元，加上材料设备涨价和概算超支等因素，实际需要总投资达到 7400 亿元，除已完成投资 3400 亿元外，要完成这些工程还需要 40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的国力，而且还有继续膨胀之势。从投资的构成看，国家预算外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预算内投资的增长；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全国重点项目；非生产性投资和加工项目投资比重上升，超过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幅度。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又不合理，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再不下决心，就定会贻误大事。

### 历史的教训

建设规模是否安排得合理，是否同国力相适应，是经济能否稳定的一个重要界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实践所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建国以来几次经济上的大折腾，都是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分不开的。第一次是 1958 年到 1960 年 3 年“大跃进”，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0.2%，积累率由 1957 年的 24.9%，上升到 1960 年的 39.6%。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0 年，一年内投资总额增长 49%，以后几年积累率大都维持在 32-34% 的过高水平上。第三次是 1978 年，投资总额一年增长 22%，积累率达到 36.5%。这三次大的投资规模膨胀，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发生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都造成了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生活全面紧张，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不是几十亿元，而是上百亿、上千亿元。这种大上大下，使经济发展走了弯路，延缓了经济建设的进程，其影响之大难以计算。

还应该看到，过去几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大膨胀，带来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发生的。虽然通货膨胀，但物价基本上是冻结的，商品不够就靠凭证供应，或者有价无货。现在正在进行改革，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再发生那种问题，结果必然是物价的全面上涨。南斯拉夫今年物价上涨的幅度达到 70%。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迄至今天一直



是好的，物价上涨的幅度不超过10%，意见已不少。设想一下物价上涨不说70%，就是30%，哪个地方能承受得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成为政治问题了，改革肯定搞不下去。

从国外的情况看，投资规模膨胀，或者叫做“投资饥饿症”，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通病。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放了权，而宏观控制的有效手段尚未形成，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例如，波兰进入7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积累率从60年代平均的25%左右猛升到30%以上，1974年达到317.3%，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恶性循环，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大量扩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是造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斯拉夫从1976到1982年间，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四倍，而且项目多，建设战线长，以致加剧了财政经济的困难。苏联和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投资膨胀的困扰。

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经济上出纰漏、栽筋斗往往发生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几经曲折，但我们总是难以真正接受教训。每当形势好转，就容易忘掉这个教训，又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规模铺得很大，直到搞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过来个大调整。这似乎形成一个忽冷忽热、忽上忽下的周期。这里，固然有经济机制、建设方针等方面的原因，但首先必须解决认识问题。

##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害处极大

我们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绝不是没有根据的推论，而是因为基建规模过大，的确是引起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消极因素的症结所在。现在看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所造成的恶果，可以列举以下几条：

一、投入多，产出少，工期长，效益低。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超过了资金和物资供应的可能，必然拖长建设周期，不可能早竣工、早投产。1981年我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6.6%，去年下降到71.8%，今年1至8月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又由去年同期的24.7%，下降为16.8%多。建设项目投产率，由去年同期的12.1%，下降到11.7%，其中大中型项目投产率由2.2%，下降到1.7%；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由14.9%，下降为

12.9%。据 169 个大中型项目的调查，原计划平均工期为 6 年 3 个月，从目前的进度来看，预计将比原计划延长近一半的时间。工期拉长，造价也就相应增加。有些项目虽然建成了，由于前后左右不配套，长期不能发挥效益。还要看到，由于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过多，挤掉了生产、流通所需的营运资金，使现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我国的资本系数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历来都比较高。日本为 2.8，南朝鲜为 2.7，我国前几年为 4.4，去年以来又有某种程度的上升。

二、严重影响重点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建设摊子过大，资金、材料跟不上，形成了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一般项目挤重点项目的现象，使本来已经紧张的能源、交通、材料等更加紧张。今年 1 至 8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能源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 23% 下降到 21%；交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 16.6% 下降到 14.4%。从整个“六五”期间看，基本建设投资中能源、交通建设投资的比重，计划要求从“五五”时期的 35.8% 提高到 38.5%，实际执行结果预计只能达到 34.9%，比“五五”时期还下降 0.9%。“六五”期间，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重，预计也将由“五五”时期的 18.5%，下降到 14.7%。这几年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虽然投资额增加了，但必须看到它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各地方都去保自己的项目而挤重点建设，这种情况，从长远来说，对扭转能源、交通、材料短缺的被动局面是不利的。

三、妨碍技术进步。热衷于铺新摊子，必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上。“六五”计划要求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应达到 36%，据统计局预计，实际只能达到 30%，而且，这五年的更新改造投资中，真正用于更新改造的，又只占其中的 54%。从工程内容看，相当大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增加生产能力，而能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发挥作用的投资只占 17.4%。究其原因，仍主要是基建投资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或挪用更改资金搞基本建设。这样下去，极不利于在经济建设上贯彻从外延为主转到内涵为主的方针极不利于贯彻充分利用原有企业和原有工业基地，以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为主的方针。

四、破坏信贷收支平衡，带动物价上涨。据人民银行分析，去年由于投资规模扩大而增加的现金支出近 100 亿元，占全年增发货币量的 38%。今年 1 至 8 月，基本建设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41.9%，其中国家投资只增长 6.1%，而使用的银行贷款增长 129.8%，自筹投资增长 94.6%。这都要多发票子。票子多发了，信用膨胀，物价就会上涨。首先是刺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984 年“三大材”价格平均比上年上涨 9.6%，机电设备上涨 20%。目前议价钢材每吨已由去年的 1200 元涨到 1800 元左右。生产资料涨价，还会把消费资料的价格带上来。今年对物价问题，不少人议论纷纷。我看问题不是出在改革上，而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速度要求过高上。

五、大量进口原材料，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我国的外汇有限，本来主要应该用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但基建规模一大，加上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使国内需求膨胀，超过了国内物资供应的可能，就不得不把有限的外汇大量用于进口原材料、组装件和其它高档消费品。这几年钢材的进口量直线上升，1982 年为 394 万吨，1983 年为 978 万吨，去年为 1331 万吨，今年预计 1900 万吨，相当于国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木进口量也从 1982 年的 470 万方，增加到去年的 790 多万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不仅耗用大量外汇，而且由于刺激国内的需求，使出口不如内销，严重影响了出口物资的收购和创汇任务的完成。一个进口耗用外汇大量增加，一个出口上不去，收汇减少，结果就是外汇收支逆差扩大，国家现汇结存下降。照此下去，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难以持续下去。

六、削弱企业的活力。许多地方为了多上项目，除了盯着银行要贷款外，主要是以各种名目向企业乱集资、乱摊派。据锦州、石家庄等地的调查，各方面向企业集资摊派的金额占企业留利的 8% 至 10% 左右。其中大型企业负担最重，人均负担 375 元，中小企业人均负担 307 元，集体小企业人均负担 84 元。有些企业被摊派集资的金额甚至超过企业利润的总额，不得不借债缴纳。企业从扩大自主权、搞活经济中得到的好处，被四面八方伸手挖去了。这样下去，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就会陷于缺乏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能力的困境，越搞越破旧，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振兴。

七、助长各种不正之风。百废俱兴，需求膨胀，人为地造成物资的短缺，已经出现的买方市场，又会变为卖方市场。萝卜快了不洗泥，提高产

品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树立良好的经营作风，都会成为空谈。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弄虚作假，以次充优，等等，从经济原因来说，也是与此分不开的。

八、造成积累率过高和消费需求膨胀。根据我国长期的经验，积累率以不超过30%为宜。1978年积累率曾高达36.5%，经过连续几年的调整，1983年降低到29.7%。但1984年投资规模膨胀过多，积累率又升高到31.2%，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上升。积累率过高，还会刺激消费需求的膨胀。据统计局测算，每增加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直接间接增加消费需求4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规模过大，将引起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再次失调，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央、国务院从今年初以来，就一再提醒各地注意纠正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度。它不仅大大超过了能源、交通、原材料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而且人为地刺激了社会需求过分膨胀。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只能带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外汇收支恶化的后果。而社会需求的膨胀，原因就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因此，解决经济发展超高速度的问题，釜底抽薪的措施，就是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猛。

总之，集中到一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就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也不能稳定，甚至大起大落，被迫再次进行大的调整，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 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当前，我国整个经济形势很好，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虽然与历史上几次投资规模膨胀在性质和程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但绝不能等闲视之，以免酿成大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只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建设规模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中央的方针能否变成自觉的行动，采取的各项措施能否认真落实，首先要把我们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

我们过去的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过“左”；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要求过急，带来了重大比例失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一个问题解决较好；而后一个问题在干部认识上还没有真正解决。有几种思想认识，需要加以澄清。

一是“百废俱兴，全面大上”。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很高，都想多搞一些建设，多上一些项目，使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得快一些，这种心情和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国家的底子还是比较薄弱的，一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不过几百亿元，除了保证新增人口的需要和人民生活还要改善之外，能够用于增加基本建设的资金有限，加上借用一些外资，数量也不会很多。形势大好，不能成为一哄而上的理由。如果什么都要大上，国力肯定承受不住。即使一时上去了，最终还是要退下来，导致大批建设工程下马，大量施工队伍窝工，给整个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

二是“你长我不长，只能切你，不能切我”。这是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特殊，不积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又一借口。应当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投资规模过大，不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带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据调查，今年1到8月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银行贷款投资超过了国家计划控制指标，其中有12个地区超过70%以上。这种情况说明，控制投资规模是各地区和各部门共同的任务，应当忍痛下刀，把全国投资总规模压缩到合理的水平上。首先是要压缩，要控制，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根据轻重缓急，区别对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各个地区和部门都指望只砍别人的，保留自己的，过大的基本建设总规模就不可能压缩下来。这里有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有些项目，从地方、部门来看是合理的，但从全局看就不一定合理。有些项目从全局看也是需要的，但目前无此可能。小合理应当服从于大合理，全局活不了，局部也活不了。

三是“我们管微观，中央管宏观”，“放活是自己的事，控制是中央的事”。宏观上管住管好，微观上放开放活，是互相联系、互相配套的，既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事，也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事。宏观不管住，就会一放就乱；微观不放活，就会一管就死。宏观控制措施如果在微观上不发生

反应，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实践和探索，逐步建立起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新的宏观管理制度和微观自我调节机制，走出一条新路来。

这次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猛的问题，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好处是可以避免损失和震动。缺点是分散在两年半的时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可能会控制不住。这一点，拜托在座各位，务必抓紧，按照计委的方案，坚决压一批，缓一批，保一批。否则，势必被迫再来一次急刹车。这件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无非是大彻大悟，下决心少搞一点基本建设。与其将来又大调整，不如现在开明一点，少搞一点。基建规模搞大了，形势就要逆转，少搞一点，与国力相适应，形势就会发展。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新班子上台，希望你们在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上露一手，千万不要在扩大基建规模上露一手。

我们既要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出路在哪里？我看很可能逼出一条路子来，使大家集中力量抓改革、抓效益。一是要大力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把大中型骨干企业进一步搞活，提高经济效益。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要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突出地抓管理，抓劳动纪律、规章制度。这些基础工作不抓好，设备再先进也不能发挥作用。各级干部应当钻进去，学会经营管理，变成内行。二是要搞好出口创汇，千方百计增加出口，并增加旅游、劳务承包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多为国家创汇。这里只是提出这个任务和课题，希望从中央、国务院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把大上基本建设的兴趣转到这两方面来，切实在这些方面动脑筋，下功夫，抓好这两件大事，使“七五”期间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好、更健康。

#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十六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的前夕，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临今晚招待会的各位来宾和各国使节表示热烈欢迎，向同情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举国共庆的时刻，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为振兴中华而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各族人民，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工作人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年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预计可以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我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在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切实加强经济的宏观控制，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今年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扩大出口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工资制度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增强横向经济联系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已经开始。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决地、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包括太空军备竞赛。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仍需警惕，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越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同第三世界各国一道，为争取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而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为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努力。

刚刚胜利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是我党历史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连续性和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对于保证我党今后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  
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四化宏图的早日实现，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和平和发展，  
干杯！



# 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批示\*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杜润生同志：

乱建房修房，每天都在减少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在这个无政府主义问题上，不及时注意必将酿成大的问题，给后世留下大灾难。请考虑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山东各地乱占滥用耕地的情况严重》一文的批示。

# 给《李约瑟文集》的贺词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李约瑟<sup>1</sup>博士致力于中英友好，悉心研讨中国科技史，成果累累。在他八十五岁高寿之际，《李约瑟文集》在中国刊行。这是很有意义的，谨致祝贺。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 注释

1.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英国近代生物学家和科技史专家, 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 皇家学会会员, 学术院院士, 中科院外籍院士, 著有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对现代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影响深远。二战时期曾任英驻华使馆科技参赞, 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 英中友好协会会长。

#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主席先生：

联合国诞生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俱增，是少有的。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一样。我们在这里举行盛会庆祝联合国的生日，就是为了重申它的宗旨，加强它的职能，期望它今后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和平等合作的世界，是人类共同愿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也在各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 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召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派出赵紫阳总理率代表团出席有一百多个会员国参加的盛会。赵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平等合作的世界的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的这一重要发言，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和欢迎。

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新的世界战争虽未发生，但局部性的热战和东西方的冷战时断时续。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而侵犯主权、武力征服的事件仍然屡有发生。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而强权政治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作用。种族隔离制度虽已遭到举世谴责，但南非当局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人类创造的财富有了无数倍的增长，南北之间的贫富鸿沟反而更加扩大。军备竞赛吞没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亿万男女和儿童继续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线上挣扎。总之，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对抗、动乱和冲突，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和令人忧虑的现象。

联合国确定把“争取美好世界”作为纪念它成立四十周年的主题，是符合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究竟什么样的世界才能算是美好的世界，对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来看，一个美好的世界，离不开和平，离不开发展，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合作。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遗憾的是，战后四十年的历史，恰恰是东西方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历史，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战争危险并未消除。为了保障国际安全，防止战争，东西方之间应当消除对抗，缓和气氛，发展关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都应当和平共处。每个国家都应当承认其他国家人民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以维护自己的安全为借口，而损害别国的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应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手段。可能导致冲突的国际争端，是世界和平的隐患和局势动荡的因素，有关方面应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安全的机构，联合国理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现在，摆在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共同任务，是要制止军备竞赛。不论是常规的、核的、地面的、太空的军备竞赛我们都反对。“威慑力量”也好，“恐怖平衡”也好，都不能确保和平，而必然会引起军备竞赛的轮番加剧。人们有理由要求两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率先采取行动，大幅度裁减其核军备，从而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创造必要

条件。我们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关注美苏两国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希望他们顺应世界人民的要求，真正放弃谋求军事优势，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协议，并付诸实践。

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少数列强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奋斗，世界和平是能够得到维护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避免的。

世界能不能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同人类能不能防止另一次世界战争一样，是人类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和重大历史性挑战。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的沉重负担和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地区的潜力，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但需要发展中国家本身作出艰苦的努力，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积极加强南南合作，而且应当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北合作。尽管四年前的坎昆会议进行了探索和努力，但全球性的南北对话迄今未能实现，南北关系的现状仍无多大改变。联合国应当认真对待这一重大问题，在金融、货币、贸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推进南北关系的改善。这对南北双方经济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联合国组织所赖以建立的基石。这种平等权利，不能仅仅理解为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它还应当包括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不受侵犯、内部事务不受干涉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世界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无视小国权利，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现象仍然存在。更严重的是，侵占领土、蹂躏主权的行爲尚未得到制止。联合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寓于所有会员国的平等之中。只有使弱者不受强者欺凌，小国受到大国尊重，才能使联合国充分发挥作用，使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清楚地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

务中的职能和地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一贯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主权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和平、发展、平等和国际合作的正义事业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热爱和平，中国需要和平。为了彻底改变长期落后的面貌，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中国希望同所有邻国和一切国家和睦相处，也愿意看到世界各国都能和平共处。中国以主动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反对军备竞赛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国外不建立军事基地、不驻军、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南北东西广泛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对于一切谋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中国永远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主席先生，联合国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它仍然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为了争取一个和平、发展、平等、合作的美好世界，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各国人民还要继续进行巨大的努力。让我们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奋斗，朝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前进。

谢谢主席先生。

# 给马海德<sup>1</sup>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马海德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知道中国麻风协会、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和麻风福利基金会即将成立，并将召开第一届麻风国际学术交流会，令人高兴。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为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而努力。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注 释

1. 马海德 (Shafick George Hatem, 1910-1988)，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医学博士，性病和麻风病专家。1936年到延安，1937年入党，1949年加入中国籍。时任卫生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 给中医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医研究院全体同志：

中医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祝同志们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我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宝山钢铁总厂，经过七年的建设，第一期工程终于胜利建成投产。这是参加宝钢建设的全体职工和外国专家通力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地区各部门各协作单位大力支援的生动体现，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丰硕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宝钢一期工程，是第六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它的建成投产，对于加强钢铁工业、支援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战斗在宝钢建设第一线的全体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宝钢建设中同我们友好合作的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宝钢建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宝钢一期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建设好第二期工程。我相信有了一期工程建设的经验，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外国朋友的友好合作下，宝钢二期工程一定能够建设得更好！

宝钢的建成，来之不易，但要管好宝钢，充分发挥它的效益，更非易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建设好宝钢，管理好宝钢，从高从严要求，使它成为国内和世界第一流的钢铁企业。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宝钢的殷切希望，也是宝钢今后的奋斗目标。

宝钢已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先进的经营管理，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队伍。今后，宝钢不仅应该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钢材，而且应该为我国钢铁工业输送掌握先进技术、擅长现代管理的优秀人才。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建成后的宝钢，应该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开拓前进，永葆青春。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宝钢全体职工，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主动迎接挑战，不断改革创新，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把革命老区建设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山东沂蒙山区在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的老战士、老干部和老区人民，为了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过去没来过，这一次留下深刻印象。今天，我借此机会向沂蒙山区的老同志，向在贫困山村扶贫致富的各级干部问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变化很大，有些地方有一些变化，但不明显。那些变化小的地方，往往是山区、库区、老区，往往是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地方，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中央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但还不平衡。

在路上，省、地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沂蒙山区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方面有些好的做法，开始有些变化。今天大家介绍的经验很好，很不错。山东省政府在这里现场办公，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时间虽不长，收效是显著的。我看，一个是领导重视了，从省开始，各级都重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增强了，干劲大了；一个是路子有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山区资源很丰富，只要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富的门路是多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商品经济，这就为发展山区经济，解放山区资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你们是走在前面的。我相信照这样走下去，办法会越来越多，路子会越来越宽，致富的步伐会越来越大，是很有希望的啊！我希望你们带个好头，创造出好的经验，为其他贫困村庄、贫困户起个示范作用。

---

\* 这是赵紫阳在山东临沂接见老红军、老党员、贫困村村干部和包点住村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 下大功夫把旅游基础设施和管理培训搞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

既要重视国际旅游，又要重视发展国内旅游。可以让农民搞一些低档的家庭旅馆，国家收税。一开始他可能搞得很简陋，一旦发了财就建房子，就改善设备，非常快。前年五月我在北戴河提过这个意见，看来他们是搞起来了。去年有两千个床位，今年差不多四千个，都是一家一户搞起来的。他们那个家庭旅馆简单得很呢。像这间大房子，至少可以摆八个床，啥也不管，就是睡觉，一个床收费两元多，一天就是十六元，一百天就是一两千元，第二年就可能建房，再有一年，再扩建一些设备。一个家庭搞，一个地方搞，比方说县啦、乡啦，投资搞旅馆，搞低档的，接待国内旅客。国内旅游也要重视。如果你只搞外国的，国内的不解决就会影响外国人。国内旅游不要轻视，这是一大批财源收入，薄利多销嘛！就说北戴河吧，有兄弟两个，盖了三层楼，本来是要自己住的，后来一看办旅馆可以，他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了旅馆，一百多个床位。东北有个什么单位全包了，一包包半年。他有钱了，就改善设备了，讲究卫生了，活跃了经济增加了地方财源。

有个外国朋友讲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觉得讲得有道理。他到我们中国，看到比较大的旅游饭店都与外国合营，他说这样做吃亏。为什么与外国合营？为什么不自己干呢？有人说自己没钱。外国人他也没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钱。咱们中国人过去没经验，总想与外国人合营，风险少些，还有个

---

\* 这是赵紫阳在曲阜听取山东省旅游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政策问题。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搞旅游是自费，华侨、华人、港商到国内来，别的他不干，就干饭店。为什么？他看准了。将来我们的饭店要自己干。设计可以和他們共同搞，干起来就自己建，自己拿钱，自己经营，经营不好，可以拿钱请经理。另外就像北京长城饭店那个办法，包给他们管。国外有一些专门搞饭店管理的，这个办法很合算。饭店管理国外有个网，它给你组织客源，帮你经营，经营以后它就抽多少。长城饭店一由西斯来芬集团管，马上客就满了。世界上有个大的旅游集团是管理集团，它不开饭店，就是搞管理，总部设在夏威夷，长城饭店与它签订合同，就委托它管。它花了一百万美元广告费，另外在夏威夷为它接管长城饭店开了个盛大的酒会，它有很多管理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客源拉上了。一个是请外国人当经理，一个是委托外国集团管理，你管理，我出资，签订合同，五年或者几年，学会了自己经营。与外商合资，他也是借钱，有一些是借的中国银行的钱。与他们合营，他到国外借款，钱尽他赚。吴庆瑞说，你要办旅游，没有钱我新加坡银行里可以借给你，你借多少都可以。这是个很严肃的事，不要很宽了。国内人民币为什么不行呢？没有材料、没钢材、没水泥，借的钱很多就要抢材料，就要物价上涨。我说是借自由外汇，不是政府信贷什么的。有了自由外汇，就可以进钢材，进水泥，也可以进其他东西，在国内换成人民币，用自由外汇搞饭店相当划算。国内外一部分人民币可以借，大量的靠自由外汇、商业贷款。商业贷款这个钱有好处，你不要投标，也不要买外国人的设备，可以倒换。可以进口化纤啦，进口一些高档的商品，在国内销售，这本身就是赚钱的，当然有些钱中央拿走啦，关税抽走啦，但还是不会吃亏嘛！将来这个外币还是有偿还能力的，旅游饭店还是有偿还能力的。但一些基础设施没办法偿还，像公路啊，现在可以捆在一起，看看除了偿还旅游饭店外汇贷款外其他项目还能不能偿还，人民币完全是可以收回来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旅游饭店收入的外汇可以担负一部分，实在不行，省里、旅游局再还一部分，这样搞得比较快。关键是搞得准，只要搞得准，这个我看就很保险。因为外国人都看透了，像日本人投资不愿干别的，首先是搞饭店，华侨都搞饭店，什么冯景禧<sup>1</sup>啊，什么胡应湘<sup>2</sup>啊，都搞饭店。为什么？他们懂，我们不大懂，他们对合营别的没兴趣，就是对这最有兴趣。他们出钱，搞十五年，就是你的了。他们就

是这个干法。吴庆瑞不是当我们沿海开放地区的顾问吗？这是他讲的真话，这是他亲自对我讲的。他讲来讲去，就是讲了三条：第一，是基础设施，主要是旅馆；第二，是交通，主要是民航，因为外国人时间很紧，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训练，是管理，是培养人才，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要有个好经理，对导游、翻译、工作人员都训练得非常严格。只有这样才能把旅游的事情搞好。这一些东西不仅是对饭店，还包括汽车、包括民航，都有个经营管理问题。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搞上去？就是在管理上下功夫，在训练人才上下了大功夫。不然的话，房子盖了，基础设施搞了，钱也花了，就是管理不好，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我在上海看了一个锦江饭店联谊大厦，那是上海了，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北京可以搞，还有沿海一些城市，像青岛，将来也应搞。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是民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体制。旅馆应当比较好办，公路也应当比较好办，人员训练吗，反正抓紧吧，突出的是民航问题（李昌安<sup>3</sup>：山东军用机场较多，我同王海<sup>4</sup>同志交换过意见，下一步都可以利用。）有一些合用，有一些可以单独搞个跑道。这要根据情况。地方搞旅游，要一块块地搞，配起套来，你不配套，有了旅馆，没有航空，有了航空，没有公路，有了公路，没人会管理。搞几个重点，一块块地吃，要同步，要配套，这样才能够正常运转。

## 注 释

1. 冯景禧(1923-1985)，广州市人。香港房地产商，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时任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与广州和上海联合经营酒店业。

2. 胡应湘(1935-)，原籍广州花都，生于香港。时任合和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大陆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之一，与广州联合经营酒店业。2004年获授香港特区政府紫荆勋章，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事务顾问。

3. 李昌安(1935-)，辽宁台安人。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北京市计委副主任，七机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保利集团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4. 王海(1925-)，山东威海人。时任空军司令员，曾任志愿军空军大队长，荣立一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历任空军航空兵团长、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空军上将。

# 在第六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

这次使节会议开得很好，学谦<sup>1</sup>同志代表外交部党委做了报告，先念同志讲了话，今天上午耀邦同志又做了长篇讲话，这些讲话都很重要。这次会议就以学谦同志的报告，耀邦、先念同志的讲话为准。一九八二年驻外使领馆政工会议以来，外交部的工作是做得好的，积极而又稳妥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对外政策的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使领馆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是感到满意的。外交部开了个问题单子要我讲讲，我想就经济形势、外交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三个方面，谈一些情况，也讲一点看法。

## 一、国内经济形势

我们常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估计合乎事实。建国以来，我们搞过六个五年计划，“一五”是成功的，二、三、四、五这四个五年计划都不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大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还是好的，主要是恢复。“四五”、“五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七八年、七九年、八〇年有一次大的调整。今年是“六五”的最后一年，实际上“六五”计划已超额完成了。我们当时提出的平均年增长率是“保四争五”，执行的结果：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这四个方面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10%左右。为什么讲这四个方面的数字，而不是专讲工农业总产值呢？要讲工农业总产值，我们解放以来差不多每个时期速度都不算很低，但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当低，说明

经济效益不好。“六五”计划有了变化，无论是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不管用什么口径统计，年平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剔除物价因素以后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年增长率可以达到7.6%左右，这是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没有过的情况。所以说“六五”期间是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最快，人民生活提高最多的一个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七九、八〇两年连续下降，因为调整的关系，每年大概要减少收入二十多亿元。八一年同八〇年持平，八一年即“六五”计划的第一年结束了下降的局面，八二年开始回升。八三年增长一百多亿，八四年比八三年增长二百多亿。今年财政收入预计比去年增收三百多亿，增长幅度达20%。当然这里也有一部分物价因素，一部分物价放开了，譬如钢材，企业里计划外的钢材高价卖了，水涨船高，交税也多了，这一部分可能有几十亿元。还有今年进口比较多，关税收入大大增加，大概又有几十亿元。

当然，全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就总体来讲，现在消费结构正在起变化。过去是为吃饭穿衣操心，现在除了少数贫困地区外，人民的要求已不再限于温饱。中档消费品的生产，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城乡住宅建设，都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六五”期间城乡新建住宅面积达35亿平方米。据抽样调查，人均居住面积一九七八年到八四年的六年间，城镇从4.2平方米增加到6.3平方米，增加了二分之一；农村从8.1平方米增加到13.6平方米，增加了三分之二，但建房趋势至今有增无减，还在继续。从温饱型到小康型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讲开始由温饱向小康型转变，有些地方还在为温饱继续努力。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消费结构肯定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并将继续推动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这是近几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趋势。

总的形势是好的，生产发展了，流通搞活了，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这二者关系处理比较好，历史上这二者关系往往处理得不好。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再就是改革。这一时期不是说没有问题，也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和那样的问题。不同的是：过去往往等到这种或那种倾向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才被迫进行调整；这几



年，问题一旦发生就引起注意，就加以解决，就加以防止，因此没有形成大的曲折。这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与接受过去几次经济工作受挫的教训有很大关系。实事求是，广开言路，有话可以讲，不戴帽子，这条很重要，所以有问题能及时发现。政治上安定团结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前提，经济形势好又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

问题也不少，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济过热，超高速。这个问题去年下半年开始冒头，第四季度工业的增长比前年同期增长18%，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3%。全世界的经济是不景气的，我们来了个超高速。速度高一点是好事，但这样高的速度难以维持。为什么出现这么高的速度？前几年在调整时期压缩进口，国家积累了一部分外汇，有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可以拿这些外汇进口一些原料和材料，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要想搞这样的高速也不可能。但这样的高速能不能持续下去？不可能年年拿那么多外汇进口原料和材料。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比较早的，今年初就看到了，今年一年花了很大的精力抓这件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主要出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因为经济搞活了，财政情况好一些，国家财政预算外的资金也比较多了。今年预算收入一千八百亿元，预算外的收入即各单位、各企业的自留资金大体上也是这个数字，这样加到一起，我们全国的家当就有三、四千亿元，说明经济实力比前几年大大增强了。但基本建设光有货币还不行，光有粮食、棉花也不行，还要有钢材、水泥以及其它许多配套的东西，而我们国家现在钢材、木材很多材料还是缺的。因为有了钱，预算内的也好，预算外的也好，加上形势比较好，大家希望搞快些，因此固定资产规模就比较大，基本建设加上技术改造这个数目比较大。今年钢材涨价涨得这么高，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今年，我们开了几次省、市负责人会议，春节以前开了一次，人代会以后留下各省的同志又开了一次，党代会后又开了一次，万里同志还主持了八个省的省长会议，共开了四次省长会议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思想比较一致了，措施也开始见效了。今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大体上可能在一千五、六百亿元。十一月份速度降到18%，上半年是23%，估计今年工业生产的速度是16%或17%，这还是高。我们没有急刹车，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使它缓缓地下降。这样比较好，对社会的影响、各方面的震动、

损失都比较小。原来担心不急刹车能不能刹得住，现在看来还是可以刹得住的，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了，工业速度在缓慢下降。估计这种缓慢下降的情况明年还要持续一年，才能进入可以长期维持的正常速度。明年速度还可能高一些，因为一下子刹下去也不容易，可能比计划的要高。经过明年一年，今后的工业速度有可能降到10%左右，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明年10%恐怕还不行，会超过10%。明后两年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运用，准备把投资总规模控制在今年的水平。当然，项目会调整。这个问题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下决心少搞一点基本建设，但实际上难度很大，因为大家都想多搞，有钱不让用似乎比没有钱还困难。但这个问题关系很大。党代会的报告讲我们进入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今后两年固定资产规模必须要控制到今年的水平上，具备这个条件，就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如果明年冒上去，或后年冒上去，这个局面就会被破坏，这关系非常大。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关键是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协调了就能持续稳定，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外国也议论纷纷：“中国经济失去控制。”我看没那么严重。这也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讲，而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宣传，可能外国人讲我们是奇迹。我们说搞得太快了，外国人也跟着喊。这种超高速搞一年还是可以的，问题是不能持续下去。

同志们都很关心物价。今年全年城乡零售物价预计平均比去年高9%，其中城市高14%。农村物价上涨的幅度低一些，城市涨得比较高。因为物价上涨主要是蔬菜、副食品。这个大体上6%是由计划调整带来的，这是正常的，是原来有准备、预计到的，也有措施加以补偿。物价问题，城市反映大，特别是大城市，集中是蔬菜和副食品价格，主要是五月、六月、七月三个月，各地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各大城市都有那么一两个月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进入九月份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也就是说在五月、六月上涨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了。有领导地放开一部分，调整一部分，使价格逐步趋于合理，对发展生产有利，这是必要的。问题是放开以后，国营商业要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这个问题到今天解决得还不算好。过去，国营是垄断，商业系统一统天下，现在一放开，多种渠道，价格比较活，国营商业如何适应市场，参与市场，指导市场，真正按经济规律去办事，恐怕

要一两年、两三年才能够解决。拿鸡蛋来讲，现在供应情况总的应当说是很好的，但由于国营经营上的问题，今年旺季（春季）全国很多地方鸡蛋价格很低，应当多收购一些，商业部也作了布置，要全国收购七千万斤，但是各地方都不愿多收购，怕压资金，影响奖金。鸡蛋有季节性，差别很大，夏天一过就到淡季，旺季不收购，淡季就供不应求。所以对供求关系要进行预测，采取适当政策措施加以调节。

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明年物价会怎么样？明年在物价方面不准备采取大的动作，大体上准备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今年物价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是蔬菜，特别是北方，蔬菜是每个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对生产蔬菜积极性不高，他们想搞工业和副业，收入比蔬菜要大得多。从长远来看，蔬菜应当逐步从近郊向远郊转移，国外也是这样。对远郊农民来说，种蔬菜是一种致富的门路，它比种粮食收入高得多，农民也有积极性。但把蔬菜由近郊向远郊转移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要几年时间，只能逐渐解决。因此，放开以后，在相当时期内还必须把近郊的蔬菜生产稳住。今年有些地方蔬菜出了问题，主要就出在这里，近郊农民不愿种蔬菜。原来是压在头上种的，一放开就大量减少面积，远郊一下跟不上，蔬菜供不应求。解决近郊种蔬菜问题，基本上要解决分配问题，要以工副业补蔬菜，使得从事蔬菜生产和从事工副业生产劳动所得差不多，这样才能把种蔬菜的积极性维持住。现在各地都正在这样办，估计明年会好一些，第四季度蔬菜供应情况比原来预计要好一些。

再谈分配问题。现在确有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制止，也可能发生不安定的因素。在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不符合按劳分配，悬殊过大也不符合按劳分配。企业内部根据贡献大小应该有所差别。企业之间如果由于外部条件不同而造成收入悬殊过大，就会引起不满，就会带来普遍要求向高收入攀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还有机关、工厂、科研单位、学校，如果一部分单位收入特别高，另一部分单位收入特别低，很难讲得过去，也很难维持下去。一个会引起不满，一个就会出现一种向高收入攀比的难以抗拒的压力。这次我到了南美四国，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南美洲有许多国家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平均收入不低，但分配上的

悬殊过大，尽管大家收入都提高了，但社会不满、社会矛盾相当多，社会很不安宁。当然，我们制度跟他们不同，但是也要注意。现在正在研究准备制定一些政策，譬如对个体户要征个人所得税。现在事实上已出现私人企业，这些企业经营效益比较好，没有官僚主义，费用低，效率高，比国营企业经营得好。我们既要继续保护他们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但在雇工和盈利问题上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些节制的措施。对发放奖金过多的企业要继续征收奖金税，对乡镇企业的工资奖金也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办法。现在有些个体户的收入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工人的工资高于国营企业，小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于大中企业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有些又高于机关、高于科研单位、高于知识分子，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现在总的情况都比过去好，但是好的中间出现了这么些问题。这在开始来讲是不可怕的，也是难免的，但是不注意，不采取办法逐步加以节制、加以协调，听其发展下去，将来也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所以现在要开始注意和研究这些问题。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今年已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但知识分子的职称还有待评定，明年可以解决。

有同志问，“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过去有过这种情况，现在和过去不同。尽管在改革中也出现过一些小的问题，不断做过一些小的调整，但总的来说，改革是在不断前进、不断深入，没有重复过去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当然，我们的改革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但同过去打圈圈不一样。“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收了就死、死了再放”，现在没有这种情况。根本的问题是改革不配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微观继续放活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控制。今年经济建设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把微观搞死，而是采取宏观控制的办法，使情况逐步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微观还继续放活，同时加强宏观控制。单靠直接控制一般会一管就死，没有间接控制就会一放就乱，所以逐步减少直接控制，相应加强间接控制，就会达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改革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加强间接控制比减少直接控制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这里有很多问题，有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机构问题、经验问题，还有市场条件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正因为这样，在改革的实施步

骤上要力求稳妥。“七五”期间要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一条已经定了。明年改革的安排，要同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分析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国务院和财经小组这几年每年冬季都要对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分析，现已有若干小组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大概从十二月份开始到明年一月将要系统地分析今年的经济形势，预测一下明年的情况，同时相应提出明年的改革措施。总的来讲，我们明年的改革是巩固和消化今年的改革。今年改革迈的步子不小，有些不够配套，有些不很合理，也还有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对今年改革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明年必须加以消化，以便后年走出重要的一步。

## 二、外交政策问题

我同意学谦同志报告中的估计，现在我们的外交工作正处在建国以来最主动、最有利、最活跃的时期。所谓“最”是比较而言，五十年代也好，六十年代也好，七十年代也好，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很难机械地去比，有其不可比的因素和条件，但同过去来比我们现在的主动权更大了。

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过去也是独立自主，但现在外交政策的调整可以说是在新的情况、新的形势下体现我们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也可以说是更加或进一步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抓住了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把一系列对外方针政策配起套来。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主张裁军缓和，既看到战争的危險，又看到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既反对热战，也反对冷战。二是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支持改善南北关系，发展南南合作，但不介入第三世界内部的纠纷。三是不同超级大国结盟，也不搞无原则的等距离外交。四是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亲疏好恶。五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五条很得人心，国内国外都能理解。我有这个体会，现在出去好讲话，到各国访问都可以找到共同语言。我们在全世界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的形象、开放的形象、搞现代化的形象、平等待人的形象。超级大国不愿做的事，我们愿意做；中小国家不敢说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形象不仅是有分量，

而且是有原则、讲道理、重信义。一九八一年以来，我访问了三十九个国家，亚洲十个、非洲十一个、欧洲九个、南北美洲七个、大洋洲两个，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是越来越好，威望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中国大，人家重视，这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内政外交政策上了轨道。我们过去有些口号人家很难理解，如“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讲绝了，等着打仗就是了，战争不可避免，那为维护和平而努力就毫无意义了嘛！还有我们过去的一些做法，尽管有当时的条件，当时的形势，当时的背景，但太绝对化了，要不就是“一边倒”，要不就是“一条线”，从这个180度到那个180度。外国对我们的政策有疑虑，感到中国的政策不可测，不可捉摸，很怕我们一夜之间突然来个180度的变化，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连续性比较差。过去有过去的条件和背景，不能完全来比。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最适合当前的情况，也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最得人心。

外交政策上了轨道不等于说今后就不再调整了，一切都定局了，一切都凝固不再变了。如果那样就没有文章可做了。外交工作应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纵横捭阖，开拓新局面。从这个要求出发，今后还会有所调整，这是第一。第二是如何调整，调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时机。总的是两条，第一要看是否有利，第二要看是否有理。中美苏关系中，中苏关系从总的、从需要来讲还应当作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也应争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我们更为有利。但是中苏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都不是一厢情愿的问题，要看条件，要看对方，在有这样时机、这样条件的时候，我们应当作进一步的调整。如果没有条件、没有时机，我们一厢情愿来搞，反而适得其反，达不到调整的目的。掌握时机，这有很大的策略性。中美苏关系中，现在中国处在很有利的地位，但今后如何驾驭这种局面，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有利的形势，那是很高的艺术。现在这种有利的局面，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不会这样有利，处理得好还可以继续推动这种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对外政策调整必须高度集中，由中央常委决策。同志们在外要注意体察形势，随时反映信息，可以多提出建议，当然必须按中央的决策行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领会和贯彻中央总的意图，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活跃。

### 三、关于经济外交问题

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对使领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外交应当为中国的四化、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繁荣昌盛服务。缺乏经济内容的外交是没有坚实基础的外交，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这次马来西亚总理来就是搞经济合作的，他比较满意。因为他经济有困难，有求于我们，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确实可以搞些东西。他回到机场，自己讲马共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障碍。经济外交的分量正在日益加重，经济外交的实绩应成为考核使领馆工作的主要标志之一。

党代会上讲过“七五”计划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是提高创汇能力。创汇问题既要提到各部门、各地区的议事日程上来，也要提到各使领馆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国家可以多借点外债、多借点款，但是前提是国家的外汇收入必须增加。外汇收入不增加，借款不可能借那么多。国际上一般认为借款数的安全线是每年还本付息不超过本国每年外汇收入的15%-20%。如我们国家每年能收入五百亿美元，20%就是一百亿美元，一百亿美元还本付息，大体上就可以借七、八百亿美元外债。即使以15%计算，也可以借五、六百亿美元。多借债就要多创汇。出口、旅游和劳务等方面也可以增加创汇。旅游和劳务在“七五”期间必须大发展，现正在做规划，但是数量最大的还是出口贸易，石油、煤炭、粮、棉、油、土特产、纺织品、工艺品以及某些机电产品和军工产品。我们在出口方面，对几个大的市场要有个布局，对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巩固和扩大。对苏联、东欧市场要恢复和发展。

我想着重说一说南南合作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展贸易的问题。我国同第三世界各国发展贸易有很大潜力。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形势：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更多地把扩大贸易的期望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因为现在世界工业国经济不景气，至少在近期内不可能再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样出现长时期的繁荣（但也不会一直衰退下去），工业国家不可避免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外债比较沉重，想多出口少进口，以便积累外汇来偿付债务。一个国家如果老是多出口少进口是不可能的，多出口到哪里去？而且多出口少进口一定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想和过去那样，依靠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

把第三世界国家带起来，我看希望很小，路子很狭窄。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形式。现在看来，易货贸易，双边的易货和多边的易货，是很有前途的一种形式。现在一般是双边的，这比较简单，将来可以考虑三角的，多边的。发展中国家都缺外汇，将来可以不用现汇，以物易物，只是用美元来结算。这样就要研究，我们中国哪些商品是他们需要的，他们的哪些商品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过去和拉美来往比较少，拉美过去传统是向美国出口，现在美国不要他的东西，出不了那么多，而中国市场还是需要的。为了向中国出口，他就愿意买中国的东西。过去发展中国家愿意出口到发达国家，然后在发达国家买设备、买技术，现在出不去，这样就可能转过来。马来西亚就是这样，过去他的热铁块向日本出口，现在想向我们出口，既然向我们出口，有些东西也可从我们这里进口。不仅是双边的，将来也可以是多边的，如他的东西中国不需要，但可转口到第三国，我们再从第三国进口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三角的以至多边的易货贸易，很有文章可以做。就是同黑非洲之间也可以开展贸易，过去我们和黑非洲贸易很少，更多是经援。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援的路子是不会宽广的。经援可以援一些，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对最穷困的国家要继续采取传统的那种经援方式，援建一些项目，但不可能很多。贸易的路子就很宽，我们同非洲之间完全可以开展一些贸易，有些产品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东西，他需要得更多，纺织品、粮食、棉花、轻工产品、设备他都需要，问题就是我们要买他的东西。这里有个开拓市场的问题，有些商品中国人过去没有消费的习惯，卖不出去，但经过一段也就慢慢适应，可以销售，包括非洲水果，拉美水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一点呢？现在中国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吃柑子、吃桔子的人很少，吃苹果的人也不多，现在大家都要吃柑子、吃香蕉，所以水果贵得不得了。东北人也到四川去抢购桔子，现在产区的水果贵得要命。我们拿些轻纺产品、热水瓶、缝纫机、粮食到非洲去换水果，就可以把国内的香蕉、桔子的价格压下来。芒果也可以进口一些。这方面要好好研究，多从贸易上想办法，贸易是最广阔的。经济往来，首先是贸易，这是互利的，越走路子越宽广。我们经常讲要发展南南合作，这作为一个方针政策要摆在什么位置上？现在的状况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是很有利



的时机，大家应该研究贸易问题。其他合作形式也很重要，如劳务、合营、合作开发、技术合作等。对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在医疗、设计、管理、咨询，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还可以多给一些帮助。对那些很落后的国家，应当把援助放在培养人才上，这是治本的办法。如果不培养人才，没有人才，你就给它援建一些项目，最后它也管不好，帮它培养人才，这是帮到根本上，也是真正使它自力更生。至于经援问题，那还是以前说的，应当在投资少、效果好、影响大这方面多打主意。

经济外交领域很广，贸易、劳务、航运、旅游、技术合作、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市场信息以及驻在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等，使领馆都有责任向国内反映。国内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指导，通报情况。你们应该抓住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每年切切实实地办成几件事情。要有开拓精神，别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去的市场为什么我们进不去，有什么问题，报告国内改进。使领馆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你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大使要亲自抓经济外交，使馆党委要专题讨论。重点国家的商务处、经参处、科技处都要配备得力的干部。有些商务参赞、经济参赞条件合适的话，也可担任使馆党委副书记。外交人员要一专多能，要兼才，只懂政治不行，一定要政治经济结合。鉴于目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情况，要特别强调经济，政治终究还是有些底子，比较落后的是不懂经济，不熟悉经济，对经济没有兴趣。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钻得厉害。我们到国外，也要根据互利的原则去研究问题，不要因为自己驻在那个国家，就想从国内抓一把给那个国家，这是不行的。大家都来抓，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不去研究相互的经济来往、经济关系，而只想给那个国家多办几件好事，增加一些项目，增加投资，增加援助，好像这样大使馆工作就好做了，恐怕不能这样子。当然，也不能只想从那个国家搞一些东西，只从我们这方面来考虑也不行，而要从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多想一些问题。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使领馆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的来说经济外交还是我们整个外交工作比较薄弱的一环。今天只是出个题目，请大家开动脑筋，共同作好这篇文章。希望在下一次使节会议上能够得到好的答案。

## 注释

1. 吴学谦(1921-2008), 上海人。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曾任上海地下党学运委员会书记, 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长, 中联部对外联络局长、副部长, 外交部副部长,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政协副主席。

# “星火计划”是科技为 农村经济服务的好形式\*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纪云同志：

这是件值得重视的大措施，建议予以大力支持。所提要求不高，希尽量满足。

科技要为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经济要依靠科技才能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要成为今后一条重要方针而突出起来。

科技为农村经济服务，国家科委提出的“星火计划”是一个好的形式。建议以上想法（本报告中的一些好的提法）能写进明年一号文件。

赵紫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实施“星火计划”请示的批示。

#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万里同志和纪云同志都作了很好的报告。刚才杜润生同志的汇报也讲得好，他归纳到会同志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原则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讲以下几点意见。

## 一、关于农村形势

从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大体上可以概括成这么两句话：形势很好，意见不少。我认为，形势好要充分肯定，意见要作具体分析。今年农村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可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胜利。为了适应农村的新形势，进一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今年我们改变了多年来在农村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使农业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变革，今年又会是个什么状况。我看那就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无论出现以下哪种情况我们都吃不消。一种情况是，假使今年不适时改变农产品收购制度，不调整农业结构，老天爷再帮忙，粮食来个大丰收，大量粮食国家不能收购，那就肯定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另一种情况是老天爷不帮忙，粮食减产，而我们又没有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作物就

---

\* 这是赵紫阳听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上不去，农民收入就会大量减少。这同样也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今年的结果，以上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今年粮食预计减产 500 亿斤左右，减得多了一些，但总产量仍达到 7600 亿斤左右，不至发生大的问题。棉花减产 3400 万担，使库存不再增加，这是符合国家要求的。虽然粮棉减产，但各种经济作物全面增产，预计农业产值还可以增加 10% 左右，农民纯收入不但没有减少，每人平均还增加 45 元左右。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今年实行改革的结果。我国农村经济已走上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这是农村经济形势的主流。

会上反映出来的意见也不少，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反映的问题，大体上是两个方面的：

一是我们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新体制正开始建立，旧体制还在起作用，在改革中难免有不适应、不配套的地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许多是属于这种情况。某些改革措施，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拿我们实行的粮食订购合同制来说，由统购派购变成合同订购，方向是正确的，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只是开始走上轨道，要求完全通过经济手段来搞，统统用平价的生产资料与农民交换，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只能做到，既是经济合同，要尽量给农民平价供应一部分生产资料，同农民交换；同时又是国家的任务，必须完成。从不大完善的合同制，发展到真正的经济合同制，需要有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应、不配套的问题，只要引起注意，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二是有些问题是由于要求过高，胃口过大带来的。执行的结果达不到，就反而容易产生埋怨情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一个包产到户，一个进口粮食，一个提高粮价，几项措施一配套，就把潜力挖掘出来，农业生产一下子上涨了。现在，我们的改革还在深入。改革的结果仍然会使农民得到实惠，但发展速度不可能那么高，增收的幅度不可能那么大，像前几年那样，一年增加上百元，年年如此，个别地区也许有可能，全国就办不到。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如果不立足于客观可能，主观提出过高的要求而又达不到，本来成绩很大，也会感到不过瘾，不满意，甚至怨天尤人。

会上，有同志反映说，国家给农民的好处现在把 85% 都拿走了。我

不赞成这种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农村特别是对困难地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证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收到了效果。现在生产资料涨了一些价，农民负担增加，固然是事实，但不能光算这些账。让农村休养生息，调整农业结构，改变收购制度，整个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对农民产生极大的好处。这个账怎么算呢？从总体看，从长期效益看，我们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到底是伤害了农民利益，还是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看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事实。要不然今年这么大的灾害，农民还增加纯收入45元，这怎么解释？前几年农村的活力来自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和休养生息的政策。现在和今后，农村的活力来自发展商品经济，推广科学技术。我们要在这个根本方面下功夫，扶持农业。同志们都是搞农业的，提出意见，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要求给农业以更多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重视和加以改进的。但不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甚至变成一种舆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就不对了。现在需要在农村形势问题上作些分析，统一上上下下的认识很有必要。

## 二、关于明年改革的指导思想

今年的改革无论城乡都迈出了一大步，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价格、工资、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度等方面走的步子都相当大。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叫做走了勇敢的一步。年初我在政协座谈会上说，今年的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第一步要走稳一点。现在回头一看，这一步走得不小，的确是相当大的改革。现在改革的冲击波已经过去了。不像五、六月，那时大家还有些担心，怕弄不好出问题。现在到了年底，可以肯定地说，改革走了一大步，情况相当好。

在今年改革的基础上，明年怎么办呢？最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了几次会，初步议了一下，明年一月还要议一下，提请书记处讨论后把它定下来。鉴于今年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明年总的指导思想，我想应该是：巩固今年的改革成果，并为后年（1987年）的改革再迈出重要的一步作好准备。明年的改革要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我们对现有改革成果，要巩固、消化、补充，存利除弊，解决突出的问题，使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比如物价改革、工资改革，都有不少遗留问题。明年不出台什么大的措施，着重把已有改革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好，使之配套。这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进行探索试点，为下一步改革迈出重要的步伐作好准备。比如现在农村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流通。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得搞好流通。现在很多问题都在流通领域内发生了梗阻，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改变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后，解决这个问题更迫切。经济搞活以后，国营商业很不适应这种新形势。今后国营商业怎么搞，合作商业、个体商业怎么搞，都是重要课题，体改委、商业部要很好研究一下。

明年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达到预期的目标。

### 三、关于“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的问题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副业兴起后，就富裕起来了。在我们国家，在若干年内要想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使农业得到像工副业那样大的利润，是不现实的，无法做到的。要富裕起来，要靠发展工副业、第三产业。“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实际上这几年我们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几年工副业发展起来，有几千万人转入非农业部门，就是因为粮食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有它作基础。而农业包括种植业之所以能持续地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工补农，工副业和农业、种植业互相促进。光靠种植业，农民对农业不会有那么多的物质投入，也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产量。除了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以外，典型的是鲁西、雁北等地。这些地区要是没有多种经营，没有小煤窑，粮食能够搞

上去吗？发展多种经营，办了地方煤窑，增加收入，支援农业，支援粮食生产，多投入多产出，农村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今后这条路恐怕还是只能这样走。

工副业和农业、粮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所以，需要协调发展。如果不协调发展，只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那就一定会出问题。有些地区把农业当成包袱，把土地撂荒去搞工业，搞商业，不可能长久搞下去，此路不通。反过来如果像过去那样，要八亿人口去搞饭吃，强调农业第一线要多少劳力，劳力归田，结果怎么样，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都有切身的体会。从根本上说，是要把二者的关系摆恰当，协调好。唯一正确的方针是：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在这样一种方针指导下，才能保持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以工补农，以副养农，以工业、副业支持种植业，以经济作物支持粮食作物，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应当作为长期实行的政策。虽然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所占的比例因而有所不同，但总的应当是实行这样的政策。

#### 四、关于粮食问题

考虑粮食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生产问题，即解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问题；另一个是流通问题，即解决调出地区的积极性问题。

当前，的确有一个农民种粮兴趣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及早引起注意。尽管今年粮食产量下降原因很多，但我们要从中看到这个苗头，见微知著，加以重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苗头，在工作上忽视它，明年和今后就有可能真正发生问题。要看到随着农副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现在许多地区，种粮不如搞工副业，不如搞第三产业，农民种粮兴趣日益减少。因此，如何保持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我认为需要重新调整粮食的合同订购任



务。去年订合同任务时，本来只想搞 1300 亿斤；但在“卖粮难”的气氛中，大家争着要多订购，一下搞成 1580 亿斤。合同任务搞这么多，没有那么多平价供应的生产资料去交换，特别是增产潜力大的地方，不能从增产粮食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订购 1000 亿斤就比较适当。为慎重计，可以逐步过渡，建议明年调减到 1200 亿斤，让种粮农民从增产中多得收益。

从全国来看，调减粮食合同订购任务，要考虑到三种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第一类是商品经济发达、多种经营门路很多的地区。这类地区现在确有撂荒土地，大量劳力转入工副业、第三产业的现象。必须稳定粮食生产，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粮食生产任务。办法是实行以工补粮的政策，使务工人员 and 务农人员的利益得到调节。这样，不仅对搞工副业、搞乡镇企业没有损失，而且有利于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社会化，使粮食生产和工副业、多种经营都能充分地、协调地发展，土地也会相对集中，由种田能手去种。根据中国的情况，将来农业生产上的基本形式可能是拥有一、二公顷到几公顷左右的家庭农场，这样的规模比较适当，便于搞机械化、集约化。

第二类是发展粮食生产有潜力，搞多种经营门路不多的地区，包括新商品粮产区和一部分老商品粮产区。对这类地区必须进一步激发他们增产粮食的兴趣。办法是减少合同订购任务，鼓励他们从超产中增加收入。

第三类是以吉林为代表的大商品粮产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土地较多，粮食商品率较高。对这些地区，可以不降低合同收购数量。并且要特别注意根据合同，做好平价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尽量满足农民扩大粮食生产的需要。

上述地区，在实行合同订购以后，超产部分，价格可以随行就市（但国家收购最高不超过统购加价）；即使在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国家也按照稍低于“倒三七”比例价确定保护价，予以收购，使种粮地区的农民放心，放手发展粮食生产。

除此以外，还有极少数贫困地区，商品率很低。可以考虑不订粮食订购合同，按市场价格收购。

以上几种地区，各省回去后还可以以县为单位划分一下。国家调减合

同任务落实到省，你们再落实到地、县。大家要瞻前顾后，不要统统要求一下调减很多，到了明年秋后粮食多了，又叫卖粮难。

另一个要解决地区之间粮食的流通问题，调拨问题。现在调出粮食的省区要负担补贴费用，多调多吃亏；而调入粮食的省区，不负担补贴，吃调进的平价粮去搞工副业和多种经营，这是很不合理的。现在不解决，将来矛盾会越来越大，路子会越走越窄。调拨问题，一定要考虑生产粮食的省、地、县的积极性。要规定几条基本政策。一是调入粮食的费用，国家只负担一部分，另外的部分由省、区自己负担。你认为调入粮食合算，就可以多调整你那里的农业结构。你认为不合算，你就多生产粮食。这样可以减少盲目性，促使调整农业结构健康进行。省对地、县也可采取类似办法。二是国家每年储备一部分粮食，哪里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增拨粮食仍按平价，有备无患。有了这两条，使调出者有利可图，调入者不吃大锅饭，流通不畅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 五、关于增加农业投资问题

这个问题要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国的农业要进一步发展，如不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可能三、五年后就会出问题。现在就应当考虑到“七五”后期、“八五”期间的农业后劲问题。当前粮食生产达到8000亿斤水平，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9000亿斤，不增加投入是办不到的。因此，在“七五”计划中，应当考虑这个问题，对农业投资适当增加一些。明年中央财政开支已作安排，追加投资有困难。好在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现在大家都想拿这个钱搞基本建设，要求计委追加指标。我主张，明年可以给地方增拨一些有关农业建设的专项指标。

今后对农业的投资，各级要有所分工。国家增加投资，主要用在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和开发上。省以下，要更多地用于一般水利工程，用于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设施。至于小型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应主要依靠县、区、乡的力量，依靠农民自己搞劳动积累。

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和大家研究。今后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不能过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必须加以控制，而农业的投资又要增加，矛

盾怎么解决呢？只有从别的方面挤一些出来。“六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非生产性投资比例上升，已达42%（“一五”到“五五”只占21%），其中住宅投资又占49.5%（“一五”到“五五”占35.8%）。据统计，“六五”期间，城镇通过各种渠道新建住宅面积六亿多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8平方米。当然，城市住宅仍十分紧张，还是第一大矛盾，要继续抓紧建设，不能动摇。但是也不能一下要求过高过急，要腾出一些力量去加强农业建设。这一点也要向城市人民讲清楚。农村里，也要进行教育，过去“先治坡，后治窝”不对，但也不能只搞住房建设，不搞农田基建。农村集中一些劳力、财力、物力，用于农田基建和基础设施，用于科学技术，这是长远利益所在。各地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我建议在今年计划进口800万吨化肥（其中地方200万吨）的基础上，再进口100万吨化肥，同时还可以通过换货贸易的方式，再多换一些化肥。国内的化肥特别是大化肥如何多增产一些，也请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提出方案。

还有一个科技支援农业的问题。国家科委提出了一个“星火计划”，这是一种好的形式。科技要为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经济要依靠科技才能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应当成为今后一条重要的方针。农业增产的一些关键科研课题，要争取突破。对乡镇企业的改造和提高，也要争取做出成效。我们应当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武装乡镇企业，改造乡镇企业，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

## 六、关于发展乡镇企业问题

这几年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今年产值将超过2300亿元，比去年增长35%；从业人员已达6000万人，占农村劳力的20%，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尽管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总的来讲，我国农村只能走这条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应当支持乡镇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加强宏观控制，全国性的紧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取得了很大成绩。银根抽紧，对乡镇企业也有好的作用的一面，减少了盲目性，

促进了经营管理的改善，提高了效益。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制，还不可能做到宏观既能控制住、微观活动又很合理。宏观上加强控制的结果，自然会发生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今年已经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明年我们不仅要加强宏观控制，而且要改善宏观控制。在金融方面，银根要继续实行紧缩，货币发行要继续控制，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有目标、按地区、按项目适当地放松一些。对乡镇企业、对整个工业都将这样办。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总的是要控制，但其中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稍微放松一些；对流动资金的控制也可以略微放宽一些。还有一些行业，比如乡镇开矿、建材、农副产品的加工等，也可以放宽一些，支持一下。总之，宏观控制要尽量做到适度，过紧了就放一点，过松了就抽紧一点。

还有一个增加劳务收入问题，将来中国农民的劳务收入大有前途。今后要确定一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采矿、修路、建筑等行业，应主要依靠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把相当多的劳务让给农民干，增加他们的收入，这对国家建设、对农民本身都有利。我们在劳务政策、用工制度上，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加以考虑。

## 七、关于流通问题

在流通领域里，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新的商社，从各方面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明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农工结合、农商结合或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企业。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既不同于过去一统天下的国营商业，又不同于农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个体商业。它的好处是可以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沟通城乡关系，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的关系。比如蔬菜经营，就可以考虑由生产地区和大城市的商业部门联合组建合营公司，从产地直接进菜到城市批发。北京市就可以研究与附近的保定、廊坊地区搞合营公司，把菜直接拉到北京的批发市场，产销结合，利润分成，流通环节的费用大大减少，城市蔬菜供应得到改善，产区销区都得到利益。又如生猪的调运，像湖南和广东，就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经营生猪的合营企业，

利益均沾，以解决湖南不让调猪，或调猪加税等问题，广东的猪肉供应也可以得到改善。湖南、江西向福建、广东调运粮食，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形式是加工厂与原料产地直接挂钩，签订合同，由产区直接供应原料，农民从减少中间环节中得到好处，工厂也有稳定的原料供应，而且可以根据工厂的需要，改进原料的质量。

明年还可以就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进行一些试点。像商业部门的仓库、冷库、车队、货栈等，应该面向社会，谁用谁付费，提高利用率。不采取这条措施，新型商业发展起来很困难，这条路子如果走通了，有利于国营商业、集体商业与农民的结合，可能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一种事业。

## 八、关于扶植贫困地区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贫困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已摘掉贫困落后帽子，但确有少数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今年以来，扶植贫困地区的呼声比较高，这个问题如何看？我认为：

第一，在我们国家里，富裕起来的地区已经出现，这是一小部分；许多地区是在致富的道路上有显著的变化，但还谈不上富裕；还有一小部分地区至今没有摆脱贫困状态，温饱都未解决。因此，提出贫困地区的问题，对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形势，在大好形势下保持冷静的头脑，很有好处。

第二，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这些地区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要弄清楚。估低了固然不好，估高了也不好，我们党内往往容易受刮风的影响，去年出现全国性“卖粮难”，就说农村怎么好；现在又说有一亿多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越报越多。所谓温饱没有解决，是指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那不会很多，我看就是几千万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要求过高。当前只能解决不饥不寒的问题，还不可能要求一下就富起来。要求明确了，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国家有很多优惠的政策，照顾的办法，只要配起套来，认真落实，调动人民摆脱贫困状态的积极性，从那里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温饱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工作做好了，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现在全国支援贫困地区的经费，各种项目加起来总数不少。要想办法如何把这些钱用得集中一些，合理一些。不要撒胡椒面。救济款也不要单纯搞救济，应当用于发展，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状态。

第三，要使贫困地区致富，是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解决少数地区温饱问题不是很困难，但脱贫后要进一步致富，就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我们有些同志到了沿海地区后，再到贫困地区一看，拿沿海地区的标准来要求，自然会感到问题很多。但贫困地区要像沿海地区那样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发展商品经济致富，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基础设施，涉及到一整套东西。贫困地区大多是一些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方。过去打游击是好地方，现在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困难了，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交通运输、服务设施、经营管理的社会水平都很差，要搞起来并不容易，要有许多基础建设。当然，我们对贫困地区要关心，但扶植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终究还是应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把贫困地区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把根据地人民忘了”。我们不能脱离那里的客观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那样，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走上小康，是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的，只能逐步解决，只能是渐进的。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把以上三点联系起来看，我们对扶植贫困地区问题就有个全面看法了。

# 在河南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这次在河南看了一些地方，总的印象，河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方面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要大。新乡、焦作也好，开封、郑州也好，都有很大变化。三中全会以来，河南的工作做得是好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当前看，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一派大好形势，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团结状况都比较好，信心十足，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衣着也发生了变化，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河南的干部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方面给人的印象较为深刻。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你们省委设想，要把河南建设成为小麦商品粮基地，这是农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很赞赏。你们打算种七千多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七百斤，总产达到五百亿斤。达到这个目标，几年时间可以考虑，但这是很有希望的。农民有这个积极性，国家有这个需要，你们又有条件，所以你们的规划是可以实现的。小麦种得多，产得多，也就增加了收入嘛！当然还要注意提高小麦的质量。总之，你们的设想很好，我们要给以支持。但你们不要“开大账”，以你们为主，我们给以适当帮助。你们的条件比较好，有人有地，水利设施也不错，不需花很多的钱。要推广花小钱的经验。豫东排水要花点钱。农民要搞点农田基本建设，搞点义务工，有力出力，不出力出钱。至于一个劳动日出多少钱，要从实际出发。温州一个劳动日十元以上，你们豫东两三元就可以了。施工时可采取包工的办法。现在我们就开始注意农业的投入，如果不增加投入，三、五年以后，中国的农

业就可能出问题。过去我们对政策注意不够，而这几年农业得到发展，主要是靠政策。现在，农业上还要抓两条：一是贯彻一号文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二是推广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包括适当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主要靠群众，地县也要拿一些钱帮一下。省里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指标，只要你们有钱，国务院可以增拨给一些自筹基建指标。国家的投资主要搞一些大的项目，比如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和开发。现在，大江大河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包括黄河大堤，谁能保证哪一年不出事？淮河流域年年淹，长江也有问题，对武汉的大堤也是提心吊胆的。当然，这些大江大河也不是马上就能治理好，要逐步解决，但必须投资，要尽力保证不出问题。

第三，你们要发展同外省外地的经济技术联系，来促进河南的经济建设，这个方针很重要。工作如果做得好，会给河南的经济建设带来想象不到的效果。河南要对外开放，就要发展对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但重点应放在外省、外地，特别是对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上，南至广东、福建，东到上海、江苏。这样做比较现实。河南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是很大的财富；二是地处中原，交通方便，与沿海开放地带运距比较近；三是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有不少骨干工厂。既要看到你们的有利条件，也必须正视你们的不足之处：一是资金短缺，二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比沿海差，人才不足，文化科技知识不够。从整个社会的水平来说，河南人是“朴实有余，精明不足”。我是河南人，这个话我可以讲。前些时候，我到温州，觉得那里人的“点子”多，本事大。古人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礼记·大学》）一到温州就给人一种感觉，有人此有财。他们没有什么资源，就是靠人的努力，不少事他们一干就成功了。你们要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把沿海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吸引过来，和你们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合作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你们也可以在沿海开个“窗口”，“东西对话”。这对于加速河南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发，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第四，关于横向联合问题。我在北京就听人讲，这两年对企业实行简政放权，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联合出现了很好的势头。这次我听了郑州、



开封、新乡、焦作的汇报，印象就更深了。在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界限，扩大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这方面有很多新鲜经验，对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意义。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把它作为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有的地方对企业没有放权，处处限制，使企业很困难，也就谈不上经济联合。只有对企业实行放权，企业才有可能更好地进行联合。联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要限制在一种模式。目前，经济联合已经开始兴起，正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们要重视这些经验，因势利导，加以促进、推广，对联合中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帮助排除联合中的障碍。要把“撞击反射”的经验，用到联合上，促进联合的发展。这样，不仅能打破部门、地区的界限，削弱部门、地区的观念，而且必将促使企业结构的合理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企业集团。这种集团和我们过去的部门所有制，和我们行政上搞的公司都不同，这是企业在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围绕生产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必然会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今年企业的改革，要在经济联合上多下一些功夫。在对企业扩权的基础上，注意及时把发展联合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研究一些必要的政策。从发展趋势看，企业的联合有可能包括资金的融通，通过联合的形式把资金、设备、劳力、技术用到合理的地方，利益均沾。这样，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就会出现。为了促进其发展，我们可以研究，国家的投资对象也要逐步放在企业集团上，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股份所有制。当然，这些企业集团仍然是全民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为主，但这种所有制和原来的不太一样，性质不变，在办法上更加灵活，因为它打破了地区、部门的限制，更注意经济效益。

原来改革的思路是把中央管的企业、省管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这是因为城市比省和地区受块块思想观念的影响要少一些，想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当时考虑企业先下放到城市，然后解决中心城市对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中心城市如何领导下放来的企业，包括原来的企业，在观念上、方式上都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不能把企业由厅下放到市里的局来管，继续搞条条分割。必须改变城市那种由行政的、部门

的管企业的方法，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这势必涉及城市的机构改革。我希望城市的机构改革更积极一点，步子迈得大一点，不要等省里和国家的机构改革以后再去改。如果城市的机构不作相应地改革，不改变过去传统的领导观念和领导方式，我看企业的自主权也很难真正落实，放下去的权也会再收回来，还会限制企业的对外联合。所以，一定要把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不然，原来改革的成果也不能巩固，更不能发展。这个问题，在北京我也感觉到了，在你们这里又受到了启发，回去以后要进一步研究。当然，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困难大一些，这主要是涉及人员安排问题。所以既要积极进行，又要稳妥前进。我昨天到了开封，通过了解情况，更使我坚定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原来有的同志说在改革中机构不能撤销，怕撤销后上边给“小鞋”穿，我看这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人员安排。说来说去就是不少同志不愿放弃那个“码头”（工作单位），只看到既得利益，而不看整体效益，要足够地估计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心城市的机构改革工作。

第五，抓好流通问题。我听了郑州市关于发展商品市场、贸易中心的汇报，析综<sup>1</sup>同志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讲得很好。大家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认识提高了。过去有的地方限制外地人、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现在认识到，人们到城市来做生意并不是坏事，可以促使城市充分发挥多功能的作用，特别是对商品的流通作用更大。城市首先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枢纽，任何城市都是商品集散地。武汉市提出要打开城门，欢迎外地人来做生意。上海市过去是一再让中央、国务院发通知限制各地去上海的人数，而现在不同了，提出要使万商云集。城市工作的水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这样一来，经济活跃了，服务设施也有了，渠道也通了，市场繁荣，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要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想法、打算很好，我赞成。

进一步改革，还要注意到金融市场、劳务市场问题。一九八六年要探索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探索，一方面看准了就改。比如金融方面已经出现了资金融通的现象。登封县不是就有外地来投资开煤窑的嘛！另外，在金融方面，按照有利于增加储蓄的方向进行改革，那就是正确的。但储蓄增加后，钱用在哪里，需要研究。从当前看，首先要用于流动资金。现在金融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票子发多了，不得不控制一下发行量，这

样一来流动资金就比较少了，包括收购农副产品，有的地方只好打白条，有些工厂互相赊账。一边票子多，一边通货不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消费基金增加过多。银根一抽紧，首先是流动资金吃紧，不少地方把流动资金占用了。所以，在储蓄增加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钱一是用作商业流动资金，包括农副产品收购；二是用作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千万不能把这部分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上，也不能用于扩大消费基金上。如果那样干，影响周转的流动资金仍然解决不了，而周转不灵，就会影响生产。这部分钱的使用，要在宏观上加以控制，这样比较稳妥。至于集资问题，也正像析综同志讲的，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采取慎重的措施，不能一哄而上，如果大家都去搞，就会造成基本建设过分膨胀，物资将更为紧张。集资只能有条件地进行，集多少，用在哪些项目上，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作为金融体制改革，很多问题都可以进行探讨研究，但要行动的，明年主要就是增加储蓄，改进服务，把资金用好。

劳务市场也是一个大问题。要存利去弊，进行研究。工厂招工、离退休后的社会保障等，都有许多问题。各个企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有的是新企业，技术设备、工人结构都比较好，退休的工人不多，负担不重，但再过二十年，他们的问题也会出现。总之，不管是金融、劳务市场也好，科技、商品市场也好，还有国际技术市场问题，都要发展，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因此，需要我们下功夫进行探索研究，看准了的就改。

第六，现在改革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放活以后，有的企业搞得比较好，工资福利就可能高一些，但这样搞的结果，又引起了左邻右舍的互相攀比。搞得好的企业收入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搞得不太好的企业也要攀比。还有企业与机关之间，也互相攀比，越攀越高。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攀来攀去，你高我也高，如果不加以节制，最后的结果仍是吃“大锅饭”，改革从克服吃“大锅饭”出发，最后还是回到吃“大锅饭”上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恐怕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可能成为决定我们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不照顾先进企业，不提高一些待遇，就不能进一步调动工人的

积极性。而这样一来，后进的企业也要攀比、照顾，这还叫什么鼓励先进？这里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间有很多不可比的条件，不能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如厂和厂间占有的固定资产不同，生产的产品不同，利润也不一样。总之要找出一个避免相互攀高的办法出来，既能鼓励先进企业，又不使这些企业职工收入和同类企业过分悬殊，其它企业也不能攀比。这是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有些办法，本来想用以奖励先进，但搞得不好的企业工人也会说，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发我也发，没有钱，甚至动用生产发展基金。原来提出机关调资要和企业割掉联系，结果怎么样呢？看来是割不断的。今年机关干部平均提高了十八元的工资，工厂企业也要提高；那么明年呢？明年如果工厂企业的工资增加，机关也去攀比，这样机关、企业之间，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之间，大企业、小企业之间，上交税利多的企业和上交税利少的企业等，都互相攀比，互相提高福利待遇，结果就把消费资金抬上去了。单从一个企业、一种情况看，形势也不错，从大的方面看，从宏观上看问题却相当严重，互相攀比的结果，生产没有搞上去，而消费资金却膨胀起来。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全国不少地方都是购买彩电、电冰箱成风，这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有人估计，中国人现在的消费水平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时的水平。我们是消费过早、超前，叫“消费早熟”吧。要看到农民增加了收入，着重用于生产投资；而城市人民增加收入以后，着重用于消费，买高档消费品。收入增加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大家知道，过去吃红薯面窝窝，现在买电视机，黑白的还不要，彩电十四吋还嫌小。要买十八、二十吋的，而西欧不少地方还有黑白电视机。应该看到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但消费水平已经超前了。实际上我们人均并不多，按一美元折三点二元人民币来算，只有三百多美元。当然这个算法也不尽准确，世界银行估计，大概人均达到四百至五百美元之间，我也赞成这个看法。这个水平在日本那是根本不行的，就这么一些钱，你要吃饭、住房，就不能去买彩电、电冰箱。我们的物价低，房租很少，每人平均只有五百美元的水平，却有了上千美元的消费欲望，胃口很大，消费水平超前，搞不好我们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未老先衰。为什么西欧、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多大活力？就是因为他们的

消费水平超过了生产发展的水平；新加坡也是这种状况，李光耀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总而言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基金搞得太高是自杀政策，必然造成未老先衰。同志们知道，过去十几年没有提工资，这几年消费基金多增加些是应该的，那是属于还账性质的，如果今后仍然这样消费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互相攀比就可能产生这个结果，不要看现在城市形势好，农村形势好，这个问题不切实解决，就会发生问题。在下边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危险性感觉不那么大。我也不主张走原来的路子，把先进企业限制得很死，但总得找个控制、节制的办法，好的不能太高，差的也不可互相攀比。要有差别，但差别也不能过于悬殊。

第七，控制基建规模中非生产建设的比重要注意。基建投资规模要加以控制，不能再扩大。在党代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来在省长会议上我又进一步讲了这个看法。明年、后年的基本建设规模都要稳定在今年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一条，国民经济就不能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现在上上下下对这一点原则上也是赞成的，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有个问题，要引起注意，就是基本建设里面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中的比例问题。过去我们只注意搞生产性建设，不注意搞非生产性建设。近几年，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搞得大一点也是对的，还账嘛！过去有些我们叫非生产性建设的实际是生产性建设，如道路、城市建设等，旅游业包括你们的“宋城一条街”也是生产性建设。由于住宅紧张，多建一些住宅也是必要的。住宅建设在我们的基本建设中比例应该大一些。但究竟我们的非生产性建设应该占多大比例？有一个统计资料，从“一五”到“五五”，非生产性建设占21%，现在占42%，你看增加多少！在非生产性建设中，住宅建设过去占38%，现在是近50%。当然房子是要盖的，但按这样的比例干下去，把钱都用在房子上就不行了。我们的住宅建设要占适当的比例，但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有的企业一年建的住宅每人平均四平方米，如果都这样搞，就不得了。基本建设中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住宅建设在非生产性建设中的比例，都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后劲问题。如果今后还是这样搞，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可能没有后劲，现在不是没有这个危险。

“七五”期间，我们面临的任務，一是搞好改革，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总供给和总需求失去控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二是使经济建设有后劲。消费基金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内高一点是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在一段时间内高一点也是应该的，但过分了，长期这样下去，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三是提高人民生活。这就发生了人民生活和后劲的关系问题。因此，改革不能改来改去只考虑生活，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后劲问题。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生产不断发展，有后劲，改革的成果才能巩固，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明确的认识。我们的改革，今年迈出一大步，一九八六年不准备迈出更大的步伐，要巩固、消化、补充原来的改革措施，存利除弊，解决突出问题，使之带来更好的效果、更高的效益，同时进一步探索，弄清楚一些问题。

## 注 释

1. 杨析综(1928-2006)，四川大邑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 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 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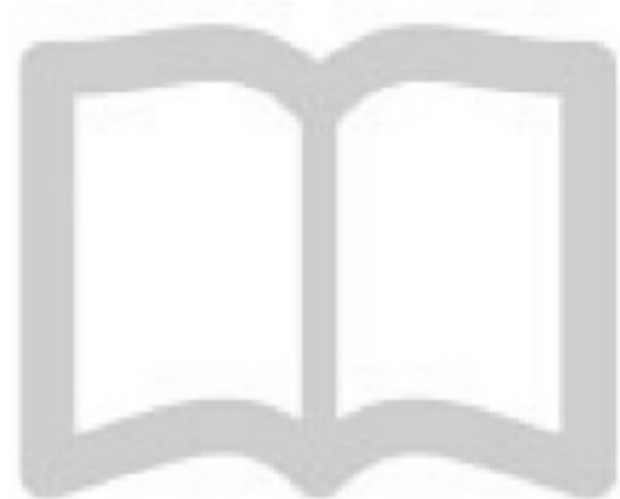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团支部并转八四级全体同学：

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感谢你们的新年祝贺。

这里，我祝贺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进步。你们是未来的人民教师。我们国家的振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者。为了将来按照这样的目标去造就你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造就你们自己。这是几句很平常的话。唯其平常，我相信只要努力，都能做到。

赵紫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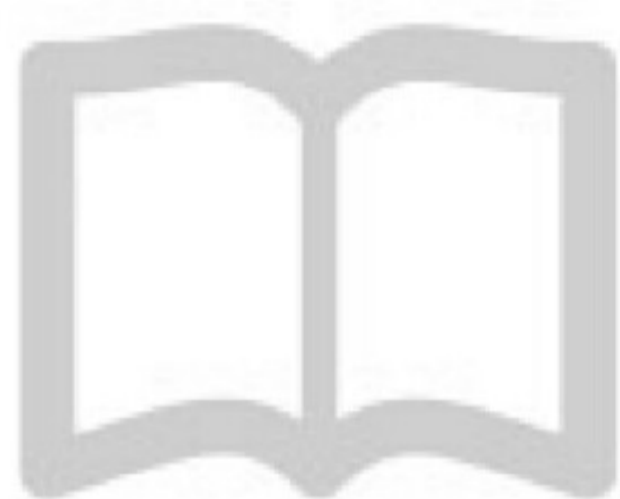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一九八六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经济工作\*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

(一) 对去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去年一年，加强宏观控制，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应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整个经济情况正处在由紧向松的转化之中。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了总供给，而且稍一不慎，还有加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确实存在不区别情况、一刀切的问题，有些不该紧的也抽紧了。这在去年那种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如不加以改进，也不利于增加生产，改善供给。在解决当前的供需矛盾上，一方面必须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必须改善供给。不把膨胀了的需求抑制下来，经济就无法稳定；但如果不从改善供应上做文章，生产也会萎缩。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注意。

(二) 改善宏观控制。今年在微观进一步放活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而且特别要注意改善宏观控制。既能控制住，又不要“一刀切”。这就需要改善宏观控制，否则，没有前途。“改善”，有许多内容，要求我们提高工作质量。无论在基本建设上、信贷上，既要注意控制总的规模，又要注意使该上的上，该支持的支持，该紧的抽紧，以改善投资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这样既能避免重新出现超高速；又能在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速度。因此，一九八六年可以说是“改善年”、“质量年”。

---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三)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这是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第一, 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 今年基本上保持去年的水平; 第二, 调整投资结构, 清理在建项目。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问题是投资结构很不合理。据统计局分析, 去年非生产性建设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生产性建设; 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投资比重下降; 用于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也连年下降, 其中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的投资比重也在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 更不利于今后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控制总规模, 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项目清理。如不进行调整, 规模就控制不住; 勉强去控制, 就会给将来的发展造成困难。调整结构的难度比控制规模更大, 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这里。

据统计, 去年十月、十一月, 各地就新上七千多个项目。首先必须清理去年第四季度新上的项目, 定几条界限, 除能源、交通、出口创汇和其它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外, 一律停止拨款, 听候清理。这件事要赶快发出通知, 春节前就要把风刹住。然后组织力量, 清理其它在建项目, 下决心停建缓建一批, 保证重点。不仅预算内的要清理, 对预算外的项目, 也要清理。由计委牵头, 制定办法, 把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调整方向管起来。

农村乡镇企业要有控制地给予支持。主要应帮助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搞好技术改造。也有一些基建项目, 如建材、采矿、交通、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市工业配套的, 可以分地区、分项目、有条件、有目标地予以扶持。总的精神还是: 第一, 要控制; 第二, 根据去年情况, 给一个信贷指标, 规定用途, 保留检查权, 使乡镇企业向符合宏观的方向发展。农业投资要适当增加。去年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 今年国家可以增拨给一些专项指标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

技术改造投资要增加一些, 并要使用得当, 不能用于基建, 不能再搞长线产品。应当把有限的投资用于适销对路的紧俏商品上, 提高质量, 改善供应。

今年还要适当多利用一些外资。纯粹利用外资而增加的基本建设部分(不包括国内配套), 可以另行计算, 不列入今年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还有一个体制问题。有人建议把建设银行办成像世界银行那样的投资银行，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可以考虑，将来把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策的项目搞得很少，其余的交由建设银行按照世界银行审定基建项目的方式去决策。

（四）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要逐步改善，但消费基金总额必须加以控制。这几年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是带有还账的性质，不可能长期如此。当前在工资福利问题上，互相攀比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要看到，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是高就业、低效率，相应的只能是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便宜，是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互相攀比、轮番抬高的结果，就会形成消费基金的过分膨胀，这一优势就有丧失的危险，最终将导致经济的未老先衰。世界上一些国家在经济成长时期把消费基金过高地增上去，使经济失去活力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五）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供应。今年要支持适销对路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把它摆到重要位置。去年我们面临的是超高速，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抑制需求、紧缩银根去做；今年情况不同，在抑制需求的同时，必须在增加供应、改善供应上做文章，大力增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商品，满足市场需要，回笼货币。这就需要在流动资金上加以支持。在货币问题上，既要紧缩，又要合理供应，两个方面都要做好。不该贷的贷了，要纠正；应该贷的不贷，也要改正，这样才符合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今年银行增加的储蓄、筹集的资金要首先用于工业和商业的流动资金上，加速流通，扶植生产。为此，银行信贷工作必须提高质量，一边实践，一边改进。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要围绕改进服务（以减少旅途携带大量现金）、增加储蓄、合理使用资金这三个问题进行，创造一些新的经验。

（六）把出口搞上去。出口的好坏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极大。今年出口如果好一些，回旋余地就大，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发展外贸出口，归根结底要解决三个问题：一要有一套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出口产品的积极性的政策；二要实行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农贸结合；三是外贸部门必须把重点从国内收购转向国外销售。当前最紧迫的是要有几条明确的政策，

把出口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好在春节以前公告全国，使今年的外贸出口有可靠保证。

要研究在银行的领导、管理下，设立外汇调剂市场的问题。至于整个外贸体制的改革，另外再议。

（七）经济体制的改革。去年我们的改革迈出了一大步，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八个字，同时为明后年再迈出重要的步伐作好准备。

价格体系的改革，今年不采取大的措施。要尽量想法把蔬菜、副食品的价格稳住。钢材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外的搞专营，实行市场调节，规定最高限价。可从进口钢材和统配钢材中，挤出一部分投入市场，使钢材价格稳中有降。

机关的工资改革已经走上轨道，今年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企业的工资改革，去年从奖金拿出12.5元用于自费改革，今年允许其中的5元进入成本，也就是说全年人均增加60元。这要早出安民布告。与此同时，要研究制订今后企业工资改革的方针和方案。在分配政策上，今年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社会成员之间苦乐不均过于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是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由于外部条件不同而收入悬殊的问题。要制定一些调节措施，把突出的矛盾缓解一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不搞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不能悬殊过大，造成社会问题。

今年要进一步解决大中型企业搞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要采取调减调节税、增提折旧基金、减少中间层次等方式，把扩大的权力真正放到企业；同时要改进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使大中型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今年的改革要突出抓一下跨地区和部门的经济联合。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围绕生产、流通的需要，企业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冲破地区、部门的束缚，必将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化，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企业集团，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联合的反馈，进行有关规章制度的改革，从政策上予以支持，从立法上予以保障，促进横向联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流通领域里，今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农工结合、农商结合和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的问题也要进行试点。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要认真研究如何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

明后年如何进一步改革，可用今年一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拿出方案来。

(八) 今年经济发展的几项主要指标。计划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8%，不再变动。根据各方面预测，如把工作做好，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达到以下水平：

——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工业产值增长在10-12%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实际增加5%，技术改造要增加一些，还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总规模仍大体相当于去年。

——货币投放量200亿元左右。同去年比，有多投的因素，如农产品收购可能增加，利用外汇回笼货币比去年少。但也有少投的因素，如速度比去年低，物价上涨比去年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比去年小得多。

——外汇收支基本打平，国家外汇结存保持去年年底水平。

——物价指数比去年上升6%左右，其中3%左右属去年翘尾巴因素。

达到上述水平，可以避免速度一下降得太多带来的问题，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并为明年改革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

总之，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把以下四条抓好：一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住、调整好；二是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努力增产适销对路商品，满足市场和出口需要；三是把外贸出口搞好；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储蓄。只要今年工作做好了，明年的经济环境就会更宽松一些，改革就有可能进一步展开。

# 端正党风要从中央领导机关带头做起\*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同志们：

中央机关端正党风动员大会的正式议程已进行完了。我原来没有准备讲话，耀邦同志、启立同志再三要我讲一下，我就在正式议程完毕以后讲几句，表态性的。

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我认为，这是一篇高度概括、十分重要的讲话。纪云同志、兆国同志、尚昆同志的讲话都讲的很好，我也完全同意。

我们国家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就是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好风也好，坏风也好，都是北京带头，传遍全国的。我们中央党政军机关如果风气正、面貌新，全党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肯定会好转。所以，端正党风从北京做起，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做起十分必要。

端正党风，首先要抓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六个严重问题，这是很现实的，看得到、摸得着的，通过解决这些方面的不正之风，必然会触及到机关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纪律性、责任心等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进而加以解决，就能把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以

---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机关端正党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为人民服务。

我们必须看到，从总体上讲，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好的，是健康的，不是腐败的，但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确有些腐败现象，这也是不能讳言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敢于揭发这些腐败现象，并且我们完全有能力来除掉这些腐败现象。整顿党风，中央是有很大大决心的，也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方法上，书记处经过研究决定抓住重点，着重解决中央党政军机关的作风，首先从解决六条不正之风入手，我看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使中央党政军机关从一九八六年起能够以新的风气、新的面貌投入宏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设。

# 希望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sup>\*</sup>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中国希望恢复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这是为了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感谢邓克尔<sup>1</sup>总干事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秘书处为促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过程中作出的努力。

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个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sup>2</sup>，它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不但要扩大出口，同时还要增加进口。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同关贸总协定大多数成员国在某些方面，如外贸体制、价格和汇率方面的差异将缩小。

## 注 释

1. 邓克尔( Arthur Dunkel, 1932-2005 ), 瑞士人, 1980-1993 年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 推动各国间自由贸易。1991 年草拟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 并成功促使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参加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2. 赵紫阳会见邓克尔提出希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以后, 1986 年 7 月 11 日, 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申请, 从而开启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大门。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时的谈话摘要。此后, 国务院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 专门研究此项工作。

# 接见体改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一九八五年的价格、工资等项改革迈出的步子不算小，这一步取得的收获和成绩，比预料的好，就是说步子大、效果好。当然，有些改革还不配套，但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对今后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沿着大的方向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路子更清晰，因此对改革应充满信心。

一九八六年的改革有两项任务。一个是，对去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另一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为明年后年迈出新的一步进行准备。这就是今后三年，走完两大步，去年加今年一大步，明年后年一大步。另外对宏观控制问题，今年要进一步加强宏观控制。要支持企业的横向联系。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使企业之间产生收入悬殊、苦乐不均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要认真解决一下。今年把这些主要的工作做好了，对巩固去年的成果和今后的改革都有好处。

---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党校和国家体改委共同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第四期全体学员时的讲话摘要。

# 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最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连续开了几次会，分析了经济形势，研究了今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我讲以下七个问题。

## 一、对经济形势的估计

一九八五年是全面改革的第一年，看经济形势，离不开改革的形势。去年，改革的步子迈得比原来预料的大，效果比原来预料的好。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搞得是好的，已进入新的轨道。针对前年四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的现象，去年一年着重加强宏观控制，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各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集中表现在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生产上看，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 17.7%，这个速度还是过高，但从趋势来说，已从上半年的 23% 减缓到第四季度的 10.2%，趋于正常。农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 10%。国民收入增长 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27.5%。财政收入按老的可比口径为 1770 亿元，增长 20.8%，

---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计划、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做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 190 多亿元，比年初的计划减少。可以说，整个经济正处于由紧向松的转变之中。

去年初，我曾说改革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五、六月间，人们对情况到底怎样还没有把握。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初战必胜的要求达到了。对于这个胜利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足够的估计。我们不仅要看到改革对当年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长远的作用。几年以来，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经过反复实践、认识、实践，从微观的放活到宏观的控制，从商品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应当说，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认识上不是更模糊，而是更清晰了；对今后改革的路子如何走，不是更渺茫，而是更明朗了。这是极为宝贵的收获，对今后的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愈久，将愈益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作用。不能因为目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妨碍我们看到主流，看到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当看到，当前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社会总供给，而且稍有不慎，还有加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上，也确有不区别情况，一刀切的问题。这在去年那种情况下，是难于避免的。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继续注意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既要继续加强宏观控制，又要特别注意改善宏观控制，避免一刀切；既要把膨胀了的需求继续加以抑制，又要改善供给，把生产进一步搞活；既要把超高速度降下来，又要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这是指导今年经济工作必须注意掌握的几点。

## 二、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这是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去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势头虽然得到抑制，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现在许多地方还是大上的劲头，从乡村到地县，到处大兴土木，百废俱兴。去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预计达到 1610 亿元，增长 35.9%，加上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个人部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2340 亿元。规模相当大，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现在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大大超过生产性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据去年一至十一月统计，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增长 57.4%，而生产性建设投资只增长 24%。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投资比重下降，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也下降。去年能源的投资比重，由 1984 年的 23.5% 下降到 22% 左右。更新改造投资比重，由 1983 年的 30.6% 下降到 25% 以下，其中，用于增加产量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34.5% 上升到 41%，而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的比重都下降了。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更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当务之急，应作为重要的任务来抓。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既要控制总规模，更要注意调整结构和清理项目。如不进行调整，规模就控制不住；勉强去控制，也会给将来的发展造成困难。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能否控制住，今后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后劲，关键在于调整投资结构。调整结构的难度比控制规模更大，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这里。

据统计，去年仅十月、十一月，各地就新上七千多个项目。首先必须清理去年第四季度新上的项目，定几条界限，除能源、交通、出口创汇和其它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外，一律停止拨款，听候清理。这件事国务院准备很快发出通知，春节前就要行动起来。然后组织力量，清理其它在建项目，下决心停缓建一批，保证重点。不仅预算内的要清理，对预算外的项目，也要清理。由计委牵头，制定办法，把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调整方向管起来。

农村乡镇企业要有控制地给予支持。主要应帮助乡镇企业和村办工业搞好技术改造。也有一些基建项目，如建材、采矿、交通、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市工业配套的，可以分地区、分项目、有条件、有目标地予以扶持。总的精神还是：第一，要控制；第二，根据去年情况，给一个信贷指标，规定用途，保留检查权，使乡镇企业向符合宏观要求的方向发展。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要适当增加。去年大部分省区都有财政节余，今年国家可以增拨给一些专项指标，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

技术改造投资指标要增加一些，并要使用得当，不能用于基建，不能再搞长线产品。应当把有限的投资用于适销对路的紧俏商品上，提高质量，改善供应。

现在沿海地区电力非常紧张，用柴油机发电，很不经济。而大电站的建设又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建议在沿海地区集资建设一批二万五千千瓦至五万千瓦机组的中、小型火电站，以取代柴油发电机。这些设备完全可以自己制造，下决心抓，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今年还要适当多利用一些外资。纯粹利用外资而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不包括国内配套)，可以另行计算，不列入今年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由国家计委统筹安排。

### 三、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

随着生产的发展，这几年职工工资总额有很大的增加。去年工资总额达到 1420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25.3%，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 12.5%；比 1980 年的 773 亿元增长 83.7%，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 50.7%。职工的生活，去年继续得到改善。前几年消费基金增长较快，有的年度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带有还账性质，不可能长期如此。现在要注意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考虑消费基金的问题，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国是高就业、低效率，相应的只能是低工资，而不能是高工资。现在有一种看法，把改革看成是工资大提高，这是一种错觉。我国和西方国家根本不同。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便宜，是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我们过早地、过快地把工资水平抬上去，超过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优势就有丧失的危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不会有竞争力，甚至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的未老先衰。我到过北欧、西欧一些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活力，不如日本，不如美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搞了过高的工资福利，现在都很困难。新加坡也出现这个问题。看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把消费基金搞得太高，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

第二，必须注意在消费基金上互相攀比的倾向。现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工资、奖金、福利上互相攀比的现象相当严重。攀来攀去，你高我也高，如不加以节制，最后还是吃“大锅饭”。有些赢利少的企业迫于压力，甚至挪用发展基金、流动资金，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互相攀比的结果，势必导致消费基金的膨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并且诱发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这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始终要密切注意的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严重性还认识不足。我们的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一方面要克服平均主义，承认差别；另一方面又不能悬殊过大。先进企业工资福利高一点是应该的，但必须瞻前顾后，适当照顾左邻右舍，不能过分。后进企业应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向先进企业学习，而不应在工资福利上看齐。今年在分配政策上，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成员之间苦乐不均过于严重的问题；二是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由于外部条件不同、机会不均等而收入过于悬殊的问题。要制定一些调节措施，把突出的矛盾缓解一下。

第三，当前面临企业同机关攀比的问题，机关工资改革以后，企业有些职工认为吃亏，要求向机关看齐。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形势教育，向企业职工讲清道理。在工资上体力劳动应高于脑力劳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不是脑力劳动者的工资高了，而是相反，必要的差距没有拉开。实际上，即使去年机关工资改革以后，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工资，无论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都低于企业的水平。一九七八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644元，一九八五年为1239元，增长92.4%；而机关团体职工一九七八年平均工资是662元，一九八五年为1173元，只增长77.2%。机关团体职工调整工资后和工业企业职工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现在有些职工提出这样那样意见，主要是不了解情况。各级党委、政府、工会和宣传单位，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切实做好宣传教育，要提倡领导和工人间的对话，像抓学生的工作一样抓好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 四、大力增产适销对路的商品

去年我们面临的是超高速，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抑制需求、紧缩银根去做；今年情况有些不同，在抑制需求的同时，必须在改善供给上做文章，大力增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商品，满足市场需要，回笼货币。去年还利用结存外汇，进口了一些高档消费品供应市场，今年这方面的进口大大减少，因此更加重了国内生产的任务。各地都要把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和出口商品摆在重要地位。

为了支持生产，当前突出的是要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去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工厂互相打白条，周转不灵，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今年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问题上，既要紧缩，又要合理供应，两个方面都要做好。不该贷的贷了，要纠正；应该贷的不贷，也同样要改正。这样才符合支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今年的货币投放和信贷指标，还是要加以控制，决不可以敞开口子。要采取多种方式，增加储蓄，开辟资金来源。除了银行系统以外，要把整个邮政系统的力量运用起来，开办储蓄业务。这件事银行和邮电部已达成协议，希望各地认真抓一下。对支付方式也要本着方便群众、有利流通的原则加以改进。现在有些专业户和商贩，携带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票子出去买东西，这是很不便利、很不安全的一种落后的支付方式，必须想办法改进，做到既能减少票子的投放，又能满足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增加的储蓄、筹集的资金首先要用于工业和商业的流动资金上，加速流通，扶植生产。地方财政有节余，也要增拨一些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就围绕着增加储蓄、改进服务、合理使用资金等三个问题去进行，创造一些新的经验。

#### 五、把出口搞上去

出口任务完成得如何，对整个经济影响很大。今年如果出口创汇情况好一些，经济上的回旋余地就大一些，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今年计划完成 270 亿美元的出口任务，是很艰巨的。面临着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的情况，我们必须从年初就抓紧，落实各项措施，千方百计把外贸出口搞上去。

当前主要是要解决外销不如内销，调动出口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问题，特别是要使出口企业有积极性。对出口产品的生产，要在外部条件上予以支持。同时要从退税、让利、奖励等方面，迅速制定出几条政策，在春节以前公告全国，使今年的出口有可靠保证。此外，还有一个“水货”问题，经济上损失很大，政治上影响很坏，各地一定要注意一下，决不能削价竞销，自乱阵脚，经贸部要加强对许可证的管理。

## 六、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去年改革的基础上，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同时为明后年改革再迈出重要的步子作好准备。

今年的改革，主要抓以下四件事：

第一，改善宏观控制。前面已经讲了，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等方面，不仅应当管住，而且应当管好。今年的宏观控制，应该有一个新的水平，在“改善”上取得一点新的经验。

第二，对已经出台的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作一些消化、补充，解决突出的遗留问题。价格改革，今年不再采取大的措施。要尽量想法把蔬菜、副食品的价格稳住。钢材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外的可以搞专营，实行市场调节，规定最高限价。尽量争取从进口钢材和统配钢材中，挤出一部分投入市场，使钢材价格稳中有降。机关的工资改革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年要抓紧解决。企业的工资改革，去年从奖金拿出12.5元用于自费改革，今年允许其中的5元进入成本，也就是说全年人均增加60元。这要早出安民布告。与此同时，要研究制订今后企业工资改革的方针和方案。

第三，进一步把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出口企业搞活。今年准备调减企业的调节税20亿元，增提折旧基金10亿元，以解决他们负担过重的问题。国家拿出这30亿元，是很不容易的，一定要把它用好，不能撒胡椒面，平均使用，更不能把它用在工资福利上。不是看谁的留利水平低就减税，而是看谁的调节税率高、贡献大才减税。这笔钱主要用在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应该说是可以解决很大问题的。国务院规定扩大企业的权力，应确实

放到企业，不准层层克扣。企业内部，要注意健全经济责任制，适当划小内部核算单位，改善经营管理，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活力。

第四，大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企业扩权的基础上，从生产、流通等方面的需要出发，企业之间包括一线、三线企业之间，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事物。它的好处是资源的开发、资金的使用、生产力的配置都比较合理，经济效益普遍比较好，符合社会需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企业之间加强横向联系的结果，将冲破地区和部门的束缚，促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企业横向联系发展下去，必将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新型企业群体、企业集团，在企业隶属关系、所有制结构、计划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等方面都将引起新的变化。我们要通过抓联合，促改革。在联合的过程中，暴露和发现现行体制、规章制度中阻碍联合的东西，加以解决，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年要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抓。对联合要从政策上予以支持，从立法上予以保障。比如投资保护、双重税收、纠纷仲裁、投资指标和产值的计算等，都需要明确规定一些办法，有所遵循。

此外，在流通领域里，今年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工商结合、农商结合和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商业服务设施社会化的问题，也要试点。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要认真研究如何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

明后年如何进一步改革，可用今年一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拿出方案来。

## 七、对今年经济发展的几点预测

今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维持在8%，各地仍应按此进行布置。

根据各方面的预测、执行的结果，今年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达到以下水平：

——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可能比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工业产值在10-12%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比去年实际增加5%，技术改造要增加一些，还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实际上的总规模仍大体相当于去年。

——货币投放量大体上200亿元左右。同去年比，有多投的因素，如农产品收购可能增加，利用外汇回笼货币比去年少等。但也有少投的因素，如速度比去年低，物价上涨比去年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比去年小等。

——外汇收支基本打平，国家外汇结存保持去年年底水平。

——物价指数比去年上升6%左右，其中3%左右属去年翘尾巴因素。

执行的结果，如达到上述水平，就相当好。可以避免速度一下降得太多带来的问题，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并为明年改革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

总之，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把以下四件事抓好：一是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住、调整好；二是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努力增产适销对路商品，满足市场和出口需要；三是把外贸出口搞好；四是千方百计增加储蓄。只要今年工作做好了，明年的经济环境就会更宽松一些，改革就有可能进一步展开。

# 关于统计信息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sup>\*</sup>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统计工作很重要，要加强，要改革。统计要提供准确、灵通的信息。准确、灵通的统计信息对宏观控制和决策是很重要的依据。

二、关于统计工作改革的方向问题。统计工作要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方向要搞清楚。外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全学西方那一套恐怕不行，苏联的模式也不一定适合，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走自己的路子。第一，是统计的准确性。单靠行政机构层层汇总上来的数字，不一定可靠，有些信息也不一定能够掌握；有时越求全越不准确。在国外，银行是一个掌握经济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系统，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搞民意测验等，搜集提供许多统计信息。政府统计部门应当利用各种信息，联系的单位越多越好，利用各单位的信息越多越好。第二，是及时不及时。第三，才是信息多少，也就是全不全的问题。宏观决策，有些数字没有分地区的，关系并不很大，当然会有些矛盾。哪些数字全国的和地区的要挂钩，哪些可以脱钩，你们研究一下。在方法上要灵活，要区别对待。掌握全国的数字很重要，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统计上要区别对待，对东部地区的要求可以细一些，对西部地区的少数省、区，如西藏、青海等，就不一定花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占的比重很小，而且条件困难，你费了很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统计局党组汇报时的讲话。

大的劲不见得就准确。要多种方法灵活运用，要加强抽样调查，我看你们抽选多少户调查就不错，资料也比较可信。

三、关于统计管理体制和工作条件问题。我看你们的汇报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人员和钱的问题，三是统计手段问题。统计管理体制是垂直，还是不垂直，垂直了能否排除干扰？各省意见怎样？需要好好论证，请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同志、体改委安志文同志主持开个会，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论证论证。

关于人员、经费、计算手段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定下来的，你们还可与有关部门商量。

经过论证、协商，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领导考虑确定。

# 发挥军工系统优势 向军民结合型转变\*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国防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对国家做的贡献是很大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国防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基础是很好的，科技队伍的素质也是好的。这几年在搞军民结合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但是，应当看到，国防工业还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军工部门要发挥自己的两个优势，一个技术的优势，一个装备的优势，这是任何部门归口、条条块块等都无法限制你们的。为什么大家到外国去引进，花了外汇，还到外国买东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崇洋媚外的问题，但我看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外国的东西好。军工发挥自己装备和技术优势，生产出一般工厂生产不出来的设备、产品，谁也封锁不了，轻工部封锁不了，煤炭部也封锁不了。不是讲在重复引进吗？哪个部门管得了啊！下面搞重复引进都管不了。所以军工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正因为你们不归口，没有人保护你们，就要靠自己拼搏，发挥自己装备的优势、技术的优势来竞争，谁也封锁不了。你们若不是靠自己的装备，不是靠自己的优势，就是让人家保护起来，最后还是没前途，还是要被淘汰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军工系统从总体上讲，装备是好的，技术力量也是好的。现在军工任务不足，这是正常情况，不要当成不正常的情况。我们所处的是和平环境，这一次中央军委确定的国防建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我

---

\* 这是赵紫阳接见航空和兵器工业部部分专家时的讲话。

们要加强科研，集中力量上水平，打基础。但是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这么大的队伍，光靠军工任务是不行的，是保不住的。如果领导上不是自觉把你的队伍，把你的设备，把你的生产能力面向社会，面向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你的队伍就要散，科技队伍要散，工人也要散，不管过去有多高的荣誉，拖上五年就把队伍都拖垮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是有领导地站到前边来转型，还是被动地在那里等待。转型是大势所趋。顺乎潮流的就能发展，不合潮流的就无立足之地。

军工本身有极大的优势，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还有很多制度上、体制上的障碍。国防战线上的科技队伍是第一流的，是我们国家科技队伍的精华。工厂的设备，总体上来看，也是我们国家机械工业的精华。现在就是怎样把这个队伍、这些设备面向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把事业和服务对象转移一下。肯定地讲，这个力量，在国内竞争，转到民品上去，转到为整个四个现代化服务，它的起点是高的。我以前讲过这个观点，我们国内和国外合作生产，首先军工应该搞起来。因为军工有比较高的水平，再加上同国外合作，就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石油伴生气回收装置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是一个很差的地方，很落后的企业，队伍不行，设备不行，在这个基础上与国外合作，必然是以外为主。如果用我们国防工业系统比较先进的设备、最好的队伍来同国外搞技术合作，这就高了一头，那就有很多合作项目可以以我们为主，时间也可以缩短。这就是我们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把优势发挥出来，当然这里有其他问题，还有体制上的问题。

我们的发电设备制造生产能力不足，有没有安排军工系统？有的当龙头，有的当配角嘛，搞技术转让，技术合作出卖技术嘛，也可以技术承包，你们那么多科技人员，可以出来专门搞技术承包，帮助设计、帮助制造。

如何保持科技队伍这个问题很重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路子在什么地方，我还是讲，如果企业不搞活，你是保不了的，企业如果没有活力，你是保不了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我觉得我们作为保军的问题来讲，我是完全赞成的，我们必须有一批很精干的队伍，精干的科技队伍，去攻关，去打基础，去上水平。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国防工业是个很大的摊子，所以现在国防工业里面，工人积极性、干部积极性、技术人员积极性，归



根到底，决定于这个企业有没有用武之地。企业如果把局面打开了，具有非常大的活力，大学生就会去了，尖子大学生也就会去了，攻军工尖端的人生活条件也会改善。如果离开这个大前提，离开这个大趋势，孤立去讲如何改变军工系统的状况，我看你保也保不了。现在我们总的看要提出这么个问题，我是从总的来讲的，我不是说具体的问题，不只是兵器工业部，也不只是航空工业部，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今年是一九八六年，“七五”计划第一年，整个国防工业战线（包括兵器部、航空部），应当是为国防现代化、为整个国家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期，到了应该和能够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期。

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很大，设备在全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科技队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为了组建国防工业队伍，特别是组建国防科技队伍，把最好的大学生，最优秀的科技人员，分配到军工，集中到军工，不仅是觉悟高，而且要业务尖子，因此，我们才有这么大的队伍。现在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队伍，这个生产力，这个基础，第一要继续地、进一步地为国防现代化做出贡献，加强科技攻关，打基础，上水平。还有一个新任务，就是它要为整个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根据新的国防建设方针，主要是在技术上打基础、上水平，科技攻关；而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职工，更多的科技力量，要面向四个现代化。这一个局面如果打开了，企业就会生气勃勃。我认为，保军转民，或者说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继续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如果军工系统不打开这个局面，不把自己的力量转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保军会受影响。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当然具体到一个企业，情况可能不一样。因此，什么叫军民结合型？我觉得，一个是认识的问题，我们的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孤立地保军，我看困难会更多。整个国防工业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打开局面，保军更有意义，对保军是很大的促进，现在国防工业许多困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什么山沟问题啊，治病问题啊，什么生活问题啊，才能解决。整个队伍才能朝气蓬勃。如果这么大的队伍，没有事情干，光是中央首长接见一下，登个报纸，宣传一下，就想把队伍稳住，这是不可能的。我说这是时代不同了。过去那个时候，是天天准备打仗，现在，我们一个是面临着四个现代化的繁重任务，一个是确定了相当长的时期内打大仗的可能性不

大。所以中央确定了新的国防方针。这样的情况，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设备，很大的生产力，国内第一流的科技队伍没有多少事情干。要把国防工业转向整个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只为国防现代化，这样也会有力地促进国防工业在国防现代化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要讲军民结合型这个观念。

为什么提军民结合型，我在这里说一下。这同军工企业搞民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一开始提军工企业搞民品，没有触及到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企业的性质问题。当时是军工企业以民保军嘛！就是没有多少事干，我就干这个事。军民结合型，就是说，我们的工厂、企业，不是军工企业搞民品，既不能说这种企业是军工企业，当然也不能说它是民用企业，它的机能，它的性质，决定它既搞军工，又搞民品。当然，各个不同的企业，比例不完全一样，企业里面的人员也可以有分工，车间可以有分工，科技人员也可以有分工，但是就企业来讲，不能说它是搞军工的企业，它是既搞军品又搞民品的企业。平时民品任务更大一些，战时军品任务更大一些。只要不发生比较大的战争，这个企业就是这个性质。当然，战争打得大了，不仅是军工企业，还有别的企业也要转。这样一个思想确定下来，对我们的企业和搞军工的同志来说，就能够把手脚放开，能够作长远打算。打开这个局面，我看有很大意义。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事情干，或者临时搞一搞，或者为了发工资、发奖金，当然这个阶段也会经过。这个认识，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长远规划问题，以及围绕长远规划的企业改造问题，也涉及到企业如何领导、如何经营管理的问题。因为军工企业一般是封闭的，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成本加百分之五，企业不可能是经营型，而是供给型，厂长、党委书记根本不研究市场，也不研究信息，企业就不能适应现在这个状况。当然，这两年有很大变化，但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军工企业如何变成军民结合型的两用性质的企业。

还有一个横向联系问题。军工企业如果把横向联系打开，相当一些军工企业可能是带头的。当然军工企业要搞横向联系，首先要解决军工企业的自主权问题。这几年反复证明了这一条，企业有横向联系的要求，上面这些“老子”是不愿意横向联系的。横向联系可以解放很大的生产力。所

谓生产力联合，就是专业协作。生产要素的联合，就是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的联合，就是城市松散的或者紧密的联合。总之，联合很有文章。但联合有个前提，只有企业在有了自主权的时候，联合才有可能。企业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听上面安排的情况下，那就不可能联合。所以，联合是一篇很大的文章。从上面来讲，比如从北京来讲，有个归口到哪个部门的问题。对企业来讲，它不太考虑，它看联合有没有利，能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企业联合就是这样考虑的。但一到北京来，它就有个部门问题。我是搞冶金的，我这是一机部，我这是军工部，企业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下面联合会受到上面阻挠，但是如果大家都把企业自主权扩大了，这种联合的形式就会顺利了。现在我们的联合里面确有这个问题。什么叫联合呢？就是打破行业、打破地区、打破部门界限，企业根据互相的需要联合起来。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我认为联合真正搞起来，军工优势就可以进一步发挥，因为军工光是技术就有很大的优势。当然这个问题也不简单，联合问题直接与现行体制有很多矛盾，要真正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可能要打破部门隶属关系，可能出现很多企业群体。就像重庆嘉陵摩托车厂，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群体。它自己参加了四家，联合起了一百多家，参加联合的企业分别属于各个不同部门，不是属于一个部门。所以，一个是军民结合型，要看到这个趋势，真正把我们的军工企业变成军民结合型；一个就是要搞联合，要促进联合。一线、三线的联合，也有许多内容；沿海和内地军工之间的联合，也有许多内容。大体上我们现在与国外合作的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引进资金、引进技术等，在国内都可以用。这种合作是多形式、多层次的。我们如果按这个方向来搞，军工企业就会活起来。军工一活起来，军工任务更容易保，军工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容易解决。当然，我这不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在保军的问题上，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或者说对现在的三线工业企业里面存在的一些困难，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从总体方面讲，这个局面不打开，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个局面打开了，军工企业有用武之地了，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要使全体搞军工的同志都认识这个总形势。不要被迫的、被动的，不适应这个形势，还是留恋过去的状况。留恋的时间越长，最后越被动。请军工部门的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要解决创造平等条件开展竞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还是部门所有制，还不能在平等条件下竞争。有两方面，第一，要逐渐地为军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二，军工要有这个气魄，依靠自己的优势，打破这个壁垒。

由兵器部带个头，把企业下放，下放了就有平等条件竞争了。现在是机械部的企业下放了，电子部的企业正在下放，接着，各个部的机械工业都要下放，什么邮电部的呀、铁道部的呀、轻工部的呀，都要下放，我看兵器部的要下放。企业一下放，联合的形势就造成了，就能平等竞争了。大家都没有直属企业，都变成地方企业了。

最近我们决定了两条，核工业部情绪就高涨了。第一，就是我们要搞自己的核电站；第二，今后核电站就归它，从建设到将来运转，到它给电网卖电。这两件事一定，核工业部就认为大有可为，变成第二个电力工业部。第一是水火电力工业部，第二是核工业部。这样一搞，它再搞什么氢弹、原子弹，就比较好办了。飞机将来也是很有前途的。兵器部是应该比较容易转的，当然，同你竞争的对手多，但你很有优势。现在，你还是要解决企业的体制，企业的领导思想。

刚才他们提了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问题。有这个问题，互相都有。实际上是个部门所有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把企业放下去，大家都没有直属企业了，就比较好了，企业自主权也有了。当然在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也应尽量改善，比如一些重要的设备招标，我们曾讲过多次，要一视同仁。话说回来，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军工这几年在军民结合这个问题上，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不少的企业尝到了甜头，自觉性也越来越高了，也就是把国防工业企业变成军民结合型企业的认识和自觉性高了。这应该首先肯定。

我们的国防工业，总的要作两条估计。第一条，就是过去几十年搞了这么好的一个国防工业基础，有这么好的一个科技队伍，这是很大成绩，是很宝贵的财富。第二条，确实要看到这个力量，这个科技队伍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发挥得很不够，潜力很大。现在就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体制上的原因，体制就包括你们说的别的部门、地区封锁你们，对你们不开放，也包括你们对别的部门、地区不开放，还包括企业自己还没有相应的自主权。军工企业自主权比民用企业小。军工企业多年来养成的

依赖思想比较大。这不怪军工企业和军工部门的领导同志，更不怪科技人员，主要是多年来体制造成的。要改变，当然要有适应的过程，但是要有信心，肯定是可以转变过来的。现在有些企业就搞得比较好。嘉陵厂就是个好的证明。现在，要因势利导，推动这个好的形势。

现在军工各个部门都有一些保军的重要的科研任务和生产任务，这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一批力量，各方面要保证条件，使这个队伍稳定下来，剩下的这些，生产设备也好，生产线也好，生产能力也好，研究所也好，科技人员也好，往民用上转。一开始转，也可能大材小用，这不可怕，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过渡。军工可以搞几个大项，除了归口给你们的，像飞机、核电站以外，可以搞出口。机械行业的出口，我认为还是军工的条件比较好。当然有些机械产品出口完全自己配，配不起来，可以和其它民用企业结合起来。另外就是搞技术改造。国防工业可以对我们现有的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并同引进结合起来，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往往是百分之九十可以搞，就可以达到国外给搞技术改造的水平。我们一般地说机械工业是技术装备部，可以改造各个工业，但是军工因为科技人员、设备水平比较高，质量比较好，所以可以改造现有工业，包括民用机械工业。我看军工可以做很多事。另外就是为国内的一些重要设备搞配套。总之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再结合逐步改革体制，包括整个国家的和军工的，这个路子可能是越走越宽。

# 发展旅游业需要“硬件” 与“软件”相结合\*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国家发展旅游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汇的三大支柱之一，即贸易、旅游、劳务。“七五”计划要收到经济效益，就要增加创汇收入。我们要明白，创汇越多，利用外资、借外债的余地越大。如外汇少，借外债也不敢多借。外汇多了就可以多借外债。国际上一般借外债，其还本付息总额不超过当年外汇收入的15%。比如全年外汇收入一百亿美元，借债的还本付息总额不能超过十五亿美元，否则会出问题。如创汇一千亿美元，即可多借外债，一年借外债的还本付息额可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同，并不是说百分之十五这个比例就是正确的。去年我在人代会上讲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外汇收入是个关键问题。现在要把发展旅游业列入各级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要列入计划，各地也要列入计划，要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考虑。

下面我讲一讲旅游业中的“硬件”和“软件”问题。

发展旅游业，需要有“硬件”，也就是要有饭店、飞机、公路等等。搞旅游，不搞好物质条件是不行的。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在会上讨论得很多了。

但是，旅游还有个“软件”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旅游队伍的素质，包括翻译导游、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旅游的管理水平问题，我们搞

---

\* 这是赵紫阳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的谈话纪要。

旅游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队伍，要搞到什么水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得很差，是非常薄弱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情况是硬件很差，软件也很差，两者相比，软件更差。

有了硬件，没有软件，旅游业也是不可能搞好的。软件没有搞好，即使有了基础设施，有了硬件，它们也发挥不了作用。

李光耀来中国，对我们饭店够不够的问题没有讲，却突出讲我们的饭店管理。他说这几年你们大饭店增加了许多，但管理得很差。

目前，我国的旅游业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但还处在初创的阶段。将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决定于我们现在打个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于我们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旅游队伍，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人员，一是管理人员。在初创阶段，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什么样的队伍的问题，就要很好地研究培养旅游人才、提高队伍素质、树立良好作风的问题。

中国要把旅游事业真正发展起来，绝不仅仅是饭店、公路、飞机的问题，更是个人才问题。中央关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就是强调人才问题。

国家旅游局要下很大功夫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饭店很好，但管理很差，不正之风很厉害，一开头就搞坏了，以后就很难再搞好，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个头是开得好的。旅游业是个新兴事业，在初创阶段，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今后在发展旅游事业的工作中，各级有关领导部门，都要把搞好软件，主要是抓好队伍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摆到首要的位置上。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不够的。

首先要下决心把学校搞好。把学校的领导干部、师资配备好，这样才能把人训练好，经过“六五”、“七五”、“八五”，我们的基础打好，队伍训练出来了，我们的旅游事业就可以健康、扎实地发展。

因此，我觉得，在旅游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首先要质量搞好，使中国的旅游业在国际上有声誉，得到国外人士的赞扬。现在，我们的声誉并不那么好。在旅游工作中，我们不能滥竽充数，搞瓜菜代<sup>1</sup>。

我们只有把软件搞好了，物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才会出效益。

要把质量搞好，关键是人的素质，队伍的素质，是对人的培养和训练，要舍得在这方面下功夫。我们可以请外国人讲课，请外国人来管理也是需要的。

## 注释

1. 瓜菜代，原指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粮食供应空前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度荒，当时中央号召城乡居民多吃南瓜、冬瓜等瓜类和蔬菜及小球藻等代食品，以弥补口粮不足，简称瓜菜代。后来泛指某些临时凑合、应付的不规范做法。



# 就三峡工程和核电站建设安排问题 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小平同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最近讨论了三峡工程和苏南核电站问题，现将纪要送上，希抽空一阅。

根据浙江秦山核电站建设情况（国产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和各方面条件，我们自己有能力搞 60 万千瓦的核电站（配套的常规部分——6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也已引进了制造技术），至多再进少量的关键部件就可以了。这比成套引进 90 万千瓦的，既可大量节省外汇，又可以使我掌握大型核电站制造技术的时间大大提前（制造 60 万千瓦后，再进而制造百万千瓦级的也不困难），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原来苏南核电站成套引进的方案需要重新考虑。

您对此事比较关心，先将以上想法告知，待您回京后再进一步汇报，并听取指示！<sup>1</sup>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注 释

1. 邓小平 1986 年 2 月 4 日在赵紫阳的这封信上批示：“赞成，退紫阳同志。”

#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部分专家 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最近，由耀邦同志带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军工各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先是一月二十一号，耀邦同志和方毅、李鹏、尚昆、郝建秀等同志接见了核工业部的专家。接着在二十四号，启立、方毅、尚昆同志和我一起接见了兵器工业部和航空工业部的一些专家。今天，我利用将要过春节的机会，见一下军工几个部的专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军工各部的专家，多年来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在发展尖端技术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启立同志说你们是无名英雄。过去由于保密关系，对军工战线上一些多年来埋头实干、苦干，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宣传很少。而且他们和中央同志接触的机会很少，因为，很多同志都不是住在北京，所在的基地、研究所、工厂都在山沟里面。启立同志有个建议，对那些无名英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时机加以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今天到这里来，也是表示感谢和慰问之意。这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国防系统的科技队伍，先进的工业设施、先进设备，都有很大的潜力，是很大的生产力，寄予很大期望。我们国防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是整个国家科技队伍的精华。为了加强国防，攻尖端，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把全国科技战线工作的优秀人才调到了国防工业战线，把许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分配到国防科研战线。另外，我们国防系统的设备也是整个机械加工工业中最精华的。所以，一方面看到国防工业战线科技队伍和国防系统的各个工厂、设

备，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还有潜力。所以党中央有个期望，小平同志讲得更早一些，就是说今后这支优秀的科技队伍，这么一个大的生产力，先进的设备，不仅仅是应当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而且应当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应当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这也就是我利用今年春节前的机会见见国防工业各部，包括发射基地的一些同志们，想传达的这么一个信息。中央对大家寄予殷切希望，希望进一步挖掘潜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我们的广播电视是租国际卫星，为什么要租呢？当然是租一个用钱少一些，过去广播电视部是坚持要买，而且国务院已经批了，要花多少个亿？（有人插话：2.8亿美元。）后来又确定不买。不买我们就租用，租用卫星大概已有几年的时间了。现在租用，以后就是两个可能，一个是买，一个是自己发射。现在，我们国内就是航天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这两家，还有基地发射，能不能在三年以内或到三年的时候，能够满足广播电视部的要求，如果能满足要求，那当然就不要在国外买了。这里有个用户问题，打开电视机，他看着不大好啊，他也会天天骂。他买了电视机，是为了看节目，牵扯到千万个家庭。所以你们只要能搞好，肯定会买你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要搞不好呢？肯定他不会买，我也不敢作主，要他一定买，一定要买我们自己发射的。因为你有个质量问题。而且这个东西，三年以后和现在又不是一个样子，这个领域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卫星，不仅要考虑到现在国际上电视卫星的质量，还要考虑三年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吧，或者两年，或者三年，希望能够发射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买外国的。总之，质量要有保证。

我们国防工业系统这么多人，将来干什么？有没有饭吃？我这不是从消极方面来讲，而是说我们现在除了完成军品，除了完成原来生产的那个产品转成民用以外，还有很大的潜力，应当为国民经济服务。

我跟兵器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座谈时，讲了一点看法。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当时我们有一个整个形势的估计，对战争的估计，那时，确实花了很大的力量组建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确实是很优秀的。现在，我们对这支队伍的要求，就不能要求它是仅仅继续搞军工。这支队伍是从全国各个战线调来组建的，我刚才讲了，是我们国家

科技队伍的精华，是我们国家整个工业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应当要求这个工业基础，这个工业生产力特别是这支科技队伍，要给它加任务，不能只担任军工任务，也不能只限于你原来搞的那个产品转成民用，而必须把自己的力量转上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你们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可能。我这样想，不管我们这个卫星怎样搞，航天工业部那么多人总是不能光搞卫星，恐怕是个浪费，是生产力量的浪费、科技力量的浪费。当然，我也赞成你们搞传统的东西，不仅要把它们维持住，而且要继续发展、继续开发，但总不能只搞这个东西。发射基地恐怕也是这个问题，听说国防科工委有几万人，光是放原子弹、氢弹啦？将来还有别的什么弹。你们也不能光搞这个东西。航天部也好，就是核工业部也不能光搞核导弹，我们国家能搞多少核导弹？我们国家现在总的一句话叫做技术人员缺，工业基础、工业设备、先进设备少。但是我们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组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放着，现在无用武之地。不管怎么讲，这是窝工，而且窝的不是普通的工，不是那个简单的劳动，不是那个担土的工，而是技术人员的工、专家的工。所以现在我认为：第一，国防工业各系统到了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做贡献的时候了，当然我不是要你不搞军工，也不是要你不搞原来的产品。第二，国防军工这个力量，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有用武之地。当然，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我们思想上要明确这一点。为什么？这是由于这支队伍在我们国家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我前面讲了，它是精华，我们国防工业的这支科技队伍，是我们全国科技队伍的精华，也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门。不仅是技术水平高，而且政治觉悟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至于怎么搞法？可以研究一下。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坚决打破军工部门对外不开放这样一种状况。还是老认为自己是军工部，首先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军工部，我们国家不能有单独的军工部，这并不是说不搞军工。只有开放才能把这个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当然，这种转变开始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很高级的技术人员去搞一些普通技术人员所作的事情，但那也是暂时的。我在飞机上和李绪鄂<sup>1</sup>同志谈了这种看法，将来军工各部，特别像航天工业部技术力量这么强，你们将来搞民用品时，很大的内容是要发挥你们的技术优势，就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在一般情况下技术上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不

仅是搞卫星、搞导弹是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的技术，也有很多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所不能解决的。为什么我们要引进呢？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关键设备、关键技术呢？当然也有重复引进，也有不该引进的引进了，但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国内有些技术落后，所以需要引进。

我们这个国防工业系统，为什么自己不去集中力量搞一些国家现在还要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呢？与其到国外引进，倒不如从航天部引进了，为什么航天工业部不可以搞这些东西？譬如说现在同国外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关键部件。设备没问题，但是一些关键部件不能解决，需要从国外引进。而我们这个国防工业系统里头有这么大的技术力量，又有自己的工厂，为什么你们不供应一些关键部件呢？当然过去消息不灵通，你们也不知道需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搞了以后，还有一些崇洋媚外的人，国内生产的他不要，而一定要进口。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国防工业系统能够在一些关键部件问题上攻关，除了攻上天的技术以外，还攻一些我们国内工业改造、技术改造、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关，那你们的贡献就是很大的了。你们有技术力量，又有设备，就是讲同国外合作，这个话我们不是现在才讲，我在两年以前就讲过了，同外国合作生产，合作设计，我们如果能在军工这个科技队伍、军工技术的基础上，同国外合作，起点就比较高，需要引进的东西可能就没那么多，要掌握这个技术就可能比较快，我们整个科技队伍的水平就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不是这样呢？假如按西昌市它这个科技队伍去同国外搞合作，那肯定要全盘引进。如果是四川成都来搞呢？可能就是引进一点，也可以自己造一些，但是可能引进的还是多一些。如果军工各部的技术力量能去攻这个关，也包括国外合作，不能说攻关一定要这个部件由我完全上，也可以同国外结合嘛。从我们军工技术这个起点，这个基础上同国外搞技术合作，搞一些我们国内还不能解决的成套设备中间的一些关键部件，我看它这样的技术就掌握得比较快。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方针。

原来，我们想从国外买 90 万千瓦的核电站，这个 90 万千瓦的核电站，如果由地方来搞，主要是由水电部来搞吧，就是买上四台，还不一定能掌握技术。就说他给你，你也不一定掌握得了。现在交给核工业部，30 万千瓦他就可以自己搞，如果搞 60 万千瓦，我们一方面自己干，一方面

还要同西德合作。恐怕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自己做，只有极少部分要同西德搞。而且这样很快，我们就可以自己干全套，自己搞。我是讲这样一个道理。我看广播电视要真正立足于国内的卫星，恐怕也要走同国外合作的道路。我就很赞赏你们那个银河亿次计算机，我到长沙看过，很赞赏这个搞法。为什么？它整个计算机里头真正引进外国的部分只有二百多万美元，但是它的机械的性能就很好。要是全部买呢？一个是国外不卖给我们，再一个要花很多钱，要上亿。全部自己搞，那二百万美元不花，名誉可能好一些，肯定性能不如现在。所以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实事求是。现在两种倾向都有。一种倾向就是离开我们自己的基础重新搞，从外国买，这个路子使我们国内的人没事干，我们的专家没事干，这种倾向要花很多外汇。另一种倾向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做，好像名誉更好一点，我看不见得。要是在我们比较高的起点上同国外合作，这样，我们很多尖端技术可以攻下来，很多东西可以搞下来。搞下来之后，我们很快就可以上去，这不是很有利吗？当然，这些事要真正变成一种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策和体制方面。但是，从指导思想，我们要明确这一点，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情况。

## 注 释

1. 李绪鄂(1928-2001)，湖北武汉人，导弹专家。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曾任七机部副部长、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 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四川长江以南的小煤窑要放手开采，以水运出川。山西这方面搞得好。四川没有多少东西，这样长江以南就搞活了。要在产煤区就地搞二到五万千瓦的坑口电站，这样也缓和了铁路运输紧张的问题。四川人多地少，要给老百姓找些增收的路子。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居住在十万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区，相当于孟加拉一个国家，这些地方解决吃饭问题还好办，但要致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下也没有啥矿藏，靠什么致富？要好好研究。四川虽然很大，但不很富，背不起原属西康省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所以就带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另案解决。

要把原西康省的问题解决一下，不要把对原西康省三个州的补贴都背在四川身上，中央要负担一点，这个问题今年不解决，明年一定要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把军工企业搞活。这在四川是一个很大的潜力，当然不是说一下就可以搞好的。应该说国家对四川的投资是很大的，修了成渝线、成昆线，搞了工厂，给了那么多科技人员，花了几百亿元，现在还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科技人员是国家的精华，在这里窝工浪费，有力没地方使，这是个极大浪费。这个问题要靠军工系统抓一下，不是简单地抓，而是要很好地研究，推广一些好的经验，要推动联合，发挥军工优势。四川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有很多人工业，很多科研机构。科学就

---

\* 这是赵紫阳在西昌听取四川省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

是生产力，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短是人口太多，长是摆了那么多设备和科技人员。如果能挖掘潜力，发挥长的优势，就能给四川做出较大贡献。别的省没有这个条件。当然现在有很多困难，很多束缚，需要很多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你们要提建议，要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但政策要军工部门同意，如果定了的政策军工部门不高兴，给了你们政策也不能用，要两方面都有利，都有这个要求。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越往后这个优势越容易发挥。

西昌是个好地方，这里气候好，物产丰富，交通方便，还守着一个安宁河平原，是川南、川滇结合部的“黄金地带”。既利于发展粮食、畜牧业、林业，又有条件搞工业。而你们现在才四千万元工业产值，工业上不去，很多事情就难办。西昌市的工业第一步搞四亿元，第二步搞十亿元，什么时候搞到二十亿元，凉山就繁荣了。

要研究西昌的工业问题，包括省里都要很好研究一下。所以你们搞个规划，怎么把这个地区搞活。四川西南部一直到甘孜这一带，宜宾以南、昆明以北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所以你们要把西昌这个地方建成川西南和川滇结合部的中心城市。通过这个中心再辐射带动其它地区，这样整个凉山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起来。

你们要求建有色金属冶炼厂，我们回去可以说一说。冶金部、有色金属总公司可以来看一下，能不能在这里投资。现在要搞有色金属冶炼，有个电的问题，现在可以吗？（凉山州委领导：现在电没有问题，可以解决。杨汝岱<sup>1</sup>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搞的都是国家需要的原材料，不跟国家争能源、争原材料，有个指标就行。给民族地区增加“造血功能”，要给点政策才行。）

三月份要开一个联合会议，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凡是一线资金向二线、三线投资、搞技术改造、原材料生产、加工生产的，指标、准备另外计算，不算在你们省里。

昨天，我们看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那么多的科技人员，这次发射后在近期内没有事干。你们要好好联系，让一些懂工业的帮助你们，支援你们嘛，它有潜力呢。它有一千多技术人员，本科毕业生就有三百多人，离这里又这么近，请他们帮助西昌搞上去嘛。过去，可能我们在观念上有一



个问题，就是只想很大的开发计划，没有想这个地方经济怎么样发展起来。当时，这里搞过一个很大的班子，叫什么“攀西开发委员会”，省上想问题只想攀钢的问题，第二基地的问题，整个地区如何开发排不上计划。从基本条件来讲，西昌这个地方是可以搞得好的，省里要把这个地区重视一下。这里比甘孜条件好，也比雅安条件好，地下资源丰富，各种矿产丰富。你们刚才讲群采，当然搞得不错，但不能算是快的。冀东的一个遵化、一个迁安、一个迁西，一九八五年耀邦同志去，给他们说，铁矿为啥不自己开呀？就是要群众办矿嘛。后来他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搞了精矿粉100多万吨。几年之后就可搞到1000多万吨。凡是搞了的老百姓都富了，包括小选矿场都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有个口号，叫做“群众采，定点收，集中选，国家炼”。那里的唐山钢铁厂就帮助群众开采，一个技术员就管几个小矿点。你们这里，不仅会理县，还有几个县都有小富矿，你们可以派人到迁安、迁西，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是怎么采矿的。你们守着一个攀钢，也可以请他们帮助一下。所以你这个地方，除了农业以外，可以大力发展采矿，这不是很大的收入吗？你们要注意一下安宁河沿岸，加上西昌市，搞上去，州里的财政收入也多了，对那些穷的地方，你们才有力量支援。你们省里要落实，思想一定要转过来，回去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以搞快一点。

凉山农房建设主要有个习惯和文化知识问题。有的你给他修了，他也不愿住。我那个家乡，过去一到冬天，人都到牲口棚里去睡觉，睡在里边他比较暖和。这是一个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生活习惯问题。不改变生活习惯，你盖了房子，他也不一定到那儿去住。过去有个牧区，花了很多钱盖房子，废除蒙古包，牧民还是不愿意到那儿住，为什么？很简单，他住在那里，牲口没有草吃，冬天畜草不可能解决，他就不可能住进去。所以花了很多钱，拿四川话说，还是在那里摆起。我看，还是要宣传教育。随着农民生活的提高，文化、卫生条件的改善，他们有了钱，他自己就可以解决了。现在，一个是没有这笔钱，一个是有了这笔钱是不是要花在这个方面？如果搞不好，花了很多钱没有用。只要把农民生活搞好了，文化提高了，再加上宣传教育，这个问题逐步会解决。现在农村里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些缺文化的地方，就是收入多了，房子也盖得不错，但是一进那个

家里头，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些地方文化比较高一点，收入不那么高，家里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这就是个文化问题。

你们要求允许硅铁出口，可以嘛，回去专门解决。如果国家将来还在进口硅铁，那就减少进口，把你们的顶上去，节省点外汇，给点优待嘛；如果国家不进口，那当然可以出口了。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水电资源丰富的地方，水电都有一个用不完的问题，可以发展些用电较多的工业。我到九寨沟就说，你们那么好的水，落差那么大，为什么不搞点水电站？他们说我们电还用不出去呢，修来干什么。这倒是个办法，水电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办一些高能耗的工业。

关于三州（凉山、甘孜、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问题，今年不能解决，明年要解决，把你们三州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注 释

1. 杨汝岱（1926—），四川仁寿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 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这次我和启立、纪云同志以及中纪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来海南岛，看了一些地方，沿途和林若<sup>1</sup>、姚文绪<sup>2</sup>、孟庆平<sup>3</sup>等同志议论了一些问题，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 一、海南的同志要重新振作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搞活， 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这个问题是海南各级领导、驻岛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全岛各族人民迫切需要回答和希望回答的问题，也是全国各个方面所关心的问题。

这次我们在海南岛住了十天，跑了八县二市。听了海南行政区、自治州、县（市）和一些基层单位的汇报，总的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海南岛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海南全岛的开发建设事业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成绩。过去我多次来过海南，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三年二月又来过。这次沿途看了许多地方，感到海南的面貌确实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区党委汇报说，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2.8%。外贸出口发展也很快，一九八五年全区出口总额 7613 万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了三倍。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139 元，一九八五年上升到 380 元，增

---

\* 这是赵紫阳在海南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加得相当快。海南岛从五十年代就讲要开发，中央各部和广东省各有关部门也多次派人来，规划也搞过多次，但海南的开发一直进展比较缓慢。这几年却大不相同了。实践证明，实行开放、搞活的方针，就可以使海南具有的独特优越条件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加快开发和建设的步伐。

海南实行开放、搞活以后，在一九八四年发生了倒卖汽车的事件，使正在顺利发展的形势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只要全岛各级领导认真总结经验，正确吸取教训，就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今后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在继续开放、搞活的过程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如果因为出了汽车事件就怀疑开放、搞活方针的正确性，或者对海南的开发失去信心，都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当前，海南各级干部应当重新振作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事业扎扎实实进行下去，取得新的成就。

汽车事件确实给海南在经济上带来一些困难。这是暂时的，主要应靠海南的同志自己去解决，而且也是不难解决的。为了使海南的开发建设尽量少受一些影响，更快地渡过困难，中央和国务院也要尽可能给以支持和帮助。因为海南的开发和建设是全国的事业，是举国上下关心的。海南的同志应认真吸取教训，严重违法乱纪的理应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处理是一回事；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海南的开发建设不要因为汽车事件而受到大的影响，又是一回事。我曾经说过，不要把对犯错误的人的处分甚至法律制裁，变成对海南几百万人民的惩罚。因此，中央也好，广东省也好，对海南的困难要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汽车事件给海南造成经济上的沉重包袱，就是欠下银行四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而且还要付利息。另外，进口积压物资还有四亿多元债务。这是一个不小的包袱。鉴于海南的困难，去年十二月中央和国务院已拨给一亿元补助款，这次决定再增拨五千万元。另外，海南的同志讲，上交给国家的五万多辆汽车，成本核算上和利息上，国家物资局还要补给一笔钱，大概也是几千万元。这三笔加起来，就是二亿元左右，相当于你们债务的一半，把这个钱用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你们要分别情况，具体规划一下。有些单位有偿还能力的，应责成它如期还清；有些单位虽然可以偿还，但要延期付款的，可以代它付一部分利息，助它一臂之力，使它分期还清；

有些单位如妇联、青年团等，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首先由各地的市、县政府帮助它偿还一部分，不足的，行政区、自治州再补助一部分。你们要作出具体的、细致的安排，争取一、二年，把这个包袱解脱，把欠银行的钱还清。应该说有了这二亿元，是可以做到的。此外，你们提出增加两亿人民币贷款指标，我回去同人民银行商量一下，尽量予以支持。

这里要说明，为什么海南在汽车案件上犯了错误，中央和国务院还要拿出一笔钱帮助解决困难呢？是不是鼓励犯错误呢？不是！主要是为了不因汽车事件而影响海南的开发。这一点海南的同志要正确对待。那么，为什么又不完全帮助海南把包袱解脱呢？第一，中央也有困难，再多给没有这个力量；第二，完全解脱，对海南吸取教训也没有好处。欠债还得自己还，背一些是需要的。这样解决，当然你们的资金还有困难，你们自己可以多搞储蓄，这是解决流动资金困难的一个好办法。希望全岛从上到下好好组织一下，真正把城乡储蓄抓起来，如果能增加一、二亿元的储蓄，资金周转就好解决了。

对汽车案件的处理，前一段中央和省的纪检部门、司法部门帮助海南做了很多工作。胡耀邦同志在这里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这次中纪委强晓初同志在这里开了座谈会，讲了很好的意见。总的来说，海南区党委在汽车事件中应负的领导责任已经解决了，包括对雷宇<sup>4</sup>同志的处分、对姚文绪同志的处分，也已经解决了。由于海南区党委的错误决定，影响到其他同志也跟着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如果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情节，没有中饱私囊的，那主要是接受教训的问题。对于那些虽然个人没有中饱私囊，但情节非常恶劣，拒不改正错误的，也应当按党纪政纪作出处理。还有一些不属于这类错误，而是涉及到违法乱纪的问题，特别是属于贪污受贿、中饱私囊问题的，那就应当根据党纪国法，依法处理。有一些虽然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但数量不大，而且态度很好，退清赃款的，也可以免于刑事处分。汽车案件涉及了不少人，在处理上应当有个方针。晓初同志讲的两点意见，我认为是对的。第一，要抓大案、要案，尽快把它搞清楚，查证落实后严肃处理。第二，要贯彻区别对待的方针，解脱大多数。这也就是要抓两头。我看在处理上大体有这么两个界限，一是是否中饱私囊，二是情节态度如何。采取这样的方针，可以申张党纪、政纪、法纪，又照顾

到海南汽车事件的特殊条件，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海南的开发建设。

按照党章、法律的有关规定，凡是需要追究党纪、政纪以及法律责任的，都要按规定手续报批，首先由海南各级严肃认真地、主动地处理好，该由当地审批的就在当地解决；该报广东省和中央的就逐级上报，注意不要把矛盾上交。中央和省的纪检、司法部门也应继续帮助和指导海南把案件处理好。为了使上下能够统一政策，协同动作，建议由海南搞几个不同类型的案例，比如哪一类属党纪、政纪问题，哪一类需要追究法律责任，还有个量刑标准问题。把案例搞出来以后，向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员会、高检院、高法院汇报，共同研究，确定下来，以指导和推动整个汽车案件的处理。我们回去以后把这个意见向耀邦、乔石和中纪委的领导同志报告一下。

采取以上办法，把汽车事件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案件问题处理好，将有利于海南各级领导和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开发建设、抓改革的事业上来。这是海南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 二、海南岛开发和建设的方针

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主要应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海南的优越条件，扬长避短，加快前进的步伐。海南，大家叫它作祖国的“宝岛”，“南海明珠”，喊了很多年。为什么过去发展缓慢呢？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针上没有发挥海南独具的优越条件。当然，这有历史的原因，有别的因素限制。过去长期给海南定了一个方针，要粮食自给。在海南种粮食并不是优势，这样做，恰恰是扬短避长，不是发挥优势而是发挥劣势。结果年年喊粮食自给，年年自给不了。其次，是种橡胶。发展各种热带作物，本来是海南的优势，但过去长时期在农场单一种橡胶，“文化大革命”中还批判种其他热带作物是“搞修正主义”，兴隆农场就把咖啡也砍了。而且过去还规定橡胶只准农场种，不准农民种，从一九六三年以后才逐步解决，但也没有推开。这样单一种植，多种经营的优势就根本不可能发挥。再次，是生产上搞过瞎指挥。

如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全岛大种油棕，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办农场种油棕，投入了很多资金和劳力，油棕长得很茂盛，但不结果或很少结果，也失败了。对海南开发影响最大的，是长期以来采取封闭的方针。那时有关海南区的一些文件上经常引用一句话就是“孤悬海外”。对外不能开放，对内地又隔着一道海峡，既不能外引，又不能内联，当然只能孤悬海外了，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海岛优势的发挥。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海南岛的经济之所以不能较快地上去，主要是方针问题。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我们在认识上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海南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由于是海岛，对外交往比较方便；第二，海南地处湿热带。全国有五万平方公里湿热带，海南就占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物产和资源较为丰富。这就是海南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应当围绕这两大特点来确定发展战略和开发方针。开放、搞活的政策，为发挥这些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不予改变。在生产方针上，要重视发展热带作物的生产和加工，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捕捞，发展旅游业，有资源的地方还要发展采矿业（包括群众办矿），要把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逐渐形成海南的支柱产业。胡耀邦同志视察海南时，也讲过这个意见。只要认真抓落实，我看海南的开发建设是大有希望的。

这里着重谈一下发展海南的旅游业问题。海南的旅游资源很丰富，热带风光，海滨浴场，名胜古迹，黎村苗寨，非常吸引人。从亚龙湾到黄流一带，是少有的好海滩，可以建设成为天然的冬季海水浴场，比夏威夷的浴场也不差。我到夏威夷，听说那里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二、三十亿美元。海南岛开发以后，每年旅游收入第一步如果能搞到五亿美元就不简单了，第二步再向高的目标前进。海南不仅对国际游客、对港澳游客有吸引力，而且也是内地人向往之地。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会有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观光。我们不应该把旅游业只看成是盖旅馆饭店，搞游乐设施，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产业、一项建设事业来对待，通过旅游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海南岛要把旅游业放在重要的地位，目前要把基础打好，搞好规划，培训人才，抓好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海南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的旅游胜地。

### 三、外引内联，大力创汇

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实行“外引内联”，同时要“大力创汇”。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创汇，才更有利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资金，引进人才。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方针。引进是受外汇制约的，我们引进的能力如何，归根结底决定于创汇能力如何。如果不积极发展出口，不积极发展旅游业，不能多创汇，多引进就会多负债。事实上没有外汇，外国人也不会借钱给你，即使借一点，条件也非常苛刻。为什么这两年对外借款比较容易，比较优惠？为什么中国银行在日本发行债券，是“三A级”，利息比较低？因为外国人知道中国每年还本付息占出口创汇的比例较小，还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有偿还能力。如果你的外汇少，资信差，你那个“三A级”就要降下来，借款也不容易借到。照国际上的通常看法，一个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占出口创汇的15%，就比较适当，超过这个比例，就有危险。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没有外汇可以借，他不了解，你没有创汇能力，就借不到钱。前年冬天在珠江三角洲我就说过，技术靠引进，设备靠引进，原材料也靠引进，而产品又是内销的，如果不加改变，外汇一紧，就玩不转。现在广东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海南这个地方要开放，要搞活，要利用外资，归根到底也要看你外汇有多少。现在你们创汇每年不到一亿美元，只相当于广东全省的三十分之一，这同宝岛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所以，在海南，要把多创汇作为开放、搞活的出发点。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要开发海南，需要对外开放，但首先是对大陆各地开放，搞好内联。海南要利用自己具有的独特优势和特殊政策，吸引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这里来，参加海南的开发事业。海南这个宝岛，是全国的宝岛，要打开大门，把全国各地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办工业也好，办商业也好，办运输业也好，办旅游业也好，都欢迎来。独资也好，联营也好，合作生产也好，补偿贸易也好，各种形式都可以。海南区党委的想法很好，不要怕内地来投资分得一些利益，他们在海南办了这样那样的事业，终究对海南人民是有利的。国内许多人对海南是感兴趣的，当然这不能用行政办法叫他们来，而是要靠互利互惠的政策吸引他们来。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有几条原则，叫做“平等互利，讲求实



效，多种形式，共同发展”。我看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海南和内地发展经济联系。你们要制定一些政策，敞开大门，放宽限制，鼓励内地各行业各单位到岛上投资办各种事业，给以优惠待遇，在税收、分配上适当照顾，使大家来投资有甜头。为了积极鼓励内地到海南来，中央和国务院今年就准备给海南增加几千万元内联的基建指标。有些地方有钱没有基建指标，到海南来就可以解决，这个指标，是特别拨给的，不占本地原来的基建指标。当然，搞什么要定向。只要政策对头，建设资金就可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南。海南也可以从内联中，学会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锻炼出自己的建设人才。

#### 四、进一步把国营农场搞活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海南岛国营农场已发展到九十一个，职工近五十万人，农场的产值占全岛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在技术、管理、资金、人才上都有很大的力量。我认为，海南行政区也好，自治州也好，各县市也好，都应当把农场系统看成是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的重要力量，这支队伍今后在建设海南中是大有作为的。据我所知，海南的不少干部对这点还认识不足，往往容易看到场群关系上暂时存在的一些矛盾，因而对农场重视不够。从总体上讲，农场系统的发展，不仅不会妨碍当地人民的利益，而且必然会促进和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所以，地方党委、地方政府，要鼓励支持农场和农场职工参加海南的各项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国营农场本身来说，必须进一步改革、放活。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要扩大农场经营管理和生产上的自主权，使每个农场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各级农垦局一定要简政放权，不要干预农场内部事务。

第二，要学习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把广大农场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调动起来，办好家庭农场。农场职工中有各式各样的能人，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可以办成许多事情，有利于把经济搞活。将来每个家庭农场都是一个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单位，与大农场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三，要实行多种经营。海南国营农场的生产方针，我建议不再提以种植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种什么要因地制宜，从本地的优势出发。橡胶生产当然不能放松，要继续搞，但有的适合种热带水果，有的适合种咖啡、可可、胡椒，有的适合种南药，不要局限于种一种作物，要发展其他热带作物。同时，也不要局限于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等也大有用武之地；不要局限于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旅游业都可以搞。总之，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向农工商运、牧工商运综合经营方向发展。

第四，农场不能是封闭式的，要打开大门走出去，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海南岛的每个地方，农场都可以去投资，办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国营农场和职工家庭农场都可以和地方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专业户建立经济联系，发展经济联合。农场系统办的企业，包括加工厂、商店等，既要为农场本身服务，更要面向社会，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服务。这样在经济上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过去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像场群纠纷等，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发展下去，将形成多种层次、多种经营方式的经济联合体，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要进一步把束缚农场发展的绳索解开，使它搞活，为海南的开发作出更大贡献，农场本身也得到发展。在新形势下要用新的观点，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来考虑农场的体制改革问题。过去农场系统在管理体制上，收呀，放呀，都搞过，都没有走出一条新路。这几年路子渐渐清楚了。根本的方向，是要在扩大农场自主权的基础上，搞好多种经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海南的农场，全国的农垦系统都应这样办。

## 五、大力培养人才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很好，现行政策也很多，有很多优越的条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缺乏。我看开发海南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资金，不是设备，而是人才。没有人才，再好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再好的政策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外地来投资，办企业，也会把各种各样人才带进来，但是主要要靠自己培养。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兴办各种中等专业技术

学校，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满足各项建设事业的急需。海南各级都要把智力开发、人才培养作为大事，摆在重要议程，下功夫抓好。

## 六、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海南岛要开发，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电力、港口、道路、机场、通讯等。国务院批准你们的二十四项重点建设工程，除了长坡煤矿及电站还要继续论证外，其余的可以按计划继续进行，争取在“七五”期间使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个较大的发展。

现在海南的基本建设摊子铺得相当大，也同样有一个调整结构、保证重点的问题。前年你们有个想法，想靠倒卖汽车赚一大笔钱，于是基建上铺了不少新摊子。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需要的，但有些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并不需要，不是你们的优势，应当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认真加以清理，下决心停建一批，缓建一批，以便加强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一些必要的加工业。这件事早调整早主动。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分个轻重缓急，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还是应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缩短工期，提高效益。

电力工业，在海南岛是个薄弱环节，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要充分论证，制定规划。长坡褐煤发电的问题，由于褐煤煤质差，发热量只有一千多大卡，开采褐煤发电，经济效益如何，还应该请专家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未弄清以前，不要盲目上马施工。海上天然气引到岛上来搞电站是可行的，但利用多少，建多大的电站，还要研究。我们国家煤炭工业的前景很好，你们可以在沿海港口建电站，从海上运煤来。你们还提出修建大厂坝水电站，可以装机二十六万千瓦，并增加灌溉面积一百多万亩，解决岛上西部地区的干旱问题。这个方案也可以论证。电力建设也不能齐头并进，先搞哪里，后搞哪里，重点搞什么，要有个全面安排。

机场问题，从全岛来看，北边是海口，南边是三亚，都得有个大机场，否则，发展旅游业是困难的。海口市的机场要改造好。三亚的老机场，靠市区太近，以后会影响三亚市的发展，从长远看不如在凤凰村新建一个机场。听说原来作过勘测，请有关部门再组织论证一下，如果论证可以搞，

就集中力量争取在四、五年内基本上建成，投资可以由中央、省和海南三家分担。

海南西部的铁路，你们提出交由你们经营。听说铁道部也同意。你们可以提高一点运价，增加收入后以铁路养铁路，逐步建设新线，由现在的昌江延伸到洋浦，再到海口市，靠自己的力量滚，形成西环铁路。这个方案我们赞成。你们也不要搞什么机构，就由交通部门统一管理就行了。

最后讲一下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体化问题。海南这个地方既是一个海岛，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海南的行政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一定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尊重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行政区党委和政府在全岛一体化建设中的统一领导，实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这并不影响自治州属地区一级的地位和享有的自治权力，而且能够把海南这个宝岛拥有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合理开发利用岛上的各种资源，使全岛的经济尽快得到振兴。至于海南的体制怎样才合理，可以进一步研究，从长计议。

为了加快全岛的开发建设，海南的同志要求计划单列。我们经过商量，同意采取类似广州市的办法，除财政仍归广东省外，其他的都由国家计划单列，这样比较有利。当然，计划单列以后，海南仍然要靠广东省的支援。

## 注 释

1. 林若(1924-2012)，广东潮安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曾任东莞县委书记，湛江地委副书记、书记，南方日报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主任。

2. 姚文绪(1925-2010)，辽宁瓦房店人。时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曾任惠州地委副书记，佛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湛江地委书记，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政协主席。

3. 孟庆平(1937-)，辽宁黑山人。时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曾任海南铁矿矿长，海南省副省长，湖北省副省长。

4. 雷宇(1934-)，广西横县人。曾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区公署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 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去年建材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希望今年能得到更大发展。进一步贯彻“大家办建材”的方针，建材部门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把骨干水泥厂进一步搞活是关键。对乡镇村办建材厂要给予技术指导，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十分重要。

会议我不参加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可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听取汇报。向到会代表问好，祝会议圆满成功。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 注 释

1. 林汉雄（1929—），湖北黄冈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局长，曾任水电总局副局长，葛洲坝指挥部参谋长，国家科委局长，国家经委委员，建设部部长。

---

\* 这是赵紫阳在林汉雄<sup>1</sup>1986年2月15日一封信上的批示。

# 国有森林不能下放<sup>\*</sup>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国有林，我从来不赞成下放。历来是这个态度。我重申，森林和别的不一样，树木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长起来，分下去谁能保证不乱砍呢！有的说林木下放了，破坏就少了，山林火灾也少了，似乎农民比圣人还高明，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抱怀疑态度。有的人还把这个叫做放宽、搞活，这样下放只能带来破坏。这几年，农区造林在发展，有森林的地区在大量破坏，你们讲风景林、防护林遭到破坏，我看其它林子也在遭破坏。国营林场、成片林绝对不能下放，荒地可以。你们要收集材料，反映情况，破坏完了再反映就晚了。林业部不反映这类情况就是默认。主管林业的不讲谁讲呢！你们要很好调查这个问题。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要慎重\*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 注 释

1. 胡乔木的信原文如下：

“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似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胡乔木 三月一日”秦柳方把当时经济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指责为“自由化倾向”。3月5日，胡耀邦也在信上批示：“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厚泽，即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

---

\* 这是赵紫阳在胡乔木一封信<sup>1</sup>上的批语。

## 赞成搞“火炬计划”<sup>\*</sup>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美国在搞战略防御计划。西欧提出了尤里卡计划。苏联东欧也有他们的计划。

过去，在“两弹一星”的竞争中，我保持了大国地位。现在进入了新一轮竞争，我应采取什么方针？花钱太多，超过国力，固然搞不起，但也不能无动于衷，无视这场竞争。

最近，王大珩<sup>1</sup>、王淦昌<sup>2</sup>等四位科学家给小平同志提了个建议。他们提出两条，一是跟踪，二是我们也要有一点。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件事，要我们提个意见，以凭决策。这是一件大事，宜早不宜拖。最近打算开个座谈会，找少数几位同志谈一次，议出了思路来，向常委报告，你们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个意见。

（宋健<sup>3</sup>同志谈到科委有个“火炬计划”的设想，专门搞尖端技术）

赞成搞“火炬计划”——中国的尤里卡。包括不包括军用尖端技术在内？恐怕以包括在内为好，以免重复。当然，原来已列入国防科工委计划的，仍由国防科工委负责。把军用和民用的尖端技术都包括进来，可以考虑由科技领导小组协调。

“火炬计划”，主要是搞跟踪，有的东西我们也可能走在前沿，有的也可能搞点开发。要多少钱？除现有投资外，“七五”、“八五”期间每年加2亿元够不够？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和宋健的谈话要点。



主要是要把方针定下来。从何着手？重点是什么？特别要注意，一是力所能及的，二是对建设有重大作用的。

七、八月份能不能拿出个“火炬计划”的初步方案来？这件事早一点定好。落实下去，也有利于队伍的组织。将来搞个精干的队伍专搞这件事，不能断了，散了。队伍定下来，其他的人愿意去搞技术转让，适当流动，也可以松动一点，有利于改革。

## 注 释

1. 王大珩(1915-2011)，江苏苏州人，应用光学家。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光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曾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3. 宋健(1931-)，山东荣城人。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曾任七机部总工程师、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中日友协会长。

# 就“国际和平年”对世界各国 听众的广播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向各国朋友们讲几句话。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联合国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仪式上，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国际和平年宣言》，宣布一九八六年为“国际和平年”。当时我能够代表中国政府亲自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感到很荣幸。

“和平”是人类千百年来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我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还是作为中国一个普通公民，同你们大家一样，对世界和平有着热切的向往。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渴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繁荣发展、平等合作的世界。联合国组织确定今年为国际和平年，倡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活动，符合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真诚愿望。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和支持。

大家知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关系到全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两大根本问题。各国人民深深懂得：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几年来，我访问了六大洲的许多国家，在国内也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朋友。在这些交往中，各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反对军备竞赛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与裁军的强烈愿望和诚意。去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减百万兵员的决定，就是中国人民支持和平与裁军事业的一个实际行动。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吃尽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加于自己的侵略战争之苦。近百年来战火连绵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新中国成立以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更加深感和平生活的可贵。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需要一个持久而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永远不会改变。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各国人民和睦相处中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贯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努力。当前世界上还存在着紧张局势和“热点”，战争的威胁也始终存在。然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我们对世界前途充满着信心。让我们和你们携起手来，负起责任，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了让和平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家庭竭尽自己的努力！

谢谢大家！

# 今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明后两年的改革，要有个设想。最近酝酿了几件事：

一、价格。主要是逐步把 66 种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理顺。这是比较大的变动，涉及初级产品和加工企业之间利益调整。

二、税制。有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价格改革所必须相应采取的措施；二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税制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土地税、资源税的设置，产品税和所得税的比重，增值税的扩大，调节税的调减以至取消等等。从税种到税率都要通盘考虑。可以说，这是利改税的第三步，工作量比第二步更重。

三、财政体制。不仅是调整基数，而且有重要的改革内容，如中央与地方在新税种基础上如何合理划分收支。

四、外贸体制改革。同前面所说的几个方面都有关联。如关税问题，退税问题，进口生产资料的价格问题等。

五、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直接关系到生产资料的市场问题和价格问题。

六、金融体制改革。也要有相应的考虑。

这些改革配起套来，可以说是一个大战役。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消费者，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市场零售物价指数影响多大，要认真测算，如不超过 10%，可否下决心同工资挂一次钩？

---

\* 这是赵紫阳与鲍彤<sup>1</sup>、白美清<sup>2</sup>的谈话纪要。

配套改革比单项改革好。配起套来，可以互相开路。单项改革，则矛盾重重。房租改革，先搞试点。全面铺开的时间，可以考虑晚一点。

最近研究两种体制并存的问题，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不可避免。二是矛盾和漏洞确实很多。新体制也罢，旧体制也罢，总要有个基本的框架。一九八四年以前是以旧体制为主。一九八五年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处在某种均衡、对峙状态。改革是渐进的过程，但这种相峙、胶着状态不宜拖得太久。拖久了，摩擦剧烈，绝无好处。两种价格并存也将是相当长的时间，但两种价格过分悬殊的状态也不宜延续过久。明后年迈个比较大的步子，基本上转上新体制为主，条件成熟不成熟？这是讲质的变化。至于量的发展，时间长一点，关系不很大。

总之，在企业、市场、宏观调节手段这三个方面，明后年主要抓市场体系和宏观手段（包括检查、监督、法规等在内）。这两方面如能抓出个头绪，就可以为进一步放活企业创造条件。横向联系是削弱条条块块的，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削弱条条块块的。这几步棋一下，企业的环境就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是提出问题：明后年的改革路子怎么走？可以是这样的思路，也可以考虑别的思路。总之要有所设想，然后认真准备方案。工作量肯定很大。要组织班子，全力以赴。国务院由一位领导同志抓总。各综合部门都要有相当强的力量专门抓这件事。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由体改委负责。

不打无准备之仗。关键是要把方案设计好，考虑周详。什么时候出招？要看时机。今年的速度可能不会太高，明年继续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明年或明年下半年可能是个时机，不要因准备不足而贻误战机。

## 注 释

1. 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

2. 白美清（1931-），四川双流人。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商业部、内贸部副部长兼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谷粮油集团、大连北良公司董事长，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会长。

#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生产问题\*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 一、关于横向经济联合

这次会议，是全国第一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横向经济联合，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抓联合也可以促改革。

横向经济联合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比较明显。联合的领域是很广的，包括生产领域的联合，生产与科研之间的联合，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联合，以及流通领域的联合等等。生产领域内部的联合，目前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名牌优质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一种是资金、原材料、厂房、设备、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联合。这两种形式的联合，一般具有配置合理，投资少，技术进步快，产品品种新，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物质消耗少的特点，因而经济效益比较好，是单个企业所不能比拟的。单个企业，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他们的长处容易被短处所抵销。比如沿海地区许多老企业有技术上和经营上的优势，但往往缺乏原材料，电力紧张，厂房拥挤，发展受到限制。内地有原材料，有劳动力，但缺乏技术指导，信息也不大灵通。有些原材料产区往往缺乏资金。三线企业有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作用远远没有充分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发挥出来。一经联合，扬长避短，互相补充，情况就会改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优势，比较全面的综合的优势。先进的企业得到发展的机会，后进的企业得到提高的机会，一些濒于破产的企业也可以起死回生。这是讲生产领域中的联合。其他各种联合也是如此。今年一月提出要发展一种跨地区的新的商业形式，如粮食联营，蔬菜和畜产品联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种跨地区的新的商业形式，不能货畅其流，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折，城市供应也将无法改善。所以，联合起来，对参加联合的各方，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利。这是讲联合的效益，联合本身就可以出生产力，出效益。

横向经济联合对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这里讲的是重大意义，不是一般意义。可以分三点来讲。

首先，横向经济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是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前年中央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符合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当然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它既然是商品经济，就不能违反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不能无视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横向经济联系正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就不成其为商品经济。人为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不符合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要求相互开放。资金、物资、人员、技术，都要流动。这是讲方向、目标。现在在条条块块之间，没有横向联系，这是同发展商品经济背道而驰的。经济体制改革，改来改去，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指出，条块分割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改变条块分割，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应该更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按劳分配同条块分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计划经济同条块分割也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是条条块块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也可以是没有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条块分割，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障碍。我们过去的经济活动，是按照条条块块的纵向隶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现在也基本上还是这样。商品经济则要求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旧体制向

新体制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广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破除条块分割的过程。要彻底解决条块分割，需要全面改革，需要各方面改革的互相配套。每一项改革的方向对不对，看它是有利于削弱条块分割还是强化条块分割。条块分割的问题不解决，统一的市场就不可能形成，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而横向联合本身，正是对旧体制的冲击，对条块分割的挑战。在推进联合的过程中，势必同旧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分配和流通体制发生矛盾，把现行规章制度中各种阻碍横向经济联系的东西全面地暴露出来。这不是什么坏事。整个改革，将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横向联合的发展，同削弱条条块块，是相互促进的。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做到的。

随着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叫做企业群体，或者叫企业集团。它们和行政性公司完全不同。一群一群的企业，自愿联合，互相服务，互相依存，休戚相关，协调行动。嘉陵集团、二汽集团以及常州的某些企业群体，就是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的萌芽。它们之间的联合，广度深度不同，紧密松散不同，还处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看来，抓住横向联合，因势利导，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很有可能通过这条路子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发展横向联合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我们宏观控制的能力。世界上有跨国公司。我们现在首先要促进跨省区跨部门的企业组织形式。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新的经济纽带。

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还有可能在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上引起变化。条块分割，容易使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成为部门所有、地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部门、地区的依赖性极大，吃大锅饭太容易，企业行为很难端正。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以各种生产要素互相投资入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方利益互相制约，各方利益都有自己的具体代表，企业行为就比较容易端正。在横向联合的过程中，在公有制基础上，中国的一部分企业也很可能实行一种全新的股份制。股份制，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企业向那个企业投资，这个地区向那个地区投资，这不是股份吗？由于价格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主要是投资分物资，将来也可能成为投资分利。单个企业不一定实行股份制，也不必勉强去搞股份制。企业联合起来后，很可能实行股份制。在中国，将来职工个人入股很可能



是小量的，主要是全民企业与全民企业之间、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联合起来以后，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但联合各方都有了具体的代表，都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这就同现在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同。所以，通过横向联合，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将进一步渗透到四面八方，更好地带动集体经济和专业户、个体户沿着符合宏观利益的方向前进。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明朗，但很值得注意，加以探讨。

所以，横向经济联合对改革的意义，绝不能低估。

现在提出要抓横向经济联合，怎么抓法？不是要大家一哄而起，更不是要自上而下地去“梳辫子”、“装口袋”，拼凑或者捏合这样那样的名义上或形式上的联合。主要是宣传联合对解放生产力、对改革的意义，提高大家的认识，从政策上鼓励联合，从法规上保障联合，改变不利于联合的规章制度和上层建筑，为联合排除障碍。纪云同志讲了六条，只要符合这六条的联合，就必须支持、扶植，不准阻挠、刁难。综合部门，专业部门，军工，民用，各地区，各中心城市，大家齐心协力，都来促进联合。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审议以后，要登报，一律遵守。这是一个初步的规定，初步扫除障碍，主要是解决一下税收、资金融通以及投资规模和产值计算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将来，随着联合的深入发展，还要不断加以充实。

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要在维护企业的自主权的基础上推动联合，绝不能削弱企业的自主权。企业要求联合本身，也是一种自主权。主管部门如果不准自己所属的企业联合，就是侵犯企业的自主权。我们提倡的横向联合，是企业之间自主的联合、平等的联合、互利的联合。联合不联合，参加联合还是退出联合，由各个企业自主决定。联合的内容和形式，参加联合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必须平等协商，谁也不能强加于谁。各方都有利，联合才能巩固。这种联合，就有生命力，拆也拆不散。企业都看到了联合的好处，就会朝这条路上走。领导的责任，在于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因势利导。

这里，要特别强调三线与一、二线的联合，科研（包括高等院校）和生产的联合。军工不同民用结合，是没有出路的。科研不同生产结合，也

没有前途。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对军工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都有很大的推动。在这方面，要多下功夫，多做穿针引线的工作。

工贸结合，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的联运，也是联合的重大课题。这两个问题，由体改委、经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继续探讨，请各地区、各中心城市也注意调查研究，提出意见。

## 二、关于明年改革的准备工作

今年改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明年、后年的改革作好准备。

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点比较有利，还是走小一点比较有利？大家可以酝酿研究一下。当然，这不能完全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要看主客观的条件。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明后年改革的步子走大一些似乎较为有利。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

一方面，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也就是要使整个经济体制进入新的轨道，或者说基本上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七五”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由于去年改革迈出了不小的步子，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已有的改革措施。明后年是“七五”的第二、第三个年头，这两年搞得如何关系极大。我认为在充分作好准备的前提下，明年乃至后年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或者说再打一个大的战役，才有利于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七五”期间进入新的轨道。如果明后年不迈出重要的步子，要在“七五”期间实现中央提出的任务就相当困难。

另一方面，目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交错的时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添了很大的活力，城乡经济空前活跃起来，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里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社会上也议论纷纷，讲成绩确实很大，谈问题也的确不少。原因就在于目前经济生活中新旧两种体制都在发生作用。我国的体制改革不是把总体方案预先设计好，在一个早上施行，把旧体制统统改掉，而是

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使新体制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这就决定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的时间不会很短，我看至少要十年左右，如果从农村改革算起，那就要更长一些时间。前几年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从整体上看，旧体制在各个领域仍起着主导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特别是去年改革迈出了相当大的步子以后，可以说改革已开始进入两种体制的均势、对峙状态，新旧体制谁也起不了主导作用，因而矛盾很多，冲突和摩擦也很多。两种体制对峙的这种状况，不宜拖得太久，拖久了，对改革、对经济建设都是很不利。前几年改革的结果，新体制发挥出它的作用，使我国经济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新局面；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这些消极因素不及时解决，新体制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制约甚至会消失。由于新体制还不能起主导作用，当我们在消除这些消极因素的时候，有时不得不借助于旧的体制和旧的控制手段，这样势必强化某些旧机制的作用，结果反过来又影响继续搞活，影响新体制的活力，形成一种胶着状态，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结束两种体制均势、胶着的状态，进入新体制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样将大大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搞活经济。当然，即使新体制上升到主导地位后，一下子也不会很完备，需要在积极完善新体制的条件下，利用旧体制中某些需要加以利用的职能。因此权衡利弊得失，在“七五”期间，我们应当考虑尽快结束两种体制均势的状态，进入以新体制为主的阶段，也就是把新体制的框架建立起来。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的步骤。

改革也有一个时机问题。经过前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改革的路子和轮廓越来越清晰，领导和群众都积累了一些经验，社会的承受能力增强了，如果我们今年再努力使经济生活更宽松一些，那么在明后年迈出改革的重要一步，应该说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其次，如果明年改革迈大步，到底着重改什么呢？在“七五”期间，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这三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明后年的改革，要在第二、第

三方面的改革上迈出大步子。我看主要应围绕为企业实行真正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能在一个大体上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创造条件来进行改革。现在，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还不具备，企业还谈不上真正自负盈亏，企业之间由于条件不同而苦乐不均的现象也较普遍。只有在两个方面的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企业才能进一步搞活，宏观上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才有可能。

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

我国的现行价格体系很不合理，许多产业、许多产品的价格严重扭曲，非调整不可，明后年应当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第一位。在前两年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和小商品价格之后，要重点解决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计划价格偏低的问题，使两种价格的水平逐步趋于接近，差价有所缩小，把这一序列产品的价格大体理顺。同时，要考虑逐步缩小国家计划内分配的数量，扩大市场调节的部分。这对搞活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大有好处。

价格一改革，相应地税收也要变动。税收问题，一是要随价格的变动而进行调整，二是要随形势的发展而进行改革。调整和改革税收，对价格不合理可以起到某种缓解作用，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实行利改税以后，企业纳入了税收的新轨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税制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大体平等的条件，下一步的税制改革要考虑通过产品税来缓解产业和产品间价格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通过资源税、资金占用税来解决级差收入问题。

价格、税收的变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都是一次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在财政上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财政，不仅是调整，也要结合进行改革。财政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明确各级财政担负的不同职能，有利于削弱条条块块的分割，以支持生产的进一步搞活，培植财源。

价格、税收、财政的改革必须配套。这是改革工作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应统一来搞。从单项来看，改起来可能变动较大；综合来搞，有些因素可以互相抵销。这三项改革同步进行，虽然计算起来很复杂，工作量很

大，但实施起来却比单项进行要容易一些，而且这主要是涉及国家与地方、部门、企业的利益分配，不像食品价格的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比较起来，三者同步改革，解决问题大，承受能力也较大。这是“七五”期间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不论是深度和广度上都迈出重要的一步，企业的外部活动条件将会大为改善，宏观控制也将大为改善。

另外，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外贸体制改革的问题。要不断完善宏观的经济调节手段，运用汇率、税收、关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杠杆，辅以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等行政手段，合理调节利益关系。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手段的前提下，解决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问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外贸进一步搞活、搞好。

明后年改革迈出这样大的步伐，能否成功，我看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物价指数能不能控制住，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控制住。

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它们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正如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是很重要也是很困难的工作。进行以上几项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对物价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承受能力怎么样。这次设想的价格体系的变动，有它的特点，虽然变动的幅度大，但主要是动生产资料价格（原材料、能源），而不是消费品价格，更不是副食品价格。尽管它涉及到地区、部门、企业的利益的一次大变动，可能有相当的震动，反应也会是激烈的，但比较起来，它对市场的影响，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风险没有调副食品价格大。但这次动原材料、能源等价格，总还会影响到市场的一部分，对这点我们应当正视，采取对策。调价的幅度有多大，波及面多宽，连锁反应多大，事先需要详细计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影响不大的话，为了取得这次改革的胜利，即使部门、地区、企业牺牲一点眼前利益，也要服从全局，把它搞好；如果对市场物价确有比较大的影响，物价指数上升比较多，我们也可以考虑，职工的工资增长与物价指数挂一次钩，不至影响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即使财政上一时少收一些，也要下决心搞。总之，要采取措施使市场物价不至发生大的问题，使人民生活不受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能否控制住，是这次改革成败的另

一个关键。投资规模如果过大，物资紧张，票子发行多，经济生活绷得很紧，就很难进行改革。为了使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宁可要基本建设让一次路，也要下决心搞。基本建设让路不外乎这两年少搞一点，从长远看，这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不很大，只是暂时的，以后可以补救，而换来的却是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基本建设争投资、争项目、铺摊子，把规模搞得过大，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一种“顽症”。前些时候我们进行的一些改革，并没有减弱这种顽症，有些方面还有所加剧。我们必须切实改变企业要上、部门要上、地区要上，只由中央控制的被动局面。因此，对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也要彻底改革，并且要制定一系列的调控措施，系统地加以解决。这应作为计划体制改革的中心来抓。

价格、税收、财政的改革，加上外贸、基本建设体制的改革，就是五大项。它们是互为作用、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可不可以这样搞，怎样有步骤地搞，请大家研究。今年就要立即着手组织班子，认真准备。要划分几个专门的小组，并要有一个综合研究的机构，把这次改革作为重大系统工程来进行。要组织力量，吸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老同志和中青年参加，集思广益，设计好方案，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

我讲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对二月份的生产怎么看。今年二月份的工业生产不太理想，这次会议反映大家很着急。我看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家分析一下也是必要的，应解决的问题要切实实地去解决，应抓紧的事也要抓紧去做。但要提醒大家，领导上不要急，更不要责备下边。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二月份生产速度为什么下来？去年速度过高就是一个原因。去年二月份增长23%，今年二月份增长0.9%，加在一起还是增长24%，平均增长12%。我看了一、二月份的生产报表，觉得问题不大。首先是市场紧缺的商品增长幅度不小，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是好的，财政收入情况也不错。计委给我送来一张从“四五”到“六五”的平均生产速度按月升降的曲线图，从十五年的规律来看，今年一、二月份的工业生产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根据这个曲线图推算，上半年速度低一些，下半年速度高一些，全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仍可达到8%。我们在年初讲今年可达到10%的

增长速度，那是预测，计划还是按8%安排的，即使低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不能看得过重，要沉住气，不要负担很重。抓生产也不要沿用过去开电话会、催进度、压产值的老办法，那样会助长企业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弊病。各级领导要深入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去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第二，要加强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落实经济责任制。据各地反映，现在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比较乱，意见不少，一是气有些不顺；二是经济责任制受到冲击，松懈下来了。这和去年企业工资调整时思想政治工作太粗有关系，没有把调整工资作为一件大事来认真抓，对调整工资会对经济责任制产生什么影响也估计不足。当前不少企业工人之所以松松垮垮，很大程度上是干部的问题带来的。有些企业干部对去年自己没有像机关干部那样去调工资有意见，对职工中的问题该管的也不管了，该做工作的也不做了。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有必要认真抓一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做好干部的工作。其次，要整顿和落实经济责任制。为了给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一点条件，原来决定把去年企业工资改革时从奖金拿出的12.5元，今年允许5元进入成本，这次再增加2.5元，共7.5元进入成本，这就等于一个半月的奖金，加上原来的奖金，应该说对落实经济责任制，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可以起到良好作用的。实行7.5元进入成本的办法以后，各地前一段时间有用地方财政收入补企业奖金的，也要相应地减下来，以免奖金增加过多，互相攀比。

集体企业怎么办呢？最近纪云同志召开了会议，作了研究。奖金税还是要照章缴纳。但是，一要提高计税工资扣除额，也就是提高了起征点；二是所收的这笔税款，国家不要，留给当地用于集体企业职工的统筹社会保险，乡镇企业还要用于以工补农。这样集体企业包括二轻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企业的问题也初步解决了。

第三，贯彻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最近，对厂长负责制有一些议论，我认为理解上的问题。现在试点的二万多个企业，还是要按照原定的办法继续试验下去。怎么改进，怎么完善，以后再说。大家提出厂长的人事任免权问题，我认为党管干部的原则是正确的，厂长、经理还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命的；有一些招聘的厂长、经理，也要经过党委任命；副厂长、

副经理，也是由厂长提名，上级党委批准的。党管干部，并不是说每个干部都要由党委任命。现在要重申，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单位，厂长有权任命中层干部，这一条不改变。厂长在任免干部时，应尽可能同其他领导干部商量，走群众路线。有些争议很大的干部，也不一定马上作出决定，你叫他干，许多人不支持，工作也难搞好。厂长要有民主作风，提倡同大家多商量，其他干部也应尊重厂长的权力，尽量采取合作态度。

第四，纠正不正之风要注意界限问题。开放、搞活以后，必然会有漏洞，会有少数人乘机搞不正之风，搞经济犯罪活动。我们既要开放、搞活，又必须长期坚持反对不正之风。小平同志最近讲，一要开放、搞活，二要法制。在纠正不正之风当中，要划一些界限，哪些允许搞，哪些不允许搞，要有明确规定，逐步形成一些规定性的东西，把经济法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改革的内容。有个规定，有个界限，便于大家有所遵循。不然的话，就容易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紧的时候，紧得不得了，松的时候怎么干都可以。我们多年来习惯于搞运动，凭精神办事，运动一来什么都不行，运动一过又什么都可以。有些运动本来也没有包括那么宽，但“闻风而怕”，什么都不敢动作了。听说现在许多地方的采购员也不敢出去了。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几个月不行动，就吃不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注意及时划清一些界限，作出一些规定。有些事中央统一规定一下子拿不出来，可以由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先搞。比如在经济交往中，有一些应酬和招待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可以由各地规定一个标准，出一点招待费。最好不要一个厂搞一个，应由省或地、市统一搞。一时不完备也不要紧，宽了将来可以再规定严一点，严了将来可以规定宽一点。我主张一个城市作一个规定，这不算“土政策”。这样逐步划清一些界限，形成一些规章制度和经济法规，可以堵塞漏洞，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搞活。

第五，解决流动资金问题。我们既要注意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不要多发票子，还是应当把储蓄搞好，这里有很大的潜力。今年一、二月份城镇储蓄存款就增加71亿元，要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抓好。对流动资金问题，最近财经领导小组开了几次办公会议，议定了几条：（一）凡是新投产的企业，产品又是适销对路的，需要的流动资金应解决。（二）凡生产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流动资金上要给予支持。（三）对企业之间互



相拖欠的，银行要帮助他们搞好清理结算，避免影响一大串。总之，流动资金要优先解决，还是先生产后基建，先解决生产转不动的问题，基建投资、技术改造投资都要服从生产，先保生产。

以上讲的第二、三、四个问题，是属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属于资金保证问题。我看只要我们扎实工作，把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今年的工业生产是会正常发展的，为明年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 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和批示\*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一、核岛应采用每回路 30 万千瓦的国际标准型技术方案，以便向国际标准靠拢。

二、秦山二期工程采用 60 万千瓦核电机组。

三、核电站工程设计建造以我为主，与联邦德国合作设计。60 万千瓦常规岛可利用已从美国引进的技术。

四、进口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要货比三家，但最后要尽量和联邦德国成交。

五、60 万千瓦机组第一批可以先搞几套，然后升级再上 100 万千瓦机组，或直接上 120 万千瓦机组。

六、从长远战略看，有的国家靠不住，不愿真正转让核心技术，核电站还是要和联邦德国合作，联邦德国科尔总理给我来了信，我准备亲自约见联邦德国大使谈一下。联邦德国电站联盟执行副总裁弗莱厄来华之事，原则上同意。三月份会谈时签了新的会谈纪要，下次再谈时要前进一步。具体时间再定。

以上这些意见，请你们向李鹏同志报告一下，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定。

---

\* 这是赵紫阳与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等人的谈话要点和对核反应堆安全标准的批示。

三月二十六日，赵紫阳对核反应堆安全标准作了批示：关于反应堆安全标准问题是否变动太大，宜慎重。一则国外安全标准也在向高靠挂，再者，如变动过大，可能造成与联邦德国合作设计的困难。可论证时研究一下。

# 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sup>\*</sup>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这个集会，是我国人民为响应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和平年活动的倡议而举行的。它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的和平愿望和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维护和平的决心。我预祝联合国倡导的这一活动在世界各地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蒙受过惨重的牺牲。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四十年来，世界虽然没有发生新的大战，但是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告诉人们，战争危险并没有消失。世界能不能在和平中安然度过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并争取在二十一世纪得到更加持久的和平，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需要和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有进行和平建设才能繁荣昌盛。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上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待于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我们不但需要本世纪的和平，也需要下一个世纪的和平。中国又是一个拥有将近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它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进行的努力，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会在世界范围里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

<sup>\*</sup>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我们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不断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我们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和友好合作。我们决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我们反对对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进行武力威胁，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争端。无论世界局势如何演变，我们将坚持不渝地执行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外政策。

当前，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引起各国人民的不安。裁军的方案和建议虽然数不胜数，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产生安全感，因为裁军是不能靠言词而要靠行动来实现。

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决不参加军备竞赛。我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水平虽然远远低于其他大国，我们还是不断主张采取措施，压缩军费。中国拥有一支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防御的目的。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明确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同志们，朋友们，现在世界上都在议论裁军问题，我愿意借此机会概括地阐明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一、核军备竞赛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核裁军的最终目标应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二、美苏两国拥有最大的核武库，理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并就地销毁各自在其国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积极的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

三、为了防止爆发核战争，所有核国家都应当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缔结一项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国际公约，确保禁止使用核武器。

四、苏美部署在欧亚两洲的中程核导弹应当同时均衡地裁减和就地销毁。

五、在核裁军的同时，应当大幅度地进行常规军备的裁减。各国的常规军备应该只用于自卫防御，而不能用来威胁他国安全。

六、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全人类。任何国家都不应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应尽快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

七、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在此之前，所有具有制造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应当保证绝不使用化学武器并停止试验、生产、转让和部署这种武器。

八、为了确保裁军的实施，裁军协议必须规定必要的、有效的核查措施。

九、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安全利益，不能由少数大国包办垄断，它们之间的裁军协议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无论国家大小或军力强弱，都应享有参与讨论和解决有关裁军问题的平等权利。

中国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上述立场和主张，考虑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有关各方的立场。我们支持一切真正有利于裁军的建议，并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推动裁军取得真正的进展而继续努力。

当然，裁军问题不是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问题。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侵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危害世界和平。中国政府重申，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消除地区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应当严格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样，才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同志们，朋友们，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神圣职责。人类的命运应当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和平因素的增长正在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只要全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赢得和平。

谢谢大家。

# 关于制定“八六三计划”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就如何制定中国高技术与开发计划问题，讲几点意见。

## 一、计划的设想

到本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主要是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科技进步概念范围的，主要包括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应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都是属于直接面向经济建设，是为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服务的；另一部分还必须要有有一个从“七五”计划就开始，一直到本世纪末，即十五年的高技术与开发计划。这一部分主要是跟踪性的，是跟踪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这后一部分是为下一个世纪服务的。科学技术也有一个后劲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很有影响。过去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成了所谓五大国核能俱乐部的成员，这后一部分叫个什么名字，你们可研究，比如说可以不可以叫“七五”到二〇〇〇年中国高技术研究 and 开发计划，将来也可以叫做“八六三计划”，因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批示的。当然你们还可以研究。

---

\* 这是赵紫阳召集宋平、宋健、伍绍祖<sup>1</sup>、马洪等讨论如何制定中国高技术与开发计划时的讲话。这个计划始于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建议的批示，后来根据赵紫阳的提议，被命名为“八六三计划”。

## 二、计划的内容

我考虑主要有三个方面，想得不一定完善。

(一) 空间武器方面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专家们说，我们要“有一点”。我想总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那样的话，将会牵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近，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苏共二十七大的内容，会议决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很大一个问题是他们军费负担太大。能否如愿实现，有很大困难。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但要多少有一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具体搞什么，你们可以研究。我们可以不可以设想到二〇〇〇年能够用定向能武器打下飞机，搞一个小型空间站等等。我们主要意图不在这儿，而是通过武器方面的跟踪，促进我国高技术的发展。美国总统里根可能相信通过搞星球大战计划真能保障安全，但为他们出主意的人们主要是想通过这项计划来带动高技术。我们的目的第一位的是带动高技术的发展。其次，有一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保持大国的地位也是重要的。

(二) 我赞成把生物工程突出一下。生物工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农业、医学、食品等关系很大，在这方面要多下点力气好好抓一下。还有新材料也可以放到计划内。

(三) 其它高技术领域也要进行必要的、可能的跟踪研究。

概括地说，第一方面军用，第二方面民用，民用也要争取有所突破。

## 三、基本工作方法

你们好好想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组织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上次会上，你们讲要用带动办法。张劲夫同志讲“以任务带学科”，选择什么作为带头的东西很重要。譬如，用航天、定向能来带动一部分。生物工程是个很大的领域。用什么来作为带头的也要具体化。要抓带头的目标和任务，用“一条龙”的办法，把相关方面都带动起来。要有明确任务带头产品，以它为主组织有关力量，绝不能按一般学科、部门或研究所来切块。要搞横的，不要搞纵的，以任务来搞横的联合。要按目标、任务力量来组



织，这是一个基本方法。否则钱花得很多，效果不一定大。我过去有一个比喻，用伞形辐射，一把雨伞端部，称作“枢纽”，然后辐射到若干方面。要有一个总目标，然后层层分解，最后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一定要打破部门界限，任务分解后要有一个评议机构，把任务落实到科研机构和有水平的科研人员，要给他们机会。这样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水平，也能够培育新生力量。

#### 四、拨款制度要改变

要特别重视拨款制度。要想避免低水平重复，避免很多人等着用这笔钱，关键是拨款制度。要避免一哄而起，大家都争着抢着挤进来，同时也要注意把真正有水平的人员和机构组织到这个计划中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办法，是改变拨款制度。如按部门切块拨款，肯定是低水平重复。如按目标任务拨款就会好得多，有水平的就拨，没水平的就不拨。我们要重视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这个计划也是智力投资。他们自己工作稳定了，还可以培养后继人才，这是个知识库。搞好了，对我国中长期发展意义很大。

#### 五、组织领导

大体可以采用你们的意见（指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整理的几个部委的意见）。这项工作总的由科技领导小组来抓，在小组下面搞个协调机构，科委来一两个人，科工委来一两个人，还有其它单位的。将来计划的执行、督促、检查，还是各部门来抓。主要是两个口子：一是科工委这个口子；一个是科委这个口子，但要注意把科学院、学校的力量组织进来。你们要把有实力的单位和优秀人才的单子开出来。当然，开进单子的不等于将来就一定给任务，还要招标、评标。

你们要花多少钱？这个账再算算。你们上次提的那个数，我看问题不大。到本世纪末，能搞起来就不错了，把量入为出和量出为人两者结合起来。

目前，不少科研单位处于任务吃不饱的状况，在他们知道国家要搞高技术时，有可能一拥而上，甚至有些已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人，也会再转回来。但执行这项计划只能是精干的队伍，只能用精华来干这件事，实际上只能用少数力量。大部分科技力量，无论是军口，还是民口，都要毫不犹豫地转向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面向当前，面向生产。

我再强调一下，搞好这个计划，一是抓好目标选择；二是改变拨款制度。总的原则是要让那些确有水平的机构和人员参加进来，而不是另起炉灶，铺摊子，或者按部门、按单位分钱。

实现这个计划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有利于巩固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水平，不然这支队伍可能会散掉。我们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使他们不断、不散。如果50岁、60岁的人没事干，那么30岁、40岁的人也就成长不起来了。

今天我说的不是什么具体计划，是个意图，是个方针性的原则问题，你们可根据这些再充实一下，整理出若干条。下个月初专家定了之后，我可以见见他们，当面再谈一谈。

## 注 释

1. 伍绍祖(1939-2012)，湖南耒阳人。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政委。曾任全国学联主席，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审议。

早在一九八三年，国务院就着手进行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拟定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预测。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同时征求了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经过三年多的工作，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已制定完毕，现提请大会审议。下面，我先报告一下“六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因为这是制定“七五”计划的重要依据。然后，再就“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这个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作若干必要的说明。

## 一、“六五”计划执行情况的回顾

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五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

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五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上述要求已经圆满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无论同建国以来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比，还是同世界各国同期的情况相比，都是很突出的。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不包括村办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这五年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农业总产值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五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而“六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这两个时期都高得多。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全面稳定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六五”时期同“五五”时期相比，我国粮食的年平均产量由三亿零五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三亿七千零六十二万吨，棉花由二百二十四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二万吨，猪牛羊肉由九百三十七万吨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二万吨。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国原煤产量由六点二亿吨增加到八点五亿吨，原油由一点零六亿吨增加到一点二五亿吨，发电量由三千亿度增加到四千零七十三亿度，钢由三千七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六十六万吨。我国有十亿多人口，目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还相当低，但由于前五年上述各项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增长，它们的总产量不仅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也大都提前了。这标志着我国总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五千三百亿元，新增固定资产三千八百八十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四百九十六个，其中能源、交通项目一百零三个。五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一千九百五十万千瓦，采煤能力八千万吨，原油开采能力五千万吨，铁路通车里程一千五百公里、复线里程一千五百公里、电气化里程二千四百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一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二十多万个，一些行业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产品品种，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了成倍的增加。这些不仅促进了“六五”期间的经济稳定增长，而且为“七五”时期和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后三年出现了大幅度稳定增长的可喜形势。“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两年合计近三百亿元。“六五”期间，通过调整 and 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一九八三年国内财政收入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元，一九八四年增加二百五十五亿元，一九八五年增加三百六十二亿元，全年总收入达到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增加最多的是“五五”时期，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二百二十六亿元，而“六五”期间的增加额大大超过“五五”时期，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七百八十六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加，一九八五年达到一千四百三十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项资金合计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了一倍。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经费共为一千一百七十二亿元，比“五五”时期的五百七十七亿元增长一倍。这五年共取得重要科研成果三点三万项，有九百三十七项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一部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取得了显著效果。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一十四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七十万人。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开始取得成效，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很快，普及初等教育的工

作有了进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全国展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或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六五”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达到二千三百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一九八五年同一九八〇年相比，国家外汇储备有了增加。全国通过各种形式使用国外贷款一百零三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五十三亿美元，在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五年间全国共引进国外技术一万多项，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国际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通过引进技术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使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此外，我们还在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改善幅度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五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三千五百多万人。二是，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民吃得比过去好了，衣着向多样化发展，耐用消费品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三是，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六五”期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六点三亿多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三十二亿平方米。四是，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一九八五年末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三亿元，比一九八〇年末增长三倍。

上述成就和变化，使得我们长期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些经济问题，在“六五”期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过去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五百多万吨，棉花产量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间长期停滞不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找

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终于较快地实现粮食自给，棉花自给有余，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过去我国城乡市场的商品供应，除五十年代前期比较宽松以外，一般都比较紧张，许多商品不得不采取定量分配、凭票供应的办法，有些时期有些地方票证多达几十种，排队购货现象十分普遍。“六五”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全国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过去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六五”期间，经过调整和改革，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明确了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率在一九七八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六五”期间五年平均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改善，对于促进和保证我国经济持久的健康发展，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六五”期间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定不移地把全部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并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前提。就经济工作来说，“六五”期间实行了以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变，这也是取得各项成就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制定“六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的状况，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且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十项经济建设方针。编制经济发展计划，既强调挖掘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强调要根据国力的可能和留有适当余地，注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在国民经济内部，坚持把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

位，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合理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并且使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大体协调，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把经济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互相促进，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其它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城市的改革，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使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渐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不断扩大，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显著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有利于搞活经济的许多变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经过“六五”期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这一年多来的实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明晰了，路子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我们冲破了“左”的思想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的束缚，克服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正确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可以取别人之长补我之短，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以及在这些转变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我们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迈进。总的来看，对于怎样根据我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正在日益明确和深化，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在日益配套和完善，各方面的



实践经验正在不断积累和提高。回顾“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越来越相信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祖国的光辉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一切，是我国人民已经取得并将长久起作用的巨大精神财富。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在实行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中对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都要有一个过程，工作上还存在某些缺点和失误，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在某些时候也有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的情况。特别是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以后，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追求超高速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进口控制不严，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某些不稳定因素。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去年一年的工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总的来看经济环境正在从紧张向宽松转化，但对目前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努力巩固和发展当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好形势。

## 二、“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继续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基本方针，以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稳妥的步骤，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效率 and 效益的良性循环轨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基本任务是：

(一) 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 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 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二)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 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

(三)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上述三项任务, 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任务。综合考虑这些任务的要求,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 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8%,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四。按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九〇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亿元, 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一点三倍;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亿元, 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一点六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八千九百六十亿元, 比“六五”期间增长近百分之七十。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 改造一批重点企业, 使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有较显著的增长, 现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 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争取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同时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五年共培养近五百万高级专门人才, 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进出口贸易总额一九九〇年比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 并相应地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在这五年内, 将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将使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 国务院在拟定计划草案的过程中, 在经济建设方面着重考虑和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高效益地向前发展。

根据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和综合各种生产条件的可能,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七, 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包括村办工业为百分之六),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不包括村办工业为百分之七);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这个增长速度比“六五”期间实际达到的速度低一些。我们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 主要是考虑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内在因素的变化和要求。今后农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 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增长速度。就工业来说, “六五”后两年的过快增长, 主要是受过大的投资需求所刺激, 靠大量进口原材料来支撑的。这种情况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同时, 目前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很紧张, 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适当控制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 有利于协调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 协调生产和运输的比例关系, 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产品质量差, 经济效益低, 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七五”期间对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提出适度的要求, 有利于把各个方面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导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个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而国内外的实践都反复证明, 只有经济的适度增长, 才能避免经济关系过分紧张, 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的经济增长率是积极的, 也是留有余地的, 在执行中有可能超过。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上, 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当然要在提高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努力争取有一个持续的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也决不能认为速度越高越好, 更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层层加码。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社会生产蕴藏的巨大潜力, 把经济增长速度订得过低, 就会影响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妨碍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无论是国力的增强还是人民生活的改善, 都要求有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同时也要看到, 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 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 即使一时上

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这种危害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地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瞻前顾后，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得到可靠的保证。

（二）规定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

这是“七五”计划的关键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七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关系到九十年代以至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经过多方测算和对财力物力的反复平衡，“七五”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五千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更新改造投资二千七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百分之八十七。考虑到“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七五”前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大体维持在一九八五年的水平，后三年再适当增加一些，但也不能增加太多。

投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无视这个规律，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延缓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应当看到，前两年出现的投资过分膨胀的势头，经过大量的工作有所缓解，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地方和单位仍然在盲目地上项目、铺摊子，使投资规模潜伏着继续膨胀的危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经过多年努力开创的好形势就有可能重新遭到破坏，已经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下去，为九十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也会落空。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统一思想认识，从上到下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务必把“七五”期间的投资规模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水平上。

当前，不但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也不合理。主要表现是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比重偏低，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偏高；更新改造投资不足，而相当一部分更新改造投资又被用于基本建设。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其结果要么是投资总规模控制不住，要么是经济的发展缺乏后劲。一般加工工业和非

生产性建设过度扩展，势必加重对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压力，要求对这些方面追加更多的投资，导致整个投资规模日益膨胀。同时，一般加工工业大量发展，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由于资金不足得不到应有的加强，骨干企业的技术面貌又不能较快的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就会缺乏强大的基础和支撑。所以，能不能恰当地控制住投资总规模，能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关键在于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七五”期间调整投资结构的方向是：一、继续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投資，相应压缩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二、适当控制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增长，使同样多的投资规模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和事业发展能力。除必要的旅游设施之外，楼堂馆所的建设要严加控制。住宅建设也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稳步进行。城市市政建设要把重点放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上，其它方面只能在有余力的条件下适当进行，形式主义的东西坚决不要搞。三、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四、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上，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和恰当的投资比例，使东部地带的发展和中部地带以及西部地带的开发更好地结合起来。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要落实到正确确定建设项目上。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建设项目过多，建设周期长，投资效益差。“七五”期间，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争投资、铺摊子，长期不能竣工投产的状况，增强时间观念、利息观念和资金周转观念，坚决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这是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问题。从“七五”计划开始，新上的大中型项目所需的资金、材料、设备必须落实，然后才能列入开工计划，并按合理工期分年拨足物资和资金，否则只能作为预备项目。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也要认真清理，进行排队和调整，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做到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

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最重要的是必须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体系和管理体制。要研究和制定科学的系统的投资管理和调控制度，并逐步加以实施，要统一计划、综合平衡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

正确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投资范围，并注重采取经济手段把不同主体的投资兴趣引导到宏观经济要求的目标上来。与此同时，要完善投资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在项目决策、勘探设计、施工组织和设备供应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推行和完善全面的招标投标体系。这样，我国基本建设的面貌才会有一个大的改观，投资效益才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更好地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七五”计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使我国经济的成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是抓好两头。一头是大力开发和普遍推广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积极帮助广大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加速实现技术进步。这是密切科技和生产的结合，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头是真正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关键性技术课题，认真开展科技攻关，同时争取在新技术和高技术领域研究和开发中取得较大的成果，大力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继续加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必须强调，努力掌握当代的新技术和高技术，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长远意义。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支有较高水平的科技攻关队伍，今后应当继续培养新的优秀人才，壮大和提高这支队伍，为跟踪和接近世界高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奋斗，力求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新材料和现代自动化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为国民经济转向新的技术基础创造条件。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过去为建设祖国已经奉献出巨大心血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够在进一步攀登科学高峰、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有赖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经济的发展能不能具有强大的后劲，最深厚的源泉也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发展科学技术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对策很好地把握这个时机和迎接这场挑战，那么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仅不能缩小而且会扩大，在经济上技术上

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任务就越来越艰巨。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技术课题很多，不是一个五年计划能够解决的，需要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普遍树立起重视科技进步的战略观点，使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紧迫感。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即生产、建设、流通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都要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要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通过技术有偿转让以及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等形式，发展同生产单位的横向联合，形成新型的科研和生产的经济联合体。这样做将有效地克服地区分割、部门所有的弊端，改变长期以来科研和生产相互脱节的状况，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协调发展。要认真贯彻执行专利法，保护发明权，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我们还要继续贯彻执行军用和民用相结合的方针，把国防科技成果更加普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科技进步以至整个四化建设，都离不开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的发展。重视教育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长远战略。必须切实加强基础教育，积极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整顿和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对科技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制度。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事业费一千一百六十六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各级地方政府还应该拿出较多的财力用于发展教育。同时要广泛动员、鼓励和指导企业、集体和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努力举办多种形式的教育事业。

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要在适应四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教育结构的同时，特别注意提高教育质量。近几年，有些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专科院校不合理地升格，有些学校不顾办学条件和教学能力过多地扩大招生规模，有些成人教育单纯追求学历和文凭，这些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并根据各自的特点适当加强劳动教育，坚持把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在这个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稳步地发展数量。要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逐步建立系统的教育评价和监督制度。加强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大力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提高教材质量。认真办好各级师范教

育和加强教师的培训，逐步建设一支在质量、数量和结构上基本适应需要的稳定的教师队伍，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队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为教师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为了促进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两个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把这方面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争取在“七五”期间取得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

（四）以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为中心，推动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我国“六五”期间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潜力来说，这方面已经迈出的步子还很不够。前几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区、部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多头对外，盲目竞争，重复引进，过多地进口一些高档消费品。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切实加强和改善管理，认真加以解决，但决不能因此而对开放政策产生疑虑。“七五”期间，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扩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规模，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兴办国际空运、海运、保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事业。

努力增加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是更大规模扩展对外经济贸易与技术交流的基础和关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汇短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将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出口贸易是我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决定着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范围和程度，制约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是关系对外开放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把出口搞上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局上的回旋余地就更大了。

要扩大外贸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最根本的是要采取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战略。一是要坚持把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放在首位，逐步建立健全在国外的推销系统和服务网络，努力做到质量稳定，服务周到，讲究信誉，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是要努力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逐步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



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提高轻纺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加新型食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三是要进一步改善出口产品的生产布局，在沿海地区和其它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各种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出口商品基地和出口专厂，逐步形成完善的出口生产体系。这是提高出口经济效益、增强出口商品竞争能力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措施。外贸部门要同有关地区和部门紧密配合，对此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四是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面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当前我国许多产品外销不如内销盈利多，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对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从多方面给以鼓励和支持，使出口创汇多的企业和职工得到应得的实际利益。总之，各部门、各地区都要把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花大力气抓紧抓好，抓出显著成效。所有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也要把扩大出口、多创外汇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面向国际市场，努力开发更多的具有竞争能力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在出口创汇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特区要朝着建立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前进。

认真总结前几年的经验，切实改进进口工作，对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根据有利于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节约使用外汇的原则，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坚持把重点放在引进软件、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严格控制一般的加工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对国内有条件生产的产品，要积极搞好并立足于国内生产；对进口国外散件、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的生产线，要严格审查，限制进口和避免重复进口。要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一切浪费国家外汇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在增加出口创汇、提高偿还能力和吸收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适当扩大利用国外资金的规模，重点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特别是电力、港口、石油等方面的建设，以及机械电子等行业的技术改造；用于发展出口产品和实行进口替代，以增加外汇收入和节约使用外汇。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利用外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正确掌握外资的使用方向，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前几年，我们对于外贸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很不适应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需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首先应着重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和管理体系，注意运用汇率、关税、税收、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同时辅之以加强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等行政手段，合理调节进出口贸易。随着宏观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进一步调动地方、部门增加出口的积极性，扩大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展外贸企业同生产企业的直接联合，更好地实行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原则，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五）按照兼顾生产建设和生活消费的原则，恰当地确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

“七五”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要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和今后五年生产发展的可能，计划草案规定，全国农民的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左右，加上就业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将高于这个数字。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消费内容日趋丰富多彩。计划草案安排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基本上与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

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政策，使生产建设和生活改善相互协调地前进。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片面强调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使生产建设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坚决地纠正了这种偏向，今后也仍然要注意避免这种毛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要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我国有十亿多人口，每年城镇有几百万人需要就业，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创业时期，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积累资金。在这样的经济成长阶段，如果生活消费的步骤迈得过大，势必减少资金积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产

品竞争能力，造成经济的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依靠努力发展生产，不能挤占必要的建设资金。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的速度，职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在社会分配方面，要继续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着重克服平均主义，同时要防止企业间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过分悬殊，并运用税收杠杆适当调节各类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目前在工资福利上存在着的互相攀比、滥发现金和实物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必须严格控制。

在恰当确定生活消费增长速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有计划地引导居民消费需求的方向，使消费结构的变化符合我国社会性质、资源条件和民族特点。我国人口众多，相对来说耕地和草地比较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食物结构的改善不可能很快，只能逐步增加肉、禽、蛋等动物性食物的消费；衣着方面要提倡多穿棉织品和化纤混纺织物，纯毛制品和皮革制品只能适当增加。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将是长期的，家用电器的消费只能适度增加，尤其要注意控制耗电高的空调器、冷热机等的发展和进口。人民的居住条件当然还要不断改善，但住房面积和建筑标准也不宜过高。总之，国家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人民的消费结构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各位代表！

以上讲的五个问题，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保证我国经济进一步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不断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我们要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努力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日前有的地方滥占耕地和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下降的情况，必须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并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要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发展。

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一要继续执行正确的农村政策，深入进行农村改革，进一步活跃农村商品经济，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二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这两方面，我国农业的发展还有着巨大的潜力。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都要逐步增加对农业的物质投入，尤其是地方要把更多的财力用于支持农业，加强农村建设。为了扶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七五”计划草案中对这些地区增加了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支持，在计划执行中还要根据国力增强的情况适当予以增加。特别重要的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着重增强上述地区自身的活力，同时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它们之间的协作与联合，使它们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较快地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此外，计划草案还对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以及对人口控制、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都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安排。在今后的五年中，我们一定要继续按照经济建设要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方针，切实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

### 三、“七五”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各项建设方针，圆满实现“七五”期间的建设任务，关键在于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和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对于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和繁荣，对于本世纪末宏伟目标的全面实现，以至对于下个世纪前五十年在经济上、技术上接近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所有的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七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起来说，主要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继续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减免调节税,提高折旧率;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和劳动制度等,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完善企业的行为机制,加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到“七五”期末,除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都要实行自负盈亏。对长期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要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改组和关停并转。特别要按照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逐步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以促进企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资源合理开发、资金技术合理使用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要通过发展横向联合,进一步推动整个改革不断前进。要排除横向联合的障碍,合理规定联合各方的权益,从政策上支持和从立法上保证企业间各种联合的健康发展。

(二)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要继续减少国家统一分配调拨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完善农副产品合同订购制度,积极发展跨地区、跨部门的商品流通,逐步建立农工商结合、农商结合、工商结合或商商结合的新商业形式,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与此同时,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七五”期间,价格改革的重点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计划价格偏低的问题,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这两种价格的水平逐步趋于接近。要结合工资调整,研究、确定合理的房租和住房销售价格,以利于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要逐步合理调整劳务收费标准,以利于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经过改革,逐步建立起对极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由国家定价,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分别实行国家指导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度,较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在改革价格的

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稳步前进、放调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七五”期间，要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and 调节经济的运行。国家计划是从宏观上引导和控制国家经济正确发展的主要依据。要进一步改革计划体制，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把计划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到主要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全面管理与调节的轨道上来。要特别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职能，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既强有力又灵活自如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筹集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调节社会需求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按照税种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逐步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分层次管理，提高地方特别是中等以上城市对搞好宏观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在进行上述各项改革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加强经济信息和决策咨询系统，建立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和经济司法工作，充实加强各级经济检查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种经济活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不可分割和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使企业拥有必要的自主权并正确地加以运用；第二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使企业活力的发挥能有一个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第三个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促使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能够更好地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必须配套进行，相辅相成，不能孤立地突出某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认真搞好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逐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与市场、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就能够更好地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做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由于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改革的进行又不能不受到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干部条件的制约，上述三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在

“七五”期间全部完成，我们只要求在这个期间大体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使经济的运行走上新体制的轨道。这个要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前几年的实践，我们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改革目标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只要继续把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上述要求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完成“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里着重讲几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问题。

（一）充分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从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它把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各种途径，坚决变革一切不符合这种要求的思想观念和规章制度。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还不善于对丰富的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鼓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总之，在整个改革中始终明确上述的基本认识，我们就能够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真正建立起既区别

于过去那种僵化半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模式有本质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二) 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我国的改革中，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都只能是逐步的，都需要时间。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新体制的因素在经济运行中日益增多，但还不能立即全部代替旧体制，旧体制的相当部分还不能不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和运用。这就决定了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控制的难度增加，微观机制一时也难以完全合理，管理上势必出现这样那样的真空或漏洞，某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行贿诈骗、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由于改革的进行必然要触动和调整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新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格局又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势必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摩擦和矛盾，出现种种机会不均的现象，有的单位和个人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引起人们的不满。由于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经验只能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工作中产生某些失误也就难以完全避免。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对改革中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议论纷纷，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这种种情况，客观地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新旧体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对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惊惶失措，甚至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另一方面，在各项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必须精心指导，周密规划，全力以赴，谨慎从事，认真试点，提高预见性，力求减少失误，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边前进。应该充分认识到，尽管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问题，但正是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搞活了经济，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兴旺局面。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是改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标志。改革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



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才能得到解决。

(三) 充分认识改革中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必要性。

我们的改革能否顺利地推向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恰当。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减少阻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阻碍，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应该也能够给广大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前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项改革都会给每个社会成员立竿见影地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有许多改革的措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效益。有的改革措施，甚至需要一些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暂时牺牲某些经济利益，但它们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久改善，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希望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使当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我们的改革必须合理确定地方、部门的权益，特别要扩大企业的权益，以便更好地调动它们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但是，只有在坚决遵守和执行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权力才能得到正确运用，利益的实现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它们积极性的发挥也才不至于陷入盲目性。因此，一切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自觉地树立全局观念，决不能用损害全局利益的手段去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只能在有利于增进全局利益的条件下讲局部利益。

(四) 充分认识改革的新形势对企业提出的严格要求。

经过前几年的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初步改变统购包销、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既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也加重了企业的责任。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自负盈亏的程度将不断提高，决不能只负盈不负亏，它们的责任也就必然要进一步加重。今后，在新经济体制的运行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职工物质利益的增进，将更加取决于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高低和经营的好坏，这对所有企业及其领导者都是严峻的考验。过去对这方面讲得不够，以至有些人把改革仅仅看作是给企业放权、减税、让

利，这是一种误解。在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下，所有企业都要增强质量观念和效益观念，增强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的观念，增强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多作贡献的观念，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讲究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改善服务态度，增加经济效益。不然的话，就会落后于改革的形势，甚至被形势所淘汰。企业的领导者、经营者和全体职工，都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形势。希望我们企业的领导同志们都能自觉地掌握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决依靠党的组织和职工群众，为提高企业的素质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希望我国工人阶级充分发挥高度的主人翁作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积极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充分认识政府机构转变管理职能和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性。

为了适应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要求，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也要相应地转变。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资金、分物资上面的做法，逐步转到主要搞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和加强检查监督方面来。随着管理职能的变化，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检查监督机构要充实和加强，专业性管理部门要适当合并和精简。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和巩固其它各项经济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重大变革。各级政府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自觉地适应这种变革，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经济知识和专业知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科学决策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企业的自主权，认真做好为基层服务的各项工作。必须坚决清除官僚主义的陋习，克服种种扯皮现象，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漏洞，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提高觉悟，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忠于职守，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六）充分认识加强法制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为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有两

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成为调解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是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巩固改革的胜利成果。前几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国务院也制定了一批必要的行政法规，今后还将抓紧各项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工作，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逐步使各项经济活动都有法可依。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必须强调，法律一经颁布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决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更替或注意力的转移而影响它们的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在工作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总之，“七五”期间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积极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同时在实践中深思熟虑、瞻前顾后，把工作做深做细，以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

#### 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动员全国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计划。为了这个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当前的国际局势依然是动荡而令人不安的。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对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美苏恢复对话，重开裁军谈判，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世界人民期待于美苏双方的不是“和平”、“裁军”的言词，而是采取真正的有利于和平和裁军的实际行动。它们双方都应当

放弃谋求军事优势，停止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人民对同自身安全直接攸关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严峻形势，特别是柬埔寨、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不能不尤为关切。我们一贯主张，外国军队应当全部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对此应当保持必要的警惕。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超级大国的任意摆布，积极采取各种行动，努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广泛的不结盟运动，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欧洲和日本，以及大洋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也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全世界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和平。我们深信，通过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尽管道路曲折，世界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同世界各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往与合作日益扩大，文化交流和其它方面的往来也不断增多。我们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同英国通过谈判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把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我国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原则，注重信义，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可以说，我国对外工作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我国对外工作的进展，是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卓有成效的体制改革和全面稳定发展的经济形势分不开的，也是同我们根据国际局势的客观变化及时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分不开的。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

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坚持谋求的是，中美关系在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报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上稳定发展，中苏关系在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的过程中切实改善。

第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

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实现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创造条件。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

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进行的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我国的内外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设与和平，改革和开放，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是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有十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深知自己在国际上应尽的义务和担负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上继续努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各位代表！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实现的。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光辉前景。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们就可以大体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把经济体制基本纳入新的轨道，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九十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更有把握地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伟大目标。

今年是实行“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做好今年的改革和建设的工作，使“七五”计划的实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年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在改革方面，要认真做好一九八五年已经进行的各项改革

的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工作，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拟定方案，争取为明后年迈出新的重要的改革步伐作好充分准备；在建设方面，要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努力改善供应，把各项生产和流通事业进一步搞活；要继续防止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同时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努力搞好重点建设和企业的技术改造；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大力增加出口，节约使用外汇，实现外汇收支的基本平衡。根据这些要求，国务院已经拟定一九八六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请各位代表一并审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无论是一九八六年计划的执行，还是为了完满实现整个“七五”计划，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是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的保证。随着经济搞活和对外开放，人们开阔了视野，锻炼了才干，增长了许多符合现代文明的新知识、新观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工作的内容，创造新的形式和方法，发挥更大的作用。放松或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就会走上邪路。我们必须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但同时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我们要继续发挥物质鼓励的作用，但也要反对“一切向钱看”、损公肥私的思想和行为。要通过大力表彰和宣传各条战线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模范事迹，以及采取其它生动活泼的方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振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

思想文化工作部门及其广大工作人员，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各项文化事业，在“七五”期间都将有新的发展。希望广大思想文化工作者，都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联系群众，深入生活，勇于开拓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以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生活情趣和健康的审美观念，激励人们满腔热情地献身四化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理论研究，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 and 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努力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相信，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已经尽了很大努力的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能够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各级政府机关要作表率。我们各级政府机关的广大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积极投身改革，忘我工作，富有成效，主流是好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的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经商谋利；有的走私贩私，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有的利用公款游山玩水，滥派人员出国；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失职渎职，使生产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等等。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政府机关的威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义愤，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纠正不正之风，要由领导带头，从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做起，从各级负责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对于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要批评教育；对于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必须追究责任；对于严重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罪，参与经济犯罪和其它犯罪，或者徇私枉法、庇护罪犯的，必须依法惩办。不合法的经济收入一定要没收。要切实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清除腐败现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思想残余作斗争的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也是对每一个干部的新的考验。必须树立起扶正压邪的风气，表扬和鼓励那些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的好干部，坚决支持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好同志。对于一切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我们要力争纠正不正之风迅速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坚决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推动整个社会风气尽快实现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六五”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英勇地保卫着祖国安全的同时，胸怀大局，精简整编，加强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公安干警为维护社会治安，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希望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在“七五”期间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体现着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顺利实施必将有力地推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七五”期间，我们一定要继续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同台湾同胞以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一道，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劳动者和爱国者，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艰苦创业的愚公移山精神，为胜利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而共同奋斗！

# 视察秦山核电站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秦山二期三期工程可安装四台 60 万千瓦核电机组，若场地许可，也可安装五台。这个问题要论证后很快定下来，一次订货就订四台或五台，有利于组织生产和降低成本。第一台 60 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后，紧接着一年一台陆续投入运行。大体设想是：“七五”二百万千瓦（包括广东），“八五”三百万千瓦，“九五”三百万千瓦。

二、在设计建造 60 万千瓦核电机组的同时，可组织少数技术力量，进行 10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研究与开发，争取在本世纪末能有 10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投入运行发电。

三、60 万千瓦核岛采用双回路国际标准化方案，100 万千瓦级机组采用三回路方案，每回路 30 万千瓦。

四、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采取以我为主、与联邦德国合作的方式。与美国、日本合作搞核电站，问题很多，苏联也靠不住。不要使国际上认为我们与西欧合作的方针改变了，对我政治不利。但 60 万千瓦常规岛可采用已从美国引进的技术。

五、核电站部分关键设备、部件和材料，可以从国外进口，在同等条件下，最后一定要尽量和联邦德国成交这一点要心中有数。

六、核电站的建造要特别注意工程质量和安全可靠。60 万千瓦核电机组要充分利用“七二八”30 万千瓦机组的成功经验，并尽量采用国际成熟技术，加以改进和扩大，确保一次安装调试成功。安全标准要采用国际

标准，不宜搞得过低。否则，万一出了问题，后果很难设想；同时和联邦德国合作也有困难。

七、核电设备制造一定要确保质量，降低造价，争取将来出口，在国际竞争中锻炼提高。核燃料要多出口一些，大锻件也可出口，以便取得外汇平衡。

八、国内设备制造工厂的选定，要采用招标竞争、择优定点的方式。评比条件主要是：质量可靠，不向国家伸手要条件，价格合理，交货及时，服务周到。

九、核工业部要加强经济核算和项目管理，尽最大努力确保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周期、降低电站成本。

# 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 “八六三”计划的方针与措施\*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

这次请大家来，主要是征求大家对发展我国高技术的意见。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到本世纪末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通常讲的科技进步的范围，包括科研成果的推广和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也包括许多重大技术的攻关，都是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服务的。这是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绝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和科技单位要摆在这个主战场上，面向经济建设。这个正确方向要继续坚持下去。

另一部分，还必须有一个从“七五”计划到本世纪末的高技术研究开发计划。这一部分主要是跟踪性的，跟踪世界上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这主要是为下一个世纪服务的。

不久前，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国外高技术发展，对空间武器也要有一点对付的手段的建议。小平同志三月五日作了重要批示：“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耀邦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也都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

\* 这是赵紫阳在科学家关于发展中国高技术“八六三”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着重阐述了中国“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高技术发展方针，提出了制订高技术发展计划须确定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着眼长远，充分发挥高技术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采取伞形辐射法，由伞的枢纽辐射到各个方面。他还决定每年拨款 20 亿元支持高技术发展，通过实行新的拨款制度、建立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充分发扬协作精神，注重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并对发展高科技的组织领导作了相应部署，使中国高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成果丰硕的崭新阶段。

小平同志批示后，我找一些同志商量过几次。决定召集部分专家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帮助中央进行决策，以便最后形成一个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叫“七五”到二〇〇〇年中国高技术研究 and 开发计划，也可以用个代号，叫作“八六三”计划，因为是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三月批示的。今天我先讲点意见，提出一些题目，请大家讨论。

## 一、发展高技术的方针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曾邀请部分同志，就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讲过一些意见。以后，由马洪同志牵头，组成一个小组，在座的不少同志都参加了，一九八四年三月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国务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

当时，世界上对新的技术革命，高技术的发展，议论很多。对它的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提出了许多设想和预测。这一两年，情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制定计划，组织力量，把发展高技术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九八四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庞大的所谓战略防御倡议，又叫“星球大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监视系统，以定向能武器为主要手段，多层次拦截导弹的战略反导系统。它的重要意图在于增强其战略威慑力量。准备用二十五年，耗资上万亿美元。一九九〇年前就投资二百六十四亿美元。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是反对的，我们反对一切称霸世界的军事部署。应该看到，里根的这个计划，其意义不仅限于军事，一旦实施，它的经济意义很可能超过军事意义。有人说，也许里根本人真的相信通过这个计划能保证他的国家安全，增强威慑力量，但他出这种主意的人，看来主要是想通过这项计划，带动一系列高技术的发展，刺激经济增长。

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方面想参加，希望拿到一些高技术；一方面又担心受美国的控制。去年，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倡导下，十八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尤里卡”计划，这是西欧共同体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据报道，已初步选定了今后五年二十六个重点项目，联合

投资五亿英镑(约七亿美元),十年内准备投资二百四十亿美元。“尤里卡”计划主要用于民用,我们已作出反应,表示赞赏。

日本制定了一个“三年行动纲领”和“十年基本对策”,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强化对科技的投资,重点是发展高技术。据说,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上,已同美国并驾齐驱,有可能搞出世界第一台五代机。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快的,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它想通过高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进入世界技术大国的行列。

苏联、东欧国家也有他们的打算。苏联一直在军用技术、国防实力上同美国争霸。苏联的经济发展是缓慢的,问题很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两大措施:一是推行经济改革,二是抓科学技术进步。去年十二月,苏联、东欧国家的首脑们,在莫斯科开会宣布了到二〇〇〇年科技发展综合纲要,计划联合开发五个高技术领域。强调谁投资,谁就可以受益,用高技术推动经济发展,要求到二〇〇〇年使经互会成员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科学技术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加速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的潮流。我们也必须及早作出相应的决策。

在发展高技术问题上,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昨天,四月六日,小平同志有个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小平同志这个指示,体现了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国工作重点的总方针,反映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采取这个方针,在政治上也比较有利,不要使人误解为中国也要参加空间武器竞赛。

发展高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要讲目的,主要的,第一位的,归根结蒂,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里有个周期问题。说得确切一点,我们到本世纪末的高技术发展计划,主要是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建设服务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振兴,中国的现代化,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高技术。我们到本世纪末在经济上的发展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左右,使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通过依靠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加上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组织科技攻关,改造传统产业,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进入下个世纪以后,我们能不能用三、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需要新的技术储备。到了下世纪初,如果我们在高技术上没有什

么成就，要用三、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恐怕很困难。国际上高技术的竞争十分激烈。高技术和尖端技术从来是买不进来的，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研究和开发。从现在算起，花上十几年功夫，集中一部分精干力量，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他们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这样，到本世纪末，既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又为下世纪的发展作了技术上的准备，进一步实现下个世纪的目标，也就有了把握了。

当然，高技术也必须为我国的国防建设服务。这一点也很重要。高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主持下，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一大批有抱负、有才华的科学家，在座的不少老科学家们都是当年的中坚骨干力量，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今后，我们要保持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提高在国际上的威望，仍然需要有选择地发展一点高技术，增强国力。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参加美苏军备竞赛，这一条已经定下来了，但也要有一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当然，也只能是“有一点”。搞多了，搞大了，搞不起，办不到，而且会对经济建设带来极不利的后果。这一点从苏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联实力比我们大得多，但由于军备竞赛包袱沉重，经济发展缓慢。我们更不能那样搞。

发展高技术，必须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方针。现在国际条件不错，我们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这样的国家，最怕是经济搞不好，经济建设搞好了，什么都好办了。所以在发展高技术问题上，第一是不搞不行，第二是不能搞得太多。我说的不仅是军用技术，整个高技术计划都应这样考虑。不搞，下世纪没有后劲。搞得太多，不适当，也会冲击本世纪的发展，更谈不上下个世纪的发展了。

## 二、计划的性质和目标

方针问题明确以后，就要进而考虑如何制定计划，搞个什么样的计划？规模多大？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的发展高技术计划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也就是

说，要研究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可能。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我们不称霸，也不参加他们的军备竞赛。中国幅员广阔，回旋余地很大，和日本西欧国家不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底子薄，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全面开花。我们在高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一点又和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

从这样的一些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在二〇〇〇年以前有必要也有可能搞一点高技术，但只能是一个目标有限、重点突出的计划，而且主要是跟踪性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订大计划容易，问题是实行不了。多少年的经验证明，目标定得很高，摊子铺得很大，只能是纸上谈兵。量力而行，集中力量办几件事，倒有可能办成。

前一段和一些同志酝酿，有个很不成熟的考虑，这个计划可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空间技术方面，二是生物技术方面，三是其他方面。

空间技术方面，可以考虑搞点对付空间武器的手段，但目的不在这件事情本身，而在于保持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要把一系列民用技术带出来，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从这一点出发来选择目标。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目标，第一是力所能及，第二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第三又能带动一系列的有经济效益的民用技术，值得认真研究。

生物技术很值得重视。相对地说，花钱可能少些，但对农业、医学、食品等关系很大。看来，我们要在这方面下点力气，好好抓一下。中国的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不断增加，耕地还要减少，光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要使十多亿人口生活过得很好，有不少困难，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生物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生物技术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可能是我们这个高技术计划的一个特色。但生物技术领域很广，究竟从哪里突破，选什么目标受益最大，也要认真探讨。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搞什么？比如说，搞不搞机器人，或者搞别的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是要选准目标。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很初步的设想，在座的都是专家，请大家发表意见。在考虑目标问题的时候，我认为需要掌握这样几条：

第一，一定要体现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第二，目标只能是有限的，少数几个，决不能多。多了，什么都是目



标，什么都实现不了。选少了不要紧，将来看准了再加嘛！选多了，上不去，那个时候再收缩，损失就大了。

第三，这个计划和近期的技术开发任务不同，应该看得远一点，面向二十一世纪，但也应当选择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确有实现可能的目标。更长远的，目前难以考虑，只好以后再说。将来经济发达了，国家财力物力雄厚了，就有条件办更多的事，但现在不行。

第四，目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要看它能带动哪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对整个国民经济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选准目标很重要。现在恐怕只能提出一些设想。有些目标也许可以初步定下来，有些目标很可能定不下来，还需要作预研究或可行性研究。这次选目标，同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就是两弹，人家都搞出来了，我们攻关就是了。现在高技术多得很，好多东西人家也没有完全搞出来。我们究竟搞什么，是篇大文章。目标选准了，几乎就是成功了一半。为了选准，宁可在目标选择上花点时间花点钱。目标选准了，少走弯路，就是最大的节约，反而争取了时间。

确定目标的过程，也就是择优的过程。所谓择优，就是看哪些目标花钱少，收效快，得益大。同样一着棋子，落点不同，后果就可能大不一样。因此，确定目标要从振兴中国的全局着眼，不能从部门出发，也不能从学科出发。我们不提倡为本部门、本学科争短长，而应当为国家经济振兴、为国家增强实力找出最佳方案。请大家在讨论中都能掌握这个精神。

### 三、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如何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这里有一个基本工作方法问题。在前一阶段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主张采取所谓带动的方法，我赞成这个办法。先定目标，从目标出发，搞一条龙，用目标来带动相关方面的各种课题，把有关力量组织起来，像一把雨伞一样，由伞的“枢纽”辐射到若干方面。譬如要搞某种武器，就从目标出发，辐射到材料、能源以及各种监测控制手段等等。这种方法，可以叫伞形辐射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同于泛泛地从学科、专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来提项目、定任务，那是经常性的工作，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基金等方面来安排。这次

制定的高技术计划，无疑可以带动相关学科的某些课题的发展，但不是某一学科的发展计划，更不是所有学科的全面发展计划。

这种方法，也和按部门、按研究机构来切块分任务不同。如果按部门去切块，局限在条条的纵向范围内组织力量，钱花得很多，效果不一定大。这次制定计划，一定要打破部门界限，要按任务组织横向联合，把真正有实力、有优势的研究机构，有水平的科研人员，组织到这个任务中来，由他们来挑重担。这样做，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也不需要另起炉灶，铺新摊子。

整个计划可以安排到二〇〇〇年，即用十五年时间办这件事。鉴于预测十五年，甚至下个世纪初的事情，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要把目标都选得很准，也是有困难的。高技术的研究开发计划，同经济计划相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探索性更强。因此，这个计划，应该是动态的、滚动式的计划，边走边看，探索前进，及时调整，逐步逼近我们预期的目标。也可以考虑，把十五年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提出阶段目标。

现在还谈不上制定计划，恐怕只能搞个初步方案。制定方案的步骤，第一段，听取专家意见；第二段，六月底以前，形成方案的轮廓设想。然后再提请中央审议批准。

#### 四、几项主要措施

(一) 要下决心拿出一笔钱。国家财力有限，但每年挤出一点来还是需要的。这个问题，国务院没有讨论，我个人初步考虑，是否“七五”先拿十亿元；“八五”翻一番，二十亿元；“九五”再翻一番，四十亿元。届时确有需要，也可以根据情况，再多拿一些。如果花上百亿元，真能办成几件大事，我看是值得的。这个盘子，比王大珩等同志提的两个亿大得多了，大了几十倍。可否大体上先按这样一个盘子来考虑，量入为出，作个试安排。这笔钱，一般地说，要安排到把目标产品拿到手。个别大的项目，也可以考虑安排到完成实验室原型样机，此后的工作，如型号研制或新产品试制，可根据需要，另拨经费，列入国家其他计划。因此，前期工作，实验室阶段的经费，要从严掌握，真正花钱是在最后出成果的时候，绝不能

前松后紧。这有两条好处：一是可以促使我们把调研工作做得更周密些，把目标、方向看得更准一些，避免盲目性；二是免得前期摊子铺得过大，把钱都花光了，到了中间试验和生产阶段无以为继。

（二）实行新的拨款制度。执行高技术计划，从一开始就应当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再走按部门、按单位切块拨款的老路子，必须按任务给钱，让钱跟着任务走。任务的委托，要实行招标，通过专家评议，择优支持。与目标相关的、水平高的、有能力承担任务的，才拨款，不撒胡椒面。只有改变拨款制度，才能保证把有限的钱管好、用好，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我们搞高技术计划，只能吸收少数人和少数机构来干这件事，只能把需要而又适宜于承担这项工作的部分人员和机构组织到这个计划中来。绝大部分科技力量，都仍然要毫不犹豫地为本世纪末的经济建设服务，要面向当前，面向生产。

（三）建立责任制。在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过程中，应当学习军工部门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按照系统工程的办法，建立管理网络，建立明确的严格的行政和技术责任制。

每个项目都要任命技术负责人，大的项目还应设立专家小组。要特别注意起用中青年科学家，让他们在攻关中锻炼提高，精力旺盛地奋斗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放到主要的技术岗位上来，因为这个计划一直要干到下个世纪。要放手发挥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导作用。各级领导要在人员的选配、方案的制定以及经费的使用等方面，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要创造必要条件，使参加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对工作做得好的要给予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要给予重奖，对不适应工作的应及时加以调整。要采取措施使这个队伍能不断吸收确有才干的新生力量，保持攻坚能力。

实施高技术计划，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出人才是这次提出高技术计划的重要目的之一，实际上是进行智力投资。发展高技术，需要高水平的科技队伍，需要他们求实、探索、开拓和献身。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支很好的队伍，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这支队伍的精华。有了明确的任务，这支队伍不仅不会散、不会断，而且

还能不断提高它的水平，培养造就新一代年轻的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形成后继有人、持续兴旺的局面。人才是最重要的，是个知识库，搞好了，对我国长远发展意义很大。

（四）要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尽可能汲取国外新的技术，利用国际上的各种合作渠道。有些研究工作，国内可以少投资或不投资，就是派科学家到国外的实验室里去做合作研究。正因为如此，更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不能给自己设置障碍，造成被动。

（五）要发扬大力协同的精神。过去，我国搞战略导弹时，协作单位上千家，包括几十个部委和二十几个省市，靠的是大力协同，一方有难，多方相助，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今后实施高技术计划，仍要继续发扬大力协同的精神，不得互相扯皮。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对某些急需的设备和人才，必要时应统一调配，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

## 五、组织与领导

执行高技术计划，必须实行高度集中领导，搞好横向协作。根据前一段的酝酿，这项工作可以考虑由科技领导小组抓总，宋健、衡高<sup>1</sup>同志牵头，宋平、嘉锡、马洪和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在计委协同下，抓好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至于计划的具体实施、督促和检查等日常工作，由科委、科工委分别按军、民两个口子来组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行不行，也请大家议论一下。总之，既要考虑过去的成功经验，又要考虑今天的新情况。

同志们！今天在座的，既有老一代的专家，还有不少中年专家，这个阵容很好。老专家们为国家的事业苦干了几十年，现在后继有人，大家都感到欣慰。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争取把这个计划制定好，最终完成这个计划，恐怕要寄希望于中年人、青年人。

### 注释

1. 丁衡高(1931- )，江苏南京人。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局副局长、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上将军衔。

# 给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卫生部转全国护理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我热烈祝贺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护理工作是崇高的事业，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现在全国护理队伍已达六十多万人，是一支很好的队伍，今后要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提高医护水平和服务质量，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希望你们加速发展我国的护理学科，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借此机会，我通过你们向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全国医护人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 给《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坚韧不拔的改革创新精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作风，是张洁世<sup>1</sup>同志的突出优点，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体现。希望《廉洁奉公的改革者张洁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学习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改革者的崇高品质，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 注释

1. 张洁世，时任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曾任北京服装三厂厂长，1986年3月因病去世。其先进事迹曾被广泛传播，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 在省（区）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

一、关于工业生产问题。影响一、二月份工业生产的几个因素，诸如企业套改工资引起的职工思想波动、纠正不正之风中某些界限不清、流动资金不足、小化肥积压、石油供应紧张等，都已经有个解决办法了。各地方、各部门如把工作抓紧，落实已有的办法，工业生产情况是会逐渐好起来的。三月份的情况已经比一、二月份好转。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要讲求产品质量，防止盲目追产值、速度；二是要围绕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有些产品，如汽车等，目前虽有积压，但从较长一点时期看还会转俏，要从资金等方面给企业以支持。

二、关于农业生产问题。在农业方面，我们又要发展商品生产，又还没有把各方面关系理顺，给农民的信息有时不灵、不准。因此，这几年反复出现某些大宗农副产品忽多忽少的现象。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使这种现象逐步减少，这应当作为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

三、关于外汇外贸问题。依林同志讲了今年外贸工作中的有利因素和石油降价所造成的困难，要求各地抓紧做好外贸出口工作，努力实现今年外汇收支的基本平衡。

四、关于财政问题。财政状况，现在不能说已经很好了。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肯定比去年低，这样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比去年少。但是，目前各地开支的胃口很大，同财力状况很不适应。各地要注意这个问题，抓紧收入，控制支出，保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五、关于横向经济联系。现在既有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又出现了城

市之间、省市之间的联合。这两种形式互相推动，地区联合为企业联合穿针引线，开拓道路，企业联合的发展使地区联合得到落实。据一些地方的企业反映，现在联合的主要阻力来自行政性公司和主管部门，希望各地在排除这种阻力方面能有所作为。商工、商农、商商之间的联合，应摸索经验，以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国营商业退出了一大块阵地，但农民和个体商业未能完全补上去。农民办商业，腿短，信息不灵，缺乏组织性。应当提倡国营商业与农民商业、集体商业联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个问题，各地应认真研究。

六、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问题。国务院即将发布几个规定，一个是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一个是关于辞退工人，一个是关于社会劳动保险，还有一个是关于招工制度。这几个规定互相配套，是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也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这项改革，可能在职工中引起一点震动。各地要把工作做好。可以组织职工展开讨论，使大家认识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和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



# 给北师大北国剧社的复信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全体同学：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利用业余时间排演莎士比亚戏剧，最近即将公演，很高兴。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我四月中旬日程已满，且即将离京去外地。我已转请朱厚泽<sup>1</sup>、王蒙<sup>2</sup>二位同志去看你们的演出，他们都已欣然允诺。此复，并祝演出成功！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 注 释

1. 朱厚泽（1931-2010），贵州织金人。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曾任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2. 王蒙（1934- ），河北南皮人。时任文化部部长，曾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 关于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给万里等同志的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

万里、依林、启立、纪云同志并报耀邦同志：

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一日，我从鄂西经万县顺流而下，到达武汉，了解三峡工程的情况，沿途和水电部、长办及三峡省所属地区的同志交换意见。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一时还定不下来，有些问题还要从经济上、技术上进一步论证，而三峡省筹备组要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势必在人大、政协引起更强烈的反映。这就使这一地区出现目前湖北、四川两省不便管，三峡省筹备组无力管的现象，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极为不利，如久拖不决，必将给这一地区造成大的损失。三峡地区的干部普遍要求迅速结束这种不上不下的局面。我们同三峡地区和两省的领导同志商量，大家赞成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所属地县仍归两省领导和管辖，国务院成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指导和帮助这一地区搞好开发和移民试点。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后，今后无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都不会受影响。即使今后三峡工程上马，这一地区的移民和开发等工作仍依靠两省承担不再变动。为了及早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李鹏、任重同志商量，代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三峡省筹备组有关问题的通知(草稿)》，请审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于武汉

# 祝叶剑英同志九十寿辰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敬爱的叶帅：

在您九十寿辰的时候，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您献身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节凛然，在万里长征的紧要关头，在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岁月，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在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您为党为人民做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无论建国初期在广东，还是以后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您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深受教益。像您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受到举国上下的敬仰。现在，我正在外地调查，不能来看望您，故写这封信，聊表敬意。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 正确对待农村党员雇工和 发展私人经济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农村中的党员雇工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要在这次农村整党期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现在对农村中的个人经营和雇工问题的认识，各方面争论很大，因此，要实践、试验，要研究、讨论，不可能马上拿出办法来。如果在这次整党中就对有雇工问题的党员不予登记，势必会引起大的震动。所以，这次农村整党不要涉及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员雇工问题。

第二，随着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在农村工业、服务业、商业、运输业、种植业新品种试验等等方面，必将出现更多的个人经营的私人经济，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允不允许，如果不允许，将会阻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允许这样做，也会有一些问题，但并不可怕，在实践的过程中，总会有办法加以解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一定要保护和发挥农民企业家和农民经营家的作用。这一批人是很可贵的，他们的经营相当成功，有相当的活力，发展了农村经济。第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许多经济的法律的形式，对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中消极的东西加以限制。这样做，既发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农村整党汇报时的讲话。

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了消极作用，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因此，一方面在理论上要探讨、要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分散的、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不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不要怕承认它是私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有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但公有制总是占绝对优势的。再一个是形式和实质的问题。形式上是雇工、私人经营，但实质是什么？如果使他的个人消费部分受到限制，使他的经营所得大部分转入固定资产，实质上个人消费部分即变成了经营者的工资收入。当然，我们将来要立法，明确规定他们的经营所得，必须有百分之多少（绝大部分）要转入固定资产，将来这些固定资产变卖，也还必须购置另外的固定资产，不能转化为个人消费。这样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在我们国家里，所有固定资产都要长期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服务，而不能转化成个人消费。另外，我们还可以逐步对经营好的、规模大的个体经济采取参股的办法，经营方式不变。用这个办法把它改变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但目前不宜过早地搞。所以，危险并不大。将来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因耕地面积少、人口多，很难发展成大的私人农场，而可能是规模不大的家庭农场。但为种植业服务的其它行业，如各种农业机械、基础设施、运输、加工、新产品试验等等，势必将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态。

现在怎么办？我主张两件事同时做：一是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百家争鸣；二是开始进行试点。可以先在相当发达的地区进行试验，试验中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尽量做到既发挥积极作用，又限制消极的东西。理论界同时讨论，百家争鸣。这个问题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试验、创造、发现，才能搞清楚。当然，这中间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搞不好，会出一些问题，但是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大的突破。即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国家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光靠家庭承包还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势必分化，一部分人离

开家庭，去搞多种经营，这样生产力就发展了。在实现这个转变中，靠我们过去的办法已经不行了；靠国家铺摊子来干，也不行；还是要利用能人来干。这样做，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来。

# 为促进中澳友好合作做出新贡献

致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的贺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第三次中国—澳大利亚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并预祝讨论会圆满成功！

前两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表明，中澳之间不仅能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而且还可分享彼此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近年来中澳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次讨论是在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召开的。“七五”计划将为中澳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也为两国企业界沟通经济信息和交流管理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相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将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 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们坚持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为社会创造和节约了巨大的财富，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党中央、国务院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对你们劳动成果的肯定和尊重。

这次获奖的 1761 个项目，都是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项目。许多项目年效益在一百万元以上，不少项目在一千万元以上，有的项目在一亿元以至十亿元以上。这是你们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探索的结果，也是你们和广大体力劳动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们作为这些项目的主要完成者，在创造和应用这些科技成果中，无疑起了特殊的关键性作用。前天我参观了“六五”科技攻关展览。这次攻关完成得很出色。98%符合合同的进度和要求，80%已经投入应用。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尽管我们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现在的条件也比较差，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是有志气、有能力的。我们应该为这支科技队伍感到自豪。

“六五”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为全面完成“七五”计划而奋斗。“七五”的任务，比“六五”更艰巨，但实现以后，肯定会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因而也更伟大、更光荣。“七五”计划对科技界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列入“七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不能复制“古董”，绝大多数应该达到国际上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许多科技难关有待攻克。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必须对传统产业加紧进行技术改造。各种产品，特别是加工机械、精密仪器、日用消费品和出口产品，都应该不断提高质量，更新换代。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原材料，必须大大节约。各种先进而又适用的技术，应当尽快在大、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普及。农、林、牧、渔，都需要研究对生产有突破性作用的新技术和新品种。村镇百业的兴旺发达，要求科学技术在产前产后各个环节上提供优质服务。为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拓新的技术，弄清我国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的特点，我们还需要加强相应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把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管理，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尚待开发的领域。为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服务，为提高十亿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环境服务，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是我们科技战线的主战场。同时，我们要组织少数精干力量，在若干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为下世纪初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技术上的准备。同志们！所有这些任务，都摆在你们面前，都是你们的用武之地，要求你们为国家建立新的功勋。

“六五”期间，我们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回过头来看，不是困难压倒了我们，而是我们战胜了困难。在今后的五年里，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着各种政策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可以预期，必将为科技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密切结合提供新的动力。党中央、国务院相信，在具有光荣传统和实干精神的广大老、中、青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科技工作一定会做得一年比一年好。到“七五”计划全面完成之时，我们再来为大家庆功。

# 关于核安全问题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

核安全局“关于秦山核电厂的焊接质量”的报告我看了。我想谈一些意见，主要是跟大家议一下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我们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总的讲有两条：

第一，不因苏联事故改变我们的核电计划。苏联发生事故说明，大的、灾难性的事故是可能发生的。过去外国人说三里岛事故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造成的，但是这一回可是真的。苏联事故会影响核电的发展，至少在以后一个时期欧洲会受到影响，美国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我们不应因此影响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核电计划也不大，核能是解决能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一是火电，二是水电，第三才是核电。

第二，我们要重新认识如何加强安全保证，确实做到不发生重大事故。因此要重新研究过去重视的程度够不够，措施够不够。今后要切实做到从设计、制造、施工、管理保证安全，以及事故发生后怎么办。我看苏联还是有一些办法，他们用飞机在上面封，下面还要打隧洞从下面也包起来。过几年我们核电站发电后也要有些办法，包括辐射病的治疗方面要准备。

今天主要是谈谈怎么看，可不可以定这两点，也就是建设方针不变，确实需要重新认识、加强核安全，以防万一。一旦出事故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核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首先是搞这项工作的同志提高认识，落实措施。此外，在浙江、广东、香港，对人大、政协要有个说法。现在为民请命的人很多。有什么办法保证安全，要向人民交代。现在对香港也要有个说法，台湾也可能发动香港人说话。总之，对人民要有个说法，有个说的口径。苏联事故后我们总要有个态度。当然，你也可以说苏联的落后，我们的堆型不同。李鹏同志，你这次去深圳也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题目，我看了核安全局的报告，主要是要把工作落实。有个专职部门比较好，旁观者清嘛！

我看整个世界上核电还会搞，但安全要加强。

首先是设计，然后设备制造、施工、运行、人员培训、包括抢险等。我看二十年内不能说安全过了关，因为还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要注意苏联发生的事故，戈尔巴乔夫<sup>1</sup>说这是第一次失去控制，没想到这样厉害。

厂址要有安全地带，是几公里，核安全局要立法。厂址确定后，几公里内不要搞大型工业。不然出事故后又要抢险，又要处理其它问题。今后选址要注意。

广东核电站也要注意。第一个电站搞好了会加强全国人民的信心。将来也许不一定出大事故，但总出毛病，人也不放心。

## 注 释

1. 戈尔巴乔夫 (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1931- )，生于前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曾任苏联总统。

# 在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日

霍克总理阁下，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第三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今天开幕了。我十分高兴和霍克总理一同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代表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在我国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

你们的会议已是第三次了。我愿高兴地指出，是霍克总理在一九八四年访华时倡导和推动组织了这样的双边讨论会，前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证明，中澳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友谊，从而为开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我相信，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必将在双方今后的友好合作中日益显示出它的作用。

我国今年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七五”期间，我们将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改革的深入进行，将为我国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开辟日益广阔的前景。

中澳两国是同处太平洋地区的两个大国。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发展农牧业、采矿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有着自己很好的经验，其中不少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具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中澳两国可以成为更好的贸易和合作伙伴。这对发展两国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

澳大利亚在结合本国的实际，学习和应用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和创造。特别在发展对外贸易、提高产品

质量、有效利用能源等方面的经验，正是我国企业目前所十分关心的。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学到不少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次会议为双方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将使两国企业界之间的友好合作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培养一大批能够走向世界的干部。企业要发展对外合作，也必须培养一批对外合作业务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七五”期间，我国将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和智力投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利用双方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业已建立的联系，以“请进来”、“派出去”等形式，促成更多的人员交流，以利于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培养中国的管理人员。

祝你们的讨论会圆满成功！

# 关于发展乡镇煤矿和建设大型煤矿等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 一、关于乡镇煤矿的整顿、改造、提高问题

我想了解一个问题：小煤窑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现在大家担心，乡镇煤矿上得这么快，到一九九五年，未挖完的还得挖；有的挖得差不多了，需要延深、改造，产量就会减少一些；还有一些矿这几年已经改造好了，会有新的增长。这样许多因素交叉的结果，是不断上升、逐年增长的趋势，还是哪一段要停顿一下？会不会哪几年突然没煤，出现停滞不前？大家比较关心。

雁北小煤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局部地区还可以布一点新点，总的来说不是布新点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整顿、提高。要搞企业化，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内部要建立领导制度，真正成为一个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不要买一台设备还要到党委书记那里批条子。要使每个矿长真正成为企业家、经营家，不合条件的要换。矿长不一定要有文凭，有文凭的不一定会经营。总之要有本事，办事公道，善于经营。现在有一些矿长不行，要训练提高。乡镇煤矿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发展煤炭工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既然要依靠它，就要把它搞好。虽然乡镇煤矿很小，但要使它真正成为一个企业，领头的应

---

\* 这是赵紫阳视察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和听取山西省政府汇报时谈话的要点。

是企业家，会经营。归根结底，乡镇煤矿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改造、延深，提高技术水平，不要把钱都吃完了。通过扩建、改造、延深，继续为解决国家能源问题挑重担，不要昙花一现，兴旺了这两三年又不行了。二是要整顿、提高。虽然它规模很小，但它是很有希望的，要加以培养，逐步提高文明生产水平。不一定小矿就死人多，就安全差。省和地区要把小煤窑的整顿、巩固、提高工作搞好。至于你们说的运输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国家还是需要煤的，而且你们的煤成本比较低。我看只要有煤，总是要想办法运出来的。至于怎么运出来可以商量。你们着急，宋平同志也着急，铁道部也着急。大秦线明年铺通比较有把握，后年就可以试生产，当然第一年拉不出多少。修那么大一条路，花那么多钱，要把各方面管理抓紧，不能拖拖拉拉，好多年才达到设计能力。你们地方上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修支线、建集运站等。

对小煤窑，大家还是不大放心，当然这两年小煤窑立了功。大家在北京想这个问题，还是觉得不踏实，究竟怎么样？不要过几天又不行了。另外，死人这么多，不敢叫外国人来看。你们努努力，到什么时候，也可以向外国人开放，叫他们来小煤窑看看，看了以后觉得还可以嘛！办矿不一定设备那么先进，主要是认真管理。这件事，山西省要认真抓一抓，抓好了可以出经验，走在前边。神木现在刚开始挖浮财，你们已经挖了这么几年浮财了，也有点资金、有点基础了，应该再提高一步，更上一层楼，很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我们国家还有一大片地方，如果走得通的话，国家不需要办很多大矿，就可以出几千万吨煤，解决很大问题。国家修干线，合作修支线，群众办煤矿。这是多快好省的事，很大的一件事，现在还未很好理顺。

不要光讲小煤窑的好处，也要讲它的不足，只有看到不足，才能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不行，提得太晚也不好。小煤窑可以和大煤窑搞联营，这样可以取长补短，解决小煤窑技术力量不足问题，资源纠纷也可解决。小煤窑抓好本身的技术改造，由小到大，由浅到深。要准备转变，不能总是老小不大，老浅不深。小煤窑把资源固定住了，它就得向下延深。

## 二、关于乡镇煤矿发展后的环境保护问题

雁北小煤窑这样发展下去，环境会出什么问题？比如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等等。大家要研究一下，不要将来有煤没水，山西还是缺水的，从长远看，山西国土治理，水是大问题，要把水放到重要位置。对这个问题，第一，要把情况弄清楚；第二，靠什么去解决，总得有个办法。不能只顾眼前，而无长远打算，这样就会出大问题。整个北方都有这个问题，不光是山西。

## 三、关于煤炭加工转化问题

小煤窑发展起来后，小水泥、电石、建材、铁合金都可以搞。小焦化也可以搞。煤化工不是那么简单，花钱很多。山西可以考虑搞一些小的火电站，搞一万、两万的机组合算不合算？反正煤运不出来。电发展了可以搞工业，这样，就不是运煤，而是输电，运铁合金。还可以发展点钢铁，进口点矿石，煤往外拉，矿石往里进。

## 四、关于出口煤自主权问题

关于煤的出口，还是用合营的办法，由煤炭部中煤公司统一出口，通过合营解决你们的问题。现在看来，凡是采取合营出口，效果都是好的；凡是想自己另外搞个摊子，当时想得很好，最后办的都不好。现在资本家到中国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抄后路，这一家本来很便宜，那一家比他还便宜。所以很多人现在不敢跟中国做生意。过去我们一开始说权力分散，外国人很高兴，现在一致呼声要求中国权力集中，因为他没有办法，不知道找谁。在山西搞煤化工，你们可以跟煤炭部对外搞合营，这样就把优势都发挥了，你也不吃亏。外贸比较复杂，最近外贸部采取了很多合营的办法，效果比较好，当然不算十全十美，但也算是一条路。



## 五、关于引黄问题

从黄河少引一点水可能是个好办法，小引黄可以考虑，地方拿钱。（王森浩<sup>1</sup>同志插话：地方干不起，两家抬可以，国家拿大头。）这个地方我原则上赞成从黄河引一点水进来。等青岛引水工程完了以后再干。山西水资源问题不能光靠引黄，地下水还是不错的嘛！问题是怎么用。有些没有搞清楚，这边说没水，那边煤矿往外抽。

## 六、关于古交区西曲矿的失火问题

西曲煤矿失火那件事钱虽然不多，但暴露的问题是严重的，反映了有关方面作风的腐败，涉及市、区、管理局等单位。那套设备是从美国引进的，引进的目的是出国，谁沾个边谁就出国，都是些可去可不去的人。东西拿回来往那儿一搁，就没人管了，结果发生了火灾。要好好把这件事总结一下，汲取教训。对各个环节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不负责任、突击出国等，写个总结。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少考虑国家，要从这个侧面解剖一下我们内部上层领导的问题。

## 七、关于小流域治理问题

合股治理小流域的经验是好的，这叫股份制，也是合作经济嘛！有钱的入股，没钱的投工，投工给现钱，农民马上有收入，这种办法比较好。合股经营的关键是要有个能人，没有个能人搞不起来。总之要有一个真正的经营者，股份比较多的，他责任心比较强，因为搞不好自己的损失最大。黄土高原的潜力很大，一定要治理好水土流失。

## 八、关于平朔露天矿建设问题

平朔矿说贷款利息高，难以偿还，要求国家优惠。优惠就等于国家投资，要优惠国家就得补贴银行。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现在银行存款利息提高了，长期存款利息八厘多，贷款利息十厘多就不算高，否则谁还向企

业投资，都存在银行算了。国外股票的利息都高于银行存款，否则，谁还买股票？股票有风险，银行存款无风险。

根据这个矿基本建设的这种搞法，我们在其它地方照它这个样子自己搞，行不行？包括使用大型设备，国内可能还要搞这样的矿。以后再同国外合作搞煤矿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各有各的国情。外国的国情是人少劳动力贵，我国是人多劳动力便宜。现在争得很厉害，神木小煤窑六元钱一吨煤，当然很浅，但也是煤，雁北一吨煤十二元，大同矿务局二十四元。固定资产多当然省人，但成本很高，另外不好安排就业。都用大机械，老百姓干什么？当然不是完全不搞机械，而是不搞太多的机械，比如将来搞准噶尔煤矿，还要不要搞这么大的设备，值得研究。看来设备不是越现代化越好，那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当然不能只靠小煤窑，只靠地方矿，也要搞一些骨干煤矿，搞一些大矿。

你们要好好学习外国专家管理的经验，外国人有一套办法。以后再合资搞这样的煤矿情况不多了，所以更应该利用这个矿好好学习。通过这个矿，找找他们开露天矿的窍门，看看人家怎么设计，怎么采掘，这一套我们还不太懂。

## 九、关于用工制度问题

现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今后再招收工人，包括固定工都叫合同工，五年签个合同。在五年内不愿干了，可以不干；厂里认为你干得不好也可以解雇，另外再找别的人签合同。这大体还算固定工，但它也是合同制。还有一种合同工叫轮换工，从农村招的，五年或六年一轮换。这样做，第一，五年可以积五千元钱，可以盖房子、娶老婆；第二，技术有了，头脑也灵活了，可以搞专业户；第三，可以独立经营，搞小煤窑，成为小老板，当农民企业家。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一系列好处，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减轻国家负担。所以，要搞好劳动制度的改革。

## 十、关于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有一个问题要很好了解一下，西方工业的发展，管理体制经过了一些阶段。一开始资本家自己经营工厂，自己当老板，请个管理人员，但事事他得过问，这叫家族工厂。后来演变为股份制，很难讲谁是老板，买了股票就是老板，股东很多，多少万人，因此出现董事会，大事由董事会决策，经营管理是经理。现在多数是这样。有些就是董事长管事，董事长不一定股份最多。联邦德国二次大战后，建立了监事会，大的决策是监事会，经常性管理是董事长。我们国家在建立厂长责任制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谁代表国家利益，谁代表企业利益，谁代表工人利益。有的说厂长代表国家利益，有的说代表工人利益。厂长是选举好，还是上级委派好，职工代表大会推荐好。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批管理工厂的能人，或者说阶层也好、集团也好。这批人专门管理工厂，谁要聘请了他，他就为谁负责，把工厂管好。他不是股东，财产不是他的，但他非常负责，有着一一种责任感，一种职业道德，为了一种信誉。这个情况日本不太明显，联邦德国非常明显，美国、加拿大也有。联邦德国有位经济学家施奈德，我给他出了这么一道题。我说我们有道难题，企业的厂长屁股究竟应该坐在哪里？是听上级的话，还是听工人的话？我们现在许多厂长，有的一上台不管经营好坏先给工人许愿，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工人都说这个厂长不错，至于这个厂将来搞得怎么样他不管。当然有的厂长为了提拔，给上级印象好一点，也对上负责。还有一些厂长搞污七八糟的事情。我问联邦德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一开始也未回答清楚。他讲我们国家有竞争，你们无竞争，还讲什么所有制，说你们吃大锅饭。我讲你们也是所有制和责任制分开的嘛！我还讲了克虏伯这个例子。现在克虏伯财团根本没有克虏伯家族。当时克虏伯立下遗嘱，委托七人委员会管理。当然有待遇，但财产不属于他们。他后来回答我联邦德国的企业家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如何，与他管过的工厂管得如何有很大关系，如果这个厂长在哪个厂管得很不好，结果被解雇了，以后他就很难找到好的职业。好的企业家大家都争，当然工资比较高。国际上还有管理旅馆的集团，但不是旅馆托拉斯，他根本没有一个旅馆，专门为别人管理，从总经理到服务员，全套人马，专门替别人管。

## 十一、关于劳务市场问题

有社会工资，就有劳务市场，现在不仅实际上存在，形式上也存在。劳务市场的劳动力价格是浮动的，对劳动力有个需求变化，所以才叫市场。修铁路的工钱就提高了，有煤矿的地方工资也就高一点。劳动力价格随着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上下浮动，这不是劳务市场吗？再一个是契约关系。一个契约关系，一个价格，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个东西一搞就活多了。

### 注释

1. 王森浩(1933- )，浙江慈溪人。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大同矿务局总工程师，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矿矿长、副局长，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煤炭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 给《中国日报》的题词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年来，《中国日报》在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希望报社全体人员继续努力，把《中国日报》办成内容丰富，鲜明生动，为中外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张报纸。我还愿借此机会，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日报》的读者致意。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 加快发展煤炭工业\*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我国的煤炭储量大，品种齐全，煤质好，开采容易，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我国的石油，看来不可能出口很多，但煤炭除国内消耗外，可以多出口。

发挥我国煤炭的优势，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开采问题，一个是运输问题。这几年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依靠农民采煤，把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最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结合起来。结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农民办矿，如乡镇煤矿，这种形式适合开采埋藏比较浅的煤炭；另一种是国家办矿，招用农民采煤，实行轮换工制度。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煤炭问题，归根结底是运输问题。对运煤问题不作根本的考虑，我国的煤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但是，煤炭只靠外运不行，还要考虑在产煤地区就地消化的问题。要在产煤地区搞电、搞耗能重工业，如搞火电、钢铁和铝等。

煤炭运输和就地消化要解决体制问题。大家办电，统统交给一家，这个办法要改变。水电部要鼓励、支持大家办电，使整个电力事业发展起来。一家办铁路、一家管铁路的状况也要改变。主要铁路干线当然要靠铁道部修建和管理，但一些专用铁路和支线，要提倡大家办，地方办，煤矿也办，自办自营。煤炭部可以考虑有一些投资用于开采煤炭，有一些投资修建铁路，收购煤炭往外运。铁道部对地方和部门办铁路要给予优惠，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并帮助他们加强管理。

---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加快发展煤炭工业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 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 一、关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工业增长速度问题

今年的经济形势，总的来看，第一、情况很好；第二、有些问题值得注意。今年的形势有两大特点：一是能源、原材料生产情况好。这一条很重要。过去经济出问题，都不是出在加工工业上，而是出在能源、原材料生产缓慢上。二是市场紧俏商品生产增长比较快。所以，今年一至四月工业生产速度低一点不可怕，这种速度有后劲。当前，总的情况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市场比较稳定，物价趋于下降；（二）货币投放减少；（三）库存增加；（四）速度降低。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样四个问题？当然，有非经济因素，但根本的是经济原因，要很好地研究。

对当前的工业增长速度怎么看？有一个人给我送了一张表，说这几年每隔两年调整一次，因此每年的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的速度就要低。今年头四个月速度降低，有一个工业生产水平的问题。我们现在每月的工业总产值也就是七百亿至八百亿元，去年上半年超高速增长，今年头四个月的速度慢下来是必然的。我看，对头四个月的速度怎么分析都可以，关键是后八个月。我是不压速度的，速度过低不好。今年应当争取搞到百分之七到八，不能低于百分之七。如果只达到百分之五至六，就有一个要不要调整计划的问题。因此，今后八个月要注意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避免

---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不稳定因素的加剧；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切实地去解决一些问题，使有条件增长的行业和地区把速度搞快一些。总之，今年既不能把速度搞得太高，又不能太低，应争取增长百分之七至八，而且要求质量高、效益好。

## 二、关于改善产品结构和引导消费需求问题

最近看到一些理论家写的文章，他们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开始看还相信，后来越看越怀疑。问题是什么结构，如何调整。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比如彩色电视机等，你能一下子搞上去吗？那有多大市场？中国的市场，最大的是农村，是轻纺产品，而不是城市里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当然，城市需要的高档商品也很重要，但这个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思路搞正确，不能把质量好的商品都理解为高档商品，只去发展高档商品。实际上，各种档次的商品，都有个质量高低的问题。

当前产品结构不合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价格太死，质量好的商品不能优质优价，大路货不能降价。要趁今年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小的机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真正放开小商品的价格，特别是要放开那些市场短缺的小商品的价格；二是名牌、优质、高档产品和新产品，实行购销议价，或者提价；三是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大路货，可以降低价格，或者把管制价格放开。这种调整，不完全是结构性的价格调整，而是对消费需求的引导。提高一些产品的价格，也不在于限制高档商品的销售，而是促进低档商品的销售，促进商品结构的调整。当然，一下子都提高价格也不行，应当有选择地提高。看来价格指数提高百分之一，问题不大。这件事要认真研究。

至于“关、停、并、转”问题，值得研究。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相当一部分工厂安排生产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减少了，它就不生产或者少生产。所以现在用行政办法关、停、并、转不行了，而要用价格手段，用经济办法。小化肥去年为什么停产，就是因为卖不出去。乡镇企业也是这样，你要它关，它不关；它的产品卖不出去，自己就不生产了。



### 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一年来，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很有成效，但问题是项目没有减下来，这是潜在的危險。关键是要下项目。如果只压投资，不下项目，必然拉长周期。而且，这一年投资压下来了，如果项目没有减，下一年的投资规模又会上去。好像一个葫芦，暂时按下去了，一松手又会上来。

更新改造，要提倡设备更新。这样，企业的生产技术上去了，机械产品也会有销路。

### 四、关于财政信贷问题

财政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省长会议上要谈一下。

我们现在的财政开支盘子，是建立在生产超高速增长基础上的，而生产超高速是不可能持久的。应当根据财政承受能力，重新考虑财政开支的盘子。现在，有些地方倒算账，说必须有多少财政收入才能过日子，再根据需要多少财政收入来确定生产增长速度。这是不对的。从长期看，我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也就是百分之七至八，最多百分之十，把财政开支增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不可能的。要把这种幻想去掉。现在胃口太大，要压缩，吃点冷饮，缩小财政开支盘子。去年生产超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加较多，实质上是上百亿美元转化为人民币。今年生产速度降下来了，又没有美元转换了，财政收入速度当然要降下来。弄不好，可能出现几十亿元或者一百多亿元的赤字。所以必须压缩财政开支，首先是压经济建设开支，消费开支不能压。要搞一个紧急压缩财政开支的措施和办法，在六月份省长开会以前拿出来。将来的方向是，财政不开支搞工业建设，工业建设由银行贷款。

现在，不少地区有这样一种情况，地方拿钱去搞自己的建设，而要求上边谁出题目谁出钱。如果这样，我国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今后，地方首先要保证经常性费用的开支，然后再去搞建设；搞建设，又应当首先搞教育、道路、公用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然后再去搞工业项目。

流动资金，今年一至四月有很大放松，今后几个月不能笼统地放松，而要排排队，支持那些适销对路商品和效益好的企业。有些则要收紧一些，比如钢材积压很多，就应当收紧。

## 五、关于流通问题

流通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些商品商业部门不收购、不进货，生产企业没有流动资金，生产遇到困难。有些积压商品，不是长线，是流通不畅，应当扩大销路。属于季节性销售的商品，要支持商业批发部门多收购一些。当然，长线的又没有销路的，不能收购。城市滞销的大量中低档商品，应当直接拿到农村去推销，避开中间环节，价格可以便宜一些，商品就容易销出去。

## 六、关于中外合资问题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问题要很好讨论一下。这方面存在不少毛病，国外反映很大。日本现在有大量资金要输出，我们应当搞一个比较宽松的办法，以利于多吸收他们的资金。对日本在中国办合资企业，可以在地皮、税率、服务等方面给他们以优惠条件，换取他们在外汇汇出方面给我们以优惠条件，争取他们不汇出或少汇出。

日元升值，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抓紧研究，如何趁机多出口，如何多引进一些日本的资金。

今天提出的财政、信贷、价格、流通等问题，要再研究一次，在省长会议之前拿出办法来。

# 积极参加援外项目管理 使当地人民受益\*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 一、我方应积极参加援建项目的管理工作， 把援建项目变为合营项目

扎伊尔要求把我援建的制糖联合企业改为中扎合营企业，我看可以试验。把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贷款变为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入股股份，这有利于我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暂时不赚钱，也不要紧。过去我们怕干涉人家内政，不愿派人参加管理，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项目建成后就交给对方，由于他们不会经营管理，往往投产两、三年后因亏损而垮台。有时他们请别国人来管理，这实际上是我们给别人作嫁妆。我们干了许多傻事。我们参加项目管理，搞好了，外方一些项目的负责人可能因个人捞不到好处而不高兴，但受援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会满意的。

今后我们援建的项目，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可以接受搞合资经营。单纯搞技术合作不行，因为在企业中没有发言权。搞合营，我们可派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进去。我主张少搞官方对官方的合作形式，争取多同民间私人搞合营。即使政局发生变化，也不至受到损失。

---

\* 这是赵紫阳在同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肯戈会谈后，就如何搞好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的问题对中方人员的谈话要点。

## 二、利用受援国的本国货币还款，在当地进行投资

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处得到资金，也希望我们出一些资金，去扎承包项目。我们不要指望非洲国家以外汇偿还我提供的贷款。可以接受受援国用本国货币还款，把还款在当地再投资，作为我们在合营企业的股份。要争取搞一些承包项目，承包项目赚的钱，可用在当地搞其它项目。

## 三、要搞可使人民直接受益的项目

在非洲援建体育场人民会高兴的。体育场是人民可以去的地方，比人民宫一类的大建筑要好。工业项目如管理不好容易背包袱。农业可以搞一些，医院、学校可以搞，这些项目使人民直接受益。

# 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 和价格改革方案的想法\*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我们搞改革，一开始搞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什么扩权走到一定程度走不通了？我现在不赞成这个说法，说改革仅仅为了形成生产资料市场也不全面，改革是要形成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创造这个条件，什么股份制，资产经营制都排不上日程。我们扩大企业自主权，受到许多外部条件限制，经营差的不一定得益少，经营好的不一定得益多。归根结底，商品生产要有商品生产的条件，条件是市场条件，市场离不开价格。计划体制改革，如不涉及市场问题、价格问题，也不行。我们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股份制是一个问题，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行。华生<sup>1</sup>提的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听了两次，没解决问题，他也承认是逐步起作用。我们的企业占有资产多的，不一定效果好；占有资产少的，如果价格不合理，也难以负责。现在走到这一步，要改革就要考虑价格改革，考虑价格改革就有风险。想尽量少动一点，风险少一点，但矛盾又解决不了。价格改革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最后是以放为主，时间可以拉长一点。放为主与税制如何配合起来，小步动作震动也不小，但没解决问题。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安志文等关于经济体制总体改革思路、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意见、财政税制改革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基本思路汇报时的谈话要点。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减少计划的调拨部分，增加市场价格部分，减少指令性计划。如现在每年统配钢材二千多万吨，每年可以减少几百万吨，拿到市场上去。若干年后，每年统配只有一千万吨或一千五百万吨，统配这部分中，成为补贴的，要与国家强制订货结合起来。进入市场后，重点建设就要相应增加投资。还有最大的问题是税收如何配合？必须要限价。现在地方的材料价格是你减他不减。因此，也可以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计划外的高价压下来，通过市场交易来施加影响。如果采取计划内调价的办法，会水涨船高。两个路子考虑哪个？

可不可以把计划外的价格向下降，最后达到平均价，如钢材达到每吨一千元。也可以考虑两条路子同时走，计划内统配的每年减少一百到二百万吨，计划外的要施加人为的影响，使价格向下压，经过几年压到一千二百元。

把进口钢材投进市场，也等于减少统配钢材二千万吨，这不是个小数。

要有措施，钢材涨价，减少补贴，要将所得追加一部分作为重点建设投资。中央、地方各级都进口钢材，都要补贴一点基建。

计划体制的改革证明价格不合理已冲击到各个方面。企业扩大自主权和计划体制有矛盾，我们就改革计划体制，下放计划权力。计划权力下放后又发生价格问题。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把思路理顺了。第一步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二步下放计划权力，改革计划体制；第三步是价格改革；第四步是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内在规律，关系已弄清了，就是步子怎么走。实际是所有制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

钢材，我看是个特殊品种，价格涨得太多，分配必然不合理。放开这部分产品价格是鼓励企业积极性，以后流向问题不管不行，放开这部分也有个市场组织方法问题，日本叫大商社。

明年粮食、饲料必须丰富内容，我主张统购再减二百亿斤，留下的一千亿斤，给柴油、化肥以及高档消费品等挂钩，保证城市居民口粮，其他都采取议价。城市口粮只能长期背，其他都放开。将来发展方向，计划内要有一定数量，工业中有一部分重要生产资料、大型设备生产要走粮食统购的路子。国家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订货，给予一系列优惠措施，供应能源，企业给国家多少设备、钢材，国家控制起来。慢慢形成一

种市场价格。另一种国家订货，国家给条件，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实行指导性计划，逐步丰富内容，变成经济合同，这样国家就可掌握多少钢材、电力等等。指导性计划通过价格、通过合同实行。

有几个问题大家研究一下。

一、物价不合理的问题。现在原材料产品情况好转，加工产品相当难过，尤其是国营大工业，沿海地区工业日子难过。明年这样调价会给企业带来什么后果，究竟改革结果是初级产品日子好过，还是锦上添花？现在原材料工业情况比三年前好过多了。钢厂好过，煤矿好过，但加工工业不好过，沿海加工工业困难比较多，利润多，但税拿走了，明年要它再消化百分之二十，这个问题如何办？原因是财政收入是在原有基础上换算过来的。

二、价格改革方案好处究竟有多大。要先把这个落实，包括中方案、大方案。如果确实好处很大，那么风险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为改革让路。不外乎基本建设两年减二百亿元来承担这个风险，换来长远利益。如果基建压两年，对五年计划影响有多大。有没有兼顾的办法，影响不一定那么大。应付风险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如果所有财政收入冻结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做到。这样做了，下文如何？如以后下文还是进行不下去，那这个方案就不行了。从这点来讲，我主张步子大一点，可立于主动地位。两年让路，以后可立于不败之地。

三、地区封锁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利益，不行。如何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对省里来说，不能说人民生活和它没有责任。中国很不平衡，完全要各地不干预经济不行，但现在地区分割也不行。地方也要管宏观，和全局发生矛盾时从全局着眼。要承认差别，可以有一定的干预，但是要在一定利益的基础上，搞共同市场，有共同利益就行得通。这次要走一条新路，不能按原模式集中划块，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也不行。

价格改革一是道理要讲清楚；二是对企业要算个长期的账，算五年的，每个城市也算五年的；三是明年也要照顾一下眼前，搞光了也不行，当年不吃亏，而且多少要好一点。

物资改革包括在流通中。流通，解决地区分割，包括物资在内，劳动力流通暂时不讨论可以。

生产资料要研究指导性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只讲一个偏低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是两个扭曲，要解决两个扭曲。计划外的必须加强管理纳入指导性计划；计划内的价格要提高。大宗的生产资料要研究指导性价格，市场要有，但要有指导。经济煤开始加二十七元，这是指导性价格。有领导的市场怎么搞法要研究，一个是计划内的价格提高，一个是计划外的价格要向下压。钢材，过多少年计划外价格如只比计划内价格高百分之五十，计划价九百元，市场价一千四百元到一千五百元或一千二百元到一千三百元，这就好多了。钢材是长期紧缺商品，完全放开不行。

我们搞指令性计划的经验有，放开的经验也有，但指导性计划的办法还没有，用经济的、法律的办法，而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搞指导性计划。计划要有立才行。我们要走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路子，就表现在指导性计划上。要使计划体制基本上转到指导性计划的基本模式，从总体上转到指导性上来，改革就是改这个。

美国是一种模式，日本是一种模式，南朝鲜又是一种模式，台湾也不是纯市场经济，新加坡也不是。

风险，要明年一年不发生问题并不十分困难，问题是后果如何？下一年怎么样？明年不涨价，后年会不会涨，还有一个经济会不会萎缩，高度控制结果，会不会带来一个萎缩问题，后劲问题。两次调价都有失控。

（安志文谈到：体改委内部对这个方案，机关里一般人都忧心忡忡，这样改究竟好处是什么，担心改不好又走上集中的体制。地方上也有看法。接触实际多的，都担心很大，改后生产资料形不成市场，觉得要慎重再议论一下。）

这个思路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可以重新研究一下。一是我基本赞成这个方案，而且倾向于大方案。二是如不走这条路，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研究过其他的思路，你们不是讲两个扭曲、跑漏吗？能不能把计划外商品作为指导性计划，要国家计划指导下，逐步成为指导性办法，把计划外市场价压下来。问题是放的办法，涨价部分国家收得太少，坏处是慢，好处是顺其自然。现在确实有个问题，计划内调价小了不解决问题，我所以赞成大方案六百亿元的架子，五百亿元的方案煤不提那么高，电少提一点，但动这么大的干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钢材提到九百元，但市场



下不来一千五百元，两个价相当悬殊，还要相当长时间。放的办法，企业之间不均衡，这能不能改变，使生产原材料的企业计划外、计划内比例差不多，加工企业的原材料来自统配的与市场的也大体差不多。能不能再议论几天，比较一下。

哪年搞，争取明年搞。大动只能一次，不是一次到位，而是逐步达到设计能力。

价格反馈，要考虑到加工工业，现在原材料工业劲头很大，但不合理，不均等。

调计划内价格并不解决问题，调了以后差别还很大，特别是大企业。能不能做到使生产原材料企业计划内、计划外分配的数量做到均等。消耗原材料的加工企业也做到计划内、计划外分配原材料均等。这样震动就小，有没有办法调过来。（周小川<sup>2</sup>等认为品种太多调不过来）事实上是个均等问题，要解决生产积极性就是均等问题。现在是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调计划内价格的思路，一种是通过解决计划内、计划外原材料均等问题来解决。计划内外实行三、七开或几几开，可以分几步解决。上海现在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内的，每年减少一点，相应调整任务（周小川等认为形不成市场）。要形成市场，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息，能都放到市场价格吗？首先要控制需求，第二因势利导，放开这部分如何防止其副作用。企业均等机会可以找到，一是以大中型企业为对象；二是核定一个目标，计划内多少，计划外多少，逐渐达到。另一个均等是指令性多少，如百分之三十，有多少上市场。粮食就是三、七开。做到企业均等有没有办法解决（中青年干部认为难度比现在还大）。现在也有计划内、计划外。

要控制需求，但钢材如调到九百元，五年以内不可能解决供求问题。钢材品种是若干年内不能解决的。但不是国家急需的产品要控制。正因为如此，不调价也可以改。钢材市场怎么搞，要设计一个办法，市场进行交易，价格要有浮动价或最高限价。中国太大，没有一亿吨以上钢材很难满足需要。中国煤炭比较容易解决，一是资源丰富，二是农民可以挖，是值得乐观的。电的问题是没有放开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物资是长期紧张的，目前钢材到市场能随便买到还办不到。

调生产资料价格走什么道路值得论证。还有，是调生产资料价格还是

调消费资料的价格也值得论证。搞生产资料的企业都能搞下去，搞加工工业的企业困难多值得注意。现在问题不是原材料，也不是电，而是加工工业，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去年财务大检查把企业整得很苦，检查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很少，尤其是沿海城市。原因是消费品不能涨价，原材料涨了价要它消化。

地区封锁像现在这样不行。我上次在流通组讲了，新疆原料不给上海，而产品又要上海的平价商品，越边远地区上海的东西越多，这样地区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如要调上海货，原材料也应给上海。当然调上海产品有个照顾民族地区的问题，但要逐年减少一些，否则这些地区自己的工业也发展不起来。

价格问题，还可以反复研究一下，如别的路走不通再回过来，基本思路再议一下，以后再讲一下。

## 注 释

1. 华生(1953- )，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曾任北京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2. 周小川(1948- )，江苏宜兴人。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 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 一、下半年工作的指导方针

今年前五个月的经济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工业发展速度基本上是正常的。在去年超高速的基础上，今年前五个月工业增长 4.3% 是不容易的。今年与去年不同，今年可能是上半年速度低一些，下半年速度高一些。

下半年工作怎样抓？有些省市的同志提出，下半年需要留一些时间，对已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消化、补充和改善的工作，让各地把存在的问题理顺一下，使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气更顺一些，劲更足一些，把生产搞得更好。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的改革是波浪式前进的，一个时期迈出重要的一步，一个时期巩固、消化一下，瞻前顾后，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有精神准备，就是在当前工业增长速度不高、市场物价趋于平稳、货币回笼较好、人心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下半年让一些很需要搞、牵动又不很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这也是必要的。如劳动制度的改革，价格上某些局部的变动，银行体制某些方面的改革等，也还要搞一些。这样做，可以把改革的承受力分散一下，为明后年较大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 二、调整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问题

当前，我们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同消费结构、市场需要不相适应。市场畅销的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市场疲软、滞销的产品，生产能力又有

余，一些商品出现积压现象。这是影响当前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下半年可能更突出。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进行：

第一，对生产结构、产品结构要逐步调整。对市场不需要的长线产品，要停下来，及时转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对一些本来有市场、但因为质量差而影响销路的产品，要逼一逼企业，迫使他们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讲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很难办到。现在市场比较缓和，某些产品出现滞销现象，要有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引导企业面向市场，增强市场观念，掌握市场信息，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服务态度，促使企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这项工作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但必须逐步进行。

第二，电力、原材料，要集中保适销对路的商品。各地在生产组织、生产调度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使那些生产适销对路商品的企业得到支持。

第三，搞活流通，打开销路。当前许多大中城市滞销的商品，特别是一些大路货，是中小城镇和农村所需要的。往往是城市市场基本饱和的商品，在农村却成为畅销货。因此，下半年城市商业部门要大力组织商品到内地、到农村销售，送货下乡。广大农民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是消费大路货的主要对象，市场的潜力很大。商业部门要创造一些新的经营形式，如工商结合、产销结合，城市和销区的批发环节联营等，打开销路，使货畅其流，满足社会的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四，引导消费，调整消费结构。解决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的矛盾，固然需要改变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使之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同时必须引导消费，逐步调整消费结构。现在，持币、储币选购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国家一方面现在还很穷，另一方面人们的购买力又很快转入高档消费品，形成消费的畸形发展。现在社会上流行“三双一彩”，洗衣机要双缸的，电冰箱要双门的，收录机要双卡的，电视机要彩色的，这种现象有点超前。生产和消费，都不能离开我国的现实情况，高档消费品，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消费对象，而大量的应当是消费中、低档商品。我们不可能把大量生产力转向高档商品的生产上。过早地、不恰当地把人们的消费引导到高档消费品上，对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消费上出现的这些不合理现象，与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有直接的关系。引导消费也好，调整消费结构也好，最有效的经济杠杆是价格。价格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档次差、质量差、季节差、地区差没有解决。我们的价格体系基本上还是过去产品经济的模式，产品靠调拨的办法分配，不按商品流转规律来考虑价格差价，因而阻碍商品的正常流通，刺激消费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影响了生产。产品的档次、质量差价不拉开，高档价不高，优质不优价，就助长了人们对高档商品的消费欲望。季节差价不拉开，淡旺季价格一个样，人们就不愿意储备商品。地区差价不拉开，边远地区都靠调用上海货，地方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得按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规律办事。应当运用价格这个有力的工具，来引导人们的消费，推动生产的发展。

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在价格上作些小的调整，中心是把档次差价、质量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以及批零差价适当拉开。在价格上作一些小的动作，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震动。三十年来，我们习惯于东西不够就凭票供应，人们也适应发票证，但在国外就不行。现在，我们应当引导人们适应价格的正常变动。这需要我们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 三、认真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今年从四月开始，就支大于收，五月赤字更大，如不抓紧，全年财政收支可能出现不平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支出盘子大了。前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特别是去年出现超高速度，我们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而超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在财政上应该是“量入为出”，但是，我们现在不少地方是倒过来了，是“量出为入”。不是考虑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首先算财政上必须多少钱，要工业上搞多少速度。这是很危险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从上到下必须明确，今后工业的发展速度，几年之内大体在7-8%以内，我们不能把财政收支押宝押在每年增长10%以上的速度上，把支出的胃口搞得很大，那是要出问题的。所以，当前在财政上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是要压缩空气，要“吃冷饮”，把胃口减下来。地方财政开支，首先要开支人头费，保吃饭，有

了多余的钱，先搞基础设施和智力投资，然后有钱再办工厂。像现在这样从城市到乡村到处盖房子，修一条街，百废俱兴，是难以为继的。财政支出搞大了，又负担不起，只好向企业打主意，甚至“竭泽而渔”，那就必然会使生产萎缩，没有后劲，必然造成需求过大，物价上涨。

财政上，总的讲应当增收节支，当前重点是要压缩开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新审核一下收支盘子，紧缩开支。一要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要把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控制住，把非生产性基建投资控制住。要下决心砍掉一批项目，保证重点，缩短建设周期，提高经济效益。二是要坚决纠正各级机关、团体、部门、企业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刹住这股不正之风。要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实现今年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这是一件大事，各级都要抓紧。

#### 四、继续抓一下把企业搞活的问题

把企业搞活，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新的经济体制，将是企业具有无限生机与活力的体制。我们的各项改革，都要围绕在宏观指导下如何把企业搞活来进行，要把握住这个中心环节。

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强宏观控制，解决超高速带来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做法，影响企业的活力。当前许多企业感到处境困难，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的加工企业，他们的企业效益好，担负国家任务很重，但近来增长速度放慢，企业干部和职工思想有些波动。他们反映，前几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所得到的东西，不少去年又收回去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在改革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有的则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下半年应当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企业能够搞活。对企业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困难，要排排队，梳成辫子，分别轻重缓急，切实加以解决。总的精神，还是要坚决把中央和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系列政策落实。下半年要注意抓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决制止对企业的乱摊派。现在四面八方向企业伸手的现象很突出，企业负担沉重。下半年对企业乱摊派的问题，各地应由经委、财

政等部门组织一次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尽量减少企业的不合理负担。关于用提高电价的办法“集资”办电的问题，实际上是挖了中央财政，挤了企业。这个口子不能开，除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停办。已筹集的资金要上交，或退回给企业。

第二，去年的财务大检查，成绩很大，应当肯定。但有的地方在某些方面也搞得苦了一点，把一些属于搞活中必需的变通办法也视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了，因而影响了某些企业搞活。有这类问题的地区应当检查一下，少数确属不恰当的，应按有关规定酌情退回一部分。

第三，由于原材料涨价，某些行业（如纺织行业）、某些企业确实消化不了的，以及沿海大中城市的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好，创造的利润多，担负国家任务重，现在确有困难的，应当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能使那些先进的、贡献大的行业和企业生产萎缩。方向是逐步减少调节税。除此以外，还要采取其它办法。

第四，认真解决行政性公司和主管局层层扣企业权力的问题。现在行政性公司很多，对企业管得很死，应当实行撤并，或改为服务性的。现在不少城市建立了工业局党委，把企业的党政工作和社会工作都统统管起来。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作为政府的厅局，只能建立党组，它不是一级党委，不能直接管企业党委。在城市改革中，对行政性公司和工业局的改革问题，要加以研究解决，核心是人员安排问题。这应作为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好，把企业解放出来，使我们的企业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

## 五、适当解决流动资金问题

经过前几个月的工作，目前流动资金已有所松动，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下半年在流动资金上，要有区别地适当放宽。对那些产品有销路的企业，要支持他们发展生产。其次，对技术改造资金也不宜卡得太死，适当放宽一点，对当前生产和以后的发展都有好处。

这里要强调，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必须与压缩计划外基本建设同时进行，否则，就达不到目的。现在一方面流动资金紧张，另一方面计划外基本

建设又急剧膨胀，不知钱是从哪里来的。下边各级对搞基本建设的劲头很大，可以说是具有全民性的。挤掉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设是普遍的现象，留下这个缺口就靠银行贷款来填补。上基本建设项目时，都说自己有钱，只缺“粮票”，但一说到流动资金，就伸手要现款，这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对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不坚决压缩，增加的资金不可能真正当作流动资金用在周转上，最终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流向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件事下面也管不住。这样下去，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的状况不仅不能缓解，还会继续恶化。所以，下半年一定要想办法把计划外基本建设控制住，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关键问题。

## 六、充实、完善粮食合同制

去年取消粮食统购派购，实行订购合同制，农副产品价格放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巩固这一改革成果，不能走回头路。最重要的措施，是要不断充实粮食订购合同制，使它一年比一年完善。明年要充实粮食订购合同的经济内容。我们应当把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农民的物资集中起来，通过粮食合同，交换给农民，使种粮食的农民能从国家平价供应的生产资料中得到好处。各方面供应农民的平价商品还是不少的，捆在一起，和粮食订购合同挂钩，是可以做一些事的。国家可以按比例价收购合同任务以内的粮食，供应城市的需要；农民也可以相应得到平价的生产资料，收到实惠，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此外，明年还准备适当调减一点合同订购任务，以保证城市居民口粮的需要，合同任务以外的实行议价，使种粮农民多增加一些收入。至于工业用粮等，要逐步转为议价粮。

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小平同志最近说，不能粮食情况刚好了一、两年又紧张起来。我们既要避免粮食生产萎缩，徘徊不前；又要避免被迫提高粮价而引起轮番涨价。除了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以工补农”外，从全国看，就是要抓充实合同制。如何充实合同的经济内容，通过合同促进粮食生产，有关部门要进行研究，下半年做好准备，提出方案，明年的一号文件要作出规定。



## 七、办好中外合营企业问题

兴办合营企业，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是我们实行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近来国外在中外合营企业问题上意见很大，投资兴趣在减少。当然，这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想压一下我们。但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要让外国人来投资，又不给人家好处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研究如何发挥我们的优势，避开我们的弱点，使外国人来投资有吸引力。

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是看到我们有几个优势，主要是劳动力便宜、地皮便宜、费用便宜，另外就是羡慕中国市场大。现在由于外汇紧张，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合营企业产品在中国销售，换成外汇兑出去较为困难。加上我们技术水平差、管理落后、效率低，使外国人感到在中国投资很不方便。这样合营企业就很难办好，发展下去对我不利。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而且今后还有上升的可能。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商品竞争力相对地削弱，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大财团在日本扩大生产成本高，企图转移资金到国外办厂。日本已把面临的这个问题，作为重大的经济战略提出来研究。国际市场出现的这种新情况，一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应当乘机组织出口，占领市场；二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利用日本资金的机会，应当从大的方面研究一下合营企业的问题，采取对策，引进日本和其它国家的资金，为我所用。

综观我们的优势和弱点，我们在外汇问题上回旋余地不大，在让出市场上作为有限，但在具有优势的其它几个方面，应当采取一些适当的政策，给合营企业以便利，吸引外国人来投资。可以分别以下情况采取措施：

第一，对合营企业产成品主要是出口的，我们要特别给予优惠。包括地皮、工资、税收、费用等都特别优待，基本上同对待国内出口企业差不多。要用事实表明：在中国办厂出口，费用比在其他国家办厂便宜得多，具有特别高的竞争力。为此，要制定一些暂行条例和规定。

第二，合营企业的产成品主要不是出口，而是在我国销售的，如果外商的资金不拿回去，继续在我国用于再投资的，我们也给予优待。如果外商要中国产品，如煤炭等，可以采取补偿贸易或易货贸易的办法。

第三，必须给合营企业的中方代表（董事长、经理）以相应的自主权，使他们能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这就需要离开现行的体制，给以应有的权力。

合营企业搞了几年，要总结一下。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如何扬长避短。要解决揩油多、扯皮多的问题。一沾个“外”字，就想揩油，工资、费用等搞得高高的，在宏观上是不利的。我们要研究，在中国办厂如何对外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生产出口商品具有特别高的竞争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都竞争不过我们。这次会后，谷牧同志还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 会见世界银行首任驻华代表 林重庚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赵：本来早想见见你，但一直没能安排上。今天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不久前，我在人代会的报告中，讲了“七五”期间改革的设想或基本构思；另外，我们考虑明年改革要迈出一大步。这些，安志文同志对你讲了。你谈了一些意见，我都看了。不仅是改革，中国经济还有些什么问题？应当怎样看？想听听你的意见。

林：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那天我和安主任谈了。我想，改革可以走得快一些，特别是价格改革。价格、税收、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有金融改革，资金市场，外资管理。大体是这么几个方面。关于价格，一九八三年您讲过，实行双轨制，但这是过渡性措施，不能持续时间太久。从那时到现在，时间不短了。双轨制有它的优点，但是造成的问题较多，而且为其他方面的改革造成阻力。特别是物资分配，这是老体制的特点。没有什么好处，不改不行。不改，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社会风气。政企不分，对一些企业分配平价物资，等于政府送钱给它。其实，为了照顾重点方面，可以采取补贴办法。

赵：石家庄有个办法，就是不论物资来自何种渠道，价格如何，统统进入市场。在石家庄市范围内，在生产资料方面，企业间互相开放。比如钢材，不直接给企业，一律进入全市统一组织的钢材市场，由各企业按各自的指标到市场上去买，如市价是一千五百元一吨，分给企业的是平价钢材，六百元一吨，企业多花的每吨九百元由市里从市场收入中补还给你。这样各企业自己的仓库里就不再大量储存了。这是开始时的办法。今年又

改进了，大体上是按照钢材来的渠道、价格，企业从市场上购买吃亏多少，市里从企业上交税利中核减。

林：中国很大，有些地方会想一些办法。我认为，补贴，不应该全补。你得到的是平价物资，不补贴你吃不消，那么其他企业怎么办？因此，你要求补贴，应提出申请，经过批准。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问题，应当在理顺价格以后放权给企业。在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工资同利润挂钩，这不合理，不是公平竞争。工人会说，企业亏了本，我也应该得奖金，因为并不是因为我干得不好。价格理顺以后，能不能挂钩，也需要研究。工人个人劳动得好坏，与企业是否盈利关系不很大，主要在于国家投资多少，市场情况如何。工人工资不应和企业利润挂钩，但厂长的工资应当和企业利润挂钩。工资总额由国家规定，厂长有权支配厂内的分配。万一厂长如果平均分配也可以调动工人积极性，那也允许。在价格理顺的条件下，厂长的工资可以与利润挂钩，但工人的工资则应在国家规定的总额、工资增长率和最低工资这三个范围或条件下由厂长决定。

赵：工资问题还可以深入讨论一下。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工资分配走什么路子，劳动人事部还在讨论。工人的工资收入，固定工资部分占多一点好，还是奖金占多一点好？

林：工资分配是一种经营手段，没有办法一般化，厂里工资如何分配，应当由厂长确定。国家应当规定最低工资。

赵：最高工资呢？在我国，在东欧，工人工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主要是如何防止过高的问题。

林：国家控制了工资总额，规定了最低工资，企业内部如何分配，包括最高工资应由厂长去决定。中国明后年进行价格改革，在这期间工资应当控制。价格改革过程中，行业、企业、地区的利益会发生变化。两年内，价格改革中，把工资控制住。企业亏了，赚了，工资仍保持不变。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地方与地方，也应这样。价格改革，需要税收、财政与之配套，税收要大动。

赵：在外国，工资中是否有固定部分是主要的？干得好，年终可以拿双薪，平时可以升级。在我国，开始的时候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承包制，奖金是从这里来的。

林：改革，简单地把农村的办法移到城市，这不行。两者实际上很不相同。城市改革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宜实行包干办法。听说冶金包了，铁路包了，港口包了，还有其他的。实际上各个都是个大的系统工程，包干把它分得一块一块的，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问题。按劳分配，在工厂，盈利与否和厂长经营有密切关系，但与工人、工种没有密切关系。

赵：包干办法，不是简单地从农村移来的。一开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以后就搞企业扩权，企业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所以就搞承包、奖金。搞了以后，有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是国家的，企业工人和经营者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互相制约的关系。厂长应付不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奖金的压力。比如一个厂经营好，工资高，另一个厂经营不好，但工人也要求提高工资，向工资高的厂攀比。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厂长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工人负责，工人要听厂长的。所以经营者有责任感，为工厂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和施奈德谈过，德国也有个所有权、经营权的问题，经营者为什么那么负责？当时他说德国已形成经理阶层，他们受聘于工厂，只有干得好，才能继续干下去，或得到其他工厂的聘请。如果他干得不好，没有人聘请，他自己就完了。

安志文：德国企业的监事会，监事会的人也是聘请一些名人担任，也有股东代表、工人代表。

赵：监事会为什么有很强的责任感？

林：监事会也有压力。工厂的股东成千上万，很分散。股东如何给监事会以压力？是通过市场股票价格的涨跌。股票价格反映出民众对企业的评价。这是股东们间接地向经理施加压力。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一）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二）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金市场？从中国、东欧来看，政府对企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关键在于所有权的问题没有解决。全民所有，“全民”是抽象的。实际上，中央的企业，是中央各部所有，地方管是地方所有，一放就无人所有了，变成南斯拉夫企业的状况。部门所有，地方所有，搞来搞去不行，是因为企业的所有者问题没有解决。对企业，国家用政策来保护国家利益，但是并不解决所有者问题。国家所有，政府可以搞个固定资产部，但是，这在大国也很难。法国的国营企业，所有者是财政部，但是企业的一部分股东是

外来的。经理每天看股票的价格，价格一下降，就有压力。还有个国营企业委员会，每年要汇报，并在报上公布，加以评论。所以，两个方面，一个行政，一个股票市场，给经营者以压力。

赵：我们搞横向联合，也出现了这种企业，有财产所有者代表。比如江苏、常州、重庆联合办的一个企业，财产属于三方共有。

安志文：我们虽有合资、集资企业，但还不是正式的股份制。

赵：联邦德国的工会，有三百亿马克的财产，与政府是分开的。三百亿马克投入企业，变成股份。法国、英国的企业也有国营股份。我们的企业，一是变成股份制；也可以把固定资产归到国家资产部，企业经营是另外一码事。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法国政府有正式代表，而且有一定的否决权。但企业搞什么他不限制，他关心的是利润分配。

林：所有权、经营权分开，这是对的。重要的是所有权的含义、内容，一个是委任经理、厂长，一个是税后利润如何分配（分红和再投资）。把所有权交给企业不行。企业的税后利润，不是企业经营者可以决定的，不能用来增加工资，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税后利润，一是所有者分红，一是用于再投资。所有者认为不需要投资，就把利润拿过来。一个经理的委任，一个税后特别注意的使用，不可把权放给企业。两个权，不该给部门，也不该给企业。我感到你们在下放经营权的同时，似乎有的厂把所有权也下放。所有权放给企业，不行。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大企业可以直接管；小的，可以放开不管；中间的是大多数。

赵：中国的改革，没有一定的模式，都是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入手。

林：方向比较清楚了。

赵：方向，基本构思，是明确的。剩下的是行动方案，如何到达彼岸去。

林：工人报酬应计入成本；厂长的工资应由上边定。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资总额权不能给企业，但总额内的个人分配权应给经营者。

赵：我们的工资制度还没有定。这几年的情况是，一部分是固定工资，一部分是浮动工资。计件工资没有什么问题。不容易计件的，变成工作量，

超过了，可以多得。好处是调动了工人积极性，效果明显；问题在于，这样发展下去，浮动工资部分会越来越来大，两个半月，四个月，如此下去，简直可能有发展到相当于十个月、十二个月的标准工资的危险。有的人主张，中国的工资应以浮动工资为主。但是浮动工资能升不能降，而且一线、二线工人差别较大。年轻工人在一线，浮动工资比重大，老工人相反。西方企业，固定工资是主要的，干得好可以升，干得不好可以降。企业之间，工人之间，工资水平差不多，因为有失业后备军可以调节。经营者的工资可以差别很大。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工资有高有低，矛盾很大。

林：中国目前没有条件实行工人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一般工人的报酬，应当基本一样。没有道理的差距应当拉平。价格改革期间，工资应当不动。

赵：世界银行搞了一次金融方面的调查，我看了摘要，所提意见很好，在中国基本可行，主要是比较实在，符合实际。有些可以早搞，如利率、汇率、储备金、再贴现率、多种金融机构形式等。有些方向是对的，但要分几步走，如把建设银行变成世界银行式的投资银行。

林：资金市场，应当快点搞起来。这个很关键。金融改革要早考虑，倒不是说马上就什么都搞，但准备需要时间。

赵：逐步搞。有个资金、人才问题。我听说，南朝鲜的经济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政府干预较多。你看有什么特点？

林：南朝鲜计划搞得很好。它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它和中国不同，不重视资金分配问题。大银行，对某些经营好的大集团，大量投资。这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好处，但对分配、对政治带来了问题。南朝鲜的经济权利集中在大集团手里。所谓它计划好，主要是用经济杠杆干预经济搞得很好。它一度利率很高，达20%，但对个别行业则用低利率贷款给予支持。用利率来引导投资是个有效办法。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但不干预到企业。

赵：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是一种模式，南朝鲜又是一种模式。南朝鲜也曾是发展中国家，值得研究。它一个是宏观管理，一个是经济发展战略。它的外债不是大问题。

林：它对外资利用得好。

赵：它原来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政治也不稳定，军事上负担也重，人才、教育也不发达。

林：南朝鲜教育水平不错。

刘鸿儒<sup>1</sup>：它教育搞得不错，人才素质好，劲头大，有竞争感。

林：南朝鲜很愿意与中国交流，包括政策方面的交流。

赵：可以由世界银行出面，组织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南朝鲜在内交流，这样，我们可以参加。发展中国家，不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市场机制与计划如何结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林：解决这个问题，银行的作用很重要。其它是次要的。银行应是多种形式的银行。

赵：好，谈到这里。谢谢！

## 注 释

1. 刘鸿儒(1930- )，吉林榆树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

问：请总理同志谈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已经取得的成就。

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近两年来，改革的重点已转到城市，正在三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领域中展开。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发展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宏观调节手段，特别是发挥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们认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须着眼于增强企业的活力。社会主义是生机勃勃的制度，要求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发挥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将是使企业能够具有充分活力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既赋予企业以大体均等的竞争条件和自负盈亏的责任，也赋予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权力和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准备把改革的总体设想同解决一定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迫切问题结合起来，根据需求和可能，分步骤地配套实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步子上力求稳健，但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讲到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我想指出这样一点：中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即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实

---

\* 这是赵紫阳在前南斯拉夫访问接受该国《新闻周报》总编辑米·杰基奇采访时对他提出问题的回答。

现。在最近五年中，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

第六个五年计划所以完成得比以往几个五年计划好，反映了我们采取的新的建设方针和经济政策比较符合实际，也反映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问：经过这几年的改革，中国城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农民和企业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独自负责？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的措施？

答：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先后实行了从社队集体耕作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和农产品由统购统销制改为订购经济合同制或进入市场交易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彻底实行。

第二个转变是从去年开始的，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充实，但也已在全国普遍实行。从根本上说，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农民过去是为完成行政指派的任务而生产，那么，现在已是为完成经济合同或直接满足市场需求而生产。正因为如此，所以农村经济空前活跃，农民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一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百分之十四。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谈到城市改革，许多外国观察家往往首先注意到中国个体经济的出现。确实，现在全国城镇已有四百五十万劳动者在从事个体经济，他们在拾遗补缺方面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毕竟是很小的：在工业总产值中不到百分之一，在零售商业和服务行业的营业额中则占百分之十五。因此，我们对公有制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才是近几年来城市经济日益活跃的决定因素。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措施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削弱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少指令性计划部分，扩大指导性计划部分，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放开对各种小商品的价格管制，允许计划外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市场上自由成交，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初步改为纳税的制度，把对企业基本建设拨款的制度初步改为由银行贷款的制度，打破地区间、部门间的封锁，

为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生产、流通等各方面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创造条件等等。

现在公有制的小企业放得比较活，相形之下，公有制的大企业还缺乏应有的活力，这是我们正在继续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不宜偏废。国家对企业的关系，将由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

问：为什么中国要同外国伙伴搞合资经营？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哪些形式？

答：现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有三千八百家同类企业正在筹办。允许和鼓励国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闭关锁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为了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大的方便和利益，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开放城市，和一些开放地带。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其他地方不对外开放。当然，由于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是中国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加以手续较为简化，政策更加优惠，因此，上述二千多个有外国投资的企业，百分之八十分布在沿海地区。

在中国办厂，诚然有一些不方便的条件，但中国工资低，费用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最近，我们正在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准备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多的优惠。在新的政策逐步形成和付诸实施以后，外国商界的朋友们将会发现，在中国办企业确实是具有竞争力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对外经济合作的领域，不限于使用国外资金，也十分重视国际贸易和科技合作。凡是国际上通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中国都愿加以采用。

问：中国的改革在国内外是否有阻力？

答：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但是，既然绝大多数人民都从改革中已经得到并正在继续得到看得见的利益，而且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旧体制

阻碍着我们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和国家的富裕，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是得到全社会支持的事业。某些人，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一时不太理解，不太适应，但最后终究是能够理解和适应的。

我想指出，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在坚持改革方向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没有分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的。

至于国外，我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和同情中国改革的同志和朋友越来越多。如果说阻力，我们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国改革的阻力。因此，我们决心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反对战争、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问：中国是否正在考虑改革政治制度？

答：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有一条方针，叫做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说，人们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应该既能适应于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又能防止和抵制在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转变，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也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问：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迄今的改革尝试是如何评价的？可能的话，请您谈谈对南斯拉夫改革的看法。

答：近几年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我希望所有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能够达到造福于人民的目的。

南斯拉夫是改革的先驱。三十多年来，在铁托同志的倡导下，南斯拉夫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钦佩。中南两国，历史背景，民族传统，地理位置，并不相同，两国的改革当然也各具自己的特色。这反映了我们两国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共同信念。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改革的成就感到鼓舞，从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发。

# 天津要走发展外向型轻加工经济的路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要继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

刚才听了你们今年财政任务承包的办法，我看这个做法还不同于税后承包，等于还是向企业下达财政任务。你们今年临时实行这种办法是可以的，如果长期实行，又会回到老路上去，又成了国家年年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下达财政任务，只是超产的多留一些。这样，究竟明年、后年怎么样，企业自己就没有个底。我记得你们一九八三年这样搞过一次，任务分不下去，最后来个包干就搞下去了。北京也搞过，辽宁也搞过。前两年，我们搞利改税时有个想法，一开始想只搞一个所得税，税率都差不多。由于各企业利润悬殊过大，利润水平低的企业加不上去，利润高的企业国家一下子让一大块，国家财政吃不消，因此倒算过来搞了个调节税。调节税从设计的那一天开始，就明确了一条，就是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取消，目标是要最后取消调节税。这两年每年都在减，但沿海城市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地方调节税的尾巴可能拖得稍长一些，因为它原来的利润比较高。像内地，一开始设计就没有什么调节税，因为它原来利润就比较低。调节税是个尾巴，是个遗留问题，将来要过渡到企业交了产品税、所得税就行了。

一九八一年全国搞了经济责任制，就是实行财政包干。我还曾经讲是不是把它作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后来感觉到，这种办法是有效的，但是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天津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

暂时的，靠这种办法走不出一条新路来。包上几年以后副作用就来了，就是原有既得利益保住保不住的问题。今年包好了，明年再搞些新的东西，可三年以后，到一定水平它上不去了，利益也就保不住了。职工到手的东西你给他降下来，很难，吃不消。这就发生了环比还是定比的问题。总的一句话，这个办法暂时的作用是有的，但它走不出一条新路。这样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按田纪云同志的话说，很难走上一条规范化的道路。我们国家改革总的一个方向是企业要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要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形式。

瑞环<sup>1</sup>同志说要加大地方政府对盈亏悬殊企业的调节能力，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税制设计以后，通过调节税，或者所得税减少一点，增加一点机动的余地，增加一些地方上的调节手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在税制上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原来考虑国家与企业统统变成税收形式，不搞利润，现在看我们国家完全是税收的形式也不允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将来所有制要发生变化。有一些是国家直接投资，有一些资金是企业自筹，有一些企业是到另外一家企业投资。可我们搞的是利改税，利变为税，它的税要统统交给当地政府，这就发生了一个投资者的利益问题。现在我国的税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因为我们是把红利变为税收，我们的所得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一样，我们是除企业留一点外基本上国家都拿走了，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交了所得税后仍然有百分之十几的利润率。因此，我们这里就产生了税前还贷还是税后还贷的问题。将来我们的国营企业里边资金来源有一部分要采取股份形式。比如说中央和地方合营，一部分是地方的资金，一部分是中央的资金。还有一种是跨省市的联营，现在主要是分产品，这是因为有些物资还比较紧张，有些产品可能实际价格比较高，通过分产品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一旦以后物资不紧张了，它对分产品就没兴趣了。比如煤炭、玻璃，这方面的联营对分产品就没多大兴趣了。所以分产品是一时性的，将来分产品没意义了，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体现？我们实行企业扩权，企业的资金势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投资，包括原来国家投资转为固定资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企业自己发展积累的部分，如果在税收上完全没有区别的话，也不大合理。所以，将来在税收上要考虑到两部分资金的区别。比如，将来是不是要把固定资产

和资金分一分，国家投资的部分产生的利润作为税收，要高一些；另外那部分产生的利润，税率就不能高，因为它要有一部分作为红利分配，这样对鼓励企业用自有资金发展生产，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会有好处。总的来讲，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当前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一些补充的办法，你们刚才讲的就属于这类。作为一种过渡的办法不要给这个总的方向造成障碍，不要影响税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税收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

### 要鼓励出口企业重视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我还要讲一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不仅是就天津来讲，沿海大城市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样的投资用在哪里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用在市政建设我完全赞成，但是如果搞很多大的消耗能源的项目，一上去，马上电的消耗就要增加，还需要新的投资。如果我们不搞这些东西，把电力用在刚才讲的那类工业上去，投资就省多了。沿海城市完全应当这样考虑，这样做就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另外我考虑，作为沿海城市，总有那么几个因素制约着，如果搞消耗原材料很多、消耗能源很多、消耗水很多的项目不行，特别是北方城市。水的问题天津也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华北这些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解决水的问题还没有很多很好的办法，万里同志也是这个观点。现在引滦工程刚结束，天津暂时还可以缓和了一点，将来海水淡化，实行循环用水，这都可以。但是总的来讲，像天津、青岛、大连这样的城市，依靠南水北调究竟能不能搞，哪一年能搞，能调多少水来，不能打得太满。水的问题要不留点余地，将来这个地方可能是很难混的。因此，我觉得，要发挥沿海城市的优势还是在“活”字上多做点文章，少搞一些大量消耗能源、消耗水的大项目，大项目摆得越多，基础设施压力越大。当然，从一个城市来讲有很多大项目那是好的，但是真正从产值、从收入、从人民富裕、从效益看，大项目在沿海城市不见得是己之所长。这并不是说不搞上面讲的那一类项目就不能把城市搞得非常繁荣。香港发展为什么那么快，它靠什么，当然现在也搞了一些钢铁厂，但一开始不是。台湾也是这样，新加坡更是这样。所以沿海还是要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华

北还有个水的制约，现在水的情况不像原来说的那么糟糕，但是从长远来讲，从本世纪末、下世纪来看，解决天津水的问题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地下水、地面水就那么个情况，南水北调也不能指望太大。上海也不是说要搞多少新的基础设施，而是要还老账，老账不适当还一下，搞别的很难上去。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总的讲，我有这样一些看法：第一，我们必须利用外资；第二，我们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用得是否得当；第三，总的额度必须有一个限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外资，不用不行；利用外资风险的大或小，关键是用得是否得当；要有对策，必须有一个总的额度，总额度不能过多。我所说的利用外资的总额度不能过多，不是说多少年累计起来，而是说借款余额总的加起来不能超过多少。总额度应是多少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必须有这样一个东西。外国人有个说法，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数量，占出口创汇的百分之十五是一个安全线，超过百分之十五，各金融机构就比较警惕了。最近世界银行已经发了一个信号，对我们国家不很有利，说中国的外债余额已经达到四百亿美元，超过了警戒线。他们这个统计结果是怎么来的我们弄不清楚，可能把所有合营企业的资产都算作外债了，而我们算只有二百多亿美元。总之，对中国承受外债的能力，借款余额总的达到多少，不能超过多少，我们要考虑。余额的数量一下子恐怕也算不那么清楚，这个问题还带有探索的性质，但一开始不宜定得过高，如果达到这个余额后比较安全，可再扩大一些，一开始就定很高，万一出了风险问题就很大。现在世界上对这个问题议论不一，我们中国对此议论也不一。像东欧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它就完全否定利用外资。这次我到罗马尼亚，他们讲第一我们再用三年咬紧牙关，把全部债务还清；第二以后永远不再借外债。南斯拉夫也在集中力量还外债，认为以前最大的失误是借外债过多。但我问他们总理米库里奇，对以前南斯拉夫借外债究竟怎么看，他说，总而言之，外债如果用于生产，而且确实是经济的，没有浪费，用的得当，不可怕；如果外债用于消费，一分钱也不敢用。所以我觉得，第一，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究竟用多少外汇，第一步安全线划在什么地方要考虑；第二，一开始设安全线，不能搞得过高，因为有很多未知数还不清楚，在国际金融方面我们的本事不是很大。比如日元贷款



这个问题，三年以前谁也没想到，两年以前我看也没想到，人民币与日元的比值从一比二百四一下涨到一比一百五日元，一下子升值这么多。日元升值使我们原来的欠款都要加，而且加很多，中国的日元借贷包括从国际银行借的基金，原来利息很优惠，现在都相当高。国际上商业贷款的利息究竟是往上涨还是往下降，我们掌握不准。有时碰上个好机会占个便宜，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碰上许多不利因素，就会增加许多困难。因此，设计安全线还要谨慎一些。国际上是有妖风的，你的情况，名誉好的时候，大家拼命给你吹，说你怎么样好；忽而风向一变，遇到很糟糕的事，他拼命给你扩大，我们要防止将来出现这股妖风。像石油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想到。当然，石油到底怎么样我们还要看，早几年凡是用借款搞了石油的现在都觉得不好办，不得了啊！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债务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条，拉美国家与美国及美国银行的关系千丝万缕，债多了不发愁，他们之间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主要是美国利用他们，他们是在这么一种关系下债多不发愁，而中国则不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太谨慎了不行，但借外债的数量要有个安全线，即使发生了风险也不至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影响，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定安全线时押宝，建立在完全乐观的估计上，一旦发生问题，回旋余地就很小，这恐怕对国家政治、经济影响都比较大。

### **企业工资要逐步与企业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挂钩**

我们主要不在于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来提高劳动效率，而在于向合资企业学习，使每一个工人紧张张地工作，严格质量、工艺和操作规程，只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工厂的质量、效率就都能上去。我考虑我们将来怎么能够把工资同工厂的效率挂一挂钩，有计划地搞一批工厂，开始可以少一些，只要进来的工人素质比较高，工资可以适当高一点，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我看没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走这条路。我们的工人总是这么点工资也不是办法，但是像目前这样，要提高大家都提高，工作还是懒洋洋的，这也不行。南斯拉夫搞了这么多年，到今天这仍是他们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广大工人的生活、福利建筑

在他所付出的劳动上？而不是少干活，多消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弊病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

在我们国家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完全同企业的利润挂钩，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比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样搞承包制，汽车一滞销立刻就不行了，上交利润更不行，国家还得救它。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工人的工资一定得和工厂的管理水平结合起来，再一个就是素质。管理严的企业，工人的素质比别的企业高，这里的工人工资可以高一些，一批批地扩大。小平同志讲一部分企业收入可以高一些。这个企业的面貌应当明显地与其它企业不同。将来百分之八十的企业都变成这样的企业了，对我们国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工资上去了，质量、产量也得上去。如果其它方面没有要求，工资只同利润挂钩不行，因为利润非常不稳定。突然发点大财，然后突然降下来，工人的工资马上也会降下来，不降不行，又保护不了。在现有条件下，存在很多不可比的、不平等的、机会不均等的情况，工资完全同利润挂钩不行。而实行上述办法会搞出一批好企业，同时能培养一批好职工。我赞成这样试试，开始可以少搞，逐渐扩大。这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付出的劳动数量多、质量高，收入就可以高。

### 沿海工业要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最近我脑子里想这么个问题，我国沿海地区过去是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发展起来的。现在看，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工资搞得很高，原材料价格也提得很高，那么整个沿海地区工业甚至会变得大量亏损。这就要我们明确一个观点，在中国这个国家，劳务费用和初级产品价格都不能搞得很高。不如此，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就没有竞争力，就不可能出口。另一方面，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原材料价格一定会提高，劳务费用也要提高。因此就发生了一个沿海工业消化能力的问题。即使我们的原材料价格不提那么高，不向国际市场靠拢，劳务费用也不向国际市场靠拢，但总要有所提高。这几年原材料价格实际上是在提高，劳务费用也在提高，当然接受新加坡的教训，我们不能提得那么高。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沿海的多数工业企业消化能力都比较低。为什么沿海工业这一两年

效益低，我看归根结底是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而销售价格又不能大动，大动了就是轮番提价。沿海工业的消化能力不高，主要是技术水平、设备不行。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可以吃那么贵的原材料？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因此，沿海工业的技术改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管理问题。香港、台湾、南朝鲜的劳务费用比我们高得多，原材料也比我们贵，可他们的产品比我们的竞争力大得多。什么原因？归根结底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威讲了一篇话，我最近重读了一遍。对改革他只表示了一种决心，改革的内容他还很模糊、很抽象，我们接触了的问题好多他还没提出来，但是，他对技术落后、产品落后的问题讲得非常具体。他们下了这样一个决心：所有在建项目只要是原来的设备一律停止。我看这个决心下得很好。他很反对新厂子采用老设备、老的技术水平。解决我们沿海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我认为一是技术改造，一是改善管理。

总起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沿海工业的消化能力不可能提高得太快，因此我们的原材料、劳务价格不能一下子提得太高和国际搞平衡；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已经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价格再这么低，内地不干，它自己搞，你还是没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在这种形势的迫使下，沿海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沿海工业出现衰落。当然不可能都这样，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 沿海要走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经济的路子

沿海工业要向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发展。我国出口各方面的潜力不小，比如煤炭、农产品、食品等。但在一定时间内，我看潜力比较大的还是轻纺工业包括一些轻加工、零部件加工。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同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竞争，确实有许多条件不具备，当然也不是说一点条件也不具备。但为什么同台湾、同香港比也差那么多？南朝鲜、台湾、香港基本上都是出口轻纺工业和轻加工产品，我们为什么不行？我想除了外贸和体制上的问题外，主要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差、档次低。我

们轻纺产品出口从数量上发展有很大困难，它有一个贸易保护和配额，同我们国内的消费也有矛盾，把东西都挤出去也不行，这么多人口还要用啊！如果我们真正提高轻纺产品档次，应该说这比搞其他方面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同台湾、香港、南朝鲜的差距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把档次提高到南朝鲜的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就把它代替了。要逼南朝鲜再上个台阶，让它感到再不转变也不行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步，那就意味着这方面的国际市场继续让南朝鲜、台湾占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合营办厂；一个途径就是请国外懂得国际市场情况、有国际消费观念的人来当厂长。我们总要想一个办法，把台湾和南朝鲜的市场挤掉一大块。如果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搞到台湾、南朝鲜的水平，价格又比他们低，就可以同他们竞争。我总觉得这个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解决起来要容易一些。要开发一个资源总得五、六年，作为沿海城市还得靠进口原材料搞出口，当然我们内地有资源也可以用了。这个观点我一九八一年在这里讲过，我说中国从总体来讲不能搞外向型的经济、出口型的经济，但是，我们沿海城市确实应该发挥这个优势，有进有出。像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都是这种类型，既没原材料，又没市场，他们就是这样搞，有进有出。这四个地方除了南朝鲜以外大多是华人。如果我们沿海城市搞这样的经济型，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也一定好，这样搞沿海就活了。当然这需要给一些政策。沿海企业如果能像合资企业那样一批一批去搞，技术搞上去了，管理也搞上去了，出口产品的质量也提高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这样搞也需要搞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搞许多条件，但比较来看投资需要少一些。

我想，中国的东部沿海、中部、西部需要适当分工。所谓适当分工，沿海要搞成完全开放型的经济、外向型的经济，同时是轻加工型经济，当然也要有一些重工业，也要搞一些跟踪世界水平的新的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沿海恐怕还要大量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掉头转向快。现在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全国乡镇企业一年创汇达到四十亿美元，大量在沿海这一带。南朝鲜就是走中小企业的路子，是不是它走过的路子我们不能再走呢？恰恰相反，它这个路子已经走不通了，我们却能适应形势走下去。西部一下还跟不上，主要搞点农牧业、手工业。中部地区需要开发点资源，

一方面支持沿海，另一方面自己也需要。这样就是让沿海搞得更活一些，发展更快一些，利用外资权力更大一些，还包括出口贸易搞得更活一些。同时，也要让中西部地区有个奔头，各得其所。当然各类型经济有相互交叉和渗透，但总的说沿海工业结构应该轻一些。沿海大体上能不能按这个思路来发展。

你们前几天提出来的那个思路，总的来讲我是赞成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在梯度发展。当然有些话没那么讲，不能讲得太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呼声都有。西部的呼声就是讲沿海已经那么活了，我们也要活，机会应均等。另一种说法是我们条件不方便，应该对我们优惠些嘛。沿海的条件已经很方便了，你们还给他们那么多优惠。中央从整个布局上始终认为，东部如果不发展起来，中、西部就很难发展起来，但是太绝对也不行。沿海条件好的地方应该发展得快一些，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天津这个地方，我认为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应该更放手，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独资企业的批准权限问题。你们这里盐碱地很多，现在开发了三平方公里，以后还有几十平方公里，一批批地来，一批批地搞基础设施。在独资企业方面，我们至少可以把上海、天津这两个地方放开，还有大连。我主张放开，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一样对待，不必要搞得更严一些。我认为这没什么危险。而且你们有开发区这么个地方，矛盾比较少，不外乎是消耗一些电，搞一些运输、服务设施。如果给你们天津这么一个政策，就可以引进来一大批外资嘛！当然最后还以文件为准。

围绕刚才我讲的想法，我赞成给天津定一个数额，由你们利用外资，主要用于我上面讲的那些方面，轻纺、轻加工、技术改造。你们列出具体项目，搞出可行性研究，到北京研究一次，如果能定下来，下一步就不干预了，怎么谈、怎么改中央就不干预了，但总盘子要到北京去定。不讲年限，只讲你搞什么事情，大致用多少钱，不讲“七五”用多少，“八五”用多少，就是讲一批项目得用多少钱。如果你执行得很好，过两、三年我们还可以再谈一次，再定一个计划。一边走一边看。这个权力可以给你们。比如第一批提十五亿美元的计划，不是说只这么多，这是计划外的、你们自己偿还的十五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到北京还要议。在上海时，他们讲的摊子也很大，讲来讲去通不过，后来通过了那么个东西。你们的计划，

应该主要围绕扩大出口，围绕提高轻纺工业出口产品质量，还可以办合资企业，办合资企业也可以借外债。至于三百万吨钢铁厂问题另议，原来在这个事上我是点了头的，后来他们没有把天津列进去，不知为什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考虑。现在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能找到二手设备，确实条件比较优越，我想可以考虑单列项目。你们先物色一个二手设备的对象。找对象要注意，现在外商纷纷传中国人要借钱搞钢铁，价钱会上去。国务院最近发了文件不让单独同外商接触了，你们可以直接接触，但要在抓钢铁的那个小组挂个号。最后你们找到的二手设备如果价钱合适，与老厂改建扩建差不多，我想是没理由不同意的。如果你们这十五亿美元搞得好的话，还可以再增加。但是，我不赞成在天津搞那么多消耗能源的大项目。如果那样的话，势必要搞好多能源，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我所以不同意这样搞，是因为国家有几个大的、节约外汇的项目必须要搞。第一个就是钢铁，钢铁包括电、交通配套要一百多亿美元。这个问题还不大，因为我们要进口那么多钢材嘛。第二个是石化，现在我们每年进口石化产品三十亿美元，进口原料再出口要五十亿美元。如果我们在石化方面，首先是原料厂，能够填平补齐，扩大能力，深加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二十亿美元。原来我们主要是出口原油、进口石化产品，那时原油价格比较好，看来以后这样不一定合算。第三个是有色金属，我们每年进口的有色金属大体要八亿美元。通过利用外资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搞起来减少进口。从全国来讲，借外资搞进口替代。这个账算下来就需二百多亿美元。这个是原来“七五”计划没有的。方针已经定了，正在具体搞，而这些项目很难说一定要摆在沿海或摆到内地，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定。这当然还是些初步的想法。这个想法还远远达不到你们想的那个程度，但路子是一致的。你们那个想法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想现在这样考虑较为稳妥。你们包括基础设施、电厂，加上轻纺，总数做一个十五亿美元的计划。可以用一点外资搞基础设施，把外资换成人民币，把外汇用在必须用外汇的那些项目上，像上海那样搞综合还汇。钢铁厂的问题另议，不包括在十五亿美元里。当然，大项目原则同不同意，最后还得到北京再议。定了之后权力可以交给你们，我们不干预了。

天津这几年变化很大，工作做得很好，有很大起色。以前我就讲过，天津这样的城市不帮一帮，位置会下降。但你们比上海好多了，首都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讲的基础设施问题可以提出一个盘子嘛，十五亿美元做个计划，到北京去议，议的结果可能是完全同意，可能是部分不同意，也有可能全部推翻。当然，我相信，小平同志已经说了话，全部推翻大概不至于。反正是这样的，政策和上海一样。你提十五亿美元可能砍掉一些，但是不排除这一批你执行得好将来还可以再批项目。我主张按项目，全部投资多少，至于每年多少再算，项目快时间就短，项目慢就长，这批计划执行得比较好，然后还可以再批十亿美元给你们，小配套，行就再批，不行就停步，风险不会太大，不至于造成最后下不来台，这样留有余地嘛。我之所以同意天津搞，是建筑在对天津有很大的信心上，天津的工作效率是好的，工作抓得很有成效。我这次来天津看，你们的市政建设搞得不错，你们有很多窍门。你们城市建设这一套究竟怎么样推广，这件事很复杂，要好好研究一下。又是规划设计，又是综合开发，又是义务劳动，又是民心民意等，很复杂。大家都说好，而学起来很难，容易走样。

## 注 释

1. 李瑞环(1934- )，天津宝坻人。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曾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主席。

## 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你们要求与大连有相同的权限，这个要求，我看是有道理的。青岛这样的城市，在我们国家不多。大连很重要，在辽东半岛，你们在胶东半岛嘛。（梁步庭<sup>1</sup>：我们记录在案。）当然，能不能马上实现，得回去具体研究一下。

现在看，企业与外贸系统联合，好像矛盾少一点。你们“青纺联”是一种形式，天津还有一个“津纺联”，都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过，你们“青纺联”比他们放得还宽一点，有两纱、两布，还有一定配额，但也有出口退税、补贴、配额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外贸企业与工厂联合。“青纺联”与纺织局是什么关系？（刘鹏<sup>2</sup>：一身二任。）现在的矛盾焦点就在这里。“青纺联”归工业口，纺织局办外贸，因此外贸公司就歧视你，因为你是工业嘛。但是由外贸来搞呢？工业就感到非常被动。所以要研究一下，“青纺联”能不能成为企业的联合，与纺织局脱钩。我在天津讲了这个意见，他们都赞成。天津外贸纺织品公司讲了个意见，我觉得有道理。他们说：不是要竞争嘛？你搞了个“津纺联”，我如果不卡你，还有什么办法跟你竞争？因为你纺织局是后台老板。天津这个意见，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如何真正把“青纺联”变成一个纺织企业的联合出口组织。归口到哪里呢？我的意见，可以归口到外经委，既不归到外贸公司，也不归到纺织局，反正是个试点嘛。不然，联合的厂子越多，矛盾就越大。山东外贸纺

---

\* 这是赵紫阳在青岛市听取市委汇报时的讲话。



织品公司设在青岛，你们纺织局自己又搞了个出口公司，他们当然要卡你，因为你也是条条，也不是企业的联合。如果纺织局作为后台，纺织企业就要归他管，现在政企又没分开，但是外贸很多权力又在外贸公司那里，什么配额等等，都在他们那里。他们卡你，纺织局就利用自己的行政领导权力卡他们，结果就互相卡。如果“青纺联”成为一个完全的企业联合，与纺织局脱钩，这样，同外贸的关系就可以改善。

青岛市计划单列问题，如果作为像南京、成都这样的模式，省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中央不持异议，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作为正式计划单列，你们省市如果有共同意见，可以考虑。（李昌安：省里同意。梁步庭：我们已经报过。）原来有个意见，先搞那么多，各地都想搞，也不再增加了。但青岛市确实有些情况，正像你们讲的，又是沿海城市，又是开放城市，又是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考虑。你们可以搞个具体意见。这就是说，你们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考虑。一个是赋予同大连相当的权限，向大连看齐，学大连嘛；第二个，计划单列问题，也可以考虑，回去商量一下。你们省、市要提出一个具体意见。像青岛这样的开放城市，无论是历史地位，还是现在的地位，在全国不多嘛。但我估计，将来计划单列也好，还是在省里单列也好，都有个财政问题。广州计划是单列的，财政就没有完全单列，没有像武汉、重庆那个办法搞。将来计划单列，基数怎么划，有个山东省的问题，因为它的财政主要靠青岛。我估计可能要降一下基数，照顾省，这有个财政部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中央原则上认为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计划单列城市的话，你们提个具体意见到北京去谈。

我这次来，一是过去没到过青岛，来看一看；二是有些问题谈一谈，请大家考虑。总的题目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问题。我们的沿海城市，过去一般都是搞加工业，不少城市是搞轻纺工业，主要是轻纺出口。过去，沿海城市的特点，就是靠工资比较低，特别是原材料价格比较低，因此，利润就比较高。过去国家积累也主要是靠沿海城市。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些变化，工资有些提高，今后还会提高；原材料价格首先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了，今后也还会有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将来都会提高。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沿海城市消化能力的问题。沿海城市，特别是过去以加工业为主的的城市，对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提高，有个消化能力

问题，表现在工业利润下降，特别是纺织工业利润下降。说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工资就是再提高，还是低工资；原材料价格再提高，也还是低廉的。但是，我们国家已经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沿海工业负担不起的问题。你们这里的情况好像稍好一些，这与你们省里去年对纺织行业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所以消化能力强一些，但是从整个纺织行业来讲，棉花提价以后，利润大大减少，因为布的价格不能提高。这就是说，我们沿海城市，特别是一些加工企业，虽然原材料价格不算很高，产品的价格不算很低，但已经发生了一个消化不了的问题。如果沿海工业不提高消化能力，将来会越来越困难。如何提高沿海城市的消化能力，直接涉及到将来沿海城市的活力问题和企业的活力问题。为什么我们原材料价格比较低，工资也比较低，但就是消化不了呢？从根本上来讲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技术差、装备差、产品质量差，因而产品卖不出好价钱，这就属于技术改造这个范围了；另一方面，是管理问题，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比较大。特别是同南朝鲜、台湾、香港比起来，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得多，原材料价格也高得多，但他们产品的竞争力比我们强得多。这除了设备、技术外，管理是个很大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劳动生产率太低。虽然工资低，但劳动生产率也低。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就是合资企业，我们的整个劳动工资，也就是劳务费，只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比台湾和南朝鲜也低得多。我们合资企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却赶不上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在那些地方办的合资企业，竞争不过他们在南朝鲜、台湾、香港办的厂。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职工队伍素质太差，劳动生产率太低，他们觉得在中国办企业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至于我们的国营企业，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我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合资企业效率还要低。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沿海城市主要是向外向型发展的问题。我们整个国家不能成为外向型经济，但我们沿海城市将来要逐渐地变成这样一种经济，出口产品比例要增加，原材料要从国外来。过去，我们沿海城市的原材料主要靠内地，当然将来还要尽量靠内地提供，但相当一些材料要从国外来。实际上，这些年也是按这个方向发展的。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原料，也没有市场，原料靠外进，产品靠外销。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特别是轻纺工业，设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不像高档的重、化工设备，就是进口也花不了很多钱，有些我们国家也不是说不可以制造；就是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沿海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同南朝鲜、台湾的同类工业比一比？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台湾，一年有一百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它的原料是进口的，产品出口，南朝鲜、香港都是这样。他们的技术、设备，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这有个外贸体制问题，但也不单纯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找一下差距，哪些方面可以赶上他们？我们应当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南朝鲜、台湾过去走过这么一段，现在走不下去了，新加坡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工资高了。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条件，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跟上去，就可能把他们那个档次代替了，他们的市场我们就可以占领。当然，他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搞技术密集型的，等等。如果我们这一段上不去，这个市场就继续被他们占领。本来我们可以有很高的竞争力，因为他们过去也是搞劳动密集型产品，靠劳务费用低，当然又有相当的技术。我们能不能挤他们这个市场？除政治方面的因素外，我们能不能挤这个市场？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产品水平也不是很高。我们沿海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带，从广州，中间一个上海、青岛、天津到大连，我们为什么赶不上一个台湾、一个南朝鲜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从全国来讲，当然我们腹地的交通不方便，我们是个大陆国家，但作为沿海地带，我们这么一片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竞争？这个问题很值得想一想。如果同他们竞争，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里，一是设备、技术问题；二是管理问题，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职工素质问题，这涉及到很多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权限问题；三是外贸体制问题，如产销结合、信息等等。

我们同自己的过去比，同内地比，有很大进步。目前，要同美国比，同欧洲一些国家比，那是没法比的。但是，从沿海的经济结构、类型来看，南朝鲜、台湾能做到的，他们似乎同我们的距离并不太大，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一时做不到，可以经过些努力做到。这个问题作为题目提出来，请大家考虑，准备再找个机会座谈座谈。

## 注释

1. 梁步庭(1921- ), 山东微山人。时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农办副主任,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山东省顾委主任。

2. 刘鹏(1924- ), 山东曲阜人。时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顾委副主任。

# 关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

## 一、消化能力和竞争能力

这是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现在是提到沿海地区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职工工资和原材料价格逐步有所提高，虽说比国际市场的水平低得多，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已感到消化不了，集中表现为工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过去，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家的积累也主要靠它们。但是必须看到，这是以很低的工资和非常廉价的原材料为条件的。这两个条件，把那些经济效益不高的企业的真实面貌掩盖起来了，似乎凑凑合合也还混得下去。现在这两个条件已经并将继续起变化。职工工资不可能老是那么低，原材料也不可能老是那么便宜。当然，即使在多少年后，我们的工资水平和那些资源丰富的原材料的价格水平，同国际市场比，仍将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不应该也不可能提得很高，这样易于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对我国的长远发展较为有利；但是，要求它们老是保持过去那种低下的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工资和许多原材料的价格，将在经济改革和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适当提高。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有

---

\* 这是赵紫阳 198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在天津、山东、北京等地几次讲话的综合摘要。

利于调动广大职工和原材料产区的积极性。所以，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说是好事。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会给沿海地区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消化能力不强的企业，带来困难。从国家来说，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总要给沿海城市和企业一些照顾。但从沿海企业来说，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这种照顾上，更不应当企图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那是没有出路的。

出路只有一条：积极提高自己的消化能力。吃廉价原材料，当然容易消化，但是，那个时代快要过去了。今后靠什么过日子？不能再指望吃便宜饭，要靠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更多的附加值。沿海地区，沿海企业，必须认清这种形势，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像游泳那样，不仅学会“换气”，而且学会“第二种呼吸”，才能在改革和开放中掌握主动。提高消化能力的过程，就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的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

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看亚太地区、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动向。现在国外不少人都在议论环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崛起。有人甚至说，欧洲正在衰落，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也有点言之过甚。但亚太地区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很快。有人把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称为“四小龙”，最近二十多年，它们的经济确实在起飞。196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额是22亿美元，它们四个加在一起，也不过24亿美元，其中，南朝鲜1.7亿美元，台湾4.5亿美元，香港8.7亿美元（另有转口2.6亿美元没有计算在内），新加坡9.8亿美元。1985年，我们的出口额扩大为273亿美元，它们则发展到996亿美元，其中，南朝鲜295亿美元，台湾307亿美元，香港166亿美元（另有转口135亿美元），新加坡228亿美元。

说这些，不是灭自己的威风，而是用来激励我们自己的志气。要注意两点：第一，它们发展得很快，它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第二，它们还在继续发展，从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向更高的层次即技术、知识、资金比较密集的出口产品转移。它们是靠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起家的，但他们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这个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逼得它们非向更高层次的出口产品转移不可。这就给我国沿海地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挤

上去，替代他们，占领它们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地盘？这里的关键，是积极增强我们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所以说，亚太地区的崛起，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工业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很好的机遇。这是一种新形势，不能熟视无睹，必须认真对待。真能借鉴人家的经验，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能扬长避短，就赶得上这班车。否则，难免掉队。

## 二、外向型经济和轻纺出口工业

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有利条件。就总体而言，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沿海地区不同。如果沿海地区的工业品打不进国际市场，整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外汇就没有着落。为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沿海开放地区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这是就需要而论。

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世界上的岛国和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都比内陆国家快得多。它们的优势，如海岸线长、口岸多、交通方便，我们也有。我们还有许多沿海小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广大的内陆腹地，可以直接供应许多原材料。如果不是同发达国家比，而是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比，那么，我们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并不比人家差多少，甚至比人家好。应该说，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sup>1</sup>，加上长江、珠江三角洲，综合优势不是比“四小龙”差，而是比它们强。跟欧、美、日本比，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四小龙”比，它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条件？我们现在落后，只是暂时的，原因一是过去长期封闭，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吸取了教训，实行开放政策，光景就一年比一年好。把我们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肯定可以超过它们。广、大、上、青、天的商品，应该挤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内地的商品，也应该升级，供给沿海市场。这样，大家都升级。大家都进步，大家都有利。

沿海出口工业要以轻纺工业为重点。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出口潜力比较大的还是轻纺工业和其它某些轻加工工业。除此之外，也要搞一些技术

密集的附加值大的工业，如电子工业等。在沿海，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这些方面，比用于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重工业，投入少，创汇多，得益快。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要适应出口的需要，调整得尽量“轻”一点，也就是说，在沿海地区，应当把承担出口任务的轻纺工业，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纺织品（包括服装、印染布、坯布、纱、丝，不包括棉花等纤维原料）是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我国1985年出口总额273亿美元中，各类纺织品出口达6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2%。看来比重相当高，但同“四小龙”一比，就可以看清问题的所在了。1985年，它们出口的纺织品总额是213亿美元，相当于我们的三倍半，其中南朝鲜是70亿美元，台湾是55亿美元，香港是79亿美元，新加坡是9亿美元。差距在什么地方？主要不在数量，而在档次和质量。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大量的是两纱、两布，印染布少，服装更少，加工深度越小的商品，出口的比例越大，当然就卖不出好价钱。

我们能不能定个目标，用上多少年时间，使纺织品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超过“四小龙”的总和？我看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把广、大、上、青、天和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力量好好动员起来。把我们的综合优势发挥出来，我们肯定可以超过它们。问题是要把力量放在提高档次、提高质量上。力争以同等数量的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外汇。如果继续把重点放在那些附加值很小的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上，那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从以扩大数量为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轨道，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技术改造问题，经营管理问题，体制和政策问题。

不宜泛泛地谈技术改造。开个大单子，要求全面铺开，只能到处撒胡椒面，最后什么都办不成。应当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目标，现在就是要紧紧瞄准香港、台湾、南朝鲜。我们和他们的关键性差距究竟有几项？纺织工业部应当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进行分解，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据潍坊第四棉纺织厂的同志说，我们清花、梳棉、并条、捻线都还不错，主要是粗纱机不过关、不匀，细纱机的加压部分不稳定，织布机同人家差距比较大，特种整理和染料不行。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那就针对这些关键性的差距，排排队，哪些自己攻关，哪些



同国外合作生产，以后再逐步国产化，怎么快就怎么干。规模也不要一下铺得很大，应该精打细算，首先按照出口的需要进行安排。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否则，这个环节是第三代，那个环节仍然是第一代，还是卡住了脖子，上不去。总之，分解矛盾，弄清差距，有目标地、有重点地按照出口需要互相配起套来，进行技术改造，问题是可以较快得到解决的。这里并没有多少高不可攀的东西。

管理方面，潜力很大，见效也快。有人说我们纺织工业队伍的素质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纺织工人，在亚洲是资格最老的，中国人又肯吃苦耐劳。问题是管理上不去，稀稀拉拉，职工素质再好也发挥不出来。一定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鼓励大家端正劳动态度，掌握先进技术，在工作时间内必须认认真真、紧紧张张地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合格率。

最复杂的是体制问题。现在，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服装、印染、织布、纺纱等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经贸、轻工、纺织等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牵扯，抵消力量。于全局有利的事，不是这家扯皮，就是那家挡路，简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把这些关系理顺，什么都谈不上。因此，外贸体制必须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思路，责成外贸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进一步论证和设计。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城市政府，应当对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工贸结合和出口联营是个好形式，应当在企业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广。有条件实行代理制的，应尽可能采取代理制。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外贸的收购制和代理制很可能将并存一个相当时期。协调各方关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在研究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时，应当找出并紧紧抓住各方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即使实行收购制的产品，也要进行最后结算。出口创汇多，按比例返回，各方都有利；最后创汇少，按比例扣除，大家都吃亏。这样，就有可能把各类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为最终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而通力协作。

### 三、改善投资环境和办好合资企业

我们是资金短缺。但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是资金过剩。他们正在为过剩的资金找出路，哪里投资环境好就投向哪里。日元和西德马克升值后，这个动向已日益明显。南朝鲜和台湾正在搭这一班车。我们不应坐失良机。

外国人来不来踊跃投资，不取决于中国人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这里的投资环境好，吸引力大，他就会千方百计投进来。如果投资环境不好，已经投入的资金也会抽走。

讲到投资环境，许多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如电站、运输、电讯等等。这些硬件，无疑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行业不发达，是我们的短处，我们正在努力改善，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总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设施条件不好，外商是知道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来投资呢？这是因为设施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条件，而外商在评估投资环境时，一般要考虑四个条件：市场大不大，设施好不好，费用低不低，效率高不高。中国尽管设施条件不好，但市场容量大，劳动力价格低，对外商很有吸引力。现在所以有六千多家“三资企业”前来登记，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市场容量确实很大，问题是购买力不高。这一点，许多外商过去估计不足。而且，如果“三资企业”主要搞内销，我们拿什么去偿还他们的投资本息？他们的利润所得如何能以外汇汇出？所以，尽管他们要求打进我们国内市场，我们还是要求他们打到国际市场上去，力求外汇平衡，即使不能在一个企业内自我平衡，也应在一个城市内综合平衡。在外汇平衡和国内市场问题上，我们回旋余地有限，很难让步。

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什么地方？在于费用低，那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便宜。这是我们的王牌，可以说是绝对优势。欧、美、日本比不上我们，南朝鲜、台湾、香港也比不上我们。新加坡搞高工资政策，失去了这个本来具有的优势。在其它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我们本来应该特别注意发挥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各种费用比较低廉这个最大的优势。但前两年，我们有些同志目光短浅，一见“三资企业”就想伸手捞一把，外国人意见很大。今年在北戴河着重议了这个问题。国务院不久即将发布文件，这个问题要抓紧解决。

同费用密切相关的是效率。我们的劳务费用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但是，如果劳动效率也只相当于香港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就会把优势抵消。所以，提高效率，应该是办好“三资企业”的当务之急。

所谓效率，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条件，即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一是内部管理，即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现在，两个方面问题都不少。政府部门办事拖拉，企业管理稀稀拉拉。外国人最头疼的，就是这个。

这当然牵涉到整个体制问题。我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在大气候没有形成之前，应当给“三资企业”创造一种“小气候”。

现在企业办一件事，往往要几十个部门盖章，谁都有否决权，缺一个图章就办不成。外国人谁懂你这一套“关系学”？办起事来就难上加难。我看应该发明一种“盖章流水作业线”。其实，台湾的高雄加工区就有这种办法：每星期一，各有关部门的主管人员集体办公，图章随身带，一经裁决，统统盖章。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在处理“三资企业”事务方面，国务院各部门应进一步向市政府放权，市政府也应采取特殊措施，由市长或副市长主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凡是不违反法规 and 政策的，大家开绿灯，提高办事效率，及时为“三资企业”解决问题。福州市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最近开了两次“三资企业”现场办公会，当场解决了九十多个难题。我看凡是开放城市，都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小气候，市政府为“三资企业”提供方便。

另一种小气候是允许“三资企业”跳出我们现行的企业管理体制，允许他们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来管理“三资企业”，也就是说，允许外国资本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按照他们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办法来办“三资企业”。什么叫企业的自主权？对“三资企业”来说，最大的自主权就是这个，包括管理中方职工的权力在内。要允许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聘职工，也允许他们按照企业规章奖惩职工，可以重奖，也可以辞退和开除。这方面，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反正他们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得打骂职工。公开招聘，人都涌到“三资企业”去怎么办？其实它们的容量很有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因为一到他那里，待遇固然高，但要求严，不能迟到早退，不能随便请假，不能磨洋工，劳动成果还有严格的考核，必须按期把合格产品拿出来，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青岛第二

食品厂有个出口车间，工人是从其它各车间招来的，进来就浮动一级工资，奖金也多，但工作艰苦、紧张、必须一丝不苟，结果效率高，合格率也高。当时也议论纷纷，有的人愿意去，有的人不愿意去，那就各听其便。你要报酬高，就得考试合格，进去后还得好好干；你爱吃大锅饭，就给你低工资。原单位不放怎么办？允许在原单位办辞职手续，将来离开“三资企业”，劳动部门还可根据你的具体表现，适当安排工作。我看这种办法可以一试，没有什么危险。总之，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是我们落后，我们应该积极采用国际通行的管理办法，而不应该强制外商来采用我们那套吃大锅饭的管理办法。否则，硬件是人家的，软件是我们的，配不成套，发挥不了作用。

办好“三资企业”，意义很大。一是能使外商真正看到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比投到南朝鲜、台湾更合算，这样，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商就会越来越多。二是这些企业办好了，还可以把它们的管理经验有选择地移植到国营企业中来，使中国尽快出现一批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的高效率的新型企业。

## 注 释

1. 广、大、上、青、天，指中国沿海地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个大城市。

# 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办成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集团\*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一、在开展外贸业务上，我建议在地区上切一块，即把中南美和阿拉伯地区划给中信公司，让公司去开辟市场，发展业务，进口出口，有来有往，搞综合贸易，成为面向那两个地区的综合商社。那两个地区是新的市场，潜力很大；而且那里与经贸部的业务碰头比较少，矛盾不大，你们可以去开创新的局面。当然，国家也要适当划拨一部分货源给你们公司。你们也可以和外贸各专业总公司联合，同上海、天津等地的地方公司联合，并注意与内地省、区发展横向联系，利益均沾，这样就可以搞活。

二、中信公司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你们投资入股的企业，可以形成一个集团，发展经济联系和联合，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松散的，也有紧密的，不拘一格。这要靠去闯，同意你们进行试点。

三、发展钢、铝和电力工业，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你们可以投资入股，不要单独搞，不必采取你们公司包二百万吨的办法。你们集资入股，可以分红利，也可以分物资（如分钢材）。办电，也要和水电部或地方联合搞。

四、原则上同意你们公司扩大自主权。你们所投资的项目，具备一定条件的，可以授权你们自己决定。比如，凡是地方上电力、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具备，不需要国家再拿钱去搞配套工程，能综合平衡的，在总

---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规模确定以后，具体项目可以授权公司自行决定，不必什么事都要上边批。可与计委研究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授权给你们公司，什么情况下需要计委协调解决。

五、中信公司在“七五”期间借款筹资的额度，四月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上已确定为十五亿美元。你们还想多筹一些。这次再开一个口，比如你们参加国家扩大钢铁生产能力一千万吨的规划所需要筹集的资金，可以另外计算，不算在原来的十五亿美元以内。你们在国外发行债券，国家也给你们一个额度，在哪里发，在总额度内一次发多少，可以由公司自己确定。但要与中国银行取得联系，互通信息，避免发生问题。

六、你们要求中信公司利用外资在国内直接投资的企业，享受与中外合资企业同等待遇的问题，原则上赞成。但这个问题不仅你们公司，还涉及到光大公司、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香港中资集团的投资，要通盘考虑，请谷牧同志处研究。

七、中信公司几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成绩，你们好好总结准备一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听取你们一次汇报。我们的改革是不断前进的，改革、开放、搞活是大势所趋，扭点秧歌的现象也会有，但总的方向是向前走，你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 对武钢引进国家两个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 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一日

俊生同志：请国务院办公厅负责把这件事<sup>1</sup>的情况弄清楚，并加以解剖，从中找出改进的办法。

赵紫阳

九月十三日

俊生同志：同意调查报告<sup>2</sup>。机构重叠，手续繁杂，办事拖拉，相互扯皮的官僚主义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够典型、够严重的了。但这样的情况甚至比它还严重的情况，恐怕还有不少。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必须下决心整改。根本上要靠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未能改革前，在简化手续、下放权力、提高责任心、采取联合办公（包括委、部内部有关司局联合办公）等方面，仍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建议将此调查报告及新华社动态清样一并印发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常务会议。请各部门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和建议。国务院常务会应专门议论一次。请酌。

赵紫阳

十一月一日

## 注释

1. 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2117 期刊载的“武钢要引进两个国家急需的项目申报四年多至今未办完审批手续”一事。

2. 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武钢引进两个国家急需项目申报四年多至今未办完审批手续问题的调查报告》。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九月十八日，我邀请启立、纪云、一波同志，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如何起步一事，进行了座谈。议了以下五条：

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五人：我们四人加上彭冲同志。这是考虑到彭是主持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都有同志参加这个小组，商量问题有可能较为全面一些。

二、所以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这个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常委决策。要求在明年十月党代表大会前，把头绪理清楚。其间，应向常委作几次阶段性的汇报。

三、在研讨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他们应组织一批人认真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应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最重要的材料向研讨小组推荐。他们应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他们内部也应经常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办公室每月至少应向研讨小组报告一次。

四、这个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sup>1</sup>、贺光辉等同志负责。（以后还要酌情增加几名负责人，但总数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十至二十名有研究能力的人，组成具体工作班子。这是一个总的办公室。将来，随着讨论逐步深入，再确定专题，组织若干个专题研讨小组。

五、办公室成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期限内，应当集中力量，搜集和研究当前国内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初步看法。研究问题的着眼点，应当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特此报告。如无不妥，请批送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常委各同志阅知。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 注 释

1. 严家其(1942- )，江苏常州人。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

# 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 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小平同志并耀邦、先念、陈云同志：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已酝酿讨论了五个月。四月间，由宋健、丁衡高同志组织一百二十四位专家，分十二个组，进行第一轮论证。五至七月，由“八六三”计划编制小组负责筛选和进行第二轮论证。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计划编制小组的汇报。会后，专门就航天技术问题再次征求航天、航空方面部分专家的意见。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日，由专家组组长会议进行第三轮论证。现已形成“八六三”计划的《纲要》、《领域和主题项目》、《汇报提纲》三个文件，一并送上，请审阅。

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入这个计划纲要的，共十五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七个领域。这些都对我国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增强有重大影响。文件中对每个项目，都概述了国内外背景，估计了可能产生的效益，提出了目标和内容，安排了大致的进度，并对经费进行了匡算。预计到本世纪末，大致需要经费一百亿元。其中，“七五”期间需安排十亿元。

十五个项目中，十三个项目大家看法一致，没有异议。现在感到看不准的，是第四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第十四项“先进核反应堆技术”。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是航天技术的关键性项目。纲要中所列的航天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载人空间站的本体；二是发射这一空间站的大型运载火箭和能往返于天地之间的运输系统。关于空间站和大型运载火箭，没有异议。大型运载火箭涉及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竞争能力问题，宜

优先发展。往返于天地之间的运输系统，看来以能多次使用、效益优于美国航天飞机方案的为好，这也没有异议。但是，在适应上述要求的多种途径中，能全部重复使用的往返运输系统的技术路线，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尚在探索过程中。从我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和财力物力出发，宁可在可行性论证和预先研究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不宜轻率上马。如果花冤枉钱，也让美苏它们先花。待它们有了突破性进展，我们再跟上去。与此相应，空间站的研制进度也应安排得从容一些，不必急于求成。因为如果能多次重复使用的往返运输系统上不去，即使载人空间站上了天，也无力维持，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在《领域和主题项目》的第十四页和十六页末尾都注明：“本项目的目标、内容和阶段成果等，尚待进一步论证。”

“先进核反应堆技术”肯定要搞。问题是选择什么堆型——快中子增殖堆，还是高温气冷堆，还是裂变—聚变混合堆——需要多做点论证工作，看准了再定。因此，在《领域及主题项目》的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说明：“鉴于上述三种堆型各有特点，需深入进行论证和预研，抉择实施”；“‘七五’期间，开展论证、预研和单项技术研究，选择堆型”。

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上。常委或书记处如需听取汇报，请小平、耀邦同志决定后通知我。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七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向全体劳动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我还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来宾和驻华使节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我国实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曾经一度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造成的紧张状况已得到缓和，我国经济正在协调、健康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市场稳定繁荣；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当前，我们要紧紧抓住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环节，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大力增收节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逐步改变产品结构同国内外市场需要不够适应的情况，使经济形势发展得更好。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去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初战告捷。今年

以来，我们采取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使经济发展得到了新的活力，并为下一步改革实施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还要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酝酿，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在坚持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当前，要特别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以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刚刚胜利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次全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以保证“七五”计划和本世纪末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

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愿。我们真诚希望台湾当局能从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我们关于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的建议；在统一以前，能顺应民意，允许台湾与大陆通商、通航、通邮，使分离三十七年之久的海峡两岸骨肉同胞得以相会、团聚。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军备竞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

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兴旺发达，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干杯！

# 致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的贺信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我热烈祝贺第六十届广州中国商品交易会的召开！三十年来，交易会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基本国策。希望大家团结奋斗，以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把交易会越办越好，为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 处理好价格改革与搞活企业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一日

对初级产品价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不仅施奈德有些意见，瑞士专家林德也认为现在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搞价格改革，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当然他也讲了不要怕赤字，只要用在建设上，有点赤字没关系。国内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论点，比较系统的是厉以宁<sup>2</sup>。厉认为要搞市场机制，在法制不完备情况下，不宜搞价格改革。这种观点，可以慎重考虑。调物价与放开物价不是一个概念。涨价往往转嫁给消费者，效果不像预想的好，出的问题却很多。汇率调整也影响了产品成本。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机制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公有制涨价就转嫁给国家或消费者。再加上企业困难很大，企业也没有多大实际利益，现在的困难还没有缓解，调价后会增加新的困难。一九七九年出台的政策（原材料调价），加工企业还没有完全消化掉。钢材提价，企业活力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个问题要讨论。解决增强企业活力一贯是重点，现在还应是重点。还有一个分配问题。是否把重点放在这里。把精力放在搞物价上可能失大于得。钢材不动，也会自发涨价，不动也有问题。可是，搞不好，工业品与农业品，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会轮番涨价。物价问题怎么办，是不是：

一、供求相适应的，放开。

---

\* 这是赵紫阳听取杨培新<sup>1</sup>关于联邦德国专家施奈德（Hans Karl Schneider）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见和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方案汇报时的两次讲话摘要。



二、比较紧俏的，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个别的也可以涨价。如呢绒，老百姓不会因此造反。

三、其他的，不是通过调整价格，而是通过税收、折旧来解决，使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有利。目前这种初级产品通过价格理顺很难，搞不好可能水涨船高，对多方面影响很大。

四、生活必需品，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还要国家定价，给予补贴或减税。初级产品是否暂不作大的变动。

两种价格主要决定于宏观控制。

一、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要改变。工资上涨影响物价，物价上涨影响工资。物价局汇报工资增加百分之七，影响物价百分之一，可见老观念要改变。现在许多物价憋在那里，就是怕工资上涨。看来可以不必怕。广东现在无人谈物价，工资也没涨多少。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工资才增加百分之一点四，也没什么可怕。

二、物价上涨百分之一，财政上增收多少，要算一下账。

三、企业搞活要采取措施，农产品和消费品势必调价，所以要重新考虑调价方案。明年搞钢材调价，不是急大家所急。一起动，风险大。只动钢材价格不动消费品价格，方案不可取。

四、现在财政规律有点改变了，有一百亿元赤字影响不大，主要看发了多少票子。

五、结论：

——搞活企业必须首先解决。

——影响当前生产的价格必须先解决。

——把上述两者放在首位，相应增加工资。

——钢材价格另议，明年上半年肯定出不了台。明年下半年搞不了，后年搞也行。非当务之急，要看形势再定。

——物价与工资问题要好好研究。改革就是理顺关系，老概念不行了。可能物价上升很大，工资也增长，生产增长很快，这应是正常的。关键在于物价是否趋于合理。无限恶性循环是可怕的。如是良性的，应是好的。过去我们顾虑过多。广东已有经验，要好好研究一下。

——搞活企业和轻纺产品调价的两个文件要早点搞出来。

## 注释

1. 杨培新(1922- ), 广东大埔人。时任国务院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秘书、金融研究所所长, 全国政协委员。

2. 厉以宁(1930- ), 江苏仪征人。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 曾任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外贸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

现在我们国家最大的大锅饭就是外贸。不管成本高低，你出口我也出口，反正亏损由国家负担，不管怎样，只要留成外汇拿到手就行。至于换汇成本，大家都不负责，最后到财政部报账。现在的体制，外贸企业经营得好坏与它的直接利益没有关系。降低成本，交货及时，对它没有什么好处，它一个钱也不能多留，亏损少就少补贴，亏损多就多补贴。

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是大不一样的。“饭”反正就是这么多，分开吃，很多人就把“饭”省下来了。而吃大锅饭，越吃，需要的饭越多，越吃锅要越大，最后大家便没得吃了。总之，不能吃大锅饭。如继续吃下去，中国的外贸竞争力会越来越差。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循环：亏损不起了，就要扭亏，扭亏就要减少出口；外汇减少了，就强调发展外贸，出口多了就要大量补亏。这样恶性循环，生产企业、外贸企业都不会改善经营管理。

外贸工作将绕着两个大圈转：一是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然后又放；二是外贸一上去，就大量亏损，一扭亏，出口就大量减少。这是外贸体制存在的大问题。我们增加出口有办法，扭亏也有办法，但是要提高外贸经济效益，既扭亏又增加创汇就没有办法。现在这样的搞法，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没有风险，风险全由上面承担；不高兴的是权力小，限制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不担风险，当然也就不能享有那么大的权力。

---

\* 这是赵紫阳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关于外贸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搞农村改革有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规定了农村改革的发展方向，一系列问题就解决了。外贸改革也要坚持这条经验。外贸问题多得很，也要抓住根本问题，找到突破点，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现在就是要通过按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实行自负盈亏，来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关键在于按不同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同一种产品换汇成本相同，全国一个政策，不管东西南北，你的产品超过规定的换汇成本，要么不出口，要么由地方自己负责补亏。自负盈亏后，他就精打细算，加强经营管理了。企业搞好了，可以多留利，可以发奖金。广东规定企业每超额完成创汇任务一百万美元就奖励一万元人民币，这个做法可以。企业创汇得来的奖金，可以不征收奖金税。

要自负盈亏，各个企业、各个外贸公司都要自负盈亏，规定统一的换汇成本，否则是搞不下去的。广州绢麻厂的出口产品是五元人民币换一美元，还亏损；外贸分公司是七元人民币换一美元，他也可以出口，就是因为分公司是吃财政部大锅饭的，可以不考虑换汇成本，绢麻厂最后坚持不下去，就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卖给分公司，价钱就高了。问题就出在：绢麻厂是自负盈亏的，而分公司不必自负盈亏。如果大家同一个换汇成本，在同等条件下竞争，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因此就不能择优，优的不能发展，劣的不能淘汰，甚至劣的还要发展。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有企业，第一是一视同仁，同等条件下竞争；第二是自负盈亏。

下放权力，必须自负盈亏；要自负盈亏，必须有个合理的统一的换汇成本。比如规定，珍珠是两元人民币换一美元，机床是六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地不分南北，也不分“中央军”和“地方军”，统统实行这个规定。你的产品出口之后，银行凭单据看你出口的是什么产品，然后按该产品的换汇率给你结算。你是盈是亏国家不管。这样，经贸部就下达指令性计划了，只有指导性计划，经贸部也不承担创汇任务。

换汇成本必须逐个产品核定，而不能综合核定。给地方下达综合换汇成本，不能保证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比如你给一个地方定个综合换汇成本，原想能多出口一些机械，但他一算账，出口机械不合算，它就不干了，而去抢购那些低于综合换汇成本的产品（如珍珠等）去出口。这样，就天

下大乱。如果我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始可能不那么完善，有一些漏洞，有些产品的换汇成本定高了就会有人去抢购，但不要紧，你去抢购就告诉我一个信息，我就可以去调整。结果你越抢，促进我的办法越完善。

现在国内价格不合理，有些国际市场上便宜的东西，我们国内价格高；国际市场价格高的东西，我们国内便宜。要一下子理顺很困难，我们可以通过按不同产品分别规定换汇成本来调整。这就是宏观指导，用这个办法把人们引导到注重效益的轨道上去。在产品出口方面，我们用换汇率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只要把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的办法搞起来，外贸体制改革就可以做起来，外贸权力就可下放，让大家去竞争。在换汇率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这有一个好处，可以择优。包干也好，下放也好，前提就是分产品核定换汇成本，不然中央根本不敢下放权力。我看，有三年时间，一套经验就出来了，就会出一批调整换汇成本的专家。

国家按产品核定了统一的换汇成本，但是，你的产品究竟能卖多少钱，还要看产品质量和卖出的时机。每个企业对这些都会非常关心。往往你能及时交货，就可以卖到好价钱。国际市场涨价，企业就会多出口。如果跌价，它就不出了。每个企业都关心国际市场价格，就这一条，我们就可增加很多外汇。这个利益要放给企业，放给地方，这会比现在吃大锅饭不重视效益好得多。现在什么时候卖给你都是那么多钱，无形中造成的损失不知有多少。国家让企业自负盈亏，企业就必然会争取比较好的售货机会。外贸企业还可以给交货及时的生产企业以一定的利益。因为它自负盈亏了，它有这个权力。总而言之，实行自负盈亏有风险，有机会。按中国现在的情况，机会比较多，风险不会太大。只要包下来，换汇成本肯定会下降。地方要看清这个巨大的潜力。

逐个产品核定换汇成本。我们不要看得太复杂。捷克斯洛伐克的价格改革方案(后来因一些原因没有实行)，一提出就包括几万种产品的价格。只要大类能够核定，小类也照样可以核定。哪种产品，哪年出口多少，卖多少价钱，大家都知道的嘛。当然开始可以搞粗一点，但要尽量搞细，能细到什么程度就细到什么程度，搞得很粗是不行的。换汇成本按中等卖价来定，你的产品质量高能多卖钱，你就占便宜，质量低的就吃亏。

可把出口产品分为三类：一类完全交给地方经营，约占百分之三十；另一类是国家垄断性商品，如粮食、石油、煤炭、棉花等，必须由中央指定国家公司经营，其它单位不能插手；还有一类产品，现在由国家、地方、企业一起经营的，可逐步分开。

按产品核定换汇成本的办法如能行得通，中国的外贸就会起大变化。沿海外贸会大发展，内地出口困难会多些，但也不怕。内地的产品内销，沿海的产品外销，内地、沿海加强横向联系，互惠互利，互相促进。中国发展外贸基本上要靠沿海。将来哪个地方口岸出口合算，商品自然就在那里去了。这样的结果，内地的资源肯定要与沿海挂钩。哪个地方经营管理好，哪个地方肯定要大发展。这样，出口产品的质量才能真正提高，才能适应国际市场。从根本上来讲，这样才能促使我国外贸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化。

一定要注意调动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可以多给企业一点利。企业产品外销不如内销合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要跟国内价格拉平，当然还要考虑到搞出口商品的其它待遇，如留成外汇等。如果算起总账来，仍不合算，那就不能出了。地方如需要外汇，让它出口，那就由地方在其他环节上调节一下。外贸企业为了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对出口畅销、换汇率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提高收购价。

按照上面的设想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后，外贸部的职能主要是：（一）管换汇成本；（二）管配额、许可证和掌握国别政策；（三）控制关税。关税不仅是财政问题，而且是调节进出口的手段。关税设计应归外贸部门，由它设计税种、税目、税率，将来还要包括汇率。

许可证可以允许转让。发许可证是个宏观预测，不可能发得很准，势必有些地方领到的许可证用不完，有些地方却不够用。解决的办法不外乎两条：一是许可证发多一点，但这有风险；二是允许许可证转让，如何转让，由双方协商。

“三资”企业的产品需要出口许可证的，凡是过去订的合同就应该履行，不然，既不让它出口，又不准它内销，它就没有出路了。但今后签订合同再遇到需要出口配额的问题就应该慎重处理。

实行新的外贸体制后，对过去地方留成外汇被中央已使用的部分如何

解决？无非三种办法：一是先挂账，待中央的外汇情况好转后还给地方。二是都由国家收购，财政能否负担，还不太清楚。三是一风吹。究竟采用哪一种办法，还要研究，从长计议。至于实行新外贸体制后，地方留成外汇的使用，我主张中央基本上不管了。不限制用汇指标，至多规定一下用途，只规定什么可以进口，什么不可以进口。

外贸体制改革后，地方出口创汇，让地方留七成，交中央三成，因为地方和企业真正自负盈亏了，要承担风险的。一些重要产品由国家专业公司统一经营的，外汇给地方留成百分之三十。这样，国家的外汇就减少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笔账，中央外汇少了，中央的进口就少了，很多需要进口的原材料等商品，要由地方自己解决。

深圳的办法，还在试验，还不能推开。如试验成功了，我们一定推广。在经济体制没有解决好之前，各种经济杠杆起作用都有一定的限度，而且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外汇调剂得多了，调剂中如果汇率上升得很高，就必然造成一种形势，使国家的汇率非提高不可。目前，外汇调剂中心，只能先在深圳办。

外贸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关系由地方处理。地方需要让企业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换汇成本出口，亏损由地方负责，国家不干预。地方可以贴息贷款，也可以贴息出口，这和政企不分是两码事，地方政府可以有这个职能。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是讨论共产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是讨论共产党怎样执政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党政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人事制度等等，理顺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责分开，党与政是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功能。近期的工作从哪里开始？要以解决党政关系和党内民主为重点。党政关系中，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解决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以党代政，这就势必使各种社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需要着力进行研究的，一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模式；二是过渡措施。目标模式能否选择恰当，是很重要的问题。体制改革完成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要弄清楚。此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过渡。否则，

---

\*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6年9月23日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为组长，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这篇文章就是1986年11月7日到1987年5月28日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上的谈话要点的辑录。政改研讨小组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政治报告。在研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意见，均通过会议纪要或简报等形式，随时报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例如，根据政改研讨小组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从十三大开始，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十三大以后在一些地方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的改革试点，开展对话协商等。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展十分艰难。



目标是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如何达到彼岸，开始的时候路子并不十分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所谓过渡，就是首先搞什么，先达到哪一步，步子怎么走，还有配套的问题。不能一个方面孤军深入，要有个配套。还有承受能力，即适应程度、适应能力的问题。过渡措施的问题，并不比目标设计简单。当然，可以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

有必要重复强调：第一，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共产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是如何执政的问题；第二，我们是讨论人大如何发挥作用，不是搬西方的议会制。有些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能搬。也不能搞三权分立，当然其中一些东西可以借鉴。因为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是一体的，所以不能分立。既要发挥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又不能三权分立，这样，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就不能是无限的。现在所列的题目中，有关人大的分量不够。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问题不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不行，人大问题不能回避。问题究竟在哪里，改什么？一是人大的作用发挥不够，这是主要的；二是人大的权力与作用如何发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为什么东西都要人大决定。有人认为人大不能干预政府日常政务，只是法律监督。要提出党和人大、政府和人大的关系问题，讲清楚。人大的构成等问题也要谈。中国的人大中要有一些荣誉职务，但不能都是，不能都是安排第二线，也不能全不安排，可以搞个比例限制。

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等之间的关系。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常委置于政治局的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现在这样的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的，背后计较。讲社会民主，重点是党内民主；讲党内民主，重点是中央一级。中央的民主健全了，可以影响全党。党内民主健全了，可以带动全国。我们要形成一种风气，建立制度、程序，要党中央带头，由上而下。

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管干部是管干部工作的宏观，包括干部规划、干部的交流、培养以及属于干部纪律方面的综合工作。组织部就管宏观，管综合，管规划，管大的事情。而考察、任免、考核、奖励、处罚等等，政府系统的干部应由政府部门来管。党管干部工作，不一定管

到每一个干部。现在党管干部就是党任免干部，就是组织部任免干部。而组织部又不管具体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这也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管理制度要有一个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和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选举，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基层的选举，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选举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代表比例是个问题。你可以聘请，可以在选举之外另外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比例定的过死，怎么选举？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制度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可以明确地提出，代表中有多少是选举出来的，有多少是请来的，也可以用团体内选举的办法。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当然，代表的组成不要缺了一些方面，要有恰当的办法。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

我们的选举要逐步有些改进。有两条要注意：第一条，下面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人名单还要上报，不过上面只是同意，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前报名单，然后承认选举结果，中间不得干涉选举。另一条是差额选举，这个问题比较大。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不要那个？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候选人机会均等，并不是有的人是陪绑的。这样可能更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选一个提两个，由人大表决选择一个。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一定要改革，不然，很多话不好说。一下子搞得那么民主不可能。但是，货真价实地只搞形式，也不行。

究竟能做一些什么事，来扎扎实实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比如苏联东欧提自治，他们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是不是也用这个词？要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搞，两党制不能

搞，无政府主义不能搞；二是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们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尽可能满足人民这个要求。这方面究竟能做些什么事？选举制度要改进，这是个大事。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农村的条件差一些，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厂等，文化水平就比较高。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必须有个办法。否则，基层干部拿反自由化来压制民主，所有正常的民主要求都被说成自由化。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基层民主。否则，好像搞自由化的人才是维护民主权利的，这怎么行。

过去对基层民主认识不够。看来，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人们对我们的意见比较多，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厂长有哪些权利工会可以监督。工会不能罢免厂长，但是可以提出不信任。对党委书记，也可以提出不信任。这会引来上级注意，厂长、党委书记会有所收敛。过去是党委领导，有这个问题；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没有制约不行。现在基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许多事处理不公，群众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光靠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也许，受到过批判的工团主义，正是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东西。

与此有联系的，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的问题，一个渠道是不行的。工会工作要总结经验，究竟应该怎么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理顺关系。我们的工会与党完全是一个声音，党包揽、代替了工会。党群关系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如果党群关系发生了问题，工会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过去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掉了一个联系群众的有效纽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党包揽一切，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问题。党、政、工、团各司其职，相互之间总会有点矛盾；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只要大方向一致，如果绝对一致就没有纽带。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二月四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谈话）

福建省龙岩市的选举的例子很值得研究。龙岩市连续三届市长候选人都没有得到人大批准。第一届是从外地派来的，来了十天就选，结果没有

选上，当选的是原来当地法院的院长。可是他当选不久就给调走了。第二次，上级指派的候选人也没有当选，原来一个副市长当选了，后来就调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三次又是类似的情况。其实，选出来的三届市长执政都不错，相当有政绩。党员不选党委提的候选人，这是否符合党章，暂且不说。我们要分析，要冷静、理智地分析一下，教训是什么。选举问题是人大改革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党委决定提名，但是通不过，一些老干部在那里起作用。于是搞预选，保险。可是，大家学乖了，预选的时候通过，选举的时候通不过。中央的先不说，省一级也要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放手选举有什么不可以？倪献策<sup>1</sup>不是我们考察的吗？可以三个人都是批准的候选人，放手选去。要真正搞点民主，不搞点民主不行。我看没有危险。三个人都考察过了，让代表去选。省长、省委书记也可以这样搞，无碍大局。全国工作主要是靠全国政策的正确，具体谁干没有什么大差别。

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扎扎实实地搞些什么事？我们的民主主要是扎扎实实的，不搞那些花花草草的。工人的意见要受到重视，真正在生产单位有发言权。要搞民主，搞监督，基层不合理的事情要有人上诉，不光是来信来访，而且是有系统。基层不舒畅，分配不合理，意见没人听，就要出问题。基层认真搞民主，搞社会监督，没有坏处。

我们说自己是真民主，但是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的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搞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关于社会监督，列宁早就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立苏维埃，本来是要解决人民自己掌权，但是，还没有找到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关于公民权利、新闻、出版、言论等等，不能说完全自由，也不能没有自由。要在这个方面立法，这对自由化是一种限制，对基本的必要的公民权利则是法律的保障。

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但是不要许那么多诺言。多宣传一些集中，多讲一点整体，实际中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谈话）

中央的工作规则是必要的。能不能区分一下，有些事常委会可以决定，哪些则要报告政治局？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会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轨道。没有个条条，怎么叫制度化？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繁琐，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要规定得具体，就要有很多条条。总的方向，还是要规定。我们党多年的习惯是不愿意搞具体的东西，这个确有难度。延安的时候，刚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可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没有了。美国总统和国会的职权，有许多条条来规定。当然，总统与国会各自利用相关规定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发挥作用。任何条文本身都有制约作用，当然行动起来又与条文有区别。我们总是怕繁琐。有的事情，完全不规定，也没有问题；而有的不规定就没有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工作规则呀，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

中央的同志下去调查研究要能够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一说话就是指示。要严格区分个人意见与代表组织的意见。个人意见不是指示。建议是可以提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建议，下面就要办。这要区分是个人建议还是组织建议。个人建议不必照办。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四次會議上的谈话）

我们的机构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体制上的，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因人设事，这个更难解决。干部那么多，又要有个安排，许多局、处所以设立，就是因为有干部要当局长、当处长。第三个原因是新旧体制的交替。旧的机构没有撤销，新的又要建立。专业管理部门没有减少，新的综合部门又要增加，如审计署、监察部、新闻署。原来的机构没有怎么撤。关于临时机构的问题，要做些分析。临时机构的症结，在于部门分得太细，结果部门之间扯皮，又不能都拿到国务院会议上来，因为问题太多，就是说，部际问题太多，结

合部太多。所有的临时机构，都是事务性的，任务是协调，是要解决矛盾，很难起咨询作用。临时机构就是上一层人出来裁决问题的机构。既要裁决，就要找几个人熟悉材料，于是有了机构。联合办公也是临时机构。机构一撤销，马上抓不动。临时机构与其说是组织机构，不如说是工作方法。精简机构的注意力不要放在临时机构上。如果环境和条件不改变，临时机构这周撤了，下周又会搞起来。根本办法是减少部，企业下放以后，经济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减少，减部可以搞得快一些。

关键是人员安排问题。机构改革有精简有加强，人员调整不容易。人多的部门，往往凝聚力强，有好处，都不愿意去清水衙门。再则，工作人员对原单位有很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关系网。部里要放的人，又不适合工作。新机构也不愿意要别的机构的人，它需要的就从社会上进，多的就走不出。设计合理的机构，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关键是人员，这个工作很艰巨。

中央国家机关的改革条件已经成熟，再拖不利。七届人大以后就可以动，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要搞。过去条件不具备，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条件具备了。企业下放了，投资体制改了，大的企业集团可以在计委单列户头，别的由省市去管，中央专业部门不再担负这个职责了。这就为国家机关实行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要设的设，要并的并，通过这个改革，可以巩固和促进经济改革。经济与上层建筑就是这个关系：经济创造起码的条件，然后上层建筑走一步，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有系统地改革，逐步搞出基本模式。有些一下子搞不清的，把职能先放到计委。专业部门要超脱，才能精简，要大胆精简。

学会和协会。学会是搞研究的，协会代表企业与政府对话。学会要比协会粗，协会要细，学会要粗一点。一些干部要转到协会去，要统一考虑干部的安排问题。协会不能成为二线，到学会去的要是在学术上有发言权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谈话）

将来人事制度划一个大杠杠、大制度：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我们不用“文官”这个词，用“国家公务员”。公务员就是指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任命的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过去分工不发达，一个干部，一个群众，指挥员和战斗员，合称指战员。解放后，这样的概念不够用了，还这么套，带来许多问题。今后除了行政学院毕业的、公务员考试合格的，都不能进入国家机关。这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质量、消除派性。日本是很严格的，大学毕业后最优等的学生进行行政学院。我一九七九年访问法国，陪我的就是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个毕业生，毕业以后在大区当办公室主任。

问题是，国家机关原来的这么多人怎么办？台湾的办法是依法铨叙<sup>2</sup>合格后任用，我们也要有个办法。新进来的要考，原来的则冻结，可以依法审核，合格者继续留用。实行公务员制度，首先就遇到这个问题。要首先在政府系统搞起来，政府要搞得精简、有效率、廉洁、制度化。

什么叫荐任、委任、简任和特任？我们就这么分：选举的和任命的，是一种；另一种是非经选举和非任命的。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就是文官制度。打了天下就要搞科举，从战时体制转到建设体制。看《官场现形记》，其中就有简任等等这些说法。这次机构改革以后，人事部就真是个吏部了。大的干部由党统一管，各类干部由各部门去管，各系统建立各系统的干部制度。这是一个大杠杠。再一个杠杠，就是区分两层干部：选举的，实行任期制；公务员，实行考试和退休。党管重要干部，就是管负责决策的那些干部，通过正当法律手续来推荐和管理。党管干部的总政策、规划等等，即宏观问题。各级党的组织部就管这个。工资则要国家劳动部门统一管，编制也要统一管。

在中国搞公务员，政治标准很重要。外国就是业务问题，我们要有个政治标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谈话）

要回顾一下，看看这一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情况。最近小平同志讲了一个意思，是小平的一贯思想，说无论如何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那是几个政府。我们没有搞，要注意不要受它的影响。小平着重讲了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不能丢。要保持很高的效率，不要互相牵制得很厉害。行政机构要有很高的效能。这就涉及到立法、行政、党委，主要是党的领导、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关系，怎样搞得好一些。中国究竟怎样搞？原来的搞法不行。人大处处是橡皮图章，这怕不行。党的领导、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关系怎样处理？要有个笼子。又要改变最高立法机关流于形式的做法，又要考虑到党的领导，立法与行政之间不能牵制太多。过去权力机关职权不具体，虽然有规定，但是难以实行，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话很空。如果权力机关的权力规定实了，党的领导虚了，也是个问题。权力机关的权力很虚，不行。现在如果反过来，党和行政都很虚，会不会又发生另外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与法制。两者要结合，又要相适应。民主的制度化就是法制，法律对实行民主也有所制约。在什么框框内民主，也要相互适应。如果这一方面很具体，那一方面不具体；这一方面放开了，那一方面不适应，就会有很多问题。

目前的现状不改变，不行；步子走得太大，也不行，各方面跟不上。要使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重要的是开始就不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就要退回来，难以健康进行。

要考虑如何保证安定团结，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凡是讲到一个方面的问题，要考虑配套的问题。比如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一旦真正发挥了作用，将来又有一些什么问题？体现人大权力机关的作用，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对于最高权力机关，都有个反制约的问题。比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东西，总统可以否决。另外有些国家可以解散议会。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启动以后，干部任免和财政问题，会成为人大与党委矛盾的两个焦点。干部问题怎么规定？既然已经选了省长，由省长提出政府人员。你如果老是否定他，又要他工作，又否决他的人选，这怎么办？有人说不会出事情，我看不一定，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文革”以来，就有所谓你的干部、我的干部。财政问题，



也很复杂，没有互相制约不行。仅仅人大通过了就可以制约政府，缺少另一方面，能行吗？比如发票子，人大决定了发多少就发多少，恐怕不行。政府也决定不了，这是由经济运行决定的。中国的经济情况，能看得那么准？又比如预算问题，如果权力机关只讨论政府提出的议案，那可以。如果由权力机关直接提出预算案，就不行了。总之，比较大的就是人和钱的问题。仅仅一个方面的制约，不行。作为改革，这些问题都要考虑，不能一个方面走得快而另外的方面跟不上。搞得很繁琐也不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付国会要占很大的精力，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内部消耗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把行政工作搞得很困难，是不行的。人大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又在党的领导之下，政府也是这样。

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要改革。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党与工会理顺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要有个过程。所以，政治协商的问题也不能说解决了。我们必须与不同利益的人协商和对话。党和政府与他们对话，这可能比较重要。将来，大型对话可以临时选代表，召开对话会议。与现有组织对话不解决问题。除了政治协商，还应有更多方面的协商。将来应该有代表农、工、知识分子等与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社会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否则就出无政府主义。对话要制度化、经常化。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基层民主，一个对话。要搞这些东西，社会生活就活跃起来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谈话）

## 注 释

1. 倪献策（1936—），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江西省省长，后因腐败案被撤职查办。

2. 铨叙，中国旧时的一种授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现在台湾地区设铨叙部。

# 接见农村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是和你们见个面。杜润生同志那里起草的文件稿，要解决的问题都谈到了，写得很好。万里、纪云同志的讲话，今天的汇报，都很好。农村的情况和今后怎么搞，比较清楚了。还有些问题，议论议论。

## 一、农业投入问题

农业是有个投入问题，我们对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但投到哪里，要总结历史经验。水利还是要搞的，但像过去那种不讲效益的搞法，浪费很大，效果不好，不能再重复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工程来稳定，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也做不到，苏联更不用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用到哪里，要考虑效益问题，符合科学原则，合理原则。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后，还要靠政策，靠科学更有文章可做，潜力很大。不要一讲加强农业，只想到投入问题，而不研究钱用到哪里，如何用，如何才能效果好。如果又回到以前的那种指导思想，那是没有出路的。

最近农研室、农牧渔业部研究了十项实用科技措施，比如地膜覆盖作用就很大，值得重视。小平同志讲了多次，化肥问题根本是要解决复合肥问题。各地都要把指导思想搞正确，根据实践不断总结，因地制宜地提出关键的措施。

我们要研究农业投资的体制和渠道，现有的办法弊病很大，是否干脆切一块给银行用于贴息贷款搞农业的基本建设。外国都是这样，没有什么

财政拨款。政府支持什么，就将增加的投资划出一块来搞贴息，这样效益最好。

以工代赈，用于搞基础设施，可能是个好办法，你们可以试点。如果成功可以推广。为此就需要在农村多发点货币，这危险不大。农村购买力主要对象是中低档货，对市场冲击不会大，但是却可以支持社队企业和城市一般工业的发展，刺激中低档商品的生产。当然，数量也不能发得太多。关键是要细水长流，用这个办法坚持年年搞，几十年下来，就会有很大效益。在贫困地区首先是要解决修公路的问题。不通路，什么也说不上，不可能发展商品生产。

## 二、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在我国将是比较长期的难题。一九八四年出现的情况，应当承认当时看得不太清楚。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又因为农业结构没有较大调整，粮食多了，还有前几年的粮食在里面，因此一时变成卖粮难，转化不了。

整个农业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不仅改革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农业资源的利用也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政策对头，今后的五年或十年，农业的发展不一定是很慢的。中国农业资源虽然不能说很丰富，但利用还是很不够的，对农业还应当是乐观的。当然，粮食不是个简单问题，人多地少，要像前几年那样快的发展，今后看来是困难了。粮食问题，在我国长时期内都是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搞得不好，会重新发生粮食紧张的局面，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搞粮食的兴趣就越小，但是，完全靠价格来解决种粮积极性，解决种粮农民得到搞其他经营一样的收入，恐怕难以做到。光想靠价值规律让农民种粮食，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靠政治动员、压指令计划也不行。要尽量让农民种粮有一定的收入，以缓解矛盾。有些同志过去曾想我国成为大量农产品出口的国家，现在看来不可能这样。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粮食能做到基本自给，在长时期内进口出口大体上平衡就不错了。在粮食生产达到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充分开发农业资源，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国要

像前几年那样大量进口粮食，对整个经济影响太大，不能那样去考虑问题。粮食问题，应按这样的思想来考虑：完全按价格解决不行，无视粮价过低也不行，只能按国家承受能力，逐步解决。全部放开粮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粮食价格上的“双轨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取消。但这种状况必须逐年有所改善。一是逐年减少平价收购粮食，增加议购部分；二是定购粮价每年加一点，细水长流，合同内粮食挂钩的物资增加一点；三是平价供应的粮食，逐年减少一点，逐步增加议价销售部分。就是这么一个方针，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个方针可进可退，情况好一些，步子可以大一点；情况差一些，步子可以小一点。总而言之，不要让矛盾激化，但也不要设想一下子解决矛盾。像苏南、浙江杭嘉湖、珠江三角洲那些地方，粮价提多高，也提高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那里还是要靠发展乡镇企业、出口产品、多种经营，搞以工补农。

明年的粮食定购，总账就是一笔，从一千二百亿斤减掉二百亿斤，其中包括原来加价的一百二十亿斤。二百亿斤各省按比例照减。到了省里怎么办，给各省自主权。

### 三、农业资源的开发问题

农业资源的开发，有很大潜力。广东、山东提供了这个经验。广东最近在东莞开了一个农业资源开发会议，说广东农业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比较乐观，着重在开发上多做文章，不一定改粮田种其它的。山东也开了个会，提出在工业资源少的地方能不能富？结论是可以致富。务农不一定必穷。山东诸城产供销一条龙，外贸搞得很好。农产品就地加工，路子是对的，但要一步一步地走。涉及到粮食系统、商业系统，要逐步把一些加工企业往下放。山东下决心这么搞。当然，棉花就不能到处办小纺织厂。

农村开矿潜力很大。现在定了个方针，支持农民搞。在冀东地区，国务院决定扶植农民搞二千万吨铁矿石，等于七百万吨精矿粉。支持农民办矿，只相当于国家办矿投资的三分之一，是经济合理的。

中国资源能够讲得上丰富的就是煤矿。有一部分煤矿农民开采有困难，但相当一部分埋藏不太深，群众是可以开采的。山西雁北农民致富就

靠挖煤。国家把路修通，办好电站，老百姓就可以挖煤。把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农村丰富的劳力资源结合起来，成本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我国竞争。陕西神木农民开矿把周围不少劳力都吸收进来了，一部分劳力转移了，人平均占有的农业资源就相对地增加了；搞了工业，地方也就富了，增加了积累，反过来又支援了农业的开发。如造林，光靠国家不行，地方一富起来，就好办了。

农业的规模经济，也要靠这一条。工业不发展，劳力不转移出去，土地也不能集中，也没有条件装备农业机械化，只能搞自给经济，小农经济。搞几十亩地的家庭农场，需要提供水利、肥料、机械等配套服务，没有这一套，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效益也不高。苏南、杭嘉湖、珠江三角洲将来是有条件这么搞的，包括开矿的那些地方，一部分人开矿去了，另一部分人搞农业，规模就可大一点。

#### 四、农村果园、养殖场和乡镇企业进一步搞活的问题

最近讨论增强企业活力问题，有这么个看法，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精神，小工业、小商业、饮食业可以实行租赁、承包，有的可以拍卖，类似农村的包产到户、大包干，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沈阳、武汉在中等企业试行招标承包。经委和体改委在研究国营大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的问题，由经营者或经营者集团承包经营。给他们以经营自主权。在所有权、经营权分开的问题上认真做做文章，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上明确规定了的。二者分开，根本问题是经营权放开。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想到农村果园、养殖场以至于乡镇企业可以有几种形式：家庭果园、农场，由家庭经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形式，财产是公有的，集体与他订合同，经营权放开，报酬和他经营好坏直接挂钩。经营好了，工资可相当于现在工资的多少倍。只要真正解决经营权放开和经营者的利益问题，人才就会涌现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可能出企业家。要出企业家，不一定非改变所有制不可。你们看过《反败为胜》这本书，亚科卡<sup>1</sup>是老板，是个企业家。董事长一年给他九十七万美元的收入，当然大部分要交所得税。我了解了一下，所有西方国家的企

业集团，作为经营者的企业家的工资都特别高，都高于国家官员，形成一个经营者阶层。你只要雇了我，就可以把你的企业办好。将来，我们的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当然首先是城市，大中企业可以搞“经营承包制”，就是刚才说的办法，把经营权交给你，你可以使用这些财产。你为企业谋了多大的利益，把企业效益提高到什么程度，你的工资就可相应提高。农村也要这么搞，你经营个养殖场，干到什么程度，工资就相应增到什么程度，除国家宏观控制要服从外，内部怎么搞，不加干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如价格、计划体制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必须改。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精神，在农村社队企业、养殖场、林场等，都可以研究和试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 注 释

1. 亚科卡(Lee Iacocca, 1924-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时任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曾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技术员、推销员、副总裁、总裁。

# 在“走向二〇〇〇年的亚太经济北京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有机会出席“走向二〇〇〇年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北京会议”的开幕式，感到十分高兴。

这次会议是由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倡议召开的，得到了亚太区域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和高级官员聚首一堂，共同探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景，生动地表明亚太区域各国对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合作的重视。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来自亚太区域各国和地区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枷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们在不断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通过探索和实践，制定并实行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战略，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显著成绩，为促进整个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二十年来，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亚太区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经济增长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亚太区域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到本世纪末，亚太区域的经济实力将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这不仅会造福于本区域的人民，而且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后，如何保持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如何把亚太区域二〇〇〇年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变为现实，是亚太区域各国面临的挑战。

和平与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亚太区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发祥地。只有各国在相互关系中严格遵循这些原则，才能使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得到维护，从而使本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得到保证。

亚太各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都应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考虑和照顾它方的需求和利益。

亚太区域国家从各自的国情出发，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同程度地都在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国可以在这方面加强交流，相互借鉴。

亚太区域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各有优势，互有需求。各国应当加强交流，促进合作，特别是在走向二〇〇〇年，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本区域的主要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应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主张是互相尊重、加强交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我们将遵循这些原则积极推动和促进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并愿意同亚太区域各国一起，继续探索亚太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力求到本世纪末使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继续前进，在三、五十年内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坚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改革将全面、深入地进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的运行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体制。

中国是亚太区域的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相当部分是在这一区域进行的。中国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面向亚太区域，面向全世界。我国的十四个开放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和三个开放地区，全部位于西太平洋沿岸一带，这种布局有利于加强我国同亚太各国的交往。最近，我国政府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立法，改善投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



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将会越来越大，中国同亚太区域各国的经济往来会更加密切。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亚太区域，反过来中国经济发展了，也必将对亚太区域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加速亚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 听取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以后企业集团计划单列是否在你们这儿单列，不在计委单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研究一下。现在整个体制还没有改变，你们先改了，变成行业管理，计委和经委原来管各部的一部分权力要分给你们，但他们还是全国的综合部门。要把这个关系划分清楚。行业管理不管计划是不行的。机械委不是只管机械部和兵器部，而是管整个机械行业的，包括纺织机械、交通机械、邮电机械等各种机械。至于机械同其他的平衡还是在计委。技术政策也由机械委管。对于其它各部的机械行业问题，基本方针还是要督促他们下放企业。企业放下了，行业管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将来机械委管理分两层，一是整个机械行业的规划和机械行业的技术政策，包括进出口的政策，哪些能进，哪些不能进。现在是经委管的，将来转到这儿来，经委就不管了。（万里同志：新机构的主要任务，应把研究制订行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放在头一条。）二是管一般的机械装备，包括投资、外汇等。各部的职能有些你们还代替不了，他们不光是从计委那儿拿到一块投资，自己还拿了些投资、外汇，挤出来搞机械。你统统要揽过来，这些就没有了，他们不管了，结果机械行业的投资反而少了，物资也少了。现在要都统起来，企业也不高兴。所以属于投资、外汇、材料这一部分，机械委搞好规划后还是按原来的渠道比较好些。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具体研究一下。总之有两条，又要能体现行业管理，又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逐步过渡。

车辆农业机械局包括不包括汽车？汽车怎么办？（何光远<sup>1</sup>同志：包括汽车，管一点政府的职能。）对，行使政府的职能。协会的工作由汽车协会去管。企业下放到地方去，对一些亏损企业要研究一下，实在不行，有些财务问题暂时挂一挂。

今天汇报的关于机构的设置，由陈俊生、尉健行<sup>2</sup>等同志和两部一起研究的。关于机械委的职责范围，今天在这儿也议不清楚，不好定，因为涉及与计委、经委分工的问题，还有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此，请安志文同志负责，找你们和计委、经委在一块具体协商研究。方针是两条：第一条，要基本上能体现出新组建的机械委是一个行业管理部门，原来计委、经委管的属于机械行业管理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转到这儿来，不然没有办法实行行业管理；第二条，恐怕还得照顾到现在各部门那么多的机械制造工业的情况，一切都统到机械委来，也统不起来，而且企业也不一定赞成。因此，大体上是这样，原来属于这两个部管的事，你们今后可能还要管得多一些，因为原来的兵器部、机械部都没有了，有些事目前交不出去，还得管一管；属于其它各部机械行业的事，要分一分，你们只管某些事，不管某些事。但这都不是指具体管企业。请安志文同志召集议论，提出一个方案，报国务院批准。要体现上面说的两条，没有改革的精神不行。不要听这个讲、那个讲，困难很多，搞个不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的还是由陈俊生、尉健行等同志抓，贺光辉同志也参加。

我还要讲一个观点。机械工业和兵器工业两个体系统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两个机械工业制造体系的问题。为什么这次把这两个部搞到一起，因为原来兵器部和机械部所属企业的机械设备、技术力量，特别是包括兵器工业今后转民的力量，在整个机械行业中占很大比重。当然，航空、船舶工业也是机械制造，还有其他各部机械制造，但是就通用的机械来考虑，成套设备和一些大型机械的制造，这两个部原来管的企业统起来搞，对解决我国两个机械制造体系的问题，就迈出了一大步。原来我们说的两个机械制造体系，首先是讲军民，军工当然还有导弹、飞机等，但大量的还是在兵器部，这个力量没有发挥出来。现在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至少从明年开始，把兵器部和机械部的机械制造任务统一起来了。这对于

推动原来兵器部的工厂生产民品，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当然，这还不彻底，还有其它军工部没有归过来，还有其它各部管的机械企业，将来专用、通用机械也要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按这个方向搞，另一方面还要承认一定的过渡性，不承认点过渡性恐怕也很难行得通。

另外就是人员的问题，你们说的这些办法，我看是可以的。先把一千人定下来，（万里同志：赶快把头定下来。）不能把三千人摆在那里慢慢往下减。两千多人的安排问题，我估计一年也搞不完。现在这个办法好，不是合并，就是重新组建。原来两个部没有职责了，撤销了，人员还在，那就慢慢解决，工资照发。现在你们有很多人，别的单位可到你们那儿去招，有很多单位需要人的，监察部成立后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招。要鼓励自谋职业，有些年轻人鼓励他们到下面去，到企业去。真正搞行业管理，一千人也就可以了。

关于老干部和行政管理的机构问题，这些事你们不要急，步子可缓一点，先把搞工作的机构建起来。如果一齐搞，就可能搞得乱糟糟的，牵扯的力量很大。最好少牵扯领导的力量，先把职能转变、班子、干部配备等搞起来，那些生活、后勤保障、老干部管理，目前还是老办法，两千多人的事没人管就会乱套，影响其他的改革。但目前搞生活的机构不能搞成两套，不能一套管新的，一套管老的，只能搞成一套。现在中心的问题，一个是把新机构组织起来，一个是把两千人的安排好，其他都是次要的，早改晚改关系不大。这些服务机构社会化也不那么简单，整个城市没有社会化，你一个部门去搞社会化不可能。

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国家没有新的规定以前，你们要和劳动人事部衔接一下，（赵东宛同志：定得高了降下来不好办；启立同志：如果你们这么搞，全国所有的老干部，包括已经退休的，都要重新算账；王兆国同志：全国有许多超龄的，七十万人在等着。）没有把握的事先不定。

关于新机构的名称问题，经过议论，就叫机械工业委员会。

汽车搞行业组织的问题，原则同意你们的意见，机构搞精干点。名称可以按你们意见叫汽车产业公会，只要你们支持改产业公会就行，这样就可以多管点大事了。

## 注 释

1. 何光远(1930- ),河北安新人。时任机械部副部长。曾任一汽铸造分厂厂长,长春拖拉机厂厂长,长春市副市长,农机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机械电子部部长,机械部部长。

2. 尉健行(1931-2015),浙江新昌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厂长,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监察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十一月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研讨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办公室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汇报，着重议论了以下问题：

一、涵义和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建设的需要；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从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转变。

小平同志最近多次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充满活力；要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确实是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之计。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

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二、党政分开。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根据党政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提出的，是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提出的，比“党政分工”的提法好。有没有更好的提法，还可以再议。

党政分开，不是讨论共产党要不要执政的问题，而是解决如何执政、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实行党政分开，需要理顺党同政府和党同人大的关系，同时也要理顺政府同人大的关系。三个关系中，重点是党同政府的关系，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化、制度化。

党政分开，首先要从中央做起。这几年，中央一级的党政关系已有较大改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至于地方各级党组织、政府、人大，它们的具体职权和功能同中央一级不一样。要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规范。

三、党内民主。以积极促进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现实、可靠、有效的途径。这几年，我们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足之处是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缺少程序性的规定。现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很好的。鉴于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考虑到今后三十年、五十年的情况，对党的中央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议事规则、表决程序，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制度。基本国策的连续性，要有稳定的领导体制加以保证。这样，在大政方针上就有可能避免因领导人的更迭或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产生波折。这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处理好了，立下规矩，可以长期得益。

在民主问题上，党带个好头，中央带个好头，意义十分深远。

四、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牵扯面很宽，改革的难度也比较大。

权力下放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基本要求：

(1) 保证中央政令统一,能够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2) 保证地方有权从实际出发,及时地解决地区性的问题;(3) 保证企业有自主权和充分活力,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目前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权力下放从何入手,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看来,政企分开是企业最迫切的要求,应当优先考虑。搞活中心城市,近期也有不少工作可以着手进行。

一九八二年机构改革后,又出现了新的膨胀。原因主要是:(1) 由于官僚主义、因人设事、形式主义和搞运动而设置的机构;(2) 由于党政不分而重叠设置的机构;(3) 由于政企不分而过多设置的机构;(4) 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为机关自身服务而设置的机构。因此,搞好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克服官僚主义并逐步扩大社会分工,精简机构是可以办得到的。

机构改革要综合治理,第一要转变职能;第二要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第三要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包括预算控制和法规控制;第四要妥善解决好有关人员的调整和出路问题。

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政府、人大和某些重要组织主要负责人应由中央和地方党委提名,这在今后也是确定无疑的。但现行的由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需要进行改革。

党政分开以后,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除管理党务干部外,主要职能似应有较大变化,即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把重点放在综合研究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政策、干部的现状和需求预测上。

“干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太庞杂,应该加以分解,实行分类管理。各个系统的干部,在用人之权与治事之权相统一、用人之责与治事之责相统一的原则下,分别由各系统考察、任免,并确定具体的管理办法。政府系统可以考虑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文官制度。各企事业单位也可以考虑按照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建立大致统一而又各具特点的用人制度。

第三梯队的办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措施,对实行新老交替很有必要,但长期搞下去,也有弊端,似应考虑替代办法。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有助于创造一种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环境和制度保证。

六、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要着重研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建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照搬国外的议会制度和两院制，也不搞国外那种三权分立，但对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对我们有用的做法，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最高权力不能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更好地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这就需要研究它们的职能范围、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等问题。人大代表及其常委的构成、人数和产生办法也需要研究。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其它群众团体和舆论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方面的呼声较高。考虑到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能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各方面的要求既要有适度的满足，胃口又不宜吊得过高。

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对实行“一国两制”也有重要意义。

七、健全法制。法制建设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当前拟着重考虑：（1）加强公、检、法、司的相互制约和独立办案，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状；（2）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

八、如何过渡。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除了目标和重点外，还需要研究从何入手、难点何在、适应程度如何、步子怎么迈、如何过渡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做到“拿定主意再动手”。

下一步准备成立几个专题小组，开展专题研究，各自提出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明年三月前，我们将分别听取各专题研究小组的汇报。四、五月间，有可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送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有关同志阅知。

赵紫阳 胡启立 田纪云 薄一波 彭冲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 在广西视察期间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 一、关于农业问题

一定要因地制宜，在“山”字上下功夫，认真抓好林业生产，大力发展畜牧业。南方山区有很大潜力，路子比较宽，见效比较快，大有作为。我看，现在南方发展畜牧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你们这里山很多，搞十大基地，首先要把畜牧基地重视起来，大力提倡养牛、养羊，还可以养奶牛，并努力搞出经验来。目前主要是注意抓好三件事：一是改造草山、草场，改良牧草；二是推广人工授精，改良牲畜品种；三是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和调动农民饲养牛、羊的积极性。要搞好家庭牧场，让一些有条件的家庭来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如技术培训和经济上的必要支持等。还要抓一些好的典型，一个村如有一、两户家庭牧场办得好，其他的就会跟着学。养牛，主要是草场问题，要把草场承包到户，让农户自己建设，自己使用，并保护草场的经营权，不能一家把草场搞好了，大家都来放牛。一定要改良草场，发展养牛、养羊。

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要注意长短结合。种柑橘到盛产期需要六、七年，杉木十五年，八角七、八年，都有一个投入与收益时间较长的问题，这对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是可行的，但是，对于较穷的地区，就要考虑群众眼前的困难问题，群众投入要等七、八年才有收益，其积极性能不能保持下去。因此，要搞长短结合，如林粮兼种。一些毁林开荒比较严重的地方，要退耕还林，可以采取先种上树，利用幼林地搞好林粮间作，等树长大了

再退耕的办法，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林粮兼种是南方的一个习惯。贵州省兴义地区现在群众种芭蕉芋的积极性很高，每年出芭蕉芋淀粉二亿斤。你们发展芒果、杉木等经济林和用材林，也可以套种芭蕉芋，还可以套种黄豆、生姜、花生等其他短期作物。贫困地区要发展商品经济，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无论是大自然村还是小自然村，都建立村民委员会行不行？我们多年来不重视自然村，可是，自然村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的，不能人为地把它分开，也不能随意合并。自然村，既是一个居民点，又是生产点，还是个文化点，两个村合在一起，事情就搞不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基层建设必须考虑把村委会建在自然村上。村干部的设置要精干，村民委员会设一正一副，小的自然村只设一个主任。对这个问题，我回去向有关部门谈。

## 二、关于工业问题

搞活企业，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明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中心。要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认真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机制，给国营企业以充分经营自主权，这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关键。原来我们有些设想，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和“七五”计划的建议，原想从明年起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作为一个主要环节，理顺生产资料价格，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或形成一种市场调节，使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以至能够走上完全自负盈亏。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步总是要走的。但经过研究，觉得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和运输价格，怕涨价幅度较大，各方面承受不了，所以又考虑明年主要是调整钢材价格，后年调整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个方案，中央已讨论过多次，基本上定了。但是，从今年第三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我们感到有两个问题更需要优先解决：第一，是企业活力问题。这几年搞来搞去，企业的活力还是很不够，尤其是国营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加工企业、轻纺企业和一部分老企业，活力很不够。同时，这几年生产资料价格实际上是上涨。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一时很难相应跟上去，企业就普遍消化不了。消化不

了，企业负担就要转嫁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转嫁。这样，从国家来说，表现为税收利润减少；从企业本身来讲，困难就增加。在全国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第二，是农副产品的价格问题。粮食势必要提高点价格，主要是通过减少合同订购任务，增加议购。粮价一动，势必涉及到鸡、蛋和其它农副产品等。要把农业稳定下来，继续保持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看来价格要有点变动，但不能大动。如果明年要提高钢材价格，又对粮食价格适当调整，两方面同时搞，物价指数上升就超过15%，我们可能承受不了，因此，不能同时搞。如果明年我们集中力量调整钢材价格，一下子很难收到明显的效果，而若不搞活企业，不解决农业的问题，就会影响明年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所以，这样考虑的结果，现在初步确定，钢材调价问题推迟出台。明年集中力量解决搞活企业的问题，以促进工业生产；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粮食价格，以维持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关于搞活企业的问题，国务院有个文件很快就发下来，还有一个搞活轻纺工业的文件也将陆续发下来。除了中央确定的一些政策外，搞活企业问题，我觉得地方上也得认真抓一抓。我们现在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进一步把企业搞活，在目前可能的条件下，减轻企业负担，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过去，中央、国务院已经明确了，还没有落实的政策，要抓紧落实。这次文件下来后，各地也要抓紧贯彻。搞活企业，大家都赞成，但涉及到地方或部门的利益，意见就不统一了。我不客气地说，大家都希望中央进一步放宽政策，但自己那一部分早就应该放宽的却没有放宽。所以，我们上下要同心协力，把该下放到厂的权力真正放下去，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一个根本。政要简，权要放，一定要简政放权，不要层层截留，希望你们很好落实。

上面所讲的是搞活企业的外部条件问题。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接触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问题。企业本身的内部机制，如果不改变，光是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解决企业的外部条件，企业仍然没有活力。现在看来，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活力大得多，个体企业又比乡镇企业活力大。当然，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有一些条件比国营企业优越，没有调节税，只有八级累进所得税，特别是指令性计划少等，但乡

镇企业也有很多困难，设备差，技术力量差，资金比国营企业少，而国营企业却比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活力要小得多。这主要是国营企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最近，报纸刊登了太原冶炼厂硅铁车间临时工武吉龙承包的消息，很有启发。这个车间多年亏损，领导班子换过多少茬，最后采取租赁的办法承包给这位临时工，就扭亏为盈，去年上缴几十万元。石家庄黄磷厂也把硅铁车间包给他，结果也扭亏为盈。这说明我们国营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很多，潜力还大得很。

搞活企业，小企业容易些。但我们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国营大企业搞活的问题。搞活企业，只解决外部条件是不行的，还必须解决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现在，改革已接触到一个根本问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问题。而要真正解决企业内部机制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权、责、利全面落实到企业经营者身上和企业中去，创造条件，逐步放开企业的经营权，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从外国来说，所有权和经营权都不是合一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码事。当然，中国如何把经营权放开，还有很多问题，但这是改革的方向。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就专门有一段论述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也讲搞多种经营方式。这样一搞，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没有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了。经营者从国家把企业的权责利接过来，国家同企业经营者的关系只是照章收税，财产分红。至于企业怎么经营，由经营者全权处理。这样，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多年来的改革，只是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基本没有变化，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小锅饭有利时吃小锅饭，大锅饭有利时吃大锅饭，国家规定的政策，对它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所以基本上还是躺在国家的大锅饭上搞改革，企业不可能有活力。很多同志主张用改变所有制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改变所有制非常复杂，恐怕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也不相符合，因为我们是公有制，不能改来改去变成私有制。但股份制可以搞，将来还是国家的股份占绝大部分，地方股份也可能占比较多，个人的股份肯定很少。如果我们既解决经营的机制，又解决股份，两个配套，就可能搞得很好。这里，决定性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

关于厂长负责制问题，要认真抓一下，《三个条例》发下去以后，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多年来，好像一讲厂长负责制就贬低了党委的作用，所以要认真落实。厂党委书记思想不通的，要做工作，调整一下，组织上不调整，就很难搞下去。当然，有一些党委书记能力强的，可以任厂长。这个工作要抓紧，搞得不好，对明年可能是个有利因素，搞不好就是个消极因素。一是要统一认识，二是组织调整，抓得越快越有利。

### 三、关于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建议，国家对属于后进地区的广西在政策上再放开一些，多给一点扶持。这不光是一个广西的问题，还有许多省、区都还落后。他们也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只能说适当地照顾。而且，沿海的条件非常有利，为什么不趁此机会让它发展更快一点？因此，看问题要全面，不能光看一个地方。

东部、西部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怎么做？西部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要逐步开发，这是一条方针。但从总的来说，没有东部地区的发展，西部的开发就没有力量。限制了东部，要外汇没有外汇，要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西部靠什么来开发？现在西部地区绝大部分要国家补贴，要想增加一点投资，还得靠东部。说要等东部整个发展了再来开发西部是错误的；但离开东部的发展，开发西部也是一句空话。所以东、西部的发展是结合的。东、西部的差别将是长期存在的，西部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开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下一个世纪，我们伟大的希望在西部，这个世纪只能主要依靠东部增强活力来发展经济。但西部不发展，东部也发展不起来。世界有个“南北对话”，中国也有个东部西部问题。东、西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全局影响很大。广西也有这个问题。

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吃亏在于甩了几次尾巴。沿海经济基础本来很好，人才也集中，但五十年代一开始，不搞沿海建设，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了要调动沿海的积极性。但还没有搞几年，到一九六三年，又搞备战，搞三线建设，投入一千多亿元，没有多少效益，

国家损失很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除了“左”和阶级斗争外，在经济战略上变来变去，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现在只能是发挥东部和西部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的特长，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按这样的路子稳定地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少出问题，健康地向前发展。

落后地区到沿海地区去参观学习是可以的，但有个怎样学习的问题。珠江三角洲有很多做法，搬到你们这里来，不一定行得通。不要老是和外地比，有许多条件是不可比的。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的作用，但也不能说，广西经济落后都是工作没有做好。不能离开这里的特定条件谈问题。不能指望来一个什么人，有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很快搞上去。改变落后面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开放，首先是开放沿海，因为它最有条件开放。开放对内地的作用就没有像沿海那样大，且不说人才比你强，信息比你灵通，就是外商到内地投资，要加那么多的运费，这怎么能同沿海竞争？对内地，国家也要给予适当照顾。国家在财政补贴上每年递增10%，就是对西部很大的照顾，这些钱都是从东部拿来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作，但要想把东、西部的差距很快地消除，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这样想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第一，老是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可能做到；第二，就是悲观失望，不满意，认为搞来搞去还是这样。其实，广西有很大进步，这几年的工作是前进的，有成绩的。

现在不是东部越富、西部越穷的趋势，但有可能某些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拉得更大一些。这是会有的，但也是暂时的。总的来讲，都在前进，从长远看，差距还是在缩小的。要使这种差距接近，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你们广西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一个国家内部有差距，一个省内部有差距，一个县内部也有差距，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次我走了几个省，都提到这个问题。有些问题提得有道理，中央会考虑的。比如乡镇企业这个问题，东部发展比较快，西部起步晚，宏观控制以后，影响了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样的问题，适当地支持西部是应该的。

#### 四、关于奖金税的问题

有些企业经济效益好，多发些奖金是可以的。问题是不同的行业怎么办。你们的经济效益好，除了你们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机会的问题，至少对这个机会要交些税吧？用奖金税调节一下，是必要的。现在有的地方劳动生产率很低，工资却很高，这是不正常的。超越物质生产水平搞高消费是错误的。我们的消费水平不宜提得太高，那样是要吃亏的。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中国的优点和优势。企业实行自主权后，留利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奖金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国家给企业让利，也不能使工人的工资成倍的增加。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收入也是有所控制的，不同行业的工人，收入不会成倍相差，因为有个产业后备军问题。在我们国家，如果工人的收入相差很大，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两个工厂的工人从事同样的劳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收入却相差很大，收入低的工人会没有意见吗？因此，没有通盘的考虑不行。奖金税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现行的奖金税办法可以改善。企业当年的奖金多，不一定发完，可以作为工资基金留在厂里，到企业经营不好时，再发给工人。将来企业的工资、奖金具体怎么发，由企业自己定，国家只控制其总额。但从事同样劳动的工人，收入不能有成倍的差别，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所以奖金税可以改进，但一点不收不行。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工资福利的增长，只能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不能搞低效益高工资。

#### 五、关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我们国家这几年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相当可观的。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大城市到农村，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能有现在这个状况就很不容易。日本的振兴时期和香港的经济起飞，也不过如此。大家都希望加快发展速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全国来说，有个财力、物力承受能力的问题。无论是基本建设也好，技术改造也好，都得靠财力、物力。有多少钱和物，办多少事，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某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照顾一些？



我不是说不可以照顾，但各地都有特殊性。沿海有沿海的问题，内地有内地的的问题，东部有东部的的问题，西部有西部的问题。银行贷了款，就要有物资来支付，而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物资。我们国家所消耗的钢材近二分之一是靠进口的。前几年的建设速度，靠过去出口积累的外汇支持。这几年能维持这个局面就是靠农村。过去我们进口粮食、油料和糖，现在把这些钱用来进口钢材。目前粮食生产并不乐观，今后可能还要进些粮食。今年的外贸又是逆差。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建设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我不担心中国的问题出在速度低上，而是担心问题出在速度高，最后支持不了。中国如果能在政治上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经济上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以每年平均递增7% -8%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大有希望。恐怕我们也只能保持这个速度。世界上连续10年保持10%速度的国家是有的，就是日本和几个小国，大国还没有。连续保持20年的国家一个也没有。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过，但大家都有亲身体会，年年说经济大幅度增长，大家却穷得要命，这个速度是假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发达国家，尤其中国是这么一个人口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投资规模要想有很大增加是困难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要有很大变动也不可能，当然，局部的、小量的调整是可能的。不要都向三角洲看，全国有几个三角洲？因此，不要离开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要重视质量和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能稳定、协调、持续、全面地向前发展。

# 不要在我家乡搞纪念性的东西和要求照顾\*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滑县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

你们好！

根据紫阳同志的意见，有两件事需要通知你们：

第一，不要因为滑县是紫阳同志的家乡，就搞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带纪念性的东西，如保留和修缮他曾住过的房屋等。这种做法，只能脱离群众，造成不良影响，而绝无一点好处。紫阳同志多次向我们说过，坚决反对办这类事。

第二，请转告紫阳同志家乡的乡村党组织和干部，绝不能因此自恃特殊，向上级、向其他单位伸手要东西、求照顾。同关心全国一样，紫阳同志对家乡的建设和父老兄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但他多次强调，家乡的繁荣和群众的致富，只能靠政策、靠科学、靠群众勤劳的双手去创造，不可

---

\* 这封信是根据赵紫阳口授的内容，并经他本人审定，以赵紫阳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

存在依赖思想，更不能搞特殊。切望你们对乡村干部多加教育，使他们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

此致

敬礼！

赵紫阳同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抄送：河南省委、安阳市委）

# 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刚才王伟<sup>1</sup>同志的汇报，我觉得是好的。我说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继续抓紧，不能动摇。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我们国家的人口确实是个大问题。人口增加得太快，如果失控，对我们的“四化”就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到本世纪末的人口指标，我们提过十二亿。就是说我们的人口不能增加得太多，这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基本政策。当然不可能到时候十二亿一个不多，或者一个不少。我们现在提出个“左右”，有点弹性，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人口可以不严加控制，可以不抓紧计划生育，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本世纪的人口控制从严一点，从紧一点，我看是对的。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又要经历一个生育高峰。如果这一个高峰比较高的话，不仅影响本世纪，而且影响下世纪。当然，人口从严控制，也可能带来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心中有数，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还来得及，比如人口老化问题。独生子女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应当认真考虑，要有综合的办法。独生子女也不一定是娇生儿。现在的情况可能对独生子女的身心健康、健康成长产生影响。父亲、母亲，还有上一代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太娇了，他们在家里称王称霸，出了门就没有多大本事。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要懂得点科学知识，纠正娇生惯养现象，要注意进行教育，要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舆论。但是不能因此动摇在本世纪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心。什么事都有利有弊，但要比利弊大小，选择利大害小的办法。

现在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侧重点不一样。但从全局来讲，人口不能增加过多，不能增长过快，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当然，经过一个时期，政策可以放宽一点，比如十五年以后，到时候再看。在这个时期内，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尽量把它的影响缩小。这也是中央书记处的方针。中央常委也很关心。这是基本态度，基本方针。这是第一点。

第二，统一认识，稳定政策。

这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应当说更加完善了，更加符合实际了。我赞成稳定政策，稳定现在执行的政策，不要变来变去。计划生育工作本来很艰巨，政策老变来变去，下边不好办。在汉族地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仍然是主要的政策。首先是城镇仍不变动，不要松口子。但是农村，中央考虑，书记处考虑，我同耀邦同志、万里同志主张，农村不能完全一刀切。农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不考虑任何特殊情况，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这样，反而助长了多生，多胎制止不了。因为它在群众中没有基础。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孩子以外，加一个独女户，只有一个女孩的，间隔几年以后允许生二胎。我认为严格按这个去办，不会因此而使中国人口爆炸，但是可以大大减少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可以密切党和农民的关系，就不会发生那种大量外逃抢生的现象。再一个是防止溺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这条政策不动，允许这样搞，允许这样做。问题是不要因此而产生错觉，以为计划生育工作不那么重要了，计划生育可以不认真抓了。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口，为了使农村计划生育更好地推行，减少阻力，有利于减少多胎。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山东多出生了一些人。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执行一种政策常常有这种现象，由于大家思想准备不足，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在理解上不完全一致。譬如说，原来我们说只准生一个，搞“一刀切”，强迫命令就比较严重。后来说可以适当地照顾一点，有的地方工作就放松下来了。这不奇怪。但是不要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对计划生育政策要正确地理解，正确地执行。开小口是为了堵大口，为了把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计划生育有利。当然，大城市近郊不要开这

个口子。大城市近郊文化比较发达，生育观念也不一样。我们都是从农村长大的，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不让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再生一个，农民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女儿是要出嫁的。这不是重男轻女，是承认现实。这是中国的国情。经过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不多生。对生了一个男孩的就要求他不要再生了，经过艰苦的工作，多数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我们经常到农村去，有时到农户去访问，比如碰到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问他有几个孩子，他首先一定要向你解释说：“我这个孩子是没有开展计划生育以前生的”，说明他知道多生孩子不合法，多生孩子不光荣。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有特殊情况的允许生二胎，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允许生二胎还得按计划，就是说要有间隔。我相信这个道理，加大间隔可以降低人口高峰，人口增长就不会过快，我觉得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有间隔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对家庭、对母亲的健康有好处。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认为可以松了，甚至放任不管，就会发生开了小口等着开大口，小口没开就先放开大口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么一个政策，长期执行下去，至少十几年内不要再打算改变。我相信，这样一个政策，只要统一认识，正确理解，正确执行，不会带来人口过快增长，而有利于减少计划生育工作的阻力，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有利于解决多胎问题。有些农村，交通、工农业、文化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如果群众多数思想不通，那么多胎生育就很难制止，因为群众不支持。

对放松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这两年在酝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使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的时候，可能造成某种错觉，至少在基层干部中造成某种错觉，认为中央的政策在继续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抓那么紧，你将来又要变了，不是又要挨群众的骂了吗？”因此，他现在就等，对计划生育工作就不管或者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去管。这样就会出现某种生育自流的现象。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开始进入人口高峰，除了早婚等等原因以外，还应当看到，这两年我们在酝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中，可能发生了某种副作用，有某种自流现象。但是这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是暂时的现象。要敢于承认它。我们全党都

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是不可怕的。这种自流的现象不应该也不会继续发展下去。对我们计划生育的形势要作这么一个估计。

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两年“开口子”确实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或者说是不少的副作用；一种认为副作用没有那么大。要讲清楚，不能因此就说开个小口，就是政策本身有什么问题，不能这样看。最近我从统计材料上看到，山东人口增长是多了一些，可能有这个现象。另外一种情况在山东也确实存在，就是跑到辽宁讨饭、生了孩子后又抱回来的现象减少了。这说明党群关系缓和了，但是也可能工作放松了一点。因此现在要稳定政策，统一认识，并且正确地去执行。我认为经过几年，我们的情况就会变好，这样计划生育就能够长期稳定地坚持下去。

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人口理论界有些争论。就是“只生一个子女”和“晚、稀、少”。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不仅在农村，也包括城市都生二胎，只要晚婚、晚育、间隔生，人口增长的结果与“只生一个”的结果一样，这是一种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现在也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但是现在不敢就这样办，因为这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我说不敢现在就推广，更不要动摇现行的生育政策。但是允许给一块地方进行试验，给个地盘，实践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说明问题的。如果经过十年，证明了实行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政策。（万里同志插话：可能只能在大城市附近文化高的地方实行。）现在已经选了几个地方，山西翼城县已经搞了一年多。全国指定几个地方试验，不要宣传。但是我们还寄予希望，如果这几个地方最后实践的结果证明是好的，顺乎民心，合乎民心，又能控制人口，那当然好了，何乐而不为，但是现在没有把握。我对这些同志的意见曾经讲过一些支持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能论证一下，如果确实这样，那当然很好，那就是个很好的政策，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既不能对这部分同志的主张加以否定，也不能轻易地就拿来在全国推广，因为这个后果不清楚，所以允许试点。至于理论上的辩论、讨论，可以百家争鸣，但报纸上不必宣传这些东西。内部讨论，学术刊物上争论、辩论是可以的，允许在一些指定的地方试验。最后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反正两种办法，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实行我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个别地方实行这个政策，最后再作决定。

第三，注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你们讲到的实际问题我们都需要认真研究，中央应该解决和能够解决的尽量帮助解决。财政部、计划委员会研究一下他们提出的属于中央应该解决的问题。另外也支持大家回去向各级领导汇报，取得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这次我们不能讲一些硬性规定的話。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央开一次会，就规定地方怎么办，中央出主意让地方出钱。但是我觉得各级党委总的来说对计划生育工作是重视的，因此这个问题你们回去向各级党委汇报，应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得到党委、政府支持的。

第四，讲一个你们汇报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就是在基层政权建设变动中要防止出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没人抓的问题。

计划生育在我们的工作中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现在有两件事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是计划生育，这是第一位难题；一个是合同订购粮。计划生育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最近基层政权建设有变动，原来的公社后来变为乡政府，乡政府下边的大队，现在改成村民委员会，变了个名称。村民委员会是选举的，宪法规定是自治单位，所以在变动中间要防止基层计划生育没人抓的状况，这是难度最大的。广西给我谈了一个情况，认为基层现在有些半瘫痪，乡以下是半瘫痪。计划生育有些放任自流，主要原因是基层有些半瘫痪，没人抓了。当然他们那里可能是特殊情况。他们主张不管怎么变，乡政府要建派遣机关。乡相当于一个区是政权机关，村民委员会是自治单位。基层搞得好的地方，可能问题不大；搞得不好的地方，村民委员会可能认为计划生育这件事可抓可不抓。所以他们认为关键是乡怎么加强领导的问题，不仅是计划生育的问题，还有另外的政府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另外找民政部门来研究。

在本世纪末计划指标的上限是十二亿左右。什么叫左右，如果你搞到十二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那就不叫左右了。接近十三亿，就是十三亿的概念了。这个问题不必说得那么死。总的提法是左右，你们分配指标时，大体上可以按这个进行控制。因为一般人口计划很难做到比经济计划还要准确。分配过了不必改它，实在不够可以适当加一点。也不必现在就把十二亿五作个指标喊出来，我看就是十二亿左右。如果哪里实在政策和指



标发生矛盾，在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你们再酌情对指标适当加以调整。就是这个原则。

## 注 释

1. 王伟(1919- )，河北肃宁人。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 纠正行业 and 部门不正之风的 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基本上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这个报告。

对形成行业不正之风的原因，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对不正之风这类社会现象应怎么看，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不正之风的产生是有其政治、历史、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制度的严密，教育的加强，改革的配套，随着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类不正之风只会越来越少，不会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不正之风肯定会大大减少。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廉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资本主义没法与我们相比。我们现在正处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有了活力，一方面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也跟着出来了。要全面地看问题，既不要怕，也不要放任自流。

前一段一些部门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不要估计过高，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任务，千万不要放松。要长期地、持久地、综合地、坚持不懈地做工作。首先是领导层要清醒，对这些现象想雷厉风行地一下子都压下去，一劳永逸不太可能。

---

\* 这是赵紫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但是，我们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只要认真对待，是可以解决的，要有这个信心。

纠正行业和不正之风，要与改革、发展生产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要靠教育、法制和监督，必须注意综合治理。一方面要揭露，一方面要搞建设。要抓好职业道德教育，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等几个重要的环节。

纠正行业和不正之风尤为重要，要把端正局长、部长以上干部的作风，放在重要的位置。只有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能做到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解决好各个行业的风气问题。领导干部的作风正了，一般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领导如果不抓，下面就抓不起来，因此，各部委的党组要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讲两点意见：

一、你们常委开会，大家都讲到李立功<sup>1</sup>同志很多长处，忠厚、民主、稳当。我是相信的。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必须态度鲜明。作为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应该是政治家，政治态度不明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作为政治家，作风上老实很重要，但光老实不行，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明朗、不鲜明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山西出现这些问题，恰恰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没有就事论事批过，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相当大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态度不鲜明、不明朗。这个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山西派性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问题，注意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作为政策来讲，这完全是正确的。但山西要消除派性，把大家团结起来，光这一条还不行。对派性的干扰和活动，要有得力的措施解决，态度要明朗。我觉得山西的常委特别是立功同志要注意这么个问题。总之，对重大政治问题，旗帜要鲜明。这次中央找你们来北京开会，无外乎是交待这件事。现在看来，你们那里的问题，恐怕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问题。本来山西出现的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信上也是一种写法了，经过你们这几天谈，加上中央很多领导同志了解立功同志，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缺陷、很大的弱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实说，你这个省委书记是不称职的。仅仅你们常委说的那些，不能作为一个省委书记的主要标准。光有那几条就当省委书记呀？恐怕不行。这需要立

功同志自己很好注意，也需要其他常委帮助。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就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弥补。

二、王建功<sup>2</sup>同志我这次才认识，但名字听到很久了。在雁北当县委书记就听说了，以后又到了太原。你最近在党校参加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的发言我也看了。建功同志有很多优点，思想解放，政治上比较敏锐，工作也还有魄力，在各地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根据你们这次生活会上讲的一些问题，我原来也听到一点，前几天也听到仲勋、兆国同志说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中上来的一些同志，有一些这方面的优点是很突出的，思想解放，政治敏锐，知识面比较广，工作局面比较大，活动能力比较强，有开拓精神。这些同志应当说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过一关，就是党性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确对待名、位、权。我所知道的一部分年轻同志优点很突出，但这一关并没有完全过。我不是说建功同志就有这个问题，但提醒一下很有好处。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终究是要栽跟斗的。（胡耀邦：要栽大跟斗啊！）第二是公道正派，不搞权术，不搞小圈子，不搞小动作。我们一部分青年同志也没有过这一关。我们要爱护这一批很有培养前途、很有发展前途的同志。必须帮助他们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必须时刻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不时刻警惕，将来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很难健康地成长。现在，我们有一部分青年同志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值得重视。我这不完全是针对你们讲的，反正有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省委里面，建功同志优点很多，但是恐怕这方面的问题是时刻要注意的，也希望常委的同志在这方面多帮助。

## 注 释

1. 李立功（1925-2010），山西交城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曾任山西省顾委主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2. 王建功（1936-1998），河北望都人。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曾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泰安市市长、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 后 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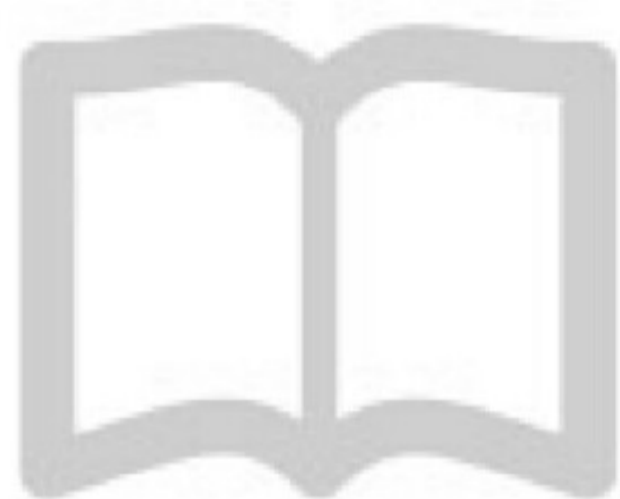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



此頁空白  
Blank Page